最强最铁血的海豹六队作战全记录
连续数月蝉联欧美各大畅销书榜第一名

（美）埃里克·格雷滕斯◎著
邸　峥　赵宏涛◎译

The Heart and the Fist

雄心铁拳

海豹六队高级指挥官摄人心魄的回忆录

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特种作战全程策划执行者倾情讲述生死历程

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　《DA师》作者王维
《狼牙》作者刘猛　《决战朝鲜》作者李峰
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上将

倾情推荐

（美）埃里克·格雷滕斯◎著
邸　峥　赵宏涛◎译

The Heart and the Fist

雄心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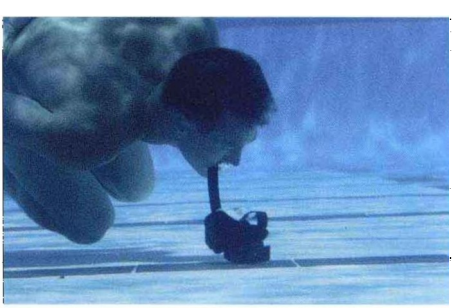
海豹六队高级指挥官摄人心魄的回忆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粉碎机操场：著名的水泥操场，我们在那里做了数以千计的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像所有“基本水下爆破训练/海豹”（BUD/S）学员一样，照片上的这两个人正在跑步。除了“地狱周”之后的一周外，学员在训练中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必须跑步。

BUD/S适应性训练开始时，班里有200多名学员，学习如何穿着靴子在柔软的沙地上跑步。最后每10个人中只有两三个人能够毕业。

BUD/S 训练中的一件怪事就是：我们要在风景最为秀丽的一片海滩上进行一部分最残酷的训练。照片上的学员们正在跑向一家全球知名的豪华酒店——科罗纳多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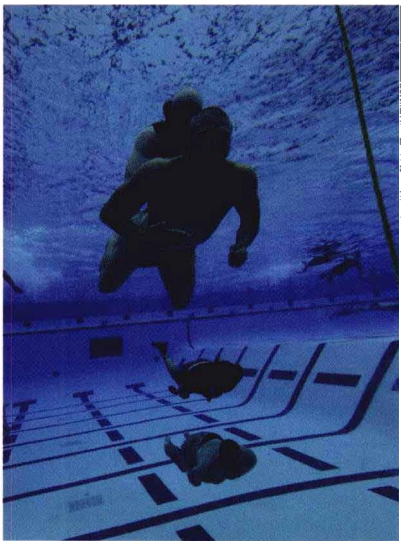


防溺水训练是 BUD/S 训练中最令人生畏的科目。这些人的脚被绑在一起，双手被反绑，然后跳进游泳池游 50 米，再在水下做前空翻、后空翻等动作，最后还要用嘴叼起扔在池底的游泳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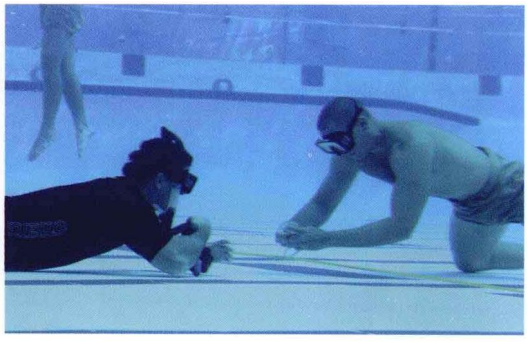
“冲浪”这种折磨遵循的原则很简单：躺在华氏 50 度的水里，等着体温慢慢降低。

划艇比赛。要在大浪打过来之前把小艇划过碎浪区，如果失败的话，小艇上七个体重超过 200 磅的家伙经常会被大浪打得飞出去。

原木体能训练是 BUD/S 中最痛苦的项目，是在用肉体上的折磨考验意志。要通过这个项目，不仅需要团结合作，更需要坚强的忍耐。



游完 50 米潜泳后准备伸手触壁的学员。注意站在池边的教官，他随时准备将在水下昏过去的学员救出水面。由于 BUD/S 的困难与危险，教官仔细地观察学员的一举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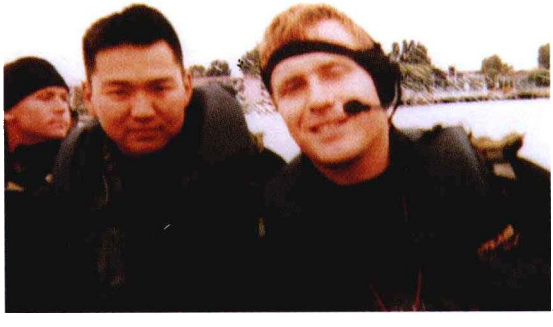
在 15 英尺深的水下，一名学员（右）正在一位教官面前打结。训练这个项目时，我的一个战友昏了过去，必须在池边进行急救。

教官们在地狱周开始时开枪射击。水龙中喷出的水流，烟幕弹中冒出的浓烟，喇叭中发出的噪音和空袭警报的哀嚎，对受训者形成了密集轰炸。教官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与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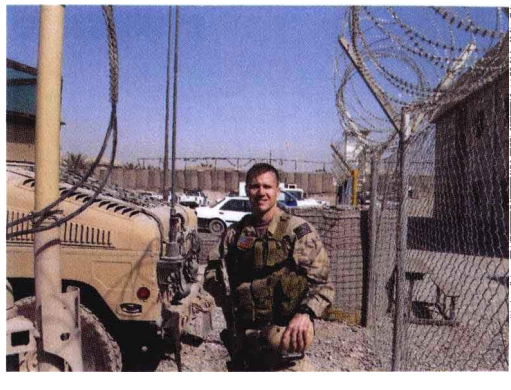
地狱周中，教官们总会把那口钟放在我们身边的地方。如果有人想要退出，他只要说一句“我退出”或者“我请求退出”，也可以站起身来走过去，敲响那口钟。

在地狱周第二天夜幕即将降临之际，教官们让我们站在沙滩上，看着太阳落山。在夜里，海水更加寒冷，时间感觉更加漫长，教官们变得更加苛刻。

在 BUD/S 的“示范坑”训练中，学员要练习炮火来袭时的隐蔽动作。习惯成自然，在伊拉克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时，我下意识地采取了这种姿势。



詹姆斯·苏和马特·艾里克森在海豹资格训练时都是我的小艇组成员。艾里克森后来在阿富汗与塔利班的一次战斗中陷入重围，苏跳上直升机赶往救援。那天是 2005 年 6 月 28 日，两人都于当天阵亡。



在伊拉克费卢杰政府大楼前。注意我身边的美国悍马车和后面的伊拉克警车。我们只有与伊拉克盟友团结合作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我们在肯尼亚的特种作战行动组，身后是我们的硬壳充气艇。

在肯尼亚拉姆的靶场与特种作战行动组的几名成员在一起。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祖父和外公

奥古斯特·格雷滕斯，上士，美国海军

哈罗德·雅各布，下士，美国陆军

目录

第一章　铁拳雄心……1

海豹训练……尖利的哨音一响，我们就要双手抱头、两腿交叉地扑倒在泥浆里。哨音两响，我们就要开始匍匐前进。哨音三响，我们就要起身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这样直到训练最后。

第二章　较量……11

我研究了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这支陆、海、空全能的突击队意味着严格的体能训练，苛刻的生存环境，令人望而生畏的测试以及队友间深厚的感情，深深地吸引着我。海豹突击队不仅会给你机会从飞机中跳下、佩戴水下呼吸器潜水或驾驶高速冲锋舟，从更深层次上来讲，海豹突击队也给了你机会担任领袖，报效国家。

第三章　预备军官学校……31

那是一份“哨兵岗位职责”。预备军官学校的网站建议我们在到达之前要熟记一些规则：以军人的仪态走向岗位，时刻保持警惕，仔细观察视野和听力范围内发生的一切；并同时汇报任何违纪、违规行为。总之，在海豹突击队，就连规则自己也要遵循规则。

第四章　海豹训练……51

“海豹训练”被公认为全世界最艰苦的军事训练。“海豹训练”时间长达六个月，其间参训者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要挑战极限。最终只有10%的报名者能够完成基本训练。另外90%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转到下一期。每年仅有约250人完成“海豹训练”，而且这250人也并非都能撑过接下来六个月的高级训练，最终成为海豹队员。

第五章　地狱周……99

地狱周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把你们每一个人拎出来扔到粉碎机操场上，我们要把你在地上摔得粉碎，看看你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有些人，我们在里面什么也找不到。只有空气，因为你们空虚、没有内涵。还有一些人，把你摔碎时发出的恶臭会让我们捂着鼻子赶紧逃之夭夭，因为你们在一种软弱的文化中长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们会被打回原形。其他的人，我们会在里面找到一把纯由大马士革钢铸成的利剑。你们将会成为海豹队员。

第六章　高级作战训练……151

海豹突击队可以从海上、空中和陆上发动攻击。我们是美国的精锐突击队，而此时此刻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刻苦训练，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战士。我们在海滩上集结训练，挑灯夜战研究阿富汗地图，把子弹一颗颗压入弹夹，分解擦拭武器，一遍又一遍地校准步枪，离开营地接受高级山地作战训练，修改军服，更新遗嘱，给自己的挚爱写下遗书。

第七章　前往阿富汗：这一次，不是演习……161

在飞往阿富汗的飞机上，我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的一端挂在飞机舱壁上，另一端挂在一个装满武器的货箱上。飞机里挤满了人和装着武器装备的箱子，有的人躺在吊床上看书，有的人躺在防震垫上睡觉，有的人坐在飞机座椅里，翘着脚，带着头盔通话器。飞机正飞入战区，而我正重读一本关于塔利班的书。

第八章　秘密突击……179

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假装这不是你们的错，假装你们是受害者，假装你们被误解了，假装你们没有做那个你们做了的决定。如果这样，这种想法会一直纠缠、困扰着你们。第二个，也是更好的选择是，你们要勇于诚实地面对所发生的事，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你们能诚实面对一切，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变得成熟。也是你们获得力量的源泉。

第九章　出击……199

《孙子兵法》中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时候，充分的战争准备能让我们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我们需要时刻准备好与敌人交火，但我们不希望与恐怖分子有太多的直接战斗。我们的目标是巩固自身的战略地位并积累优势，从而在恐怖分子出现时打垮他们，在恐怖分子躲藏时搜捕他们，尽可能地阻止其发展壮大。

第十章　"猎杀小组"在行动……213

作为海豹突击队员和"猎杀小组"指挥官，我的任务跟以前一样——击毙或捕获基地组织高层人物。但目标太多了，单独依靠特种作战部队无法完成打击任务。我的上司要求我们找到抓捕基地组织成员的新办法，并与常规部队和伊拉克陆军密切合作。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共享情报，同时评估海军陆战队军事训练组及其伊拉克

同行的战斗力，看他们能否胜任此类任务。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行动，我们就能极大提高对基地组织网络的打击力度。

第十一章　没有结局……227

支努干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传来，黑色的天空里慢慢出现了它灰色的剪影。我站在跑道外30码的地方，脚边放着我的背囊。直升机降落下来，激荡起一片尘土，尽管我带着耳塞，但双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依然让我觉得震耳欲聋。我和战友们握了握手，拿起两个装得满满的帆布背囊，慢慢跑向直升机。对我来说，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和飞扬的尘土通常预示着即将发生什么。走上坡道进入机舱时，我有一种熟悉的兴奋感觉。

后记和致谢……241

第一章

铁拳雄心

海豹训练……尖利的哨音一响，我们就要双手抱头、两腿交叉地扑倒在泥浆里。哨音两响，我们就要开始匍匐前进。哨音三响，我们就要起身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这样直到训练最后。

第一颗迫击炮弹落下时，太阳正在升起。

我和约尔都睡下铺，铺位紧贴着兵营西面的围墙。我俩从床上坐起身，约尔说道："他们最好放明白点，这样叫我起床会让我很不爽。"迫击炮袭击很正常，清晨的一声爆炸跟一个讨厌的闹钟差不多。

我们开始穿靴子的时候，另一颗炮弹在兵营外爆炸了，但沉闷的爆炸声说明炮弹的落点离我们足有几十码。叛乱分子的迫击炮一般打得并不准，打上的话纯是靠运气。又一颗炮弹落下——这次的落点更近了，兵营的围墙都晃动了一下。突然间枪声大作。

我不记得那辆自杀式卡车炸弹是什么时候引爆的。灯灭了，空气中烟尘弥漫。我趴在地上，两腿交叉，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大。遭到炮击时要采取这一姿势，这是我的海豹突击队教官告诉我的，也是从诺曼底滩头"水下破坏小组"（海豹突击队前身）的前辈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

海豹训练：尖利的哨音一响，我们就要双手抱头、两腿交叉地扑倒在泥浆里。哨音两响，我们就要开始匍匐前进。哨音三响，我们就要起身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一响，卧倒；两响，匍匐；三响，冲刺。这样直到训练结束。

在训练的最后阶段，教官们会使用烟幕弹和闪光雷。我们在泥泞中匍匐，头上几英寸就是铁丝网，周围则是刺鼻的浓烟，红色、紫色和橙色的烟雾让我们眼前一片模糊，只能隐约分辨出前面同伴的靴子和腿。我听见营房里面有人在我周围咳嗽，空气中尘土弥漫。接着我感到一阵烧灼感，就好像有人把一个打着的打火机扔进了我的嘴里一般，火焰灼烧着我的喉咙和肺部。我感到双眼剧痛，使劲把眼睛闭上，然后再用力睁开。叛乱分子

在卡车炸弹里面掺进了氯化物:化学袭击。我听见“性感的大弗朗西斯”上士，这个我们悍马车上的12.7毫米重机枪手就在离我一两英尺的地方喊道:“你还好吗？”

迈克·马里斯回答他说:“我很好！”马里斯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F-18战斗机飞行员,但他选择了离开舒适的机舱,拿起步枪参加费卢杰的地面战斗。

“约尔,你在吗？”我喊道。我的喉咙里像着了火,而且尽管我知道约尔就在离我两英尺的地方,但房间里尘土飞扬,我的眼睛又火烧火燎的疼,眼前一片模糊,根本看不见他。

他咳嗽着答道:“是的,我很好。”

接着我听到菲舍尔中校在走廊里喊道:“从这边能出来！这边！”

我抓住弗朗西斯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在散落一地的装备和瓦砾中跌跌撞撞地朝外走。我弯着腰,忍着眼睛的剧痛,摸索着跨过一个翻倒的柜子,来到外面安全的地方。我后来才知道,迈克·马里斯一开始走错了方向,从墙上炸出的一个大洞走到了兵营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差点被子弹打中。我从建筑的东侧走了出来,枪弹划破天空,纷纷落在东边一处路障后。菲舍尔中校就站在我身边。

我趴在地上开始剧烈咳嗽、吐口水,胃部一阵阵痉挛,想要呕吐,但什么也吐不出来。菲舍尔后来告诉我他看到我嘴里和鼻子里不停地冒烟。一个穿黄褐色裤子、黑衬衫、身材瘦削的伊拉克人在我前面弯着腰呕吐,嘴上还挂着几绺黄色的呕吐物。

我低下头,看到衬衫上有一块暗红色的血迹,裤子上的血迹更多。我用右手在衬衫上摸了一下,又按了按胸口和胃部,没有感到疼痛,但我在训练中曾经学到,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会掩盖伤口的疼痛。

我又检查了一遍,胸口、腋下、腹股沟、大腿,没有受伤。我用手指摸了摸颈后和后脑,手指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汗和血,但我找不到伤口。

那不是我的血。

我的呼吸很轻,因为每次我试图深呼吸的时候,喉咙都会产生窒息感,肺部更是像着了火一样。但我们必须参加战斗。我和迈克·马里斯冲进建筑。我们的一名伊拉克战友正站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楼梯上用AK-47

开火。枪声在整栋建筑中回荡。

菲舍尔和另一名陆战队员在氯化物的烟雾中发现了约尔，他正坐在地板上，努力想把靴子穿上。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中了约尔的头部，后脑处血流不止。他的确说过“我没事”，当时的意识也还清醒，但他没有站起来离开营房，因为他的脑海中一直想着靴子……靴子……靴子。

我同菲舍尔和弗朗西斯冲上被炸得歪歪扭扭的楼梯，前去占领制高点。那辆自杀式卡车把兵营西面的墙整个炸飞了，所以当跨过大块的混凝土和瓦砾冲上楼梯时，我们完全暴露在西面敌人的火力之下。兵营中的伊拉克士兵们朝四面八方猛烈开火——这是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兵营，我们不过是战争这一阶段中他们临时的盟友而已。但当我冲上楼梯时，我找不到任何目标。在楼梯顶端，我停下来等待火力间隙，随后忍着呼吸带着剧痛冲上了楼顶。上面只有一名此前在执勤的伊拉克士兵，他正抱着一挺M-60机枪，向西面倾泻着子弹。我冲向西北方，弗朗西斯紧跟在我身后，他冲向西南方。就在此时，一串子弹打了过来，我一下扑倒在粗糙的褐色混凝土地面上，在一堆塑料饮料瓶、空牛奶盒、烟头、罐头盒和碎玻璃瓶中匍匐前进——这些都是曾在这里执行警戒任务的伊拉克士兵们留下的垃圾。

我冲到房顶北侧后就开始搜索目标，看到东北方的一座清真寺内有一处高耸的尖塔。狙击手常常躲在尖塔内向美军开火，但这座塔的距离太远，就连最好的狙击手也很难在这个距离上命中目标。我一面搜索街道一面不停地移动，以防万一。

妇女和儿童在下面的街道上四散奔逃，但没有人持有武器。在北面更远的地方，我看到有武装人员在跑动。我缓缓地吸了一口气，瞄准后将手指抠在了扳机上……不，那些是从我们基地里冲出去的伊拉克警察。

我朝弗朗西斯喊道：“你看到什么了吗？发现目标了吗？”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太阳升起了。屋顶上开始变得酷热难当。我们呆在屋顶上继续观察。我还是得小口呼吸，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胸口捆了一根带子，然后拼命地勒紧，打算把我勒死。我又朝下面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我们带了充足的弹药，我还带了急救包。我们占领了制高点，有良好的掩

蔽，视野开阔，能够观察敌人的每一条接近路线。虽然我们需要些水，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守上几个小时。我坐在费卢杰一座刚刚遭到炸弹袭击的建筑物顶上，周围堆着臭气熏天的垃圾，心想：兄弟，我可真够幸运的。

特哈维斯·曼宁和另外两名陆战队员随后也冲上了屋顶。特哈维斯刚刚从海军学院毕业，是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我们是在费卢杰街上一起巡逻时认识的。特哈维斯是条硬汉，但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的下属和伊拉克人都很尊敬他。当时费卢杰到处都是《斯巴达300勇士》[1]这部影片的盗版碟，在他们眼中，特哈维斯就是一名完美的斯巴达战士，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甘愿牺牲一切。他也认为自己的任务同那300名勇士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远离家人而战是为了保卫家园。

我又看了一眼那座尖塔。天空湛蓝，万里无云。真是个好天气。电台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通知我们，快速反应部队的坦克已经朝这边赶来。爆炸、枪击带来的紧张过后，情势平静下来，天也变得越来越热。坦克到了，还来了几辆悍马车运送伤员。因为我和弗朗西斯都曾在爆炸现场，我们两人接到命令，前往医院接受检查。我问特哈维斯："行吗？"

"行。别担心，我在你背后呢！"

所有的装甲悍马车都坐得满满的，所以我跟一名年轻的陆战队员挤进了悍马车用来运装备的尾舱里。悍马车的尾舱是敞开式的，仅在侧面焊有两块绿色的装甲钢板。我们躺在里面得到的防护跟两个孩子打水仗时躲在一辆皮卡车货厢里的情形差不多。在开往基地的路上，我们完全暴露在街道两旁窗户和屋顶的火力覆盖范围内。悍马车在费卢杰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向前驶去，我们把步枪上了膛，随时准备还击。

等我们出了城之后，我问旁边的年轻陆战队员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你知道吗，长官，我觉得这次任务结束后我还是赶紧回家比较好。"不知怎地，这句话让我们感到非常滑稽，开始放声大笑，笑得筋疲力尽，但也感到十分放松。

---

[1] 2007年的电影，讲述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亲率三百名勇士镇守温泉关，抵御数万波斯军进攻，最终全部战死的故事。

在费卢杰医院，我同许多美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起接受了治疗，许多人衣衫不整，浑身血迹斑斑。我问约尔怎么样了，有人告诉我他头部的伤很重，已经被飞机直接送往巴格达了。

回到兵营后，我脱下靴子，拽下衣服，把防弹衣扔在角落里。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氯化物的味道。我走进淋浴间，让水冲洗自己的身体，同时揉搓着头皮，冲掉头发里面的混凝土碎渣。碎渣掉在淋浴间的地板上，再被冲到下水道里。我看着这些碎渣心想，这次可真够悬的。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每个晚上都躺在床上剧烈地咳嗽。早上醒来后跑步时肺部总是不舒服，感觉像是被堵住了一般。但我还是天天跑步，最后我终于能够做深呼吸了。在这几周里，我的听力也有所下降，但情况原本可能比这糟糕得多。不是我所有的战友都像我这样幸运。

一个月后，特哈维斯·曼宁中尉牺牲了。

约尔来到了我在华盛顿的住所，这还是那次卡车炸弹袭击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约尔是一名情报军官。他与伊拉克在费卢杰当地的驻军合作十分紧密，不但对自己手下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清楚伊拉克人的姓名、历史、喜好。他快活开朗，明智冷静，每次巡逻前都要抽一支运气烟。他的妻子给他寄来香浓的咖啡，他在费卢杰的办公室里还备有大量的糖果和干果，热情招待来访的每一个人。

我们聊他儿子的棒球，他的高尔夫球赛。他告诉我在他受伤之后，军方派了一位心理专家对他进行评估。专家问约尔有没有易怒的问题。约尔回答说："早上喝咖啡之前我总是很烦躁，但这跟一次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有他妈的什么关系？"

他恢复得不错，告诉我想回伊拉克自己的部队去。他低下头，让我看他后脑处缝合后留下的疤痕。我从一个黑色帆布包里取出我的防弹衣，给他看上面残留的血迹——那是他的血。

"能把这个（他的血）还给我吗？"

"你当时应该低下头，"我说，"曼宁一家知道我们要去吗？"

"知道，我来你家的路上就给他们打电话了。"

我们一起开车去曼宁在宾夕法尼亚州多勒斯镇的家。在那里我们见

到了特哈维斯的父亲汤姆·曼宁上校，他的母亲詹妮特·曼宁，他的姐姐瑞安和姐夫戴夫。

汤姆·曼宁上校向我们讲述了特哈维斯的灵柩返回故里时的情景。道路两旁站满了前来致敬的人们，美国国旗在消防车的云梯上高高飘扬，警察、邻居和亲朋好友组成了一支300辆的车队，将特哈维斯的遗体从教堂护送至墓地。曼宁上校告诉我在特哈维斯执行任务期间，他经常与儿子通电话，并打算那年秋天一起参加海军陆战队的马拉松比赛。现在他无法同特哈维斯一起跑了。他说："不过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有那么多人赶来，对他说'欢迎回家，勇士，欢迎回家'。"

我们取出一张费卢杰的地图，把它摊在曼宁上校的桌上。约尔向他介绍了特哈维斯在费卢杰当天的巡逻情况和牺牲的细节。

"这里是工业区，这儿……"

我们努力让特哈维斯的父亲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特哈维斯在伊拉克战斗和生活的情况。特哈维斯的队友发来了他们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的照片：悼念场地的中央倒插着一支步枪，枪的两旁各摆着一只军靴，特哈维斯的头盔挂在枪托上，周围则是参加仪式的美国陆战队员和伊拉克军警。约尔把照片一张张拿给上校看，向他逐一介绍那些悼念特哈维斯的美国人和伊拉克人。

"有时候他们的狙击手会藏在这儿……"

我们跟特哈维斯的家人一起在门廊坐下，准备吃晚饭的时候，我和约尔都在想，这是特哈维斯的座位；他应该在这儿。

尽管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特哈维斯的家人并没有产生怨恨、愤怒或绝望的情绪。曼宁夫妇失去了他们的独子，但我深深地感到他们以特哈维斯的一生为荣。

我们那次在费卢杰并肩作战之后4周，特哈维斯壮烈牺牲。他的银星奖章嘉奖状上写道：

> 当曼宁中尉带领的巡逻队搜查完一处疑似叛乱分子的住所后，巡逻队遭到轻武器火力攻击。一名士兵受重伤，巡逻队陷入重围。曼宁中尉与一名陆战队员冒着猛烈的炮火将受伤的士兵转移到安全地点。

救回伤员并对其实施急救之后，曼宁中尉带领巡逻队发起反击，并亲自用 M4 步枪和 M203 榴弹发射器摧毁了敌人的一处阵地。在他指挥战斗期间，又有一名陆战队员负伤。他再次不顾 5 名叛乱分子的猛烈射击，穿过敌人的火力杀伤区救援这名陆战队员。伊拉克陆军的增援部队因为遭遇路边炸弹无法向叛乱分子的侧翼挺进，结果曼宁中尉和他的巡逻队受到敌人三面围攻。为了获得更有利的射击位置并将敌人的火力从受伤的陆战队员身上吸引开，曼宁中尉再次挺身而出，被敌人的一名狙击手射中身亡。他英勇无畏的举动激励部队发起反攻，最终挽救了巡逻队中其他所有士兵的生命。

当特哈维斯说“别担心，我在你背后”的时候，他是认真的。

特哈维斯曾学习过希腊历史，这让我想到了古代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对雅典战役阵亡者家属的演讲，他当时说道：“你们留下的不是墓碑上铭刻的名字，而是融入其他人生命中不死的精神。”

在那片遥远土地上，激烈而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在曼宁家中以及费卢杰的许多伊拉克人身上看到了集体精神。在我和约尔开车回家途中，我思考着两者之间的联系。之前在波斯尼亚、卢旺达、柬埔寨和其他许多国家，我也曾遇到过许多勇者，他们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一颗悲悯之心。在这个世界上，即便在那些“最艰难的地方”，人们依然能够将痛苦化为智慧，将苦难变为力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为逝者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在人道主义危机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甚至在国内的餐桌旁，我都深深地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停止战争，幸福的生活也不仅仅是消除苦难。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变得更加高尚、更加有力的时候，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坚实的和平、繁荣的和平。只有当我们不再仅仅为自己而活着的时候，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享受生活，度过美好而有意义的一生。

途中，我和约尔决定要为曼宁的家人做点什么。我们要让特哈维斯和所有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精神万古长存。

第二章

较量

我研究了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这支陆、海、空全能的突击队意味着严格的体能训练，苛刻的生存环境，令人望而生畏的测试以及队友间深厚的感情，深深地吸引着我。海豹突击队不仅会给你机会从飞机中跳下、佩戴水下呼吸器潜水或驾驶高速冲锋舟，从更深层次上来讲，海豹突击队也给了你机会担任领袖，报效国家。

我见过各种武装冲突造成的暴力、悲剧和伤痛，但我认为，在虐待和遗弃中长大的孩子比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或肢体的孩子活得更加艰难。在玻利维亚，大多数流浪儿童从未体验过家庭的温暖，更不可能去上大学。我猜其中也没有几个人曾享受过一天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如果我们要改变，就必须首先理解。如果我们要关爱，就必须首先接纳。杰森和卡洛琳的善行始于接纳和关爱，然后凭借他们的勇气、智慧和同情心，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改变那些孩子们的生活。他们的关爱以耐心为基础，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懂得：他们并未无所不能，但是他们必须尽力而为。

后来，我在军队中读过一些军官写的简报，出于善意，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准备在战后当地统治崩溃后“迅速重建公民社会”。我尊重他们的美好意愿。但如果说我在玻利维亚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公民社会、人的品质和孩子们对未来的信仰，这样的东西决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造就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东西可以靠战斗夺取，有些东西则必须接受，有些转变可以推动加速实现，有些转变则必须建立在长期内部改革的基础上。只有这样，人道主义者，战士，学者，外交官才能各尽所能。我才 22 岁，我仍然坚信能够通过努力改变世界，但在玻利维亚的经历也告诉我，耐心和接纳同样不可或缺。

在玻利维亚，我重读了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一书。在书中，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爆发了鼠疫，一个名叫伯纳德·里厄的当地医生和一个被困当地无法返乡的名叫简·塔鲁的旅行者，共同组织了一支志愿防疫队与鼠疫斗争。在工作间隙，里厄和塔鲁讨论生活的意义何在。塔鲁说：“一个人

当然应该为挽救受害者而奋斗。如果他不再关心身边发生的事，那他的奋斗还有什么用呢？”

在海外进行人道救援的工作当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不但要为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还要让我们的生活值得为之奋斗。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申请了罗德奖学金。罗德奖学金是一个每年一度的世界性奖学金，发放给那些有意愿“为全世界而努力奋斗”的学生，获奖者将会被送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正是在牛津，我才真正开始欣赏生命中所有的美好：欢乐、喜悦、休憩、爱情、安宁、和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为之去奋斗的东西，为了他人，也为了我们自己。

牛津大学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更给了我们许多聚会狂欢的机会，远远超出我之前的想象。最重要的是，牛津给人难以想象的自由。我去上课，但考勤不计入分数，只要到年底露面通过考试就行。罗德奖学金的生活津贴不是太多，但只要精打细算，就可以用它到处旅行。津贴的使用没有限制，我得到唯一的指导就是：“充分利用它。”

伊丽莎白女王厅坐落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看上去像一个英国乡村庄园。我在那里通过了一个关于发展研究的学术项目的面试，进入一个多样化的国际班，班上的学生来自南非、西班牙、印度、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和比利时。在那段时间，我不仅可以向教授们请教，也从同学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很快，我发现牛津不光欢迎多样性，也欢迎特立独行。有一个学者，人们叫他“土耳其汤姆”，如果算上他那一蓬科学怪人般的乱发，他大概有6英尺半高。他穿着黑色军用上衣，在学院各教室里走来走去，嘴里嘀嘀咕咕地念叨着他的长篇学术论文，然后花7年时间去完成它。在牛津，大学者们真的就是穿着软花呢休闲服，骑着自行车在城里穿行。

在我阁楼房间的窗前，摆着一张黑色木课桌。我每天早上坐在那里读书、写作，看着太阳从学院教堂顶上升起。大学里经常举办各种课题的报告会，并对所有学生开放。有天早上，我坐在桌前看学术报告安排表，用一支黄色标记笔标注了我感兴趣的报告：英国历史、当代文学、道德哲学、科学史、现代艺术、古希腊文明、议会政治等，这就像一场你可以随手取食的学术盛宴。一天，我去听一个哲学报告。报告厅是一个古香古色的房间，里面竖立着一排排木质的书架，一本本皮边的图书沉重地压在书架上，教

授的声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响起："什么是真理？"

晚饭可以持续整整一个晚上。在我就读的马格丽特夫人学院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我和英国历史学家、瑞士化学家、智利人类学家和波兰指挥家坐在了一起。我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这里的人们怎么能完成工作。下午5点，我们开始喝餐前饮料，然后喝鸡尾酒。6点半，我们坐下来开始吃饭，菜一道接一道地上，当你觉得应该吃完了，又转到另一个房间里，吃巧克力，喝饮料。之后，大家再一起去酒吧。你们每天上午、下午喝两次茶，中午出去和朋友吃顿饭，而我觉得我一天都在吃、喝、聊天。"

罗德奖学金基金会在阿尔卑斯山有座不小的木屋，有一次我应邀去那里参加一个"读书聚会"。每天早上我们一起读书，然后用大半天去阿尔卑斯山上徒步远足，晚上会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非正式的论题供大家讨论。我已经记不太清我提出了什么论题，但我确实让一大群国际学者更加了解美国。

我和几个朋友去一个英国乡村庄园呆了一星期。我们在那里一起读哲学，沿着小路在乡间漫步，葱翠的田野里到处点缀着白色的羊群。回到牛津，我们去河里划船。用16英尺的长竿撑船，坐在船里吃草莓，喝香槟和果汁，船时不时地会轻轻碰在河岸上。

我和美国来的同学努力想在文化交流上有所贡献，尝试着教其他国家的研究生们玩美式橄榄球。我的朋友艾德一直想当教授，所以由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美式橄榄球比赛的规则，最后，所有人都朝他点头表示听明白了。我拿起球准备开球，这时看到我方的有个队员跑了过来，而且这个英国化学家无人盯防，于是我就把球扔向他，可是球从他身边飞过去掉到了地上。对方的一个德国历史学家飞快地捡起球开始狂奔，我方的一个波兰工程师想擒抱他。艾德高喊："不，不，本次进攻结束。"此时，我方一个希腊语言学家冲过来把德国人撞倒在地，紧接着，一个南非律师扑倒在德国人身上把球抠了出来，扔给10码外一个澳大利亚生物学家，可他没接住，球掉了，他又把球捡起来，冲进了球门区。我这一方开始狂热地庆祝了起来。

"Yes!" "Ja!" "Nai!" "Tak!"各种语言的欢呼声响起。

艾德双手撑着膝盖，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我说："我猜这也算达阵吧！你想再给他们解释一遍开球规则吗？"

牛津的夜晚是迷人的。当白天最后一缕亮光轻轻融入夜色，现代生活的明快印记悄然退去，剩下的只有蜿蜒的鹅卵石路，城堡一样的学院建筑，还有灵气十足的怪兽饰[1]，带着500年恒久不变的或顽皮、或恐惧的表情，在那里微笑、皱眉、逗趣。有天晚上，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我站在古老的谢尔登剧院外，看着匆匆忙忙的人流从我身边拥入剧院大门。一个美丽的姑娘骑着车从我身边经过，朝我灿烂地微笑了一下，这回眸一笑就是我们之后五年朝夕相处的开始。

周六早上，我们一起做早饭，做巧克力薄饼和奶酪鸡蛋，然后在背包里装满水果，出去沿着牛津运河散步。我们在小路上尝试不同的岔路，在上次转右的地方转左，然后在满是高草的野地里穿行，再沿着河走，接着就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奇迹——一家小酒馆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们在那里吃午饭，品尝鱼和薯条。

我们周末会去露天集市，在货摊上买新鲜水果，把背包装满法国面包、西红柿、熏火鸡、法国布里白乳酪和鳄梨。天变长了，我们就会很早出门，在山路上骑车走上几英里，看看绿色的田野、奔腾的马群和放牧的羊群。我们会遇到一些农民，他们拄着长长的木手杖，大步流星地在山路上行走，牧羊犬欢快地跟在他们身后。我们有时会随兴而动，带着一张地图和“我们去那个小镇吧”的想法就出发，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能提供食宿的小旅店里停下来吃晚饭，在疲累的时候，简单的饭菜吃起来也是那么的美味。接下来，我们会去洗个澡，洗去一身的泥土，然后相拥而眠，简单、幸福，安稳。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步行去特劳德酒馆，坐在火炉边点一些热巧克力，炉火上烤着的栗子发出诱人的香味。

有的周末我们会租一辆小车，花上几天时间去探索整个不列颠。我们到过海伊镇，那里有很多古老的书店。我们到过湖区，徜徉在那里大片的石南花海里。我们到过北威尔士一座12世纪古堡的废墟，坐在已经残破的石墙上聊天，之后走下葱绿的山坡，趟过一条湍急的溪水，走进一个威尔士村庄，在一个小茶馆里避雨。

我们去了马耳他，在地中海的碧波中潜水，去探访那闻名遐迩的圣约

[1] 中世纪西欧建筑上的怪兽状滴水嘴。

翰骑士团[1]古城，租一辆敞篷吉普在岛上兜风。我们乘轮渡到北爱尔兰，在1998年那个耶稣受难日步行穿过高威城，那天也是北爱和平协议——《贝尔法斯特协定》的签订日。还有些周末，我们会停留在巴黎，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跑到楼下的面包房买一袋羊角面包和巧克力，再沿着塞纳河散步。

一天早上，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我在罗丹的著名雕塑"思想者"旁边等着女朋友的到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我坐在那里剥着橘子，我把橘子瓣掰开时，看到每一条果肉纤维上都闪着亮晶晶的光，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已经向我敞开，所有的美好都在我的手中。

我加入了牛津大学的业余拳击俱乐部(成立于1881年)。亨利·迪安是这里的总教练，他在这里的地位就像阿拉巴马橄榄球队里的贝尔·布莱恩特或者杜克大学篮球队里的麦克·克雷泽维斯基。在牛津大学的体育赛事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每年一度与剑桥大学之间的校际比赛。到我加入牛津拳击队为止，亨利已经连续七年在该项赛事赢得拳击项目的胜利，这是两校所有校际赛事中最长的连胜纪录。牛津大学里多是富家子弟，亨利·迪安就像是一座孤岛，代表着英国工人阶级坚韧的精神和勇气。从那时起，打拳开始成为我在牛津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

有一天，很多人正在训练，我问队长哪些拳手会被淘汰。他对我说："亨利不会淘汰任何人，他没必要那么做。"亨利让所有人都接受训练。

由于有各种各样狂欢派对，牛津的生活每天都很晚开始，上午10点的课已经算早了。但拳击队不同。全队每周都有几个上午要在海丁顿山脚下集中。这座山是牛津城中最大、最高的山。在日出之前，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整个牛津城。通常情况下，牛津城的主要街道会挤满熙来攘往的车辆和人群，有乘坐巴士慕名前来的游客，还有穿着睡衣的学者们。但在这样早的清晨，牛津城像熟睡的婴儿一样安安静静。城堡一样的马格达伦学院、查威尔河，一切都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

在上午激烈的训练开始之前，骑上一段自行车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当

[1] 亦名罗得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最后演变成马耳他骑士团，现为联合国观察员的"准国家"组织，是最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一，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

我到达基地时，亨利·迪安已经等在海丁顿山脚下，他穿着一件粗布的蓝色上衣，手上戴着棕色的劳动手套，手里的秒表已经归零就位。亨利大概有5英尺9英寸高，尽管岁月的磨砺让他变得更加刚毅，他走起路来还是有一点瘸，然而在他教打刺拳的时候——“就这样打他，砰！砰！砰！”他步伐的移动还能看到以前拿全国冠军时的风采。早上7点半，我们会准时在山脚下集合。亨利会说：“我们开始吧！”于是，我们像是一群嗅到狮子气味的瞪羚，拼命朝陡峭的山上跑去。

大多数早上，我们这伙人都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胡子也不刮，当我们沿着小路飞跑的时候，偶尔会吓到那些早上出来遛狗的睡眼朦胧的英国女士。亨利把我们分成几组在山上赛跑。他巧妙地设计了线路，完成每一轮比赛后，我们就能慢慢地放松着跑到山脚下。随后一声哨音响起，我们又要再一次往山上疾冲。当我们大口喘着气，想短暂地休息一下时，亨利会说：“剑桥那帮人现在还在睡觉呢。”

亨利容不得抱怨，也容不得胆怯，如果有人想找个借口不来海丁顿山时，亨利会说：“我不想听什么借口，如果有谁不想训练，那么他们就是不想当拳击手，他们可以离开。”

大卫·克雷林以前从未打过拳，他第一次和我练拳时，就被我把鼻子打出了血。大卫转身就想走，亨利又把他推了回来，边推边说：“欢迎来到拳台！”人们都害怕亨利发怒，但更害怕他在打拳时搞卫生的做法。大卫鼻子流血时，亨利走到拳台一角，从一桶水里拿出一块黄色海绵，把海绵按在大卫脸上，接着弯腰用那块海绵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然后把它扔回水桶里。再有人流血时，亨利又会从桶里拿出这块海绵，再把它按在那个人的脸上。

亨利经常会让我们练到筋疲力尽。“多练习，你们需要多练习。”他举着手靶陪我训练时，他一边绕着拳台移动一边说：“打，打，刺拳，现在！”在这时，一点都看不出他瘸了。我的拳头击打在手靶上的声音在整个训练馆里回响，他不停地喊：“继续，加油！”他一直让我打，练得我的双臂都快抬不起来了。这个回合结束时，他会用一个手靶敲敲我的头，对我说：“打得很好。”此时此刻，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毫无掩饰地袒露在我面前。

亨利带着我和牛津拳击队一起到不列颠各地去打比赛。在牛津剑桥

地区教员学生对市民的拳击比赛中，我们和当地拳手比赛。拳台很小，周围摆着桌子，观赛的人们穿着晚礼服，吃着牛排，抽着雪茄。我们参加英国大学体育联盟的全国冠军赛，我和队友一起夺得了金牌。我们去过不少小的工人拳击俱乐部，也去过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院。在那里，军队的一名风笛手引领着我们走向拳台。

我到牛津第二年的校际比赛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考验，也是我体验“牛津式教育”最难忘的夜晚之一。牛津市政厅里聚集了数百名前来观战的观众，拳台周围摆满了座椅，人们趴在拳台边高声喊叫着。拥挤的人群紧紧地围在拳台四周，拳手们的汗水能洒落在人们的身上。我们在更衣室进行赛前热身时，就能听到外面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当我走向拳台时，我感觉像是走进了一场暴乱的中心。

学生们穿着运动夹克，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袖子也都卷了起来，他们高举着拳头大喊着：“打倒他！打倒他！”牛津的支持者们高喊着：“牛——津！”剑桥的拳迷们也回应着：“剑——桥！”那些曾获得拳击蓝绶带[1]的老家伙们，带着他们那耀眼的蓝绶带，坐在拳台边上，高喊着：“Shoe! The! Tab! Shoe! The! Tab!”Tab是指剑桥的学生，而Shoe是指毫不留情地痛打，那意思就像是把人打倒在地后还要再朝他脸上踢一脚。就连所有那些在牛津生活的怪人们也都涌了出来，学者，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他们来自上百个不同的国家，上千种不同的文化，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同样嗜血的族群。

在比赛开始前，拳手们都会恶狠狠地互相盯着对方，他们瞪着对方的眼睛，直到裁判把他们赶回自己的角。不过伊尔不是这样教我的。

“为什么你要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他对我说，“你要像一个绅士那样走向拳台中心，裁判说话时，你要尊敬地低下头，这会使裁判喜欢你。更重要的是，对方本是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强硬，但他却只能盯着你的头看。他可能不得不问问自己，他盯着你的头看有什么意思？他需要放松一下吗？他是不是也要低下头呢？拳赛还没开打，你就已经把他搞糊涂了。”

裁判让我们碰下拳头，我抬起头，微笑着说：“祝你好运。”

---

[1] 牛津、剑桥拳击比赛的最高荣誉。

“接下来，你要朝他微笑，你要对他说‘祝你好运’，”伊尔告诉我，“这样你就主动了。你是那个更强大的人。而你的对手又该迷糊了，这人比赛前冲我微笑是啥意思？这会让你的对手想破头的。”

我走进拳台的时候，亨利对我说：“用你的刺拳，埃里克，用你的刺拳打他，你能把他打倒，没问题，放松！”

人群疯狂地尖叫着，我的对手在拳台那边盯着我。我从人群的狂呼乱叫中分辨出了队友们的声音：“去收拾他，埃里克！”然后是亨利的声音：“没问题，放松！”

铃声响起，我迅速向前打出两记刺拳，我的对手向后退去，举起双拳把脸护住。我们绕着拳台试探着，我突然打出一记刺拳，感觉这一下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脸上。我继续向前压迫，他一直向后退，我又是两记刺拳，紧接着打出一记伊尔教会我、亨利训练我的右勾拳，这一拳干净利落地打在他的下巴上。他的双腿立刻难以控制地踉跄起来，整个身体也一阵痉挛。我走到中立角等着裁判读秒：“4，5，6，7……”裁判看到我的对手无法再继续下去，挥手终止了比赛。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野兽般的狂吼，我把拳头高高举在空中。五年的艰苦训练，换来了这一回合辉煌的 84 秒。

赛后我们一起去威尼俱乐部吃晚饭。威尼俱乐部是牛津蓝绶带俱乐部，里面随处能看到以前牛津的拳击手和其他运动员的照片：1892 年，1904 年，1937 年，1972 年。尽管里面有黑白照片，也有彩色照片，但每一张照片都看起来有些相似，年复一年，年轻的人们在这里接受训练，比赛，然后直视着照相机拍照留念。直到今天，我在 1998 年牛津业余拳击俱乐部里结识的一些人仍然是我的好朋友。那一年，我们以 5 比 4 的比分赢了剑桥，那也是亨利的第八场胜利。后来他更创造了 13 次校际比赛连胜的纪录。连同亨利到来之前的三次胜利，牛津拳击队保持着牛津体育史上最长的连胜纪录，直到现在仍保持着这项荣誉。有时早上起来跑步时，我还能听到亨利的声音：“剑桥那帮人现在还在睡觉呢！”

一边享受牛津的舒适生活，一边接受拳击队的锤炼，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人道主义工作的探寻。我写了一篇相关论文，论点很简单，那就是“解

决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的健康和生存问题的长远办法，不在于给予他们什么，而在于让他们做什么”。不应简单地给那些孩子们援助，而应为已经开始努力恢复正常生活的孩子、家庭和社会团体提供必要的支持。

我研究了挽救儿童组织的历史，也了解到该组织的创始人的理念是如何转变的，他最初的目的是想帮助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饥饿儿童，之后反对“以向儿童提供援助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后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帮助那些家庭找到有助益的工作”。我研究了1967—1971年比夫拉出现的饥荒危机，也研读了卢旺达的新兴文学。我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文学作品和人道主义危机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许多十分相似的建议和意见。虽然这些教训一遍一遍地被记录下来，但人们并没有认真汲取，更没有充分付诸实践，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重犯同样的错误。

我一直潜心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慈善组织可以激发人们的力量，也可以只是简单地分发一些救济物资，但为什么前者要比后者难得多？当我阅读人道主义行动历史时，我从亨利·杜南[1]的故事中受到了启发。1859年，杜南去意大利出差，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一天早上，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住的地方旁边就是战场，遍地都是死尸和伤兵。法国—撒丁联军和奥地利军队的士兵绝望地躺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苏法利诺的战场上。杜南后来写道：“那些可怜的伤兵，脸上一片死灰，筋疲力尽。有些重伤的人表情已经木然。还有些人的伤口已经感染，痛苦的折磨使他们已接近癫狂。”

杜南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但在数量庞大的伤兵面前，他的努力显得那么可怜，那么微不足道。杜南敦促路人参加他的救援行动中，并亲自给伤员家人写信。

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并引起了巨大反响。他由此决定宣传一个简单的观念：受伤的士兵不应该遭受痛苦，不应该孤独地死去，志愿者们应给予帮助。伤兵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不应该遭到攻击。国际红十字会正是基于这一观念诞生的。

杜南在战场上呆了两天，他是一个商人，没有一点医疗和战争知识。

---

[1] 1828—1910，红十字会创办人，被后人尊称“红十字会之父”。

但根据他那两天的经历，他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组织（红十字会），并根据人的基本道德确立一系列原则（他的观点最终形成了日内瓦公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原则都适用。

杜南离开了战场，决心改变整个世界对待战争中受害者的方法。他本可以带着对一群人滥杀另一群人的厌烦和自己在战争浩劫面前独木难撑的沮丧一走了之。在杜南之前，数以千计的军人和各种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士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伤者在自己身边逝去，却没有一个人具备杜南的见识。

我知道，无论自己写什么，说什么，我永远不会有亨利·杜南那样的影响。但我坚信，如果用心倾听、努力工作，我也有可能像杜南那样，在亲手作贡献的同时，激发出人类最本源的力量。如果能够激发出这种力量，就会产生无限可能性。所以在牛津大学埋头于大量档案文献的同时，我仍会抽出时间游历、调研和拍照。

1996 年 12 月，我去了加沙地带。我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带到边境时对我说："我从没去过加沙，永远也不会去那里。你真要去加沙吗？你是认真的吗？那里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所有人都是恐怖分子。"

在加沙的大街上，一群好奇的人给我喝茶，给我吃面包，这样的人好像到处都是。我们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坐在箱子上或凳子上，他们会问我："你来加沙干什么？""美国人怎么看加沙？"我们谈论政治、历史、失业、生活条件、捡垃圾的事，还有联合国和阿拉法特[1]。孩子们穿着捐献来的衣服，在街道上相互追逐着，在晾衣绳下面钻来钻去，他们会坐在岩石上，也会堆石头过家家。房子一栋紧挨着一栋，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在小胡同里飞跑而过。

每一次对话都像有政治含意，每一次观察都似乎直击历史。如果我问一个孩子是哪里人，她会告诉我海法、特拉维夫或者耶路撒冷，哪怕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根本没见过这些城市。虽然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里，但成年人会不屑地挥挥手，把加沙称作"这个地方"。我不得不重新考虑"难民"这个词。在加沙，一家人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 50 年，但他们仍然梦想着有另外一个"家"。

---

[1] 1929—2004，1989 年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1994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走在这里的大街上，会让人变得谦卑。到1996年，加沙已经被以色列控制了将近30年；之前被埃及控制了20年；再之前，被英国控制了30年；再之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了将近400年；在那之前的3000年里，这里相继被十字军、哈里发帝国、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马其顿人、波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色列人控制着。一个人到底需要多久才能对这样一个地方有所了解？

在加沙，年轻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历史，这是我去过的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们不仅仅会给我描述他们想象中的家园，就连9岁、10岁的小孩子，也能向我讲述他们眼中的阿以冲突。街道两边的墙上有很多死去的加沙少年的大幅画像，正是最近几次冲突的有力见证。我正看着孩子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一位老人向我引述了一段阿拉法特的话。阿拉法特曾经说过，一个巴勒斯坦妇女的子宫就是一件“生物武器”，他可以用它把人塞满加沙地带和西岸，由此创建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个男人微笑着，脸上洋溢着自信，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遭受的每一次屈辱，每一次无力的感受，每一次对尊严的侮辱，都会在暴力中得以洗雪。加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53%的人口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相信这些孩子都是武器。

街上到处是我的同龄人，他们都吃的不错（部分食品是由联合国提供的），也接受过一些教育，但他们几乎没有离开加沙的机会，而在加沙，很少有适合他们的工作。传统观点认为，贫穷是滋生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温床，但在这里我认识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贫穷、饥饿的人很少会投身暴力活动，他们更关注如何解决下一顿饭的问题。革命者通常来自中上层阶级，那些生活舒适却空虚失意的人才会选择暴力。

我拍了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站在墙上的一幅画像前，画像里的年轻人前不久刚刚死于一场政治冲突。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兄弟俩，其中一个死了，提醒着人们世界曾经和现在的样子，另一个还活着，见证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我在加沙的一个小店里坐下来，一边吃着1谢克尔[1]的鹰嘴豆、莴苣、

[1] 以色列基本货币单位，1谢克尔约合1.8元人民币。

西红柿三明治，一边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我只是这里的过客，我知道不可能完全了解加沙，也不可能了解能决定一个孩子命运和未来的各种力量。“当然，我是一个旅人，”杜南曾这样描述他在战争地区的经历，“但我是一个非常关注人性问题的旅人。”

在印度瓦蜡纳西城离恒河不远的一栋简陋建筑物里，特雷莎修女慈善机构为穷困潦倒和濒临死亡的人们开设了一个庇护所。她们的任务很简单：帮助那些最贫穷的穷人有尊严地死去。那里的很多人已经病入膏肓，有身体上的疾病，也有精神上的疾病。在这栋朴素的水泥建筑物里，修女们和病人们住在一起，因为这些修女曾宣誓，要和最贫穷的人过一样的生活。

我本以为在那个庇护所里只有成年人，但我却见到了一个男孩，他的精神和身体都不健全。他是被遗弃的，此前已经沿街乞讨了很多年。他蹲在庇护所里，就像以前蹲在街上当乞丐时一样。因为蹲得时间太久，他的双腿已经伸不直了。他总是微笑，但他只会说一个词——“行礼”。每次说这个词的时候，他都会双手在胸前合十，低下头，行印度传统的合十礼，意思是“我向你体内的神行礼”。

在这家庇护所里，到处都是死亡的阴影，我本以为会发现悲伤、忏悔和压抑的气氛。人们来这个地方是等死的，但是在这里，濒死的人会受到慈善修道院的修女们的关照。修女们通过过一种极度贫穷和绝对艰苦的生活来显示自己的信仰。

据我所知，这些修女们就像穷人们一样，任何东西都用手洗。她们每人只有三件莎丽[1]和一双便鞋，再没有其他东西。但我经常能看到修女们在避难所里跑跑跳跳，和病人们分享一个笑话，一起开怀大笑。她们做那种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可怕的工作，她们帮助濒死之人清理脸上的呕吐物，而且以极大的热忱来投入这项工作。我在那里的工作很简单：洗毯子、给病人喂饭、刷盘子、做饭。

修女们都是同情心的模范，但是我却并不太想向她们学习。在大街

[1] 印度女人穿的布外套。

上，我经常会被乞丐包围，这里的乞丐比我在其他地方遇到的更具侵略性。我学会了不给钱。很多孩子被派到街上乞讨要钱，给钱只会使更多的孩子被派到街上来。在印度，到处都有行乞的孩子，有的甚至被毁容，被打残，因为这样他们能要到更多的钱。在德里市，一个独腿的孩子在肮脏的街上坐在一块纸板上，他一直跟着我，想要一个卢比。我知道不能给钱，但当你遇到一个饥饿的孩子的时候，你很难置之不理。在过去几天的行程中，我一直在说不，当我最后回到庇护所时，因为不停地拒绝那些饥饿的孩子而感到身心俱疲。我在别的地方有个习惯，那就是背着一袋食物，里面装着面包卷、圆面包、小饼干、葡萄干，当一个光脚丫的孩子走在我身边拉我的衬衫时，我就能给她一点东西。这看上去像是个好办法，孩子们可以有东西吃，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我心里也会好受。但是在印度，这方法完全行不通。这里的乞丐太多了，当我拿出一个面包卷递给一个孩子时，马上就会被一群孩子包围，他们会抓我的口袋。当我的口袋被掏空后，更多的孩子仍然会跟着我，继续要钱。

有一天，我去瓦蜡纳西的一个面包店，这里做的大块烤面包里填满了葡萄和榛子，我买了一个当午饭。我坐在恒河岸上的一个天井里正准备吃，两个男孩从围墙外探出头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接着他们从围墙外走了出来，伸出手向我要钱。我又累又饿，挥挥手让他们走，然后把头扭了过来。其中一个捡起一块石头，做出要朝我扔过来的样子，我狠狠地盯着他，就像在说：你要是敢那么做，我就揍你。他转过身，把石头扔进河里，然后两个人一起跑了。我来到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地方工作，但是我发现自己不在街上看别人了。

庇护所里有个病人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现在已经基本康复。在这里，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告诉我毯子去哪里洗，锅在哪里放着。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陪那个只会说“行礼”的男孩作最基本的物理治疗，希望这个男孩有一天能够伸直双腿，正常行走。他还会给其他病人喂饭。有个精神问题很严重的病人整天都在自言自语，我这个善良的朋友总是会尽力和他说话。不过，我这个朋友在这里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个庇护所收留的都是濒死的人，而他已经康复了。他是个很受欢迎的志愿者，但是修女们告诉他，他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有一天，他领我到庇护所周围转转，他掏出一支烟抽了起来，我们就站在那里聊天。这时，一个修女冲出来向他大叫了起来，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惊呆了。我不记得她喊叫的时候用的什么语言，但是这个男人嘟囔着："这根烟才1卢比，修女。"但是修女对他说，那就意味着当她把他赶出庇护所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就少了1卢比。这些富有同情心的修女们有时也很强悍。

还有一天，我走进庇护所，一个修女正在给病人们分午饭，她递给我这朋友一块饼干。他连想也没想，就把饼干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这个男人什么都没有，就连他穿的裤子，身上穿的衬衫，脚上穿的鞋子也都不属于他。但当他有了食物而发现我还没有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一半给我。

离开瓦蜡纳西的庇护所之后，我去了加尔各答的一个类似的庇护所。到那里的第一个早上，我去了一个被当做小教堂的房间，所有志愿者都被叫到了那里。房间里很安静，一群人面对着祭坛坐在那里。我向左边看去，那里放着一部轮椅，一个人独自坐在上面，望着前方，那就是特雷莎修女。我曾读过她的传记，也读过她写过的文章。我想不出用什么更好的词来形容她，我觉得她的生活——不可思议。现在，她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坐在离我仅有几英尺的地方。我在那里，也当了一天志愿者。我洗了毯子，还给一个病人喂了饭。这是个老人，蜷缩在一个绿色的小帆布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等死。

特雷莎修女院能接纳所有人，连同他们的一切——孱弱、失败、怪癖、力量和信仰，也为这些人全心全意地工作。修女们的一生都在虔诚的信仰中度过，但在我看来，她们对于自己的信仰根本无需用语言表达，因为她们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这样充满关爱的地方呆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逐渐明白，高人一等的感觉其实是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恨的表现。这里的人们能够认可自己，关爱自己，同时被别人关爱，因此不再相互批评或比较、哄骗或劝说，修女们则把精力都集中在关爱他人上。

我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人道主义工作，读到、听到的更多。但是，不管我

亲眼目睹了多少同情、热忱和美德，我仍然坚信，仅仅靠援助是不够的。

我开始倡导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此保护弱者，结束种族清洗，结束大屠杀。但当我撰写文章或在大会上发言阐述这一观点时，我觉得自己的语言是那么的空洞。我实际上是在长篇累牍地要求其他人去一些地方做那些我认为重要而危险的工作。但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话，我怎么能要求别人以身犯险呢？

我不记得小时候是不是考虑过要参军入伍，我对从军服役的一点点印象来自我那从没见过面的爷爷。我爸爸罗伯·格雷滕斯生于 1947 年 11 月 26 日。他爸爸奥古斯特·罗伯特·格雷滕斯曾是美国海军上士，1953 年 9 月 11 日逝世，那时候我爸爸才五岁。我爸爸和他寡居的妈妈一起生活在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我奶奶叫珍妮特·格雷滕斯，一开始是一家鞋店的售货员，后来去银行当了出纳，带大了我爸爸和他两个妹妹。

我们全家人经常在感恩节的时候聚在一起，给我爸爸庆祝生日。有一次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围坐在餐厅桌子旁，奶奶给了我爸爸一份用斜纹纸包裹的礼物。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走过去看爸爸拆礼物。当我爸爸拆开包装纸时，我们看到了一个相框，里面是穿着海军制服的爷爷。在爷爷的照片两侧，挂满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的勋章和奖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放声痛哭。爷爷的照片现在仍然挂在爸爸卧室里的矮柜上方。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长大后要干什么，我未必会说要当兵或水手。但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和弟弟们会拿着球拍当枪相互射击，也会拿小的塑料保龄球瓶当手榴弹扔。我记得我喜欢《壮志凌云》和《第一滴血》这样的电影，特种作战的情节更让我深深着迷，但这仅仅是因为那让我想到了迷彩服。换句话讲，我只是个小男孩，军队并不比恐龙、外太空或圣路易斯大主教队更让我感兴趣。

在克罗地亚坐在棚屋里听一个男人讲述塞族民兵迫害他的经历时，在卢旺达站在满是遗骸的教堂门前时，有一种观点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世界上所有文章、论文、抗议声明和指导文件都有局限性，有时候讲话、谈判、志愿行动起不到任何作用，需要有勇气的人去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我写了一篇 441 页的论文论述国际援助，我可以一直这样说下

去，也可以去将我的信念付诸实践。

所以，在阅读《阿富汗排雷计划》和《孟加拉小额贷款项目》这些文章之余，我也研究了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这支陆、海、空全能的突击队意味着严格的体能训练、苛刻的生存环境、令人望而生畏的测试以及队友间深厚的感情，深深地吸引着我。海豹突击队不仅会给你机会从飞机中跳下、佩戴水下呼吸器潜水或驾驶高速冲锋舟，从更深层次上来讲，海豹突击队也给了你机会担任领袖、报效国家。我完成论文时已经26岁了，而海豹突击队招收队员的截止年龄是28岁。时不我待。

我已经认识到，一旦某个军阀掌握了一支武装，控制了人道主义者需要去进行救援的每一个地方，那么从特雷莎修女院对穷人的帮助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难民儿童的救援，一切最富同情心的援助行为都将毫无意义。这个世界需要的人道主义者比需要的战士多得多，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战士，再多的人道主义者也无法发挥作用。克罗地亚的小孩子们用粉笔画着他们在枪口威逼下逃离的家园，这一记忆在我脑海中永远无法被抹去。

我乘巴士去往伦敦，和两个在此工作的海豹队员会面，与他们坐下来商谈。那时我已经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就职通知，我可以在那里开始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我还拿到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就职通知，我可以在那里挣很多钱，第一年就能挣到比我父母两个人加起来还多的钱。我在考虑牛津给我的自由和咨询公司给我的巨大财富，但我还是仔细地了解了美国海军给我的待遇。

如果我的申请被接受——他们每年接受的申请不会超过10份——我会被送到海军预备军官学校。海军每月给我1332.60美元的工资，我必须遵守海军的规章制度。在军队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天没有1分钟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如果我能从预备军官学校毕业，海军就会提拔我担任军官，而作为回报，我需要在海军服役8年。他们会给我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去通过基本水下爆破/海豹(BUD/S)训练，如果我能通过，我就算踏上了成为海豹突击队军官和领导者的道路。如果我没能通过，事实上每年都有超过80%的受训者被淘汰，我还是要在海军呆满8年，他们会告诉我去哪儿服役，在那儿干什么。

回到牛津后，我去罗德学院参加一个高档晚宴。罗德学院是为纪念创立罗德奖学金的塞西尔·罗德而建。到达那里后，我推开带有狮子状铁门环的黑色大门，我女朋友走在我的身旁，她的脚步声回响在白色大理石地面上。

进入罗德学院的主餐厅，就像置身于一个缩小的大教堂里。在房间的一端，是摆着长椅的小包间，在另一端，木质雕花的墙上挂着塞西尔·罗德的肖像。整个房间的奢华与我来牛津前见过的一切截然不同：粗大的木房梁，铁艺白玻璃吊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照片，厚重的黑色大理石壁炉，手工编织的挂毯，木质雕花板隔断的房间，皮革包边的图书，大落地座钟，南非大平原的油画，大理石地板，巨大的钢琴……房子中间有一张长方形的大桌，上面铺着厚厚的桌布，摆着玻璃酒杯，银餐具，还有叠得像大主教帽子的餐巾。桌子旁边摆着藤椅，椅面是手工编织的，坐在上面发出吱吱的声响。

这里有牛津能提供的一切：奢华，休闲，时间，自由和财富。

但是，站在圆形大厅里，我抬头看着石头墙，墙上刻着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那些名字提醒着我罗德奖学金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愿意“为全世界而努力奋斗”的公仆。很多人放弃了牛津的舒适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走向冰冷的战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横跨全球作战。如果他们当时选择呆在家里而不是去服役，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罗德学院的大厅里，抬头看着他们的名字。

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曾经写道：“战争虽然丑陋，但还不是世上最丑陋的事。道德沦丧与丧失爱国情操远比它更糟。如果一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自己的安全更加重要，值得自己为之奋战，那么他和行尸走肉无异，他也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有比他更优秀的人努力奋战。”

我不希望以后能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墙上刻上我的名字，但我的确感到了责任。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为了抚养我每天都要辛勤工作。我的前人设立了奖学金，让我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接受了8年的高等教育。这一切付出是为了什么？

---

[1]　1806—1873，英国著名、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牛津可以给我时间，咨询公司可以给我财富，海豹突击队给我的不多，但能让我更加充实。我想，我可能通不过 BUD/S 训练，我可能会很痛苦，但我不会遗憾。

当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把文件放到我面前时，我马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第三章

预备军官学校

那是一份“哨兵岗位职责”。预备军官学校的网站建议我们在到达之前要熟记一些规则：以军人的仪态走向岗位，时刻保持警惕，仔细观察视野和听力范围内发生的一切；并同时汇报任何违纪、违规行为。总之，在海豹突击队，就连规则自己也要遵循规则。

2001年1月20日，我到达了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城，我低头看着手上的打印稿，那是一份“哨兵岗位职责”。预备军官学校的网站建议我们在到达之前要熟记一些规则。

职责第二条：以军人的仪态走向岗位，时刻保持警惕，仔细观察视野和听力范围内发生的一切。

我要去预备军官学校“就职”了，但是在签署了那些文件之后，我开始有些疑虑了。有些事是肯定的：我知道我要服务于我的国家，我知道我要通过层层考验。强者通常要保护弱者，我也坚信与其夸夸其谈不如立即采取行动。我要在服务国家的行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但是，我一直过着非常自由的生活，如果要牺牲自由，我还真觉得有些勉强。

在牛津时，我基本可以随心所欲。我和女朋友在雾霭中走过古老的街道，边走边谈去海边度假的欣喜。看到街道那边的旅游公司橱窗里贴出了打折希腊游的广告，我们就会去预订旅行。那时候我还可以整天都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读小说，读《愤怒的葡萄》、《紫色》。我想在特雷莎修女院的一个庇护所里工作，去帮助那些濒死的人，我就动身去了印度。我每周去拳击队训练9次，一次都不会迟到，我愿意这么做。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和每一年。在牛津，我学习、训练、生活，投身人道主义工作，一切都按照我自己的规划。

在牛津的每一天，我都会晨练，懒洋洋地吃顿早饭，然后再悠闲地读点闲书。但是我知道，在预备军官学校，如果每天我能偷得一两分钟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话，那就应该觉得很幸运了。我还听说一天只有几分钟时间让全班人一起洗漱，洗澡得匆匆忙忙，然后还得跟几个人抢一个洗脸池去刮

胡子。我的东西一直很少，床、书、拳击装备……，但我一直住在很舒服的地方，时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职责第三条：汇报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除了自律之外，我从没真正遵守过什么规则。而我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会给每个人发一本厚厚的手册，并且有人指导他们学习、牢记、服从。那本手册必须放在课桌上，手册右边与桌子右边平行，距离正好一英寸半，手册底边要与桌子底边平行，距离还是要精确的一英寸半。在海军，就连规则自己也要遵循规则。

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开始几天，我一度质疑自己参军的决定是不是错了。来到基地，我受到了几个老学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期13周的训练马上就要结束，只剩下最后两周，现在负责管理像我这样的新学员。其中一个家伙汗流浃背，有点矮胖，脑袋刮得很干净，他脸红脖子粗地朝着我大喊："走快点！"他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站在便道上，和一群新学员排成一队。我穿着牛仔裤和旅游鞋，还有8年前我穿去中国的那件已经褪了色的猎装衬衫，我的红色行李袋就放在脚边。老学员们来回来去走着，竭尽全力模仿巴顿将军那样喊道："眼睛朝前看！"

有一个满身是汗的老学员，沙哑的声音直打颤，这说明他其实很紧张。他不停地叫着："你们想成为海军军官吗？"我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绕着基地操场齐步走。不停有人朝我们大声嚷嚷，让我们站直了，别把手放兜里。到处都有人在叫嚷着，但这些声音在我听起来却是那么不成熟。伊尔和亨利也曾要求拳手们要好好表现，但我从没听到过他们朝谁叫嚷或大声斥责。

老学员们开始收我们的报名表，给我们作入伍登记。

埃里克·格雷滕斯

入伍日期：2001年1月20日。

叫喊声仍然在继续。"喝水！多喝水！每经过一个饮水处，你们都要停下来喝水！"我打拳已经很多年了，我绝对知道我需要喝多少水。"多喝

水！你们要把整壶水喝光！”一个老学员跟在我们后面喊道，“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就会无所畏惧！”

我可能没表现出足够的恐惧，一个老学员把脸贴到我眼前，大声喊道：“等你的教官来了，你就做俯卧撑吧，让你把胳膊做断掉。”我稍稍放纵了一下我的反叛情绪，朝他皱了皱眉，瞪了瞪眼。

事实上，这些学员比我在海军的时间仅仅多 11 个星期。他们 22 岁，虽然我也刚 26 岁，但我觉得我比这些从学校刚毕业就加入海军的孩子们大了有 20 岁，而他们正在冲我大声嚷嚷着让我朝前看。也许是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我一直希望能遇到一些训练有素的军士或者饱经风霜的老兵，他们能把我们这些新学员训练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推动我们突破自己的极限。那将会是一种考验，我希望能被这种人推动着前行，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训练我。而眼前这些家伙，穿着新领来的黑色海军风衣，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活像一群傻瓜。当他们在我们面前来来回回地走时，活脱脱是拿破仑综合症爆发。这就是军队培养出来的领导素质吗？就这样狂呼乱叫，目中无人？

当我偷眼扫视我的同伴时，我变得更加失望。很多人都被吓得要命，他们弯腰系鞋带时手都在发抖。难道他们看不出这是个笑话吗？

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套不合身的草绿色训练服，他们管这衣服叫“邋遢绿”。我穿着这身衣服坐在食堂的一张桌子旁，另一个新学员坐在了我对面。这家伙被大声嚷嚷吓了一天，又被灌了一肚子水，一坐下来就吐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隔着桌子喷了我一身。

离开食堂，老学员们把我们赶进营房，让我们在过道里排队等着。最后，主角登场了，来人是刘易斯上士，我们的教官。他看上去就像漫画里典型的大兵形象，沿着过道大步流星走来，一张脸隐藏在护林熊[1]帽子下面，结实的肱二头肌在整整齐齐卷起来的袖子里面若隐若现，皮靴锃亮，说话嗡嗡作响：“给我让开，靠着隔板站好！”

当他沿着过道走过来时，我带着人类学家那样的好奇心观看着他和周边的人。真有意思，看看美国军队向这帮大学刚毕业的孩子都灌输了什么；

[1] 一只穿森林警察制服的卡通熊，是预防火灾和保护环境的象征。

你能看到他们有多害怕。我在想，教官是不是在沿着过道走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洗脑了。下面该干什么了？刘易斯上士抓住了我的衣服领子，推着我朝后走了三步，把我摁到墙上，大声说道："跟这帮衰人们站在一起！"

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已经加入海军了。

刘易斯上士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绝对忠诚的战士，后来我渐渐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官。但在当时，看着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推搡着，咆哮着喊出命令，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笑。他命令我们绕着营房跑，一个女孩在惊慌失措中跑错了方向，刘易斯上士狂怒地高喊道："你，过来！"他抓着那个女孩的领子，把她推倒在过道里。

教官告诉我们，听到命令的时候，我们要高喊："杀！"然后再执行命令。

"向右看齐！"

"杀！"

"齐步——走！"

"杀！"

在这杀声震天的训练中，我偷偷扫视四周，想看看还有哪个学员也觉得这是件可笑的事，但只有一个人在训练中也转动了一下眼睛。

"杀！"

我根本不相信这帮新同学能去杀谁。我们里面只有几个"前辈"——他们之前在海军中服役，来这儿受训成为军官——除了这几人外，大多数都是没有经受过任何考验、身材走形的大学生。

"房间门上有你们的名字，去吧！"

我跑着去找我的房间，和我同一房间的还有另外三个人。终于看不到那些老学员和教官了，我坐下来放声大笑。几个新室友，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我。他们大概在想：噢，天哪，压力太大了，这人已经疯了！

接下来的几天波澜不惊。我们都领到了作训服，这些衣服毫无时尚可言，甚至还有些"功能不全"——游泳裤腰上居然没有拉绳。我学会了一些海军行话。管门叫"舱口"，管墙叫"隔板"，管盥洗室叫"船上厕所"。女人也通常不被称作女人，而叫"雌儿"，要说什么叫"放话"，安静叫"闭嘴"。

我们坐在食堂里，吃煮得稀烂的食物。教官们会一起拥进来，蹬上桌子，用大皮靴把餐具和杯子踢到地上。当学员们端着盘子经过时，如果教

官发现谁有一丝一毫违反了规定，就会把他的盘子从手上踢飞，任由意大利面撒得满天满地。

我们把大把时间花在和衣服较劲上，我们会花上几个钟头的时间，叠衬衫、短裤和裤子。事实上，我们会在内裤上洒很多淀粉，然后用熨斗把它烫成平平整整的四方形，然后再把这平整的方块放进衣柜里接受检查。我们每人领到了两双跑步鞋，但是有老话流传下来告诉我们，有一双鞋不要穿，这样它就能一直干干净净，准备应付检查。所以这双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非跑步鞋”。一切都看起来很荒谬。

我以前跑步的时候经常跑得飞快，觉得肺都要炸了。然而在这里，我们要排成整齐的队形跑。我以前6分钟跑一英里，在这里12分钟才跑一英里，一边慢悠悠地跑，一边还要傻乎乎地唱歌。

任务绝密，目标未知；
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重返家乡；
站起身，搭好扣，快步走向舱门……

我们慢吞吞地沿着路跑，我只觉得我的体能在慢慢下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那种艰苦的训练？这真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参加海军，是想能够接受挑战，但是很多晚上，我手里只拿着一瓶指甲油，因为教官要我们剪去军装上那些松散的线头，然后再在上面涂上些指甲油，这样线头就不会再开了。这就是我要接受的挑战？涂指甲油？

我们班上有一个矮小瘦弱的亚裔美国人，他姓王，刚刚从大学毕业，拿到了工程学学位，理想是在美国海军当一名文职工程师。有天早上体能训练时，我们正在做俯卧撑，教官朝王大叫了起来：“你在对体育馆地板做什么？”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教官也要求王在做俯卧撑时挺直身体。但王连一个标准俯卧撑都做不了，他的胳膊撑得很直，但他的后背挺不住，胯骨已经挨到了地。教官继续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在强奸我的地板吗？你在这儿是不是很寂寞？”

王使劲晃着屁股，想把后背绷直，但这让教官火上浇油：“噢，我的老天，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心的举动，你这是在对美国海军财产进行暴力侵

犯。”

这时候，刘易斯上士朝王走过去，问道：“王，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大声叫道：“那个叫格雷滕斯的家伙在哪儿？”

他说的是我吗？

“格雷滕斯，过来！”

我跳起来，跑向刘易斯上士。

“到，长官！”

“你来教王做俯卧撑！你来教他体能考核的一切！你准备搬家吧，你搬去和他住一个房间，他几点起你几点起，只要有时间，你就得教他，让他能够通过最后的体能考核。我让你负责他的体能考核，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我不得不接受预备军官学校的一切。我想好好服役，但我不能改变这个学校。我想让我们进行真正的跑步训练，而不是慢悠悠地边跑边唱，可是不行。我想改变课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跑障碍，而不是坐在那磨腰带扣，可是不行。我想改变进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手枪射击，而不是把内裤烫成正方形，可是不行。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中。

预备军官学校培养的是海军军官，这些海军军官有可能成为指挥官。在我的想象中，预备军官学校里应该有艰巨的体能考核——障碍跑、跑步、游泳救援，有艰苦的课堂学习，有细致的军事训练——行军、操枪、手枪射击等，这里应该通过这一切塑造我们的领导素质和才能。但我想象的都是错的。而现在我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领导别人，帮助同学。预备军官学校对我来说很容易，但对班上的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严酷的考验。如果我参军是为了服务军队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我全心投入到学校生活中去，在摆弄制服的时候，我和王每隔10分钟就起来做15个俯卧撑。我成了“体能测试小子”，负责全班的体能考核项目。我对王逐渐有了种特殊的尊敬，预备军官学校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异常艰苦的，他在报名的时候一定知道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报名了。

领到步枪后，我竭尽全力熟练掌握操枪动作。预备军官学校会颁发一种被称为“雪花”的奖励徽章，无论是谁，只要在体能训练、理论考试和军事技能三方面均表现突出，都能够获得这一徽章。我下定决心，就算我不喜

欢某一门课程，但我也要精熟地掌握它。我们全班确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要通力合作，在毕业时比其他班拿到更多的雪花奖章。我们开始在一些细节方面合作，比如说，我从来都擦不亮皮鞋，于是我就和同学做了个交易，我替他们刷运动鞋，他们替我擦皮鞋。我们班得到了一面班旗，我们走到哪儿都举着它。

学校生活仍然让人失望，课程看上去毫无用处，而且海军里最搞笑的传统之一是，教官们在讲要被考到的问题时会跺脚。比如说教官讲道，“救生圈可以用来协助航行……”说到这里，他会跺两下脚。有人告诉我说：“这意味着要考这道题。”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要考这道题’？”

“因为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考题。”

我们晚上经常到很晚都还在整理制服，磨腰带扣，然后第二天白天在课堂里打瞌睡。晚上睡觉时，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把被褥摊开，因为没人想在第二天早上为了应付检查再花20分钟去整理床铺。

我和王还是用收拾衣服的间隙做俯卧撑。有天晚上，王在收拾衣服时出乱子了。为了去除军装上的零散线头，并不是所有人都用剪刀和指甲油的办法，还有很多其他招儿，王的办法是用打火机烧。就在检查前的那天晚上，王的手艺出问题了，他在卡其布制服衬衫上烧了一个三指宽的大洞。

第二天早上进行检查时，教官们看到了王那件烧了个大洞的海军制服，他们暴怒了：“王，俯卧撑准备！”王在地上摆好俯卧撑的姿势，教官们把他衣柜里所有东西都拽出来扔到了地上——烫好的内裤、烫好的袜子、洗衣袋、帽子、裤子、腰带扣。三个教官在我们房间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咆哮着。

“你们这帮人有毛病啊？”其中一个叫道，“你们就看着王在自己的衬衫上烧洞？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进来看到了会怎么样？”

我们没人答话。

那个教官继续叫喊道：“噢，王，你的制服，除了那个拳头大的洞以外，看上去太完美了！”

我们都立正站着，我拼命咬紧牙关，唯恐自己会突然笑出声来。

他对王大叫着：“你连不要在衬衫上烧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你还

想站在你的水兵们面前，当一个军官，当一个指挥官，你做梦去吧！”

刘易斯上士走进房间，他的表情就像是被飓风吹了一样。他看了一眼王，王还趴在地上保持着俯卧撑的姿势，他身下的地板上已经积了一小摊汗水。刘易斯盯着我说：“格雷滕斯，出什么事了？”

另一个教官替我回答说：“王非常有创造性，百分之百有个性，我想格雷滕斯肯定是给他报名参加什么当代时装秀了！”他举起那件烧坏的衬衣，“这是先锋派的T台垃圾！”

刘易斯上士用他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对我说：“格雷滕斯，我告诉过你要看住王！怎么回事？”

“没借口，长官！”我说，“是我的责任，长官！”

刘易斯上士命令我们宿舍里那另外两个人去吃饭，叫我和他到过道里去。

另一个教官还在疯狂地绕着王叫喊：“如果我连一件衬衣都不敢给你，我怎么能把一艘价值十亿美元的军舰托付给你？！”他们把他的床掀翻，然后又把屋里另外三张床也掀翻在地，把所有叠好的被单都扯下来堆在了屋子中间。

一个教官问王：“王，你这辈子有没有参加过一次体育运动？”

他们本没想得到回答，没想到趴在地上的王大叫了一声：“参加过，长官！”

“真的吗？”那个教官问道，“你参加了什么运动？”

“橄榄球，长官！”

透过敞开的门，我看到两个教官满腹狐疑地互相看了一眼，还听到他们说：“真的？王，你会踢橄榄球？你踢哪个位置？”

王喊道：“是约翰·麦登橄榄球游戏，长官！”

我看到一个教官走出房间，使劲憋着笑，另一个教官弯下腰趴在王的耳朵边喊道：“电脑游戏不是体育运动，你听懂了吧！”

“听懂了，长官！”

我以为刘易斯上士也会对我大喊大叫，但他第一次像一个人那样对我说话，虽然还是一个粗野的人：“格雷滕斯，王肯定要错过早饭了，我要你去趟麦当劳，给他买点东西吃。”

“是，长官！”

从我们站的地方，刘易斯上士看不到王，可我能看到。他喊了一声：“王，格雷滕斯要去麦当劳给你买早饭，你想吃啥？”接着我看到那个教官弯下腰趴在王的耳朵边小声嘀咕着，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那个教官小声对王说：“你最好告诉他，‘刘易斯，去给我买个该死的鸡蛋麦满分’，你敢说错一个字，我就天天来揍你！”

王喊道：“刘易斯，去给我买个该死的鸡蛋麦满分！”

刘易斯上士冲进房间，和那个教官一起让王做了一组又一组的俯卧撑和深蹲，让他在地上留下一大摊汗水。

刘易斯上士逐渐把我们这个班敲打成形，我们像一个班那样行军，像一个班那样训练，像一个班那样学习，我们通过了检查和考试。对于一个以前从没在一起行进过的群体，我们的枪操也逐渐开始步调一致。最后，我们还设法做到了在走进食堂的时候不让教官们找到任何理由踢飞我们手中的托盘。

我和同学们的好日子也开始了。我们获得了星期六的自由，我们可以全部出去，穿着我们傻乎乎的学员服，为热乎乎的炸鸡翅和汉堡包乐得几小时合不拢嘴。我们可以在海滩上跑几英里，我开始越来越了解我的同学们，越来越喜欢他们。他们都是来为国服役的，我们变成了一个整体，同样的军装，同样的发型，同样的军语，但我们仍然保留着多样性——思维、观点、幽默感、价值观。他们善良，有思想，我通过他们重新认识了美国。有一天我们坐车离开基地时，我意识到，如果从我 18 岁成人时算起，到我将近 27 岁时从军入伍，我在美国国外的时间要远比在国内的时间长。我在国外的经历给了我无价的教育，让我认识了世界。

人们都希望有一次冒险旅程：极少的资助，严酷的寒冬，长达数月的极夜，接连不断的危险，安全返回却受人猜疑，一旦成功，便会得到荣誉和赞美。

1914 年，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乘坐他的“坚毅”号蒸汽船，出发前往

[1]　1874—1922，英国南极探险家。

南极洲，一旦顺利抵达那里，他将率队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徒步横跨冰原的探险。据称，当沙克尔顿投放广告之后，他只收到了500美元的资助。那注定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作为在密苏里州长大的孩子，我一直沉浸于《选择你自己的冒险》系列丛书。在书里面，我可以创造自己的探险故事。《海底旅程》开头写道："要小心，提高警惕！此书与众不同，你，只有你自己，能掌控故事中发生的一切，有危险、抉择、冒险和推理……你是一个深海探险家，要去寻找著名的亚特兰蒂斯失落之城，这是最具挑战性和最危险的任务，恐惧和兴奋将时刻伴随着你。"我经常打着手电筒，读到凌晨两点，浑身毛骨悚然。

和很多美国孩子一样，我成长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我读过很多故事：伯里克利，在雅典创建了民主；斯巴达人，在舍茅普利[1]为希腊而战；罗马人，创造了法典；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为保护弱小与巫师和巨人战斗；以色列人，为逃脱奴役穿越沙海。我还读过很多伟大美国英雄的故事：乔治·华盛顿，穿越冰封的特拉华河，带领美国人民走向胜利；邦克山的义勇军，高举着火把奋勇前进，直到能看清英军士兵的眼白；亚伯拉罕·林肯，以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安抚阵亡将士亡魂，唤醒国家责任；马丁·路德·金，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有一个梦想。"

我喜欢读史，但经常心怀恐惧。我最大的担心是：上帝和我父母犯了可怕的错误，让我生不逢时。我坐在图书馆里，读人们发现古老城市，扎营荒野边缘的故事，读勇士、探险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们的故事。但是，当我抬起头望向窗外，看到的只是一片新修剪过的碧绿草坪，整个世界对我来说是那么安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被开发了，所有伟大的战斗都打完了。孩童时在电视上看到的名人都是运动员、演员和歌唱家，他们代表什么呢？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我第二个担心是，我是不是弄丢了车票，无法再乘坐那趟列车前往有意义的生活。好像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有人告诉我，如果想过一种成功的生活，就得去一个叫大学的地方。他们说，大学，就是那张"车票"。我明白，在高中毕业后，他们就会发车票，如果你想要一张，就得有好成绩。三

[1] 希腊中东部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奋战失败之处。

年级时，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家，上面写着：埃里克·格雷滕斯，书法，B-。当我告诉妈妈书法得了个B-时，她说："还不错。"

"但他们还会让我去上大学吗？"

父母十分在意我能不能成为好人，他们要我对待别人要善良，要我懂礼貌，要我努力学习，要我成为球队队员。但是，当他们关注这些人格、性格之类的东西时，却没有特别在意我是不是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这种情况，在科学展览会时总会格外明显，我通常需要凭一己之力，想象、制造、完成参加科学展览会的小发明，没人会帮我。三年级时，我设计了一个试验，验证放在普通水、苏打水和啤酒（我爸的百威啤酒）里的切断的郁金香花枝，哪枝存活的时间长。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都记录着实验数据，也看着啤酒里的郁金香一枝枝地枯萎。我在地下室里剪切纸板做成说明牌，从车库中废弃的瓶瓶罐罐里找来喷漆。我把说明牌漆好后，用黑色记号笔在上面写下实验结论："切断的郁金香花枝，在普通水中的存活时间，比在苏打水和啤酒中要长。"我的计划是，在科学展览会那天，摆上三个杯子，一杯普通水，一杯苏打水，一杯啤酒，每杯里放一枝郁金香，然后在每枝郁金香边，用铅笔把数据分析写在笔记本纸上。

到了科学展览会那天，看到同学们的作品，我震惊了。他们用的都是木质说明牌，大小完全符合科学展览会规范，制作精良，油漆考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突出展示了机器人，甚至还有花园和喷泉，就连数据说明也全是机打的，有的还制作了展台。

我强作镇定，摆好了喷漆说明牌和在笔记本纸上用铅笔手写的结论，然后打开了一瓶啤酒。我倒了满满一杯啤酒，然后放进去一枝郁金香。但是，在往苏打水杯里放花时，我打翻了啤酒杯，百威啤酒溅满了整个说明牌，并顺着桌子流到了地板上。这起意外吓坏了一对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地上组装蒸汽机火车头。他们惊恐地看着我妈妈，而我那足智多谋的妈妈正在用汗衫下摆擦着流开的啤酒。我们只剩了四分之一罐啤酒，我把剩下的啤酒都倒进杯子里，把郁金香放进去，然后就把这科学项目留给了裁判。

裁判们皱着眉头看着我的实验，然后给出了裁定结果——一条表示"重在参与"的白带子。我又在想："他们还会让我上大学吗？"

这种担心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在等校车的时候，点着了几片树叶取暖，结果却意外地点着了整个车站。然而，我仍在想："他们还会让我上大学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别人说，大学是一个可以追求更大梦想的地方，大学是生活开始的地方，大学是通往"真实世界"的第一步，在大学里，可以实现很多伟大的目标。

所以，我上大学了。但刚刚过了几个星期，我就感觉被骗了，那个时刻一直让我记忆犹新。我入学时选择了学习公共政策，因为我相信，公共政策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关于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如何共同推动世界发展的学科。但是，第一课就让我大跌眼镜。那一课讲"公共政策研究概述"，教授用低沉的声音说："首先，我们计算出预计产出的值，"他在黑板上画了张草表，"然后，我们估定能实现预计产出的概率，"他在黑板上画着，"然后相乘，"他最后画了一笔，"现在，我们就知道做何决策啦。"

这就是公共政策？决定世界命运的重大决策就是乘出来的？冒险精神何在？能量何在？伟大的事业何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讲到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领导民众？为何而战？他们向我承诺说，在大学里，可以钻研人类生存的伟大智慧，然而，他们正教我怎么画一棵决策树。他们向我承诺说，在大学里，我们将学会如何改变世界，但他们想让我用数学去改变世界。

我努力抗争，参加了一项新的体育运动，也考虑要换一个新的专业。在和遇到的所有人交谈之后，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路不能任由别人安排：我需要选择自己的冒险人生。

有一天，我在学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虽不像沙克尔顿的那样充满戏剧性，但我从中发现了机会，如果我能赢得资助，就可以在夏天独自去海外留学，像我这种从没出过国的申请人还能有优先权。我把报纸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朝教室走去。

这笔助学金给了我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但是，我该去哪里呢？

我叔叔在一家生产扫帚的企业，他曾去中国出过一趟短差，参观了一家扫帚工厂。这就是我的全部背景，但是，我还是决定去中国学习。

我动身前往机场的时候，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一点不了解中国文化，

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但我有了顶新帽子。受印第安纳·琼斯博士[1]的影响，我去市场买了这顶帽子，澳大利亚内地风格的帽子。背着崭新的背包，戴着澳大利亚内地风格的帽子，穿过机场候机大厅，我想，我已经做好准备去冒险了！

我从圣路易斯飞往达拉斯，再飞往旧金山，然后飞到北京。在最后一段航程中，我请坐在身旁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女士给我来了次中文速成。她问我姓什么，我告诉她“格雷滕斯”，她告诉我，在中国，还是叫“埃里克先生”比较好。接下来，她教了我几个比较重要的短语。到着陆时，我已经会说：“我很饿，给我吃东西。”

韩琳是我叔叔的朋友的朋友，她来机场接我，并把我送到了北京一家旅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时差反应让我迷迷糊糊的，还非常渴。在美国时，朋友们对我说，中国旅馆里的水不能直接饮用，喝了会生病的。我去买了个热水器，但是，在浴室里折腾了5分钟，也没能烧开一杯水。我把所有警告当成了耳边风，打开水龙头，接了杯水，迅速灌进了嘴里。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北京的白天灿烂美好。我向下面的街上望去，骑自行车的人们往来穿梭着。我真的在这里了，我出国了，我在旅行。在出发之前，我看着地球仪，一只手指点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位置上，另一只手指点在北京上，现在，我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了。想到这里，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是1993年。我的计划是去长春，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底特律”。我想了解中国的新兴产业区，也想花些时间来了解这个国家。

长春并不是旅游者常去的地方，除了在长春大众汽车厂里见到了几个德国人，我在那座城市里一个外国人都没看见。去工厂的参观很有意思，但我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于是，当旅馆招待员邀请我和她一起去上功夫课时，我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4点半，我们到了一个学校的体育馆。师父——按字面翻译过来像是“老师的爸爸”——大概有5英尺5英寸高，肌肉结实，留着花

[1] 美国著名科幻探险电影《夺宝奇兵》的主人公。

白的平头。我猜他大概有60岁了。他穿着一件浅蓝色棉布上衣，胸前系着刺绣的袢扣，袖口高高挽起。他说话声音低缓、稳重，显得泰然自若。他从正在进行套路练习的徒弟们中间走过，让我想起了巡游的肉食动物。在我到那里的第一天，他给我演示了一个动作。他把拳头抵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暴喝一声，一拳把我打得直退到墙上。其他徒弟乖巧地点着头。师父把我从墙上拉起来，就为了再把我打倒一次。

旅馆招待员朋友解释说："师父打你，是在教你怎么打垮敌人。"

我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准备学习能打垮敌人的秘籍。做了些拉伸活动后，我站在徒弟们的队伍中。师父面向大家鞠躬行礼，徒弟们两手垂于体侧，躬身向师傅行礼，之后开始整齐划一的套路练习。

助理师父是一个30多岁的警官，每天都穿着一套黑色宽松衣裤，我觉得那有点像睡衣。他有5英尺6英寸高，如果在街上遇到他，我会想：嗯，矮小粗壮的家伙。他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凌空踢打目标，能很轻松地连续踢六七脚，动作很有力。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时间，我的朋友把他的话转译给我听："你必须学好功夫，如果你回到美国时还没学好，他会觉得羞耻。"有一次，我正在练一套动作，他走到我身后，右手抓住我的下巴，左手按住我的脖子，随着他双手快速旋转，我听到我的颈椎骨一连串的噼啪作响。

我辛辛苦苦地练了几星期后，功夫班结业了。毕业典礼是一系列技能测试。第一个测试中，一个徒弟凝神聚气（他的内力），稳稳地站在地上。他双腿叉开站好，好像骑着一匹看不见的马，双手在胸前合十，眼睛平视前方，好像是在祈祷。助理师傅在他头顶放了一团破布，然后在上面放了一块红砖，然后又放了一块，然后又一块。我觉得这像是种平衡测试，看在头上顶着砖的情况下，到底能站多稳。9块、10块，最后有10块砖摞在了他的头顶上。我想，这个我也行。

接着，有人在他身边放了把折叠椅，师父站在椅子上，下了一个命令，助理师父向房间角落里跑去，回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大铁锤。我看到大铁锤时，暗暗祈祷了一下。我用的是英文，也觉得几乎没出什么声，但是不知何故，房间里所有人都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也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测试的内容，他们都在冲着我笑，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师父抡圆了大铁锤，铁锤在空中划过一道剽悍的弧线，落在徒弟头顶第一块砖上。砖头从中间整整齐齐地断开，直到最后一块，碎砖块从徒弟身侧掉落。徒弟站在一堆碎砖头中间，转过身，虔诚地向师父鞠躬，很显然是在感谢师父给了他这次经历。之后，徒弟微笑着转向同学们。我就站在第二个。

我挥舞着双手，用英语拒绝说："不，我很抱歉，这不行……"他们说，我第几个接受测试都行。助理师父抽出了一把剑，我看着另一个徒弟聚气、扎马、站稳，只见他目视前方，把气聚在胸骨上切迹（即喉结下方，锁骨中间的位置）。师父把剑尖抵在他的脖子上，开始向前推。我觉得那把剑要刺穿他的脖子了，但是，师父把剑拿开后，我看到他脖子上只留下了个红点。助理师父向我走来，我向后退着，想着如何拒绝这个测试。但是，助理师父开始向我朋友大声说着什么，他告诉我说："师父说，如果把你弄死了，有损于中国功夫，如果你不接受测试，也有损于中国功夫。这个测试对他们的荣誉和你都很重要。他说，如果你尽力，你就可以通过测试。"

我敢肯定，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为了中国功夫的荣誉"而献身，他们不会感到多大安慰，但是，我还是向前走了一步。我双手在胸前合十，师父把剑尖抵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把全部气力都集中在咽喉上，他向前推着。我感觉到了脖子上那个锋利的铁尖，突然，我身子向前躬了一下。很显然，我也通过测试了。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了尚武的荣誉，公然接受测试。那时，我只有19岁。那天，我感觉到了全班对功夫的崇敬，我也得到了一副钢质双节棍和一把剑。我从没想过我会需要这些或其他什么武器，对我来说，世界上的暴力都发生在舞台上。我想在某种情况下，或在某些地方作贡献，但没想过我的奋斗会牵扯进武装暴力。

夏末时分，我回到了北京。韩琳帮我在她的公司找了个工作，让我在下午教英语。我想第一课只会有几个学生吧。三四个学生走了进来，我向他们问好并简单聊了几句，又来了几个，接着又来了几个。很快，我的教室里挤进了15个渴望学英语的学生。在向每个学生问好时，我发现他们的英语水平差异巨大，有的能很流利地说英语，有的却只能磕磕巴巴地说："How are you?"

我站在教室前面，不知道该怎么教英语，更不知道该怎么教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一帮学生。于是，我决定开放课堂，让大家自由讨论，他们提问，我来回答，也许有人能从对话中学到什么。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喜欢大家一起学习。"

一只手举了起来："埃里卡(把我的名字念错了)先生，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

这第一个问题听起来很奇怪，但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嗯，在美国，我们有一个文献，为政府打好了基础，这个文献就是宪法，宪法中包括一个权利法案，这项法案赋予每个公民权利，权利之一就是可以说几乎任何你想说的话。"我打算再多解释一下，但很明显，班里有些人已经走了。

另一只手又举起来了："埃里卡先生，集会自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又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仍然是关于权利法案的。很多学生都20多岁，他们对美国的政策和生活都非常感兴趣，有人也想去美国工作或留学。

我很快和中国年轻人们成为了朋友，我们一起骑车去食堂吃饭，他们教我在吃包子的时候淋上一点醋，我们在食堂边吃边谈。他们会问我："在洛杉矶要花多少钱能买套公寓？"或者"波士顿有摇滚俱乐部吗？或只有孟菲斯才有？"

我还去了他们的宿舍，看到那里贴着影星、歌星和汽车的海报。在宿舍里，我们还聊了旧金山、哈利-戴维森摩托车、第二次世界大战、虎年和美国姑娘。

时间过的很快。几天后，我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在登机前，安检查出了我背包里的双节棍和那把剑，他们把这两件兵器交给了一个很和蔼的空姐，她对我说："你不可以随身带着这些东西，我替你保管，到美国落地后，你再从我这拿回去。"

在中国，我体验到了练武时的辛苦和测试时的恐惧，也享受了和年轻人们在一起时的随意和轻松。坐在座位上，我没再想如何选择一种冒险生活，而是更多地思考了要选择一条有目的的道路。

如今回到国内，我又重新了解了美国同胞们，认识了这群最好的人，这群献身国家的人。

我发现我经常在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有个人母亲突然病重，他大哭着准备离开海军回家。另一个人家里非常穷困，他进入预备军官学校7周后几近崩溃，想要放弃，但实际上他只是一直都缺乏自信而已。我一直在开导他们，让他们坚持。

我仍然认为叠内裤和刷干净鞋准备迎接检查这类事情荒谬可笑，但我也逐渐开始认识到教官们的所作所为中蕴含的智慧。我们班上有些人以前从来没被大声吼过，但现在每天有两个教官专门冲他们吼，一边让他们完成困难的体能练习，一边要他们回答基本的军事问题。这种精神压力虽然远不能和军舰指挥官所面对的压力相比，但这确实让学员们认识到：在压力之下，他们能够也必须控制住恐惧情绪，履行职责。

无法控制的恐惧会毒害心灵，影响行动。海军军官履行职责时可能碰到导弹来袭、舰船下沉的情况，这些情况会让人因为恐惧而变得不知所措。拳击和海外工作的经历告诉我，人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自身对恐惧的免疫力。我第一次登上拳台实战的时候，心跳加剧，肾上腺素增多，肌肉紧张，结果我被打倒了。跟随伊尔训练了几年之后，再上拳台时，我能正确判断对手的危险程度，心跳平稳，肌肉放松，这样就能打得很好。在海外那些危险的地方工作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并不是无视危险，实际上我能更加敏锐地发现周边存在的危险，但在危险的环境中，我能让内心完全不受恐惧的干扰，正常工作。但对很多人来说，预备军官学校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混乱和慌张的地方。

同样地，尽管我认为那些对军装吹毛求疵的检查让人思想麻木，这种训练的确教会大家要注意细节。如果一个人的衣服背后沾着什么东西的话，全班都要受罚。因此，我们学会了相互检查，非常仔细地相互检查。

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刘易斯上士也表现出了人性的一面。在基地里是不允许吃垃圾食品的，但如果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里面有这种东西，我们也能吃上一点。到了收信的时候，一个学员会模仿邮车的声音，嘴里喊着“叮当叮当”、蹦蹦跳跳地给大家分信。刘易斯上士对这个喊着“叮当”的家伙突然吼了一声，他急着立正喊：“是，长官！”信件撒了一楼道。刘易斯上士低下头，把头藏在他那顶大护林熊帽子底下，但是轻微的颤动能让人看出，他在使劲憋着不让自己大笑出来。

我的朋友马特·蒂马克和我建立了一个名叫“求死体能训练”的组织。每天晚上，我们会把班上一大群人带出来进行额外的体能训练。没人会死，我们反而得到了很多乐趣。我们用引体向上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然后用大笑挥霍掉这一天仅剩的最后一点精力。我们参加了预备军官学校的拔河比赛，让我们的班旗在领奖台上高高飘扬。

就连刘易斯上士也开始有一点为我们班感到骄傲，当他喊“1-5”（我们班是 15-01）时，我们会高声呼应：“必胜！”

在最后的体能考核中，王和我们一样要在 2 分钟内做 47 个俯卧撑。最后，他做了 90 多个。他站起身，得意地说道：“就这么简单！”到了毕业那一天，我们全班人穿上耀眼的白色礼服，列成方队行进，行持剑礼。我们已经成为了海军军官。

我离开阅兵场，手里拿着命令，下一站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科罗纳多，去那里接受海豹突击队的训练。

第四章

海豹训练

“海豹训练”被公认为全世界最艰苦的军事训练。“海豹训练”时间长达六个月，其间参训者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要挑战极限。最终只有10%的报名者能够完成基本训练。另外90%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转到下一期。每年仅有约250人完成“海豹训练”，而且这250人也并非都能撑过接下来六个月的高级训练，最终成为海豹队员。

风景秀美的“银色海滩”全长七英里，将加州的“帝国海岸”与科罗纳多半岛连为一体。太平洋的海浪拍打着科罗纳多的海军两栖作战基地，这里是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海军海豹突击队的训练场。

每当我眺望银色海滩时，我都会想起我在杜克练习拳击的生活和海军海豹突击队相对短暂但无比荣耀的历史。

我的拳击生活

在杜克大学，在教授们的引导和鼓励下，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畅所欲言，我们可以对美国外交政策、亚里士多德、医学伦理等展开议论。作为杜克大学的学生，尽管我们在佐证立论方面毫无经验可谈，但我们能够自由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希望能有机会证实我自己。作为学生，我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我知道，现实的艰苦磨砺会让我更加出色。

我爷爷在芝加哥长大，那时候正是大萧条时期。他经常给我讲他在那里打拳的经历，粗野的训练馆，穷困的生活，艰苦的训练。他提到过各色拳手，有的擅长右手，有的是左撇子，有的是话唠，有的很安静，和他较量过的，和他争吵过的……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如何立足于这个世界。这就是我想要的——在经历艰苦考验后确立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在想，我为什么不上拳台试试呢？

大学二年级时9月的一个晚上，我把车在停车场停好，走下车，穿过满是啤酒瓶碎片的街道，就看到坐落在阿尔斯顿大街上的那家训练馆。沿街都是廉价住宅区，有些人在街角加油站附近闲逛。刚刚踏上训练馆的台阶，我就已经听到里面传出打沙袋的声音。我推开训练馆的大门走了进

去，里面没人注意我，也没人和我说话。我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白人。这是个与杜克大学校园截然不同的世界。

训练馆只是一个长长的屋子，拳台在屋子的一头，拳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速度球，墙上镶有很多用来练动作的镜子，屋顶上挂着三个沉重的沙袋。在屋子中间，拳手们有的在跳绳，有的在和陪练们打手靶。

我走到一个墙角，把背包放在一个蓝色的摔跤垫上，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训练。我做了一组俯卧撑，做得很累，然后又做了一组仰卧起坐。我拿出一卷从体育用品商店买来的绑手带，站在那儿开始绑我的手。

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大概有5英尺半高，肩膀肌肉发达，穿着紧身背心，下巴上有短短的胡子茬，肩膀上吊着一副拳套。

“嘿，老弟，想打比赛吗？”

我确实没仔细考虑过，我说：“不。”

他看着我说：“老弟，你不想打比赛，那你学拳击干啥？”

我没法回答他。我走向装备柜，拿了个头盔戴在头上，并找到一副红色拳套，用力套在手上。

我爬上拳台，但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就站在这儿吗？假想一个对手跟他比划比划？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个活生生的对手踏上拳台，并从护绳间钻了进来。他径直朝我走过来，我举起了双拳。他一记刺拳打中了我的额头，我用摆拳还击却没打着他。他左右移动着，用拳头向上晃我的面门，却向下一拳打中了我的肚子。他绕着拳台跳着，咧着嘴笑着。他又一次打中我，索性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冲他打了一拳，没打着，而他又打中了我的嘴。我又出拳，又打空，他的右拳再一次打中了我的额头。他打我的时候一直在微笑，我感觉训练馆里的其他人都在看着我们。他本来早就可以把我撂倒，但是我好像不值得他那么做。他的这些击打纯粹是为了逗乐，而我毫无还手之力。他找足了乐子后转身走下拳台，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我又来到了训练馆，人们都看着我吃吃地笑，但他们没再理会我。我又走到昨天那个角落放下我的东西，做俯卧撑，做仰卧起坐，直到汗流浃背。我想去跳绳，但不知道该怎么跳。为了让我看上去不那么像一个傻瓜，我决定去打那个很重的沙袋，但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让我更像一个傻瓜。

开始几天，我一直没怎么和别人说话，除了“嘿”、“你用那个练习吗”，还有“好！”

有一天，鲍勃·普在我打沙袋的时候朝我走来。他曾是一个拳手，饱经风霜，现在是这个训练馆的经理。他说：“你右面空当太大了。”我知道我有很多动作都不对，我很感激他跟我说话时的态度。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他。

“你需要找一个教练。”

“哪个教练最好？”

“伊尔和德里克。”

“他们在这儿吗？”我问道。

“不，他们现在在馆外训练，但我有德里克的电话号码。”

鲍勃从他办公室里拿出来一张卷了角的白纸，那是一份外卖菜单，他在背面用蓝墨水笔草草写了个电话号码。

德里克·哈姆普雷，26岁，身高6英尺2英寸，高大强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出色的拳手。他的鼻梁上斜着一道疤，我开始以为是拳击留下的，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小时候他妈妈拿木棍管教他时留下的。他曾是个无法无天的少年，留下过很多不良记录。

他住在一间公寓里，房间里空空荡荡的，灰暗的地毯皱巴巴地铺在地上，靠墙边是一张小桌，上面只有一个像框，里面是他妈妈的照片，电话就扔在地板上。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正在为几周后的拳赛进行备战训练。

几个月后，德里克告诉我说，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觉得我像个神经病。他说，几乎每周都有人对他说他们想要打拳，他们会来两三天，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像兴趣十足，然后这些人就消失了。德里克说他从电话里就能听出我是个白人，当我告诉他我在杜克大学上学并且已经在训练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时，他对我说：“我根本就不是觉得你像疯子，简直就是百分之百肯定你是个白人疯子。但是我想让我的生活有意思些，所以我才叫你过来。”

德里克介绍我认识伊尔·布莱尔，伊尔是他的教练。伊尔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人们叫他“爵士乐”，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总是充满活力，节奏感十足，面带微笑。

“你好吗？这么说，你准备要参加比赛了？”

“是，先生。”我回答道。

“嗯，那很好，很好。”

伊尔热烈地和我握了握手。他身高大概5英尺6英寸，66岁，身体非常结实，像农场里的小伙子。他笑容满面，全身都洋溢着快乐和愉悦，只有真正懂得去享受生命中每一天的人才会这样。

我们走进德里克家门外的停车场。孩子们已经放学了，有的骑着自行车在停车场里来回穿行，有的坐在水泥便道上聊天，妈妈们时不时地从门口探出头来，对着自己的孩子大声嚷嚷。站在德里克身旁，我不禁在想：难道要把这里当训练馆？

“很好，我们开始，德里克，你们俩一起，高抬腿跑，准备，计时开始！”德里克和我开始在停车场里进行原地高抬腿跑，每一步膝盖都要抬很高，都要打到拳头。伊尔看着他的秒表喊道：“停。”然后，德里克绕着停车场走了一小圈，我也跟着他走了一小圈。

“今天真适合训练，多好的天啊！”伊尔对我们说。我们休息了大概有30秒，又进行原地跑，还是要膝盖碰到拳头。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我开始怀疑伊尔是不是一个出色的教练，我也开始怀疑德里克到底是在怎么准备参加一场职业拳击比赛，难道就是在他家门口的停车场里跑跑跳跳吗？

我们做了几组训练之后，伊尔说：“好啦，热身结束，开始实战训练。”

“计时开始。”伊尔叫道。德里克开始跳动起来，迅速挥拳。他的出拳速度实在太快了，周围骑自行车的小孩儿都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个小男孩越看越激动，开始模仿德里克的动作，也在那里尽可能快地挥拳。我试着努力跟上德里克的速度。当我的胳膊、腿都开始发酸的时候，伊尔喊停了。我们暂停了一会儿，紧接着又马上开始，跳动、出拳，越快越好。伊尔喊停，我们停下，接着又开始，一遍，二遍，三遍……孩子们骑车绕着我们转。有一次暂停时，我双手撑着膝盖气喘如牛，听见一个孩子叫道：“那个白人快不行了！”

训练科目换了。我们躺在停车场的地上，头离开地面，脚离地6英寸。伊尔喊道：“保持高度。”接着，他走过来照我肚子就是一拳，我的腿触电般

垮了下来，双手不由自主地按在了肚子刚刚挨揍的地方。

“把腿抬起来，你能做到，看看德里克。”伊尔走向德里克，德里克的脚仍然保持着离地6英寸的高度。伊尔开始打他的肚子，右手拳，左手拳，嘭，嘭，嘭，每一拳打中德里克的时候，我都听到他迅速呼气，然后用鼻子迅速吸气。“时间到。”伊尔叫道。

那天，我们在停车场进行了一系列训练，但一件器械都没碰。当我拖着快散架的身体从地上爬起来，回到自己的车上时，只觉得筋疲力尽。这比我以前的任何训练、任何比赛、任何测验都更加要命。

如果说伊尔一边教你打拳一边传授给你生活经验，那是不对的，因为对伊尔来说，生活和打拳根本就没有分别，每一个举动都有意义。我们怎么悬挂那重重的沙袋，上帝保佑，怎么用绑手带绑手，保持谦逊，怎么正确地戴拳套，要准时，老师怎么爱护学生，怎么正确保养器械，这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伊尔不愿意别人叫他教练，用他的话讲：“教练能教你技巧，告诉你怎么把一件事做得更好，比如说跑步、投掷、打拳。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教练在教会你之后，你会用新学到的技能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学会了跑步，你可能会去抢劫商店；学会了打拳，你可能会去打架斗殴。我不希望这样。我不是训练选手的教练，我是教育学生的老师，我不仅要教怎样打拳，更要教怎样做人。”

我每周付给伊尔25美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感恩节也好，圣诞节也好，我都会给他。伊尔曾对我说：“每周25美元，周一支付。我们提前讲好钱的问题，这样就不会有误解，也不要找借口。每周25美元，不管你这周要训练5天，还是一天也不练，25美元一周就是25美元一周。”

伊尔解释说，为某事花了钱，你就会更加珍惜它，这是他以前得到的教训。“我曾免费训练孩子，可是孩子们根本就不知道珍惜。如果有一天不想练，他们就根本不去训练馆，我对他们也没办法。我知道这钱看起来好像有点多。我第一次跟德里克要钱的时候，德里克认为他不会付钱。但是，德里克，这五年来，你有哪一周没付过吗？”

“没有，先生。幸好如此！”

“他努力训练，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我总是说，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

的东西，但你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其实，这些钱并不算多，我知道我的时间比这更值钱。我将来会得到回报，但现在付钱仍然很重要。”

伊尔要求我们每天开始训练前都要进行祷告。他会说：“开始吧，说任何你想说的话。”我们会闭上眼睛，默默地进行祷告。我以前从没见过有谁每天开始工作前要做祷告，最开始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练拳是种很暴力的训练。几天后，当我的肋骨被打得断裂般疼痛的时候，我发现训练前祷告真是合情合理。

对伊尔来说，训练馆，停车场，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后面的泥地，任何能让人变得更加优秀强大的地方，都是值得尊敬的，而打拳的过程更像是一个仪式。我们在绑手、戴拳套时都保持着一种庄严的心情。德里克在比赛前绑手时，会把右手留给伊尔。他把五指尽量伸开，伊尔用剪刀在绷带上戳一个洞，德里克把大拇指从洞里伸出来，伊尔把绷带沿着德里克的大拇指向下把他的手腕紧紧地缠上六圈，然后再把德里克的手掌和指关节斜向交叉地缠上，最后再把大拇指缠上四圈。“把手指都伸开。”伊尔说。德里克会把手指尽可能地伸展开。伊尔不会把德里克的手指缠得太紧，因为那会影响到他手掌和手指的血液循环。最后，伊尔再用胶带把德里克的手腕缠上三次。胶带，伊尔对我说。我递给他一段胶带。胶带，伊尔说。我又递给他一段胶带。胶带，伊尔说。我再递给他一段胶带。伊尔把德里克的手指握成拳头，问：“感觉怎么样，德里克？”

几年后，当我看着一些人在军事行动前磨刀、擦枪、装背包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这种备战时的神圣的专注神情。

在杜克大学学习和练习拳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方式。在杜克大学，我们所做的只是读书和讨论，在训练馆，我们几乎只做不说。

“伊尔，怎么打刺拳？”

“看看德里克，跟他学。”

谈话结束。

看看德里克，这就是我要做的。我看着德里克找了块空地开始跳绳。绳子舞动起来，越来越快，这是热身。然后慢了下来，一下一下地从他脚下滑过，好像他的脚从来就没离开地面。一分钟以后，膝盖抬高，越来越高，绳子舞动得越来越快，带着一阵疾风。然后，他慢下来，看着其他拳手，绳

子也安静了下来，但他的脑子在飞快运转。绳子又开始激烈地舞动起来，上、下、左、右、飞起、落下，整个训练馆好像都动了起来。绳子噼啪作响，像一团舞动的清亮的云，包裹着一个专注训练的拳手，承载着他全部的重量。

两周以后，伊尔开始教我打沙袋，接下来整整两周时间，我一直在练习打刺拳。

“时间到。”伊尔喊道。我离开沙袋，德里克走了过来。“他是你的榜样，埃里克，看看德里克怎么打沙袋。”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坐在伊尔那辆老爷车的后座里，德里克坐在副驾驶位置。伊尔开车很猛，恨不能总把油门踩到底。他说：“我想我应该能把车开飞起来。”的确，我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驰。那天晚上，德里克在罗利市的里兹大饭店有场拳赛，我是去跟着帮忙的，但我的脑子里却老想着杜克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出去狂欢聚会了，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该和他们出去玩一次。

伊尔和德里克在谈论怎样才能确保拿到报酬。完全出于好奇，我问他们：“打这样一场拳赛，一个人能拿多少钱？”

“哦，”伊尔说，“我想一个四回合的比赛的话，你大概能拿 400 美元。差不多吧，德里克？”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德里克说道：“没错，伊尔，作为一个白人，一个新人，埃里克也应该能很轻松地拿到 400 美元。”

“另外，德里克，他们可能还会多给一点，因为他是初次登台嘛！你看，仅仅经过三周训练就登台打拳。”

“没错，伊尔，埃里克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兜里能装着 500 美元。”

“是啊，孩子，你打一个四回合的比赛，可能能挣 500 美元呢，这是给新人的。你多打些比赛，多积累些经验，你以后会挣大钱的。”

他们嘻嘻哈哈地评价着我那三周训练后的初赛的美妙前景。之后，他们告诉我，大多数拳手打一个回合能挣到 40 到 50 美元。

经过几周训练后，伊尔知道我打算留下来坚持训练。他告诉我应该自己买装备了。伊尔不想再让我用训练馆柜橱里的东西了。

他说：“我们都在用这个沙袋，当它最后破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得掏

钱买一个新的。至于其他的东西，每个拳手都该有自己的装备：自己的拳套，自己的跳绳，自己的绑手带，自己的杯子，自己的护齿，自己的凡士林。为什么？因为我要教我的孩子们如何照料他们自己的东西，让他们学会如何尊敬这些东西。他们需要自己保养拳套，回家后自己往上抹凡士林，拿出去晾干，清洗绑绳。你看看训练馆里的这些拳套和头盔，每个人都尊敬它们。你看看这些，到处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装备总是像新的一样，崭新的。我们的东西是与众不同的，我们要一直让它们与众不同。"

有一天我刚做完祷告，伊尔递给了我一份Ringside品牌的拳击用品清单。我翻了一下，有拳套、头盔、吊袋、护裆……伊尔指着每一件他觉得我需要买的东西。"这种拳套是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这种头盔和德里克用的一样，它能很好地保护你。"伊尔从兜里掏出了个旧计算器，我给他写了张支票。

几天后，伊尔抱着个大纸箱走了进来，上面巨大的黑体字写着"Ringside拳击"。他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脚步似乎比以往更加有活力。他把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我的头盔、拳套、护齿、靴子……当他把一件件东西递给我时，我感觉我合格了。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拳手，但至少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学生。这是一份不小的订单，所以Ringside给了不少免费赠品，伊尔从中拿出一顶黑色球帽，帽子前面印有"Ringside"。他把自己的旧帽子摘下来，戴上这顶新的Ringside帽子，高兴地咧着嘴笑道："太棒了，我们需要的东西都齐了。"

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后，我走进更衣室，脱掉了我的新拳套和绑手带。我伸开双手，看着每一个指关节。前些时候我在打沙袋时把手上的皮蹭破了，看上去很快就会结痂了。现在我似乎很享受手上的鲜血、嘴唇上的小口子、疼痛的下巴带给我的感受。我开始从经历的伤痛中获得力量，这种感觉非常好。我往洗手盆里放满了热水，把双手浸了进去。当我把滴着水的双手拿出来时，我感到热血流遍了每一个指节。我对着镜子检查伤势，轻轻地捏捏下巴、脸颊和鼻子。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自己的脸，我知道自己只是在多年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我还不那么坚韧，也并不特别出色，但我正在变得更加有力。我喜欢这种感觉。

对伊尔来说，每一件事，小到清洗自己的拳套绑绳这样的事，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道德含义。如果你不是每周洗一次绑绳，说明你不爱护自己的装备；如果你不爱护自己的装备，说明你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训练；如果你不能足够认真地对待训练，你就不应该在这儿；如果你不应该在这儿，你就应该马上离开。这套逻辑关系有些上纲上线，但在训练馆里，确实很管用。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拳击训练馆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可以远离外面混乱和无法预知的世界。拳击训练馆的好处在于，这里有秩序，有纪律，没有作秀，没有废话，没有夸夸其谈和自吹自擂。“你有啥想说的？来吧，拳台上说吧。”

伊尔一直努力在用他最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保护他的拳手，但他终究不能保护所有人。悲伤的记忆像幽灵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最痛苦的记忆是比沃尔，他的第一个学生。有一天训练完，我靠着拳台站着，伊尔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比沃尔有个比他年龄大的朋友，叫欧内斯特。他们一起长大，住在克拉克大街同一个街区。我开始训练他的时候，他刚上七年级，欧内斯特上九年级。比沃尔觉得他永远都打不过欧内斯特，因为欧内斯特强壮高大。经过几年的训练，我告诉欧内斯特，我训练了比沃尔，你不能再欺负他了。

“但是欧内斯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他还是去招惹比沃尔。接下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比沃尔在大街上把他揍了一顿。当我听说后，我对比沃尔说，你要小心欧内斯特，离他远点，你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你别再去克拉克大街了。”

“克拉克大街怎么了？”我问道。

“克拉克大街一片混乱，孩子们到处惹麻烦。我告诉比沃尔离那里远点。我知道，欧内斯特就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第二天，欧内斯特就去寻仇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接比沃尔过来训练。我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大街上，刚开始我以为是谁喝醉了躺在那里。我走近一看，我看到了他的脚。那是比沃尔的网球鞋。我跳下车，发现是欧内斯特开枪打了他。我的孩子躺在大街上，奄奄一息。我听见有个孩子喊，伊尔来了。就在那时，我看到欧内斯特开车要跑，我顾不上比沃尔，跳上车，紧追欧内斯特。我们穿过了整个亨德森市，最后他把车开到了警察局。但是我觉得我

当时应该在那里陪着我的孩子。我有时在想，当他听到那个孩子喊‘伊尔来了’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一切就会好起来了。但我却去追欧内斯特了，而比沃尔就那么孤零零地死在了大街上。”

眼泪在伊尔的眼眶中打转。

“那是我的遗憾，我很伤心，因为比沃尔不听我的话。就在前一天，我还告诉他离开克拉克大街。就在前一天，我还告诉他，欧内斯特绝对不是个好人，别再理他。比沃尔刚刚18岁，我教了他将近五年，他是我第一个学生，我第一个孩子。”

伊尔的生活给了他严酷的教训，他对品德的关注近乎偏执：如果你不洗拳套绑绳，按照他那套逻辑关系，你这个人就不值得他教。伊尔苛刻地要求我们和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很好地照料属于他的东西，他就不是个男人。

伊尔还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一个拳手恃强凌弱的话，他还不如一条狗。“我甚至不愿意把他们与狗相提并论，因为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好狗。任何打女人、打孩子的男人，他连狗都不如。”在伊尔看来，上帝给每个人都赋予了力量，我们的责任就是开发这些力量。“你爸爸为什么给你肌肉？为什么给你大脑？看着我，我不可能是这片街区最强壮的人，也不可能是这条街上最聪明的人，但我知道，我不能浪费我爸爸给我的这些东西。”他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力量，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开发这种力量，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这种力量用来服务上帝。有时候，这意味着你要好好跳绳；有时候，这意味着你要帮助莫名其妙闯进训练馆的迷路小孩儿；有时候，这意味着在早上5点给我这个大学生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帮他挪冰箱。

伊尔几乎从来不用“尊敬”这个词，但他整套教育方法和生活方式都以“尊敬”的概念为核心。你尊敬上帝，所以你要节约时间；你尊敬朋友，所以你对朋友要以礼相待；你尊敬老师，所以你要称呼老师“先生”；他尊敬学生，所以他要教学生们勇于挑战痛苦而变得强壮。伊尔把关爱与痛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治疗伤痛的时候，爱具有非凡的作用。

我们的训练馆后来被市政厅关闭了，所以德里克和我在北卡大学的跑道上进行训练。天经常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对抗练习，也不能打速度球。因为我们大多数装备都是皮质的，容易被雨水淋坏。雨中跑步给

我们新鲜感，感觉清新，但雨水也让土地变得泥泞不堪，所以雨后一两天都不能打沙袋。我们练习对打，但没有拳台，就不能把一个人逼入死角，很难击出重拳。下雪的时候，我们会绕着操场跑圈，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踩出两圈清晰的脚印，露出下面的红色塑胶跑道。

在我和德里克跑圈的时候，伊尔通常会在场内来来回回地飞跑，大声地给我们鼓劲。我们就是他关注的焦点，不过有女士在跑道上走过时，伊尔就会在脸上挂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女士们，你们好啊！"伊尔已经66岁了，女人们经常会误认为他这个年龄的男人没什么危险。他会对她们说："这些是我的孩子，我训练的拳手。"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伊尔正跟一个30出头的女人约会。

我和德里克肩并肩在跑道上跑着，我们戴着拳套，边跑边打出刺拳、上勾拳、勾拳、短直拳，同时不断摆动头部，好让手臂能够护住要害。

跑道外面有一圈围栏，经常会有北卡大学的学生从外面经过，他们会朝我们乱喊乱叫："嗨，你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跟泰森打一场啊？"或有人对我叫："那个白人小子，我来和你打一场吧。"德里克说："别理他们，埃里克，我们有事要做。"我们继续跑步。

当我们从伊尔身边经过时，伊尔会对我们喊："瞧啊，他们来了，多棒的组合啊！"我们跑过去，他还在继续喊着："一个要拿世界冠军的职业选手，一个即将创造纪录的业余选手。"过会儿，他跑去坐在橄榄球教练经常坐的那个位子上，接着喊道："是，先生，那就是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和德里克、伊尔一起训练了三年。在我三年级时，我就想参加金拳套全国锦标赛，但是我在那个圣诞假期时打橄榄球摔断了腿。因此，在我四年级那年2月份举办的锦标赛，将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参赛机会。

有几周时间，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跑步，整天都想着打拳的事，到了晚上也辗转难眠。在去参加锦标赛之前，我站在秤上，很高兴地看到我把体重减到了156磅。当我和伊尔在暴风雨中开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时，我镇定自若，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三年了，我在沙袋前练得汗流浃背，经常打到指关节出血。只要再打几场比赛，我所有的付出就将得到回报。根据规定，业余拳赛单场比赛时间不能超过6分钟。

我走进称重室，那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美国业余拳赛宣传册和零散的纸张，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子坐在桌子后面，大手里拿着支笔。我走过去，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哦，知道，知道，你是从达勒姆来的那个小伙子。你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对吧？好，我们现在开始称重吧。”

“156 磅。”我精确地控制了自己的体重，156 磅是次中量级的上限。

“太棒了！”伊尔说道。

“嗯，很好，你是个新手。”根据金拳套锦标赛的规定，参赛少于 10 次的拳手被称作新手。“哦，我们需要另一个次中量级的新手。因为这场暴风雨，很多人不能来参赛了。这次我们能组织起 12 场比赛就算幸运了，半数的拳手都没对手。我真不记得这种鬼天气上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伊尔问：“我们的对手是谁？”

“哦，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你们的新手。”

“我们想比赛。”伊尔说。

“我们也想让你们比赛，但是你们需要有对手。”

我们得等到检录结束才知道结果。我走上楼，过了一会儿，伊尔上来了，手里拿着张打印纸。我的名字在表格中“156 磅新手”那一列里，属于“蓝角”那一栏，而我的对手是“无”。我低头看着我的背囊和脚边的小冰袋，突然觉得那么精心地做准备是件很荒唐的事。

我和伊尔看了几场比赛，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直到有人叫到我的名字，把我叫上拳台，在观众们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给我颁发了奖杯，只是因为我来比赛了。

我垂头丧气地用左手倒提着奖杯穿过大厅，这时伊尔在我身后对我说：“站住，把你的奖杯拿好。”我们在大厅中停了下来，伊尔转到我面前，用手把我的脸扭向他，“看着我的眼睛，埃里克。你是金拳套锦标赛的新人冠军，你赢得了这个奖杯。好好拿着它，继续往前走。你苦练了三年，真的是苦练，你能够打拳。你做了所有你应该做的事，甚至更多，你尽了最大努力。你得到了这个奖杯。这个奖杯要摆在你家的壁炉架上，让所有人都看到。孩子，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你做到了，其他的事要看上帝的。你知道怎么打拳，看看那些在训练馆中被你击败的

人吧。你一直练得很努力，差不多三年时间啊！”

“我知道，但我想通过比赛赢得这个奖杯。”我说。

“我明白，孩子，你以为我不懂吗？”伊尔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

伊尔确实知道我很想比赛。有一天晚上，我和德里克正在跑道上练拳，莫里斯跑了过来。莫里斯是职业拳手，伊尔以前也训练过他。莫里斯也在北卡大学操场上跑步，有时他会过来和我们一起打沙袋。

“伊尔，最近好吗？”

“非常好，非常好，你呢？”

“还不错，几周后我有场比赛，我想找个好搭档练练拳。我能和德里克练练吗？”

“埃里克怎么样？”

“埃里克？”莫里斯看着我。

“埃里克也不好对付，况且他跟你的级别更相近。”

德里克是168磅级的，我是156磅级的，莫里斯是147磅级的。

“埃里克，嗯，好吧。”莫里斯笑了笑，“我肯定能很轻松地对付他。”

我曾经亲眼看过莫里斯在罗利市的里兹大饭店里打赢了比赛，他是个天才职业拳手。我在想：伊尔可能是疯了！但在金拳套锦标赛之后，我确实很想比一场。

伊尔站在我面前，给我打开拳套。我把手滑进冰冷的拳套，直到指尖碰到拳套底部，我才把手指紧握成拳。我把拳套紧紧抵在伊尔肚子上，他稍稍弯下腰，用他那有力的手指帮我系绑绳。他把绑绳交叉系好，打了个双节，然后把剩下的绑绳塞到拳套里。两个拳套都系紧之后，我转过身，面对莫里斯。

伊尔用橙色的三角锥在跑道上圈了块拳台大小的地方，我和莫里斯碰了碰拳头。我曾经和德里克打过，他有6英尺2英寸，臂展很长。莫里斯比我矮一点，所以我比较容易靠近他。我打出一记刺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的头猛地向后仰过去，这是我打过的最漂亮的一拳。在我们凑合成的拳台里，我一直追着莫里斯打。我不停地打出刺拳，不停地听到拳肉相撞的声音。

莫里斯绕着拳台滑步，我意识到，他在躲着我。我打他，他也狠狠地

回击我，我们的对打很快就变得十分激烈。我一个右摆拳，打中了莫里斯的头，打得他一个踉跄。我继续追着他打。他转过身，恶狠狠地还了我一记右手拳，拳头带着劲风从我头边擦过。我们已经不是在练习，我们是在比赛。

伊尔曾教过我先用右勾拳击打对手身体，紧接着再用右勾拳打他的头。我先虚晃一拳，然后一拳打中了莫里斯的肋部，然后我扭身发力，绕过了莫里斯的左手，一记右勾拳正打中他的太阳穴。莫里斯又踉跄了一下，接着他转过身，走出了拳台边界。

“我告诉过你埃里克能打。”伊尔叫道。

那天晚上德里克对我说：“埃里克，我以为你要在那儿把老莫给宰了。你现在也算是打过点比赛了。”

那天晚上，伊尔打电话给我，说：“你有时间的时候来我家一趟吧。”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嗨，伊尔。”我一进门就跟他打招呼。

“哦，太棒了。”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我感觉棒极了。”他说。

我看到在他餐厅的桌子上，挨着我那金拳套奖杯放着一块金色的小金属牌。伊尔拿起那块金属牌递给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拿着那块金属牌，当我看到上面我的全名时，我突然有了一种非常庄重的感觉。

伊尔没再让我插话，接着说：“现在把它翻过来，看到背面的胶布没？把它揭开。”

“好的。”

“把它贴在奖杯的大理石底座上，就在那个人像下面。”

我把我的名牌牢牢贴在奖杯上，就在那个出拳的金色小人像下面。

“他看起来很像你，很像你今天打莫里斯的样子。贴牢了没有？”

“嗯，贴得很牢。”

“很好，你把它带回家吧。上帝保佑，明晚见！”

“谢谢你，伊尔！”

在海豹突击队的艰苦训练

突击队的前身是二战期间“水下破坏小组”的蛙人们。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德军在水下和海滩上布置了大量障碍物，用以阻碍登陆艇、坦克和车辆抢滩。“水下破坏小组”作为先遣部队被派往登陆区进行侦察，爆破障碍物，为登陆部队开辟通路。如果没有提前清除障碍物，登陆艇就会被堵在深水区，无法让士兵登岸，并被德军的炮火撕成碎片。如果没有那些蛙人的话，盟军在D日的登陆行动根本无法展开。

与那些参加诺曼底登陆的前辈们相比，我即将接受的训练所依据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学习的许多战术也是相同的。游骑兵、陆军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部队、空军伞兵营救部队都是声名赫赫的特种部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赤胆忠诚、英勇善战的勇士。每支部队的任务不同，需要的技能也不同。所有部队的训练都异常艰苦。不过“基本水下破坏训练/海豹(BUD/S)”训练被公认为全世界最艰苦的军事训练。BUD/S的训练时间长达六个月，其间参训者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要挑战极限。当我2001年报名参训时，我知道最终只有10%的报名者能够完成基本训练。另外90%要么被淘汰，要么被转到下一期。每年仅有约250人完成BUD/S训练，而且这250人也并非都能撑过接下来六个月的高级训练，最终成为海豹队员。

2010年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选出了255名新秀。每位新秀一旦被球队选中后至少可以得到32.5万美元的年薪，除此以外，许多高顺位的新秀还会得到额外的奖金(对某些新秀来说这意味着上千万美元)。相比之下，2010年接受海豹训练的海军士兵年薪要低得多，服役两年的士兵为19464美元，服役五年的士兵也只有24744美元。这两者都是精英群体，只有勇气非凡的健儿才能通过长年的考验，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识不少伟大的职业运动员，也非常崇敬他们，但我在训练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每年通过海豹训练的250人所获得的回报远比他们更加丰厚。

一名穿着迷彩服的年轻水兵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跟我打招呼：“你好，长官。”他名叫达斯汀·康纳斯，是BUD/S中体能科目的佼佼者——他能够飞一般地完成越障训练，而且能在柔软的沙地上如履平地般飞奔。他

后来曾随海豹第一大队在伊拉克服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做工程师，而且已经当父亲了。我们将一同经历无数磨难。

“我很好。你呢？”我握了握他的手。

“你肯定是在237期吧？”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达斯汀参加的是上一期训练班，但在训练中摔断了腿，所以就落到237期了。他告诉我237期训练班正在“集中”——很快就要进行最初的适应性训练。他说我们很可能会一起参加BUD/S训练。

他在我的命令上盖了章，让我第二天早上再来，领我的装备，并接受开训前最后一次体检。

在BUD/S训练中，我们必须在领到的所有东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我领到了自己的脚蹼，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前领到这副脚蹼的参训者的名字。

沃克

罗德里格斯

赫曼

他们都没能通过。我取出一支笔，划掉“赫曼”这个名字，写上我的名字“格雷滕斯”。几个星期之后，会不会有人再领到这副脚蹼，然后划掉我的名字呢？

清晨5点，我们的第一个BUD/S正式训练日在海滩上开始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享受生活的早晨。细浪拍打着海岸，卷起沙砾。当我们在海滩上跑步的时候，我抬头瞥了一眼天空，多美啊。天空还是暗蓝色，群星在海上闪耀。

但我们没有闲暇欣赏风景。教官到场后就会要我们交集合报告，清点参训人员。我跟其他军官把我们新剃的脑袋凑到一起，凭借一支红光小电筒微弱的光亮核对本期训练班通过适应性训练的人员名单。我们开始时有220人，但现在由于不少人在适应性训练阶段主动放弃或因伤病退训，

我们只剩下 160 多人。

第一个科目是在柔软的沙地上跑 4 英里。我们都穿着靴子、迷彩短裤和白色 T 恤。教官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海滩上乱转，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个家伙想活跃一下气氛，说："他们是要等到美女来为我们加油的时候才出现吗？"但我们都太紧张了，没有人发笑。谁都知道，今天早晨来海滩的大部分人最后都会被淘汰。

"趴下！"教官们走上了海滩。我们都俯下身体，双手撑地，做好俯卧撑的准备姿势。

"做。"

"一！"我们一边挺起身体一边整齐地喊道。

"做。"

"二！"

"做。"

"三！"

一个教官用脚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然后用扩音器喊道："两英里外的海滩停着一辆卡车。沿着海滩跑到卡车那儿，然后再跑回来。你们有 32 分钟。还有，先生们，"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那句我们在接下来的 BUD/S 训练中还要听几千次的话，"优胜者有好处。"

与此同时，卡车打开了前大灯，光柱刺穿了清晨的黑暗，看起来离我们非常远。

"妈的，这可不止两英里。"有人嘟囔道。

"简直是放屁。"

"我听说他们就是要让你第一次跑不完，有时候比五英里还远。"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预备。"我们都深吸了一口气。"开始。"

一群人开始冲刺。学员们一片恐慌。一个个穿着白 T 恤的身影飞奔而过，把沙子踢得老高。我大声喊道："稳住。稳住。"但是恐惧笼罩着这个早晨，全班都开始在海滩上狂奔。

跑在我身边的同学是一名优秀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周围的恐慌景象让我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当我们跑到半英里处的标记点时，那些一开始就冲刺的人速度都慢了下来，有些人已经跑不动了。他们慢跑一段，冲刺

一段，停下来大口喘息，然后接着再跑。我们还要跑三英里半，而这些家伙们已经快不行了。他们都曾是运动员，其中有高中和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水球运动员，还有得过州冠军的摔跤运动员，许多人在后来的跑步训练中也名列前茅，但正如我们在BUD/S训练中所学到的那样：如果精神不够坚韧，不能克服恐惧，身体的强健就无用武之地。

当我们接近卡车的时候，强烈的灯光穿过清晨的黑暗，把我们跑在队伍前面的这几个人照得几乎睁不开眼。我们迎着灯光向前跑，这时听见教官们喊道："脱掉你们的T恤！脱掉你们的T恤！扔到车上！"我们边跑边脱下T恤，扔到卡车车厢里，然后朝终点跑去。

所有的教官都经历过BUD/S训练，清楚所有作弊的花招。他们知道在黑暗里，在160多人的混乱中，很容易有人作弊，还没跑到卡车那里就掉头往终点跑。不过，我们的T恤上写着名字，能够证明我们跑到了折返点。

我们在沙滩上朝终点飞奔，在限定时间内跑过终点线的人可以休息一下。

马上就要到32分钟了，绝望的学员们开始拼命冲刺。教官们在终点线上来回踱步，时间到了。教官们对此后跑到终点的学员吼道："冲浪去！马上下水！"这些筋疲力尽的家伙跌跌撞撞地冲入冰冷的太平洋，水温只有大约华氏50度[1]。

当这些学员们浑身湿透地上岸后，教官们又吼道："去玩沙！"他们趴下打滚，直到全身每个地方都沾上沙子。"俯卧撑——开始！"教官们喊道。等他们俯卧撑做得筋疲力尽后，教官命令他们仰面躺在沙滩上练习浅打水，然后再做俯卧撑，又做浅打水，再做俯卧撑。"起立。找个同伴。抢救背负[2]。跑到韦德教官那里。开始！"这些家伙们已经两腿打颤了，但他们还得扛着另一个浑身湿透、重达200磅的家伙在海滩上奔跑。

一位教官走到我们这些正在休息的人跟前说道："先生们，好好看着。在BUD/S训练里，当优胜者有好处。""失败者"们现在又跑回海里，潜进水底，然后再跑回海滩。下水，上岸。下水，上岸。

---

[1] 约为摄氏10度。

[2] 一种背负方法，在无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将被背负者扛在肩上送至目的地。

“失败了，就要付出代价。失败了，就要付出代价。”一位教官在岸边大声喊着。

教官们围在一个学员周围，他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全程，现在浑身湿透，沾满了沙粒。他保持着俯卧撑的姿势，屁股撅得高高的，双臂不停地颤抖。教官们就要淘汰他了。一位教官对他吼道：“你知道战斗中的第二名能得什么奖品吗？”

“不知道，教官。”

“是死亡。第二名没有奖品。现在好好完成你的俯卧撑。”

那个学员的胳膊在发抖，他吐着嘴里的沙子，结果口水流了出来。他肯定是回答了一句“我也想”之类的话，因为教官一下子暴怒了。那教官大声道：“没有什么想。我们不想。你的队友不需要你想掩护他们的背后。你的兄弟不需要你想救他。你的排不需要你想打准。没有什么想。只有做。做或者不做。没有什么想。”在我们跑步去吃早饭之前，已经有几个学员退训了。

教官们鼓励学员退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员在训练中说“我退出”或者“我主动放弃”，他就会立刻被踢出训练，而且一般来说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退出者随后必须敲三下钟，从而正式退出训练。接下来，他们要把自己的BUD/S头盔放在操场上排成一列。每天操场上都会出现更多的头盔。

为了提供“优异的客户服务”，有时教官们在我们训练时也会带上一口钟，这样你就能直接敲三下钟，“快速退训”了。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日出前赶到基地。进了基地后，我经常能听到兵营中传出愤怒的摇滚乐的咆哮。

>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闭嘴！
>
> 闭嘴！闭嘴！闭嘴！
>
>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闭嘴！
>
> 闭嘴！闭嘴！闭嘴！

歌词颇能说明我们中几个年轻的狠角色的音乐品位。他们剃了光头，穿着迷彩服，一边在营院里闲逛，一边猜测当天的训练内容。

“你好，长官。”

“怎么样，利普斯基？”

“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我笑了。如果我留在牛津大学任教，或者到某家咨询公司工作，很难想象我起得这么早，心情还会这么愉快。我也知道，如果我留在牛津或者去一家全球500强的公司工作，我一辈子都只会跟一类人打交道：他们上的是杜克大学或牛津大学，在光鲜的大公司工作，看上去十分“多样化”，有男有女，有的来自印度尼西亚，有的来自赞比亚，还有的来自土库曼斯坦，肤色也各不相同——但实际上，这些人的成长背景几乎一模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当教授，当律师，但没有几个人知道怎么当警察，怎么干力气活。他们觉得自己是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而这些参加BUD/S训练的人却只把自己当做美国人。

我们训练班的学员与好莱坞塑造的海豹队员形象有很大差别。没几个人有好莱坞银幕上渲染的那样健美的身材，他们并不起眼，但无比坚强。安德鲁吉斯·巴巴契纳斯是与我们一起训练的立陶宛特种部队成员，体重250磅，我曾经见过他仅用两手完成攀绳训练课目。德鲁·博尔顿出生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伐木工人家庭。德鲁性格坚忍，酷爱读书，尤其是爱默生的作品。还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乔丹·迈韦尔。乔丹的孪生兄弟贾森此前已经通过了BUD/S训练，其间乔丹曾穿贾森的衣服训练了一天，好让他的兄弟休息一天。那时乔丹还没有参军。这件事简直疯狂，而且是违法的，但这也说明他有勇气，愿意为他的兄弟做任何事。

大部分BUD/S训练都在战斗训练池进行，这是一个特殊设计的水池，长164英尺，宽82英尺，与奥运会比赛泳池大小相同，根据水深分为3个区：15英尺区、9英尺区和3英尺区。

我们穿着迷彩上衣、迷彩裤、黑靴子，戴着绿色的“第一阶段”头盔跑步前往训练池。我们还都扎着一条用来挂装备的武装带，上面挂着一个军用水壶，壶上面还系着一根白绳。

只要有空，无论是在等开饭，还是在等轮到我们跑障碍，我们都会练习

打结，因为我们必须能把炸药牢牢地系在水下的障碍物上。打结是一种古老的技巧，历史几乎与蛙人一样悠久。诺曼底登陆时的前辈们就必须在漆黑的夜里，用冻得僵硬的手指打结，炸掉纳粹布置的障碍物，现在轮到我们了。

我们来到训练池边后，看到教官已经在15英尺区的水下拉了一根绳子，离池底只有几英寸。我与我的同伴跳进水里，游到前面的教官那里。我们两人都深吸了一口气，单手握拳，伸出大拇指指向下方。意思是我们已经做好潜水准备。当我们朝池底潜去时，鼓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用学到的瓦耳萨耳瓦氏法，捏住鼻子，然后用力做呼气动作，直到感觉鼓膜内外的压力平衡为止。

当我们潜到池底后，我扯出自己的绳索，开始在横拉在水下的那根绳子上打结。在岸上打结很容易，但在15英尺深的水下，我一打结就开始往上浮，我必须松开一只手划水，这样才能让自己继续潜在水中。

我和同伴打完结后，朝教官做一个“可以了吗？”的手势。他从左边看看我们打的结，又从右边看看，然后又分别拽了拽两个结。就在我感觉自己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他向我们作了一个“可以”的手势。我们解开自己打的结，浮上水面。

我们在水面上作了五次深呼吸，接着教官说：“走吧。”我们又潜下去打另一个结。我们必须打五个结，而且一个比一个难。

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潜下去打完结后，突然间身体无力，开始向上漂。教官们把他拖上水面，命令我们其他人上岸，背对训练池坐下。但我们能够听到教官们在抢救他——把他拖上岸，按压他的胸口，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在池边被抢救过来，活了下来。但他的大脑受到了损伤，退出了BUD/S训练。

两期前的BUD/S训练班中，约翰·斯科普中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训练中的极大压力会导致液体流入肺部，引发肺水肿。这会降低肺活量，就好比是在岸上溺水一般。症状包括胸部疼痛，有溺水感，咳血。大部分BUD/S学员的身体素质棒极了，哪怕肺活量减小也仍然能表现得很好。因此即便有人得了肺水肿，但他仍然能咬牙坚持训练，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了麻烦。

教官一再警告我们，一旦自己咳血，必须马上告诉他们。当时就在战斗训练池里，斯科普中尉正在进行“毛毛虫赛”。在所谓的“毛毛虫赛”中，学员分成小组，穿着救生衣在池里排好位置。每个人（救生衣让自己浮在水面上）都用两腿夹住自己前面的人，然后用两手划水，跟其他小组比赛，整支队伍看上去就像一条笨拙的毛毛虫。斯科普中尉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患了肺水肿，在毛毛虫赛中，他的肺部充满了液体，最后死在游泳池边上。

当我第一次听说斯科普中尉的事情时，我心想，这真是愚蠢，我肯定会告诉医生，跟着下一期完成训练。

当我真的参加了 BUD/S 训练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训练期间，你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退出本期训练班，跟不认识的人从头开始重新训练。

几周后，当我在 15 英尺深的水底打完结上岸后，我吐了一口血一样的东西。一名 237 期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看到了这一幕。我对他说：“我没事。”他则回答说：“行了。最好别让教官看到你。”

训练一周周过去，最初 220 人的训练班越来越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认识，彼此喜欢，彼此信任。在长跑、游泳、潜水、障碍训练中仍然不断有人被淘汰。一个家伙在越障时从 40 英尺的高塔上摔了下来，双腿骨折。我们学会了如何齐心协力地划小艇；怎样让自己的背包浮起来，好拖着它在黑夜中游过海面；怎样磨快自己的军刀；怎样执行小分队巡逻任务。许多学习都是痛苦的煎熬。

但有一件事我们都非常喜欢，那就是乘直升机。我们在旋翼的轰鸣声中跑向直升机，第一次爬进机舱时，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当直升机离开地面时，我探过身体，对自己小艇组里面的一位军士格利戈·霍尔喊道：“真是太酷了！”

他以为我是在临时给他下什么命令，拍拍耳朵示意他没听见。“这太酷了！”我又大喊道。他咧嘴笑了起来，对我跷起了大拇指。此时我们正在圣地亚哥湾上空飞行。

直升机减速到 10 节。我们在距水面大约 10 英尺的高度飞行，旋翼呼啸着，掀起的狂风将海水吹得翻起阵阵泡沫。我带领一个七人的小艇组。

我们都站起来排成一列。教官向舱门外一指，第一名成员就跳了下去。直升机继续飞行，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出舱门，落入海中。霍尔倒数第二个跳出舱门。

霍尔之前曾在陆战队服役，上大学时是橄榄球队队员。他只有5英尺9英寸高，但体重却有215磅。霍尔结实得像块石头。他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但对完成眼前的工作却又认真得要命。我对他已经完全信任。这期训练班满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他们还不习惯迎接挑战，也还不习惯领导团队。在这个班里，霍尔是代表力量与成熟的指路明灯。

我排在霍尔之后，最后一个跳出直升机。教官先举起拳头做了一个准备的手势，然后向舱外一指，我接着跳了出去。现在我们这组人浮在水面上，仍然排成一列。直升机绕着海湾兜了个大圈子，然后放下软梯，朝我们飞来。现在真正的挑战来了。直升机会在我们头上飞过，高度还是10英尺，速度还是10节，小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抓住掠过水面的软梯，顺着梯子爬回到直升机里。

我们训练的是海豹进入和撤出任务区的方法。一架直升机飞入任务区，将一个小队投入水中，小队执行完任务后游回水中，直升机放下软梯，掠过水面，接回小队。

霍尔跃出水面检查我们的队形，确认我们排成了一条直线，随后他将手臂高高伸出水面，向我跷起大拇指。我们小队中的第一名队员抓住软梯，开始向上爬。他爬上了三阶后——这非常好——第二名队员抓住了软梯。雅普是一名前来参加BUD/S特种作战训练的新加坡突击队员，当他抓住软梯时，梯子开始左右摇摆。当第三名队员抓住软梯时，雅普才刚刚爬了一阶，现在梯子开始扭转起来，拖着三名队员在水面上滑行。直升机继续飞行，队员们继续攀爬。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具。直升机越飞越近，掀起的狂风在水上吹起一个漩涡。我知道在这种风与水的机械风暴中，很容易根本碰不到梯子，而这种错误肯定会受到教官的严厉惩罚。

直升机掀起的漩涡接近了霍尔，我可以看到在扭转的软梯上只有三名穿着黑色潜水服的队员。霍尔被漩涡淹没了，直升机随后向我飞来。我盯着软梯，耳畔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掀起的机械风暴也越来越近了。

突然之间，我周围的圣地亚哥湾又变得一片平静。我恼怒地拍了一下水面，以为我抓偏了。

我抬起头，看到直升机不断爬升，30、40、50英尺，梯子上只有两名队员。这时一名队员松手了——我知道那是卢卡斯，他曾在陆战队服役，也是我们小队中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我看着他从空中落下，双臂在空中挥舞，最后才并拢在体侧，接着他重重地坠入海中。另一名队员还抓着软梯，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霍尔。

我后来才知道，霍尔抓住软梯后，当直升机朝我飞来时，一部发动机发生严重故障。直升机只差一两英尺就坠毁在海面上，飞行员决定紧急返回位于北岛的海军航空站。教官朝卢卡斯大喊，让他跳下去——他在水里比在发生故障的直升机上更安全——所以卢卡斯松开软梯，坠入了海中。

当卢卡斯跳下时，因为一下子丧失了一个人的重量，扭曲的软梯又反转过来，而这时霍尔正抓着软梯的底端。现在直升机的高度已达80英尺，并很快攀升到100英尺。教官在旋翼的轰鸣声和引擎的咆哮声中握紧拳头，对霍尔做出抓紧的手势，同时大喊道："抓住！抓住！抓住！"

霍尔后来告诉我，当时他发现自己处在150英尺高的空中，脚下的世界以60节的速度高速掠过，他一抬头，发现教官正在大喊："抓住！抓住！"心里想：行了，别他妈废话了！

霍尔抓着软梯，吊在直升机上飞过了200英尺高的科罗纳多大桥，不知道那天早上通勤的人们透过汽车风挡看到霍尔时会做何感想。霍尔作了一次疯狂的旅程，但直升机最终安全地返回了北岛上的航空站，霍尔也安然无恙。

整个BUD/S训练期间，如果我们没能完成某件应该完成的事情，就必须做俯卧撑。如果你应该磨快自己的军刀，但却没有做到，你就要做俯卧撑。当霍尔离开直升机时，教官吼道："霍尔，趴下！"霍尔立刻摆好俯卧撑的准备姿势。教官对他说："霍尔，你本来应该死掉的。但你现在还活着，做俯卧撑。"

霍尔愉快地完成了20个俯卧撑，随后喊道："呼吁，为了活着！"

我们的信心与日俱增。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坚持进行BUD/S训练，而且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队。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一度以

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国外做人道主义援救时的那些事情：

谈到人道主义救援，还得从我的外公谈起，因为是他给我人生的很多指引。我的外公哈罗德·雅各布，1916年生于芝加哥，在大萧条时期长大。他的父亲塞缪尔·雅各布是波兰华沙的一名装订工人，母亲雷贝卡·纽曼·雅各布是纽约人。我们经常管外公叫“沙”，他认为这是古代波斯国王们的尊称，但我妈妈和小姨对我的叫法有不同解释。有一天他们正在聊天，当时还只有两岁的我跑向外公，边跑边喊：“沙！”我妈和小姨都觉得我在喊“嘘”，这个字发音和“沙”很像，是安静的意思。我外婆可没少对我外公喊这个字。

“沙”的一生充满了真实、艰苦的经历——他曾在大萧条时期艰难度日，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曾在贫困的街区里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我知道他会理解我对拳击的执着，也会赞赏我对从军的渴望。

1994年夏天，前南斯拉夫内战正如火如荼，种族清洗在波斯尼亚肆虐。在“沙”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结束之后，全世界都认为这一切不应再次发生，但每一天都有人们从大火熊熊的房子中逃生，都有妇女被侵犯和蹂躏，都有孩子们在邪恶与暴力中失去双亲。我志愿参加了无陪伴儿童救助计划的工作，并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筹足了所需费用，首先飞往欧洲，然后到克罗地亚的难民营中居住和工作。

我学了一学期的波斯尼亚语，但那语言对我来说太难了。不过，当我坐在从维也纳开出的火车上后，却非常骄傲地发现原来自己还能说一句完整的波斯尼亚语：Ja sam u vlaku za Zagreb——我在去往萨格勒布的火车上。我不知道如何单凭这句话度过在难民营的那几周，但如果我再次坐上开往萨格勒布的火车，我至少知道该怎么说了。

在火车上，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皱巴巴夹克衫、戴着粗框棕色眼镜的中年波斯尼亚女人听出了我的口音，在过道里拦住了我。

“你是美国人吗？”

“是的。”

她问了我要去哪里，在美国住哪里。紧接着，她说：“美国人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

“做什么？”

“为什么美国人不来制止种族清洗呢？为什么不制止强奸、谋杀呢？你知道波斯尼亚人在面对什么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你们什么也不做呢？”

我无言以对，只能解释说我就是来帮忙的。

“如果你是来帮忙的，那你怎么什么也不做呢？”她的双手颤抖着，又说了一句：“如果我们有石油，你们就会来帮我们了。”

我从她身边走过，站在火车车窗前。火车已经进入克罗地亚，我第一次看到了克罗地亚乡间的群山。一辆紧凑型红色小车在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行驶，我朝着敞开的车窗挥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也从车里伸出手来朝我挥了挥。

我和一个志愿者在一条通往庞蒂左拉难民营的砂石路旁下了车。搭我们过来的车开走后，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朝我们跑了过来。他们看上去就像美国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样。大多数孩子都穿着美国人和欧洲人捐献的衣服，面带微笑，很干净，看上去吃的不错，身体也不错，都很快乐。以前我只从新闻中看到过一次难民，他们通常被描画得肮脏、疯狂、痛苦不堪。

孩子们包围了我们。他们不停地问：“有棒棒糖吗？”或“有巧克力吗？”那些不会讲英语的孩子们就伸着手或用手指着嘴要东西吃。那些比较好奇的就会问：“你们是志愿者吗？”有两个小男孩过来抓住我的手，我以为他们想让我牵着手，但是他们把我的手腕翻了过来，原来是想看看我的手表。另一个男孩在我们走路时不停地绕着我们跑。一个看我手表的孩子抬起头看看我，再看看跑圈的那孩子，然后朝我皱皱眉头，转转眼珠，意思是说“那家伙有点不正常”。

达里奥和哈斯娜夫妇跟在孩子们后面，他们自己也是难民，在难民营中负责志愿者计划。达里奥大概有5英尺7英寸，身材粗壮，黑头发，满脸胡子，挂着愉悦的微笑，但他的嘴角弯弯的，让人觉得他好像马上就要开口嘲讽你几句。我赶忙过去和他握手。

“嘿，你们好，欢迎到天堂来！”达里奥咯咯笑着说。他对孩子们用波斯尼亚语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们说：“孩子们已经喜欢上你们了，如果你们能弄来糖果，他们会一直喜欢你们。”他大笑了起来。

哈斯娜略矮，也比较安静。她的金发略有些脏，脸上挂着谦逊和温暖的笑容。她默默地跟在达里奥后面，在我们初次见面的过程中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英文不是很好，但她的幽默感无与伦比，而且比她丈夫更加务实。她给志愿者安排住处，告诉他们工作安排，什么时候吃午饭。他们这一对儿真不错，达里奥能让每个人都斗志昂扬，而哈斯娜则可以让难民营正常运转。

庞蒂左拉难民营在克罗地亚普拉县郊外。普拉县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有不少古罗马遗迹，包括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古罗马圆形剧场之一——阿里纳剧场。这座古老建筑的石头围墙时至今日还有106英尺高，为在石头街道旁摆摊卖冰淇淋的小贩们提供了一片荫凉。难民营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公园里，海滩上怪石嶙峋，湛蓝的海水波光粼粼，营地周围还有一片高大的柏树。难民营里的人家都住在拖车里，尽管拖车很狭小，但这还是跟我之前对难民营生活的想象大不一样。说实话，当我在海边一个旅游胜地看到住在拖车里那些难民家庭时，我感到很吃惊。

在难民营里，我跟一个男孩一起创建了足球队，在幼儿园里帮忙照顾孩子，和十几岁的孩子们下象棋，和成年人们聊天。我和一家人坐在拖车里聊天，没完没了地喝着咖啡。除了我会的那仅有的一句完整的波斯尼亚语之外，我又学会了不少短语，而且可以很自信地把这几句说出来，让人误以为我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在很多时候，虽然我坐在那很长时间，却一个字都听不懂，只是看着和我说话的男人深深吸一口烟，停顿一下，然后随着烟一起喷出来一大堆话，他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有时还会踢一下桌脚表示嫌恶。我会尽量在我觉得适合的时候点头表示赞许，有些时候，一个英语讲得好的难民会把他们说话的大意翻译给我听。担任翻译的通常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总是东张西望，因为那些老人已经把这些话讲了无数遍了。

“那时，几个塞族人走进他的房间，他叫他们滚出去，但是……”

“现在，他说的更多的是他表兄的事……”

“还在说他的表兄，他大概有28岁吧……”

庞蒂左拉的美丽掩盖不住这些难民的悲惨遭遇。我听过很多极度暴力的事。虽然我知道达里奥和哈斯娜都是难民，但直到达里奥和哈斯娜告

诉我他们来自班加卢卡，我才把“难民”这个词和直接暴力联系在一起。

对塞族人来说，班加卢卡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是前南斯拉夫军队建造重要军事工业设施和储存军火的地方。战争爆发后，塞族军队控制了这座城市，在波斯尼亚人的家门口挂上白布作为标记。随后，士兵们开始洗劫这些家庭，拿走餐具、电视、家具、珠宝……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塞族士兵用枪托殴打老人，用铁棍敲碎他们的手指，用刺刀将他们肢解。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强奸妇女，甚至小女孩，任何敢于反抗的人会被枪毙或割喉。

班加卢卡内矗立了几百年的大清真寺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他的小清真寺遭到炮火轰击。那些在炮击后侥幸残留下来的，则被人在地基上放上炸药炸毁。废墟被清走后，剩下的空地就被用作停车场或垃圾场。

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赶往集中营，社区的领袖则被挑出来送往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会饱受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他们经常会“失踪”，然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波斯尼亚人被赶出世代居住的房屋，还要为前往难民营的“特权”而交纳费用。我遇到的很多家庭都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们只能带上一点随身行李走上背井离乡的路，而且载满难民的巴士还经常会直接开往屠场。

虐待和掠夺在班加卢卡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尼亚的城镇乡村，塞族军队会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赶进清真寺，在那里把他们一关就是几天，只扔给他们一点点面包和水。

我听到的很多细节经常会让人作呕，简直无法相信，坐在拖车里的人们给我讲的故事就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些故事听起来完全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一个波斯尼亚男人告诉我，他的妻子被拖出房子后遭到了强奸，两个哥哥都被杀害。他听邻居说，他的一个哥哥在被枪杀前受尽了折磨。她妹妹和父母住在另一个城市，他不敢肯定他们是否还活着。他撩起衬衣给我看他腹部和胸部留下的疤痕，那是被一枚扔进他房子里的手榴弹炸伤的。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妻子和孩子都还活着。他开始痛哭，而他的两个孩子就坐在角落里听着他讲述这一切。

那时候我 20 岁。在我看来，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少年是营地中最迷惘

的人。父母或祖父母们需要投入精力去照顾孩子，他们有目的去爱、去生活。作为孩子，那些少年非常坚强，但当他们正准备开始真正的生活的时候，战争打碎了一切。他们身陷难民营中，不可能找到工作，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教育，几乎没有机会娱乐，也几乎没有机会结婚。如果换作是我，我也可能会摔酒瓶。

很多个晚上，我都坐在那间公共房间里，听一台捐献来的收音机里面的节目。难民们坐在一起聊天，下棋。丹尼斯经常和我下棋，他是个15岁的少年，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捐献来的T恤衫，嘴上经常叼着支烟。我们下棋的时候，他总是问我很多问题：美国怎么样？我去过的地方怎么样？我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这种对话经常是单向的。每当我问他的时候，他总是笑一笑，然后摇摇头。他不愿意谈论他的生活，而且，我能问些什么呢？我不能问他我经常问美国孩子们的问题，就像：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呢？你在学校最喜欢哪一科？你想学什么？你有女朋友吗？你这周末打算去干什么？丹尼斯没有学校，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不可能去思考难民营以外的生活和未来。

丹尼斯经常用“狗屎”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生活，狗屎拖车，狗屎饭菜，狗屎衣服，狗屎电视。他不愿意谈及过去。下棋的时候他喜欢抽烟，在我盯着棋盘思考的时候，他喜欢走开去和别人聊天，当我走棋后，他会转过头来看看棋盘，然后很快地走一步，再继续去和别人聊天。

所有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语言，地理位置，波斯尼亚咖啡，国际象棋，我在学习，所以我很快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忽略了周围人的苦难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旅行是我的又一次冒险，是从舒适家中出来解闷的一种方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拍屁股走人。

夏末，我回到杜克大学，一个朋友邀请我去社区教堂讲演。她告诉我，人们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波斯尼亚种族清洗的事。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站在一间屋子里，大概有20个人坐在我面前的金属折椅上。介绍我的人说：“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波斯尼亚的事情，但你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真正去过那里的人。”

我打开幻灯机，播放我拍摄的照片，一个用白垩石在地上画房子的小姑娘出现在银幕上。

这些照片是我在两个难民营中工作时拍摄的。我按下放映键，咔嚓、咔嚓，一幅幅照片出现在银幕上，这是一张难民们在加辛西难民营下车的照片，我一边播放一边告诉他们有多少难民失去了朋友和家人。

咔嚓，咔嚓

这个女人在织毛衣，这是红十字会的一个援助项目。

咔嚓，咔嚓

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在波斯尼亚被杀。

咔嚓，咔嚓

这些孩子在上课。

咔嚓，咔嚓

这就是难民们在难民营居住的棚屋。

随着每一张照片的出现，我能够感觉到教堂里的人们第一次把他们以前听到的和现在亲眼看到的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在报纸上读到数千人被赶出家园，那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当他们看到一家人拖着大包穿过原野寻找住处时，他们明白了一切。

我放完幻灯片后，灯光都打开了，我准备回答他们的提问。

一个白头发的男人把手举过头顶，用他那浓郁的卡罗来纳方言问道："也许是个很愚蠢的问题，但我想问，他们在难民营里的食物从哪儿来？"

接下来都是类似的问题。

"他们的衣服从哪来的？他们怎么洗衣服？"

"他们中有人回家了吗？"

"那女孩其他的家人怎么了？"

教堂里的人们想知道的不仅是一条消息，他们是想了解另一个人的生活。

人们看到的照片和在电视上看到的影像，通常是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镜头：女人们在哭泣，孩子们在流血。可在我给他们看的照片中，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有的人还在微笑。教堂里的人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画房子的波斯尼亚小姑娘，他们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朋友家的女儿或者自己孙女的影子。

反映国际救援活动的典型照片拍的是遥远国度中绝望的人们，绝望的

婴儿，而我的照片截然不同，虽然周遭的环境非常特殊，但我拍的只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在做着普普通通的事。看着我的照片，很难把那场前南斯拉夫内战简单地解释为“种族暴力”或“世仇”。

教堂里有一个人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波斯尼亚人？”

在去克罗地亚之前，对于这个问题我至少能够给出一个不完整的答案。我会说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如何高涨，种族关系是如何紧张，美国和联合国的回应又是如何软弱。但在难民营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自己可能变聪明了一点，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人会虐待、拷打、杀害和他同样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坐在后排的一个老妇人问的。她问：“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我预料到的一个问题，但我仍然有些措手不及。我本可以告诉她寄些旧衣服和玩具过去，或者给难民组织捐些钱。但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人对我说的话——“美国人为什么不做点什么？”还有我在难民营里听到的那句话——“我们最需要的是阻止那些塞族人焚烧村庄、强奸妇女、杀害我们的兄弟。”

我停顿的时间比自己预想的要长，听众们都在期盼地看着我，等着听我的回答。

“我们当然可以捐钱，捐衣服，我们也可以去难民营做志愿者。但这些善行归根结底是在人们被杀害、家园被烧毁、生活被毁灭之后才去做的。没错，衣服、面包、学校，这些都很好，也很受欢迎。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姐妹、兄弟、父母受到了威胁，我们会怎么办？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应该同样主动采取行动，保护他们免受伤害。”

我夏天去波斯尼亚难民营做志愿者是我的一个教授安排的，他名叫内尔·布斯拜。这次经历之后，我有了更强烈的渴望：我要见证那些与悲惨命运抗争，并勇敢活下来的人们的生活，我要找到帮助他们的途径。内尔后来离开杜克大学去了联合国难民署，在我毕业之前，我随他一起前往卢旺达。在那里，我将亲历一场比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规模更大的苦难。

在去往基加利[1]的途中，我们的白色路虎车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

[1] 卢旺达首都。

颠簸前行。车门上印有黑色的粗体字母“UN”[1]，车的前保险杠上竖着一根我所见过的最高的天线，那是一根细金属杆，足有12英尺高，随着车身强烈晃动，它也大幅度地摆来摆去。我穿着一件灰色的猎装样式的衣服，它是我的幸运衫，我在克罗地亚时就穿着它。我时不时拍拍衣袋，一次次地确认我的护照、钱、回程车票都还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

事实上，卢旺达这个名字，在一年前的西方世界还几乎无人知晓，但现在已经成为死亡、野蛮、疯狂的同义词。发胀的尸体塞满河道，数量巨大的成堆的尸骨遍布乡野，只能用推土机胡乱把它们推进露天的大坑里，草草了事。对人类来讲，毫无尊严可言。那是1995年的5月。

我透过车窗仔细看着每一条街道，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光着脚从我们身边跑过，大一点的那个孩子拿一根棍子在追打那个小一点的。路边有一个摆着香烟、电话卡、小蛋糕和饼干的小货摊，摊主是一个木呆呆的男人，套着一件破旧的红衬衣，穿着肥大的黑裤子，腰里紧紧地系着一条黑腰带，光着脚。他站在货摊旁，毫无生气地朝我们招着手，或许希望我们能买点什么东西。在他旁边，一个右肩斜挎着一支AK-47步枪的男孩，用很不友好的眼光盯着我们这辆联合国的汽车，然后又盯着内尔。

内尔把家搬到了这里，他是这里“救助种族灭绝中遗弃、遗失儿童和孤儿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在波斯尼亚，这些儿童被称为“无陪伴儿童”，“无陪伴”这个词往往掩盖了暗含其中的可怕的暴力，就在这些暴力中，儿童们失去了他们的父母。

内尔用法语对司机说：“向左拐。”

20世纪20年代，说法语的比利时人在卢旺达建立了殖民统治。此后，很多卢旺达人除了讲金亚旺达语[1]之外，也能很流利地讲法语。很多卢旺达人指责比利时人为了能实施殖民统治而加剧了（也有人认为是制造了）卢旺达国内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的分歧。比利时人宣称图西族人是高加索白人的后裔，所以拥有特权。图西族人因此在社会中占据了很多显赫的位置，图西族人的身份证也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但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许多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之间建立了友谊，通婚现象也很普遍，所

[1] 联合国的缩写。

以如果有人出价合适的话，他就能买到一张图西族人的身份证而变成图西族人。

我们拐进一条小巷，开进了联合国营地。这里曾是一所小学，后来被改成了救援人员的办公场所，守卫这里的是来自印度的维和士兵。身着肥大军服的哨兵懒散地为我们打开了大门。

内尔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旧教室，里面有一张木桌子和一把金属椅子，还有另外一名来自加拿大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这里，各色国际救援人员都穿着野外工作的装束，兜里装着用十几种语言制成的小册子。看来几乎全世界都派了男男女女的工作人员来完成援助工作，但在这些人到来之前，胡图族人已经在100天内屠杀了80万图西族人。

20世纪90年代初，断断续续的暴力事件开始蹂躏整个卢旺达大地，各种关于流血事件的巧言令色越发变得不堪入耳。1993年，在与卢旺达南部边境接壤的布隆迪，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被该国的图西族军人暗杀，种族关系因此变得越发紧张。一些宣传员开始鼓动杀害图西族儿童，就像一个胡图族播音员所说的："要想杀死大老鼠，你就必须要杀死小老鼠。"

1994年4月6日，一枚火箭击中了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哈比亚利马纳和同行的布隆迪胡图族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以及随行人员全部坠机身亡。哈比亚利马纳的极端主义军事顾问们把这笔账记在了图西族武装头上。在数小时内，联攻派民兵手持弯刀、手榴弹和AK-47步枪，涌向了街头。100天以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后最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结束，80到100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胡图族人遭到屠杀。

当我开车穿过基加利时，我们路过了米尔·柯林斯酒店。"在屠杀期间，这座酒店是难民的天堂。"内尔告诉我说。酒店的经理保罗·卢斯赛伯吉纳从屠杀中挽救了1268人的生命，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著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保罗注定会成为我的朋友，但当时我甚至都还没听过他的名字。

和大多数在卢旺达的工作人员不一样，我不是学术研究人员，不是人类学家，不是社会工作者，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我只有在波斯尼亚难民营工作过一夏天的经验，我哪方面的专家都不是。

不过经验不足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尽管我对卢旺达人道救援工作的

一些基本情况都毫无所知，甚至不清楚来自不同国家的红十字会之间还可能存在矛盾，但这也让我不会有偏见，不会有主观臆断，可以直接问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救援人员有四驱越野车，他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村子里给村民们看病，为什么要让那些病人走上几英里来这个医疗点看病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开着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把医疗设备和医生直接给需要的人们送去呢？我们那样不是可以给更多人，特别是那些病得走不动的人提供服务吗？”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背后存在充分的理由。但有些时候，我的问题会直接暴露整个人道救援体系的缺陷和人类的弱点——腐败、堕落和懒惰。

志愿者身份是我的另一个优势。我用拍摄纪录照片获得的津贴购买机票，支付自己的花费，所以没人能支配我的时间。而且，我愿意挤在狭窄的卡车里，长途跋涉去了解那些偏远地区的援助项目实施情况。我欠缺知识，但我愿意努力用干劲来弥补。

有一天，我跳上一辆卡车，和另一名联合国救援人员一起去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边境。“我们准备去监督一次遣返，”那个叫吉尔的救援人员告诉我，“那些都是从卢旺达逃到坦桑尼亚的难民，现在他们要返回卢旺达。”

吉尔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很快，她在讲述卢旺达这段时间的经历时，更是思维敏捷，言语犀利。她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后来改信了基督教。她毕业于夏威夷大学，拥有图书馆管理学学位。她有一头棕色短发，笑容来得快，收得也快。

“这次有多少人？”我问她。

“可能有100，也可能有200，到了那儿才知道。”

当我们到达边境时，我看到了一队难民正通过两国间的无人区进入卢旺达。男人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手里提着装满水的蓝白相间的塑料桶，肩上扛着粗麻袋或塑料袋，里面装满了他们的家当。很多人穿着夹克衫，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衣服，他们穿着这件衣服逃离了自己的国家，现在又穿着它回来了。

女人们抱着孩子，或把孩子紧紧背在身上。她们戴着头巾，头上顶着变了形的大包，里面装着衣服、裤子、罐子、纪念品和其他属于她们的一切。大一点能走路的孩子都在帮忙拿东西，有些小姑娘背着自己的小弟弟或小

妹妹，小孩子就在她们背上蜷缩着熟睡，还有些孩子用力拖着装满水的罐子和装满食物的袋子。我还看到有人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拖着仅剩下一个轮子的新秀丽黑色拉杆箱，和其他难民一起走向联合国的供水车。

供水车停在边界线卢旺达一侧。孩子们跑向水车往自己罐子里装水的时候，我开始拍照。可能是被我的相机激起了兴趣，孩子们开始在镜头前摆姿势、嬉戏打闹，有的举起小拳头，有的几个人搂抱在一起，看着他们玩闹，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一个小女孩撑着一把宽边大伞微笑着，红黄相间的伞面早已经被晒褪了色。

我刚刚给那小女孩拍完照，就感觉到身后有人用手抓住了我的肩膀。一个肩挎 AK-47 步枪的人把我的身体扭了过去，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照相机。我猛地把相机夺了回来。他比我矮两英寸，从他抓我照相机的力度上看，他没什么劲。从他的眼睛里，我能看出他很害怕。他指着我的照相机，摇着头说："不行，不行。"当他又要抓到我的照相机时，我肩膀一转又把照相机拉了回来。

"不行。"他说道。

"好的，好的，"我把手轻轻放在他肩上，说道，"好的！"

"不能拍照。"

"好的。"我又重复了一遍。

"不行。"他站在供水车边未标明的国界线上，冲我摇着手指，又一次准备抢我的照相机。当我再一次转过身把照相机挡在身后时，他冲我伸出手掌，手指向回勾，无论国别，谁都明白这个手势，意思是"把那个给我"。

"好的。"我说，"我把胶卷给你，好吧。"我按下了照相机上的倒卷键，当胶卷开始回倒时，他的眼睛在我和照相机之间来来回回地扫视着——我在捉弄他吗？我的手一直搭在他的肩膀上，他站在那儿，头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浑身大汗淋漓。我把胶卷从相机里拿出来递给他。他拿着胶卷，整个身体好像马上就轻松了下来，他朝我微笑了一下，眉毛上还挂着汗珠，他说："好了。"

我走回到吉尔身旁，我们站在那看着几十个家庭蹒跚地走过边界。他们在供水车前装满了水罐，然后挤上了一辆联合国租来送他们返回卢旺达的巴士。他们挤满了车厢，四五个人挤在一张椅子上，大大小小的包裹、物

品堆满了过道，还有的放在腿上。他们将去往几个月前他们放弃的地方，看看那地方还剩下了什么。他们的房子还在吗？其他人家还住在那儿吗？如果他们的家毁了或是被别人占了，今天晚上他们睡在哪儿呢？

男人们爬上车顶，接过男孩们递上的背包和水罐，然后把它们固定起来。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背着自己的小弟弟或小妹妹站在车门口，把小孩子们从背上解下来抱在怀里。我很尊敬这些家庭，因为他们都有勇敢面对人生的坚强意志。在大学的哲学课上，我曾仔细研究勇气的定义，勇气有很多定义，但我现在看到了勇气的本质：那就是你要日复一日地做你必须要做的事，而且永不放弃。

那天我拍照时内心很纠结，我想把她们的模样都拍下来，让其他人看到我所见到的一切。没几个美国人见过这样坚强、坚定的幸存者。我知道这些女人并不是完人，如果说只因为她们遭受了苦难就把她们描绘成圣人，那肯定是愚蠢的。她们是普通的女人，可能婆婆妈妈，可能会嫉妒，可能会刻薄，但她们的可贵之处远远超过了她们的缺点。这些女人承受了我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而且她们仍然愿意接纳我，欢迎我，和我聊天。在她们经历过所有背叛，所有艰难之后，她们仍然愿意去相信一个陌生人。如果人们经历屠杀之后还能保持悲悯之心，如果人们能够从痛苦中汲取力量，依然笑对人生，那么他们身上就肯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但是，我在举起照相机的时候很犹豫。摄影是门艺术，但与其他艺术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构成要素里面有捕捉和占有的成分，正因为如此，它有时也含有侵犯的因素。在某些文化里，人们认为如果你给他们拍了照，你就夺走了他们的灵魂。如果我举起相机，那我必须征求她们的意见，问她们是否愿意让我给每一个遭受苦难的人拍照，是否同意我与其他人分享她们的故事。当我坐在那里犹豫着是否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扶着她的小儿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鼓励我给他拍张照。

她冲我微笑着，我举起照相机，透过镜头，看到一大群女人都在冲我微笑。

回到基加利，我开始思考我该做些什么。有些人已经在卢旺达工作了很多年，而我只能在这里6个星期，我该为这里做些什么呢？我想，至少我可以多拍些照片，让美国人民了解卢旺达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欢乐、失

落、离散、力量、艰辛、悲悯。

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在那间被当做庇护所的小教堂里，我一边喝着装在塑料杯里的鸡汤，吃着泡得发灰变软的饼干，一边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聊天。当有一个人谈到他的工作时，我脸上的表情出卖了我内心的惊讶。

我在卢旺达拍摄了一些难忘的场景。在一片空地上，数百名孤儿穿着捐献来的衣服，跟着一名男人的歌声蹦跳着做游戏。一处教堂里堆满了骸骨，几十名死者本以为在这里能躲过屠杀，结果却被手榴弹和弯刀夺去生命。

当我们得知卢旺达正在发生种族屠杀时，美国却对此置之不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遇袭身亡两天后，美国主要媒体报道了图西族人被屠杀的消息。1994 年 4 月 11 日，国防部副部长阅读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卢旺达）将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另一份备忘录报告卢旺达政府准备清除所有图西族人。这一切我们都知道。

联合国部队在卢旺达的指挥官罗密欧·达莱尔判断，只要有一支 5000 人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就可以挽救 80 万人的性命。但国际社会不但没有行动，还拖了他的后腿。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迫使联合国推迟就出兵卢旺达的提案投票表决。联合国通过出兵决议几个月后，首批部队才抵达卢旺达。而在此期间，每过一天就有 1 万名图西族人被杀。整整两个半月，联合国毫无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八个非洲国家主动提出，只要提供给它们装甲运兵车，它们就愿意派出自己的部队。但是美国没有把装备给这些国家，而是将之租借给了联合国。没有任何东西及时抵达卢旺达，没能挽救一条生命。

屠杀发生四年之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出访卢旺达时对卢旺达人民说：“我们没能在杀戮开始后尽快采取行动……我们没能立即将这些犯罪行为准确地定性为种族大屠杀。”但他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能挽回逝者的生命，也不能抹去给生者留下的惨痛记忆。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基加利一家饭馆门口等车，顺便和旁边的一个卢旺达人聊了起来。他在基加利学习英文。大屠杀时，他和妹妹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藏起来躲过了一劫。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了埃利·威塞尔——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他问我有没有读过威塞

尔的回忆录《夜》。

“是的，我读过，”我说道，“那本书非常好。”

“是的，那本书能给人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鲜为人知的英勇事迹。在卢旺达，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别人。这些勇气非凡的人，其力量大多来自他们的信仰和家庭。有些人给危难中的朋友和邻居提供庇护，他们可能当时感觉自己是异类，因为整个村子只有自己向异族人提供避难所，但在整个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听说了很多英勇事迹，到处都有保罗·卢斯赛伯吉纳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卢旺达饭店这样的地方。

有一次，内尔把我放在了卢旺达-刚果边境的卢旺达一侧。在刚果，我体会到了国际慈善事业的复杂。

我排队等候海关检查。在我前面有个人，穿得像个牧师，灰色的外套，白色的牧师领[1]。他走近检查桌，把一个棕色背包放在上面。年轻的海关检查员打开银色的锁扣，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背包，拿出了一捆百元大钞。我以前从没见过，以后也再没见过这么多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美元。这个牧师随身带了4万美元。

背包被掏空检查之后，牧师把钱又重新装进背包，扣好锁扣，走进了刚果境内。刚果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很多胡图族流亡者就驻扎在刚果，他们杀人，也鼓动别人杀人。有传言说，这些人在刚果境内的营地里重新组建队伍，重新武装。也有传言说法国政府可能在背后资助讲法语的胡图族人，还有传言说天主教的牧师们也参与了。我不知道这些传言是否属实，但是当我看到那个穿得像牧师的人走进刚果时，我发现自己还有许多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东西。

我的背包里只有几件衬衫、胶卷、钢笔和笔记本。通过海关检查后，我走向刚果。一条20码的土路将卢旺达的出境口和刚果的入境口分隔开来。在刚果边检站，一个男人坐在登记台后面的摇椅上，他冲我伸出手，我把护照递给他。

“你有签证吗？”

---

[1] 牧师用的颈后系扣的领子。

“抱歉，我没有。”

“你得回卢旺达办张签证。”

“回卢旺达哪里办？”

“基加利。”

我听说交50美元就能过关，我不知道这是法定收费，还是贿赂。

“我想我可以在这里提出书面申请吧。”

“嗯，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以。”

“我知道收费是50美元，希望你收下，就当是感谢你，并为我给你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没问题，先生。”

我拿他那破了头的钢笔，在入境表格上草草签上了我的名字。那个官员拿起表格，坐回椅子里。桌上还有一摞表格，上面压着块石头，他把石头拿起来，把我刚填好的表格放在最上面，又把石头放上去。就这样，我正式进入了刚果。

当我走向刚果海关检查站时，一辆军用吉普尘土飞扬地朝我开来，在我面前5英尺处猛地停住。一个身穿黑色背心、头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站在吉普车后座上，用车载机枪指着我的胸口。他左手指着海关检查站后面正在升起的一面旗，我听见了升旗时播放的刺耳的音乐。我明白了，这是在搞什么仪式，我得表现出敬意来。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旗子。那个士兵脸上淌着汗，眯着眼看着我，机枪还指着我的胸口，他的食指就搭在扳机上。升旗仪式结束后，士兵朝司机大喊了一声，吉普车掉头开走了，留下我哆哆嗦嗦地迈开脚步走进了海关检查站。

里面的士兵冲我指了指地，我把背包放了下来。他朝我走来时，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酒味。他打开我的背包，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抖了抖，然后他站在那儿，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他用右手冲我搓着手指，又勾了勾手，他想要钱。他又伸出左手，指着自己的嘴作喝酒状，他还想要酒。我装傻说：“噢，我没带酒啊。”他又表示了他想要钱和酒。我继续装傻。

另外三个身背AK-47步枪的士兵走了进来，我仔细看着他们的手，他们的枪。内尔警告过我，曾有救援人员在刚果被枪杀。我在想是不是该从他们手里抢下一支枪来，我该抢哪个？怎么抢？他们相互嘀嘀咕咕地说着

什么，其中一个又把我的包翻开，把我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另一个挡住了门口。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想抢些什么东西。我考虑是不是该夺门而逃，但我又能逃到哪里呢？回卢旺达吗？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思索着逃跑和向他们行贿的种种可能。正在这时，一辆四驱路虎汽车在门外停了下来。

从车上下来了个白人女人，一头金发高高盘起，脸上洋溢着微笑。她不用开口我就知道：噢，美国人。她一手拎了一袋饼干，一手拿了一桶苹果汁，对刚果士兵们说："嘿，伙计们，好吗？"一听这话，我知道，我安全了。她把饼干和苹果汁递给那几个士兵，"现在你们都没事了吧！"那几个士兵也朝她笑了起来。我抓起我的背包，跳上她的车，驶离了海关检查站。

凯伦，我的救星，来自德克萨斯，是个基督徒，她在刚果为"粮食救济难民"组织工作。用她的话讲，撒旦就像是一个你躲不开的坏脾气的邻居。我还是第一次听一个女人这样评论魔鬼。

"就是啊，撒旦在这里要多忙有多忙。他会和人谈话，把这个脑子弄坏，把那个心灵弄脏。就昨天，这有个从来不看圣经的女人，就突然跳起来和另一个难民打了起来。不用说，肯定是她整天坐在那儿和撒旦小声聊天来着。"

她猛地一打方向，然后又迅速把车回正。"撒旦无处不在。"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怀疑我们刚才是不是差点撞到他了。

对于卢旺达国内的种族屠杀，国际社会一直坐视不理。最后一支图西族军队——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杀回国内，用一场军事胜利终止了杀戮。我们本可以提供军事援助，甚至可以派出海军陆战队。但我们只送去了钱和食物，而且已经太迟了。

当我即将告别卢旺达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扶着孩子让我拍照的女人，我也想起了父母们疼爱孩子的方式。当孩子需要爱的时候，父母会拥抱他；当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会照料他；当孩子受伤的时候，父母会救治他；当孩子面对危险的时候，父母会保护他。如果有哪个父母会拥抱孩子、会给孩子治病，但不会在孩子面临危险时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这不是很奇怪吗？会有这样的父母吗？虽然联合国不是世界上所有人的父母，但一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着暴力。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其他人，有时候我们就必须主动战斗。我们都知道，关爱不但需要同情，更

需要力量。

一天，我站在卢旺达一个医疗站门外，一个志愿者指着一个小女孩让我看。我看到一道很深的伤疤，一直从她的右耳斜到脖子后面，这是弯刀留下的伤疤。我们看着这道伤疤，反思着人类恶的一面，不由自主地对人性产生了怀疑。但就在那时，这个小女孩看着我们，绽放出美丽的微笑，用微笑告诉我们她活下来了，她已经长大。那时我们已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相信我们能够改变这一切，相信这世界需要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爱心和力量。

我觉得自己在卢旺达做了一点事情，但我更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要学，很多要做。

想到这里，我与其他五名学员一起站在战斗训练池边。各自的游泳训练同伴把我们的双脚紧紧绑在一起，让我们蹬不开。接着我们把双手放在背后，同伴们又把我们的双手绑在了一起。

“怎么样？”我的同伴问我。

“感觉不错。”

他拽了拽绳结，最后检查了一次。绳结如果松开，就意味着未能通过训练。我们几个人站在池边，相互望了望对方，然后就这样跳入了水中。现在要进行的是防溺水训练。

首先要游 50 米。我们像海豚一样摆动身体，朝训练池的另一端游去，每游几下就侧身吸一口气。接下来要进行“漂浮”。我们微微摆动身体，浮在水下约一英尺的地方，每隔大约 20 秒就浮出水面吸一口气。“漂浮”了大约五分钟后，教官吼道：“上浮下潜！”

我深呼一口气，跟其他人一起沉到池底。感觉碰到池底后，我蜷起身体呈下蹲姿势，随后猛蹬池底，在迅速上浮的过程中，我把肺部所有残余的空气都呼了出去，头部一露出水面，我立刻开始吸气，接着又开始下潜。

冷静是关键。如果你总想着自己的脚被捆住了，或者想把反绑在背后的双手挣开，那就麻烦了。时机的把握也是关键。呼吸的时机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呛水，导致产生慌乱情绪，忘记将肺部所有的空气都呼出去。发生这种情况时，由于四肢都被绑住了，人就会悬在池中间，既浮不上水面，

也沉不到池底。

防溺水训练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在考核前一天的训练中，我们的双手绑住了，但我们的双脚没有绑，教官要我们并拢双脚、模拟被绑住的情况。练习上浮下潜科目时，我走神了，结果冲出水面时呼吸的时机没有把握好，呛了一口水，当我从池底再次上浮时，我快要窒息了，心里充满恐惧。于是我分开双脚开始踩水。“怎么了，格雷滕斯？哦，不，看来我们又有一位军官慌神了。”我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随后呼气让自己的身体再次沉到池底。

集中注意力是这一切的基础。我在海豹训练和执行任务中逐渐认识到，最让人分神的不是身体上的挑战，而是家庭问题。军旅生涯可能给家庭造成巨大压力，家庭问题又会给军人造成巨大压力。家庭关系融洽的人不仅更加快乐，训练中表现得更加出色，而且在我看来，他们也会成为更优秀的海豹队员。在海外服役与进行防溺水训练一样，需要绝对集中精力。在某条伊拉克的道路巡逻时，脑子里要想的是右面的小巷里可能在发生什么，不是闹别扭的妻子。在海外服役期间，我手下有些人离了婚，有一个人的孩子确诊患有自闭症，有些人家中遇盗，有些人父母逝世。当军人奔赴海外时，生活仍在继续向前。

我知道在担心亲人时，很难集中精力。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认识，这让我成为一名更加称职的军官。我会问手下的兄弟：“你最近给家里打电话了吗？一切都好吗？”一般他们会夸耀一下自己的孩子有多么优秀。但有时候，他们会在深夜推醒我，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的婚姻处于破裂的边缘，自己的孩子病了。这些硬汉会黯然泪下。当然，家中的生活在继续，海外的任务也同样不能停顿，这些人第二天还是要照常执行危险的任务。爱默生曾经写道：力量的秘密在于集中精力。一心不能二用。对于这些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军人来说，虽然家乡的生活仍在继续，但他们必须集中精力执行当前的任务。

防溺水训练继续进行，单纯的“上浮下潜”之后，我们又在其中加入了翻跟头的环节。我们呼出肺部的全部空气。当我碰到池底时，我先在水下做了个后空翻，再蹬池底浮出水面吸气，我再次沉入水中，这次碰到池底时我做了个水下前空翻。

我猛蹬池底，当再次跃出水面时，我看到自己的游泳训练同伴站在池边，手里拿着我的面具。等我再次沉入水中时，他把面具扔进了9英尺深的池底。我看着面具慢慢落到池底，再次跃出水面时，我吸了一口气，同时向前俯身，像海豚一样晃动着身体朝面具游去。游到池底后，我先用鼻子把面具的带子拱到适当位置，然后紧紧咬住带子，接着猛蹬池底，又一次冲出水面。我叼着面具又上浮下潜了五次。

BUD/S的学员想成为海豹队员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人是受了亲属的鼓励，有些人是因为看了电影，有些人则是因为玩过“特种作战”的电子游戏。有些人为了赢得父母和朋友的尊重，有的为了赢得姑娘的芳心，还有些人只是为了考验自己。许多人在一种女性化的文化氛围中长大，对于男子汉的概念仅限于啤酒广告和情境喜剧中得来的印象。不管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主人公被描绘成什么样子，是早熟而自私的男孩还是永远一事无成、被耍得团团转的软蛋，但参加BUD/S训练的这些人知道男子汉的含义肯定不是这样(哪怕他们没有这么说)。他们知道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而且他们清楚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有时候我们会在BUD/S训练场北面的一片公共海滩上跑步。这片海滩正对着科罗纳多酒店，一座气派的大酒店，也是一个热门度假场所。一天，当我们跑步时——我们还剩下大概60人，彼此都看得厌烦了——一位躺在海滩上的比基尼女郎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那天早上领跑的是军士长萨拉扎。军士长个子不高，但非常健壮，参加过海豹突击队的多次作战任务。他也是优秀教官的典范，严格要求，坚定自信。我们班里的每一个人都崇拜萨拉扎军士长。我怀疑他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利用他的威望来传授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仅教我们怎样战斗，更教我们怎样做人。“你们知道吗，伙计？我要告诉你们点关于女人的事情。我也要告诉你们成为真正的蛙人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真正的蛙人怎样对待女士吗？”我们接着跑步，谁也不知道军士长接下去要说什么。“如果你是个真正的蛙人，每次当女士离开你身边时，你都要让她感到更加高兴。”

在军队文化中，许多人长期受到大男子主义的灌输，对妇女不屑一顾，

而军士长却说出了这样一句朴实的话："每次当女士离开你身边时，你都要让她感到更加高兴。"许多人参加BUD/S训练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海豹队员，也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等待并不能缩短泳池的距离，所以我决定随第一组训练。我们五个人排成一排，站在泳池边上，泳池里是五名教官，踩着水等着我们。我们站在战斗训练池深水区的岸边。水深15英尺，池宽25米。我们的任务很简单：跃入池中，潜泳到泳池的另一边然后再游回来，一共潜泳50米。

站在泳池边，我的心里在反复盘算：我应该尽可能地跳远一点好让自己少游一英尺吗？这样会不会消耗太多的能量和氧气？我应该一入水就向前游吗？还是应该下潜几英尺以后再向前游？

我控制住思绪，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件事情上：起跳前深呼吸，尽可能地向下潜，游泳时保持放松。

我能感觉到其他学员的目光。他们都在看着我，因为我是第一批参加训练的学员，而且我是训练班中的一名组长。他们要看看我有没有资格领导他们。

我缓缓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跃入水中。我一入水就开始向另一端的池壁游去，同时保持一个相当大的俯角，希望能够尽快地下潜到尽可能深的地方。

根据波义耳定律，在恒温的密闭环境下，气体的压力和体积成反比关系。你潜得越深，身体内氧气的压力就越大。所以，在15英尺的深度游50米要比在五英尺的深度游更容易。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波义耳先生，但我知道要向深处游。我划着、蹬着，一直游到离池底大约三英寸的地方。

当我游到25米外的折返点时，我触到池壁，蜷起双腿，然后用力一蹬。水贴着我身体急速流过，但另一端的池壁看起来非常遥远，而且我快要窒息了。

我向前伸出双手，继续划水，我对自己说，坚持……当我完成这次划水动作收拢双臂时，我又对自己说，放松……我反复重复着：坚持……放松……坚持……放松……我没有空气了，我的身体拼命地要得到氧气。但在我之前有数以千计的人通过了这项训练，此后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通

过，我也能通过。

我必须让自己的心跳保持平稳。坚持……放松……心跳越快，需要的氧气就越多。

我到达了终点。在我最终触壁的同时，一名教官把我托上了岸。我跟另外两名学员都趴在地上，用膝盖和双手支撑着身体，大口呼吸。一名医护兵走过来，弯下腰盯着我的眼睛，我用右手做了个“OK”的手势，说：“我没事。”

“干得漂亮，长官。”

这就结束了吗？这就是我担心害怕了几个月的潜泳训练吗？我站起身走到我的小艇组员那里。“伙计们，”我又深深吸了口气，“只要潜下去，往回游的时候保持放松，我们就都能通过。”

他们看着我，点点头，但我能看出来，我的话没能让他们完全打起精神。

“噢，我的上帝，弟兄们，我们好像有个跳疯鸡舞[1]的了。”一名教官说道。

与我一组参加训练的一名学员正在泳池边上“跳疯鸡舞”。在水下缺氧的情况下，有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抽搐。身体的颤动和痉挛既痛苦又尴尬，而一旦出现这一症状，甚至在训练者上岸后颤动和痉挛有时仍会继续。

每天都有人退训，所以我的小艇组成员（每组一般是七个人）也每天都在变化。那天上午，一位非常沉默寡言的学员刚刚加入我的小艇组。他名叫詹姆斯·苏。他看着泳池边上那个“跳疯鸡舞”的家伙，看起来很紧张。所以我又特地对他说：“你也没问题，苏。你肯定能过。”

苏抬头看着我，说：“一定通过，长官。”苏不但通过，而且是那天50米潜泳训练的第一名。尽管训练班的人员组成几个月来不停变化，但在总共一年多的训练中，绝大部分时间里苏都跟我分在一个排，一个小艇组。我从没听到苏高声叫嚷，但他绝对可靠。他有数学学士学位，也是训练班上最聪明的学员之一。他后来帮助几十名同学学习水下物理，如果不是苏的帮助，我们许多人就学不会如何计算水下破坏所需的爆炸力，也就无法通

[1] 20世纪50年代源于美国，常使用节奏布鲁斯配乐，舞者会模仿鸡的动作。

过考试。苏的远程精确射击科目、水下科目、伞降科目表现得同样出色。我记得苏讲过他在上大学时曾经打过几架。他会打架，在要打架的时候也毫不退缩，但他从不主动惹是生非。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辛，最终成了好朋友。

苏后来成为一名海豹队员，阵亡在阿富汗。他乘坐的直升机在交火中被塔利班击落了。当时他正赶去救另一名海豹队员——马特·艾里克森。我们都叫他艾克斯，他那天也跟我们一起坐在泳池边[1]。

“一定通过，长官。”

是的。苏，的确如此。

地狱周就要开始了。此前的训练已经是艰难的挑战，但地狱周是全世界最难的军事训练中最难过的一周。我们班里有得过金手套奖的拳击运动员，得过州冠军的摔跤运动员，具有国际水平的水球运动员，还有大学游泳运动员，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在地狱周中，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坐在教室里，听教官介绍地狱周的情况，讲台上站的是哈蒙教官。哈蒙教官颇有几分哲学色彩，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花瓶——一件美丽的瓷器——在父母、老师的悉心照顾下闪闪发光。几天之后，地狱周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把你们每一个人拎出来扔到粉碎机操场上，我们要把你在地上摔得粉碎，看看你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有些人，我们在里面什么也找不到。只有空气，因为你们空虚、没有内涵。还有一些人，把你摔碎时发出的恶臭会让我们捂着鼻子赶紧逃之夭夭，因为你们在一种软弱的文化中长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会被打回原形。其他的人，我们会在里面找到一把纯由大马士革钢[2]铸成的利剑。你们将会成为海豹队员。”

---

[1] 艾克斯参加的即为“红翼”行动，详见《孤独的幸存者》一书。

[2] 使用印度乌兹铁矿经特殊工艺冶炼而成的一种高碳钢，用之制造出的刀剑异常锋利，且带有“夜空中的繁星”般美丽的花纹。

第五章

地狱周

地狱周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把你们每一个人拎出来扔到粉碎机操场上，我们要把你在地上摔得粉碎，看看你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有些人，我们在里面什么也找不到。只有空气，因为你们空虚、没有内涵。还有一些人，把你摔碎时发出的恶臭会让我们捂着鼻子赶紧逃之夭夭，因为你们在一种软弱的文化中长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会被打回原形。其他的人，我们会在里面找到一把纯由大马士革钢铸成的利剑。你们将会成为海豹队员。

每个人口中的地狱周都有些差别。他们记得某些特别的同学，特别的教官，自己最艰难的时刻。但总体来说，他们口中的地狱周又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超越自己而进入这个未知世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考验，每次考验都比上一次更加艰难。地狱周则是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当这一周结束时，他们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成败，他们都已经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

地狱周一般在星期天夜里开始，但是教官会改变具体的开始时间，这样我们就无法知道考验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周末，我们早早来到基地，开始焦急的等待。学员们都带了自己最喜爱的电影和音乐来消磨时间。我们还带了一套便装，以备被淘汰时之用，此外还带了枕头和食物。我们班的学员全都呆在海滩上的几顶多用途帐篷里。每一顶绿色的帐篷里都挤进了十几个人，每人有一张折叠行军床。

我们分享带来的食物：蛋白质棒、运动饮料、皮萨饼等等。一个家伙的妻子给他做了燕麦葡萄干曲奇饼干，我们剥开锡纸，把它吃得干干净净。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消耗将近 8500 卡路里。我们也知道，现在海水的温度只有华氏 50 多度，而身体需要燃烧卡路里来产生热量。我们尽可能地往肚子里填东西。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坐在行军床上开始聊天。我说我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去过好几个国家，我特别谈到了我在玻利维亚的日子。

那时，我刚从卢旺达回来，我满心欢喜地再一次沉浸到大学生活中。当我还是新生时，因为第一学期第一天的第一节课与我所抱的期望相距甚

远，整个一年我都对大学生活感到失望。但随着我逐渐成长，我渐渐开始庆幸自己所受的良好教育。

我阅读米尔顿、莎士比亚、柏拉图和洛克的著作，研究世界主要宗教的精神，学习经济、哲学、科学、伦理，阅读古典名著、历史书籍、现代文学，也学习了一门艺术和一门外语。我很幸运，利用课内和课外时间，在许多见解深刻、耐心细致和要求严格的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很多西方经典著作。这些老师不受流派影响，没有偏见，认为这些名著正如依迪丝·汉密尔顿[1]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历经几代建造的强大的精神堡垒”。进到这些堡垒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坚强。1996 年 5 月，当我和朋友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参加毕业典礼时，我知道已经得到了教育给我的最好的礼物，那就是更加清楚地明白了美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好人又意味着什么。

苏格拉底教育我们要用审慎的态度去生活。在杜克大学，我不仅能够自省生活，还能深入阅读，由此看到生活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我的发现简单得简直令人尴尬，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希腊人有一个词“eudaimonia”，它的意思是“贴近人类繁荣的某些东西”或“过美好、完整的生活”。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我觉得这简直是咄咄怪事。而“arête”这个词虽然常常被译作“美德”，但实际的意义是“杰出”。另一个词“phronesis”则被译作“实践智慧”。为这个世界发明民主和奠定科学、文学和艺术基础的民族，他们思考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我此前从未想到过的，体会到这一点真令人着迷。

阅读林肯[2]的葛底斯堡演说让我心生敬畏，并在其中听到 2500 年前伯里克利在雅典建立民主时所作演讲（林肯曾研读过这篇演讲）的声音。阅读马丁·路德·金[3]的“伯明翰监狱来信”让我从中看到了圣托马斯·阿奎纳[4]写于 13 世纪的那些经典著作的烙印。研读宪法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制宪元勋要建立三权分立的体系。了解历史，细读经典，加深

[1] 美国古典学者、教育家。

[2] 1809—1865，美国第 16 任总统（1861—1865）。

[3] 1929—1968，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

[4] 约 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

了我的认识。这些著作跨越千年，直指人类的基本问题，让我深感自己的渺小。坐拥一本好书，细细品味，我可以学到很多，能够从古罗马军团战士、15 世纪的大主教和早期的美国农民那里了解他们对生活真谛的见解。

当然，大学校园里也有很多吹牛大王，他们工作马虎、吹毛求疵，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幸运也好，碰巧也罢，我接触到的那些教授都因为自己有充实的生活而感到欣喜。不管他们会不会这么说，但他们都坚信在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需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还有幸认识一些教授，他们尊敬沉思的价值，更理解将思想付诸于行动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们认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行动不可或缺的观点。爱默生曾写道："没有行动，思想永远无法成为现实。"

在杜克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认识了一个刚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女人，她在那里一个名叫玛诺·阿米加的流浪儿之家工作。那个流浪儿之家是她的两个朋友开办的，用她的话讲，那里就像是贫穷、虐待、犯罪和艰苦的沙漠中一片充满快乐的绿洲，而她那两个朋友是她所见过的最接近圣人的人。

杜克大学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一笔摄影资助，可以用来购买一张飞往玻利维亚圣克鲁兹的机票。当我收拾自己的背囊，往里装胶卷、相机、笔记本和一些旅行衣服时，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老专家。这是我的第四次海外之行了。在克罗地亚和卢旺达，我给遗骸拍照，倾听幸存者的讲述。我看到了那些坚强的人，尽管身处难以置信的悲惨境地，他们还是爱护孩子，相互关爱。我看到了那些坚强的人，自己一边一点一点地重建生活，一边向邻居们伸出援助之手。不管我在那些地方看到了多少苦难，但离开的时候，内心还是充满希望，我知道志愿者能够挽救生命，带来欢乐。玻利维亚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考验。

在圣克鲁兹，成百上千的孩子流浪街头，他们通常被称为流浪儿童。这些孩子日复一日地在外流浪，靠擦鞋、乞讨、兜售口香糖和香烟为生。晚上，有些孩子会三五成群地回到纸板和破铁皮搭成的窝棚里睡觉，依偎在他们身边一起入睡的还有流浪狗，孩子们和狗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保

[1]　1803—1882，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护。孩子们的窝棚搭在僻静小巷的阴暗角落里，那里充斥着毒品、疾病、虐待、伤害、偷窃和痛苦。

有些孩子被遗弃后在街上孤独地死去，有些孩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来到街上，却仍然躲不掉如影随形的暴力，特别是年轻女孩，经常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在流浪儿童中，自残十分常见。我曾遇到一个女孩，年轻、漂亮、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她站在一个志愿者面前，穿着脏兮兮的汗衫和牛仔裤，当她伸出左胳膊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她胳膊上有三道结着血痂的黑色伤口。

"闻胶水"在玻利维亚的流浪儿童中也非常普遍，对有些孩子来说，把一个小白瓶凑到鼻子下面狠狠闻一下，这已经成为眨眼一般的本能反应。闻这种廉价毒品可以缓解痛苦，但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性伤害。痉挛、抽搐、失忆、失聪，所有这些症状都很常见。我见过一个女孩，大概 17 岁的样子，她把一个白色的小瓶子凑到鼻子底下，深深吸了一口气，一双眼睛看上去雾蒙蒙的。之后，她目光呆滞地把瓶子放下，放在她那因怀孕而隆起的小腹上。

玛诺·阿米加儿童之家坐落在圣克鲁兹市郊，一个光脚的孩子走上一小时，就能从市中心走进这个儿童之家的大门。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志愿者们以及所有孩子都聚集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个大房间也是他们的食堂，我在这里吃了简单的早饭和午饭，晚饭是面包和从一个黑黢黢的大锅里做出的炖肉和蒸菜。

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走进房间，黑头发，棕皮肤，戴着一副小眼镜，看上去颇有学者气度。如果是在美国，我肯定会认为他曾在大学橄榄球队里当过后卫。这个大个子男人慢慢地走到前面，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致词，嗓音如田园诗人般深邃、柔和。

"欢迎各位，我叫唐·托马斯，在这里工作有几年时间了，我感到非常骄傲和快乐。"我在高中和大学时都学过一点西班牙语，但从来没用过。我努力想听懂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听到他说："每次我介绍新来的志愿者时……"这时他转过头去，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他又转过来，我听到："我非常感激你们能来这里。"他真诚地笑着说，"你们在这里的工作不仅是对玻利维亚儿童的贡献，也是对上帝的孩子的贡献。我谨代表这里所有的孩

子，真诚感谢你们能来这里。现在，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

杰森和卡洛琳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他们管理着这个儿童之家。杰森是个典型的威斯康星人，无论处理什么事情——治伤、劝架、管教孩子，都有条不紊，步伐稳健，就像那些走向自家牲口棚的中西部人一样。他的妻子卡洛琳是个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女人，能在短短的一分钟内温柔地管教好一个孩子，用西班牙语告诉厨师午饭准备什么，用英语告诉志愿者去哪里找美术用具，再把一个哭泣的孩子从地板上抱起来。有一次她对我说：“我给妹妹打电话了，她生日那天男朋友送了她一条钻石项链。杰森送我的生日礼物是给我擦了擦背。”她说着说着笑了。杰森和卡洛琳在儿童之家工作，他们买不起奢侈品，但这里的工作给了他们最美好的幸福：简单、深刻。我记得他们说：以这种方式开始一段婚姻，多么美好啊！

接下来，孩子们开始自我介绍：罗德里戈，卡洛斯，阿多普霍，马里贝拉。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有的羞涩，有的调皮，有的积极，和我在美国见到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我坐在椅子里，身体向前倾，努力听懂他们每一个人说的话。有的孩子说话含混不清，有的孩子声音又高又尖，有的孩子几乎不能讲西班牙语。很多孩子都是来自圣克鲁兹周边的乡下，他们的母语是盖丘亚语。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到底是不是“老专家”，我来到这个儿童之家当志愿者，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说哪种语言。

一个大概6岁的孩子站起来喊道：“我叫艾迪！”接着，他挥舞着胳膊，好像他是一枚发射升空的火箭。艾迪笑着坐下，在他的椅子里扭来扭去。又有两个孩子做了自我介绍，艾迪再次跳了起来，在屋子里绕着圈子飞奔，边跑边像猴子一样搔着腋窝，呼噜呼噜地叫着。

“艾迪。”卡洛琳只叫了一声，艾迪就马上回到座位，笑嘻嘻地坐下。

轮到我了，我决定用我的西班牙名字进行自我介绍，这名字是我在高中西班牙语课上给自己取的。我觉得，比起埃里克来，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发这个西班牙名字的音。我站起来说：“大家好，我叫奇克。”孩子们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就连杰森也笑了起来。老天，我的西班牙语有这么差吗？！

有两个孩子不停喊着：“奇克泡泡糖，奇克泡泡糖。”我转过身无助地看着卡洛琳，她告诉我说“奇克”是玻利维亚一个很有名的泡泡糖品牌。我刚

才就像一个玻利维亚人在美国作自我介绍时说："大家好，我是巴祖卡·乔[1]"一样。后来，孩子们走向我，一个个两腮鼓鼓的，做出在嚼泡泡糖的样子，活像一只只花栗鼠。也就是从那之后，孩子们开始管我叫"泡泡糖"。

在玛诺·阿米加的第一天，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关于玻利维亚的信仰：足球。杰森和我走进儿童之家旁边的一块土场地，那里已经有一大群孩子，正踢着一个满是玛诺·阿米加历史印记的破球。有些孩子光着脚，有些孩子穿着捐献来的鞋，有些孩子的鞋已经小了，大脚趾从鞋前面的破洞里伸出来。

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那时的我和眼前这帮孩子差不多大，我的父母为了是否给我买一双托尼·格拉文足球鞋发生了一场争执。托尼·格拉文是"圣路易斯汽艇"室内足球队的球星。那是双特别版的足球鞋，在1982年大概要30多美元。我还记得发生在家里的那场争吵。

"他不需要这种鞋。"

"球队里其他孩子都买了这种鞋。"

"这要30多美元呢，他不需要买。"

在玻利维亚，大多数孩子都光着脚踢球，但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踢得兴高采烈。独自一人，人会感到饥饿；独自一人，人会感到寒冷；独自一人，人会感到疼痛；但只有和别人对比时，人才会感到贫穷。我脱掉了我的鞋。在儿童之家，这些孩子并不贫穷。他们的娱乐有足球，各种你追我跑的游戏，甚至土里的石块和酒瓶盖也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在他们的想象中，废弃轮胎变成了战斗机，废纸箱变成了糖果屋。

男孩们每个下午都会在一起摔跤，一个叫约瑟的志愿者经常和他们一起在草地里滚来滚去，和五六个男孩一起玩摔跤。很多孩子以前只有在被虐待时才体会过一个成年男人的力量，但是约瑟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力量。他从不伤害他们，也决不允许他们互相伤害。

我在卢旺达和克罗地亚见到的那些难民孩子，虽然他们都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是令人发指的创伤，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还算完整，有疼爱他们的父母，有关爱他们的长辈。但这里的流浪儿童则不同。难民

[1] 美国巴祖卡泡泡糖糖纸上的卡通人物。

的孩子们遭受了很多痛苦，但总有一天，他们的生活会回到正轨。而对于许多玻利维亚的流浪儿童来说，自打降生那一刻起，虐待和暴力就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把男孩子们集合起来，赶着他们去洗澡。像所有地方的孩子一样，很多男孩在家里是不怎么爱干净的。因此，杰森把这件差事变成了一种游戏，他会高喊："洗澡时间到，快跑，快跑，快跑！"我们把手高举过头顶，像张牙舞爪的怪物一样，把孩子们赶进浴室。

有天晚上，阿多普霍踢球回来，滚得一身泥，脸上和头发里还沾满了食物残渣，但他就是不愿意洗澡。杰森已经试过了怪物追小孩的游戏，他还用了激将法："阿多普霍，让我们看看你洗澡和上床有多快。"最后又试着给他讲道理："阿多普霍，如果你洗得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我会觉得很高兴。"但阿多普霍就是不去，天已经很晚了。

"阿多普霍，好孩子，你需要好好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我一边说，一边轻轻抓住了他的手腕。就在我轻轻拉他的那一瞬间，他像触电一样，双脚乱踢，倒在地上乱滚。他扯开喉咙尖叫了起来，那种令人恐怖的声音萦荡在整个房间中。他挥舞着双手乱打，脚也在乱踢。我有两个小弟弟和三个小表弟，而且在高中时一直担任儿童夏令营的辅导员，我见过很多孩子发脾气的样子。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被虐待过的孩子发自内心的恐惧。

"阿多普霍，阿多普霍，放松，放松，没事的，放松，没事的。"

慢慢地，他平静了下来。阿多普霍需要重建一种正常的生活。

有一天，我想去圣克鲁兹的贫民区走走，拍些照片。我刚从宽阔平整的主路拐进狭窄的泥土路，就闻到了一股垃圾腐臭味和尿骚味。我穿过一片拥挤的棚户区，这里大大小小、破破烂烂的棚户紧紧挤挨在一起，就像是暴风雨中挤在一起的一群动物。棚户间横七竖八地拉着晾衣绳，一条条棕色的污水在棚户间的地面上流过，水面上漂着塑料瓶和破布条。如果地上所有塑料袋都变成蔬菜的话，这里会是一片丰饶的菜园。

泥巴糊的墙和生锈的红铁皮屋顶构建起的一座座小屋，比一间车库大不了多少。一个老妇人在一间屋里冲我招手，我走了进去。这间屋里的地板很干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布帘子把屋子分隔成两个房间。在帘子的一边，地上铺了张旧毯子当做床，后面远一点的地方有个用来煮饭的小铁炉

子，炉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门框上还钉着圣母玛丽亚的像。门外是一群光脚的孩子们，在那片污浊的死水里玩着。

孩子们转过身看着我，我看见他们弱视的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微笑，胳膊、手肘、膝盖和腿上都有裂开的伤口。我知道，这些孩子只能吃他们的看护人所能捡来的东西，或者是用在街上工作一天的收入买来的东西，或者是偷来的东西。我知道，在玻利维亚，孩子们因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经常会死于疟疾、甲肝或污水中的有毒化学物质。我还知道，这些孩子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无法治疗他们的弱视、骨折和肠道寄生虫。

回到街上，我遇到了一群擦鞋的男孩，还有一个大概只有 8 岁大的小女孩，她的脖子上挂着个纸盒，正在叫卖口香糖。

“要口香糖吗？”她问我。

晚上，我和这城市里的一群美国人一起走上大街，唱着歌，给我们自己鼓着劲。然后我们走进流浪儿童居住的地方，给他们带去绷带、热茶和面包。

我们看到孩子们成群结伙地聚在一起，胳膊挽着胳膊，手里还都拿着那种胶水。一个男孩站在垃圾箱旁看报纸，一只手里拿着胶水往鼻子底下凑。孩子们喝着茶，吃着面包。我希望能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但他们都慢慢地嚼着，一边吃一边左顾右盼。他们大多数个子都很高。

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包扎伤口，当他们用酒精给孩子们擦伤口时，酒精棉球能擦掉一层厚厚的污垢。雪白干净的绷带替换掉以前肮脏破烂的绷带，在孩子们脏乎乎的肢体上显得格外明显。有的孩子接过茶水时会报以微笑，一些人也会冲着我的相机镜头微笑。但我从没接近过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看起来活像僵尸，大脑已经被毒品侵蚀，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痛苦和虐待更使他们灵魂的光芒变得摇曳欲灭。

那晚，我走在路上，发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就像我马上要打一场拳击赛一样。我到底是怎么了？开始我以为是在生这些流浪儿童的气，因为他们的生活而愤怒。但我很快意识到了气愤的真正原因。在克罗地亚，在卢旺达，我能看到希望，在这里我也想看到希望，想相信孩子们的生活境况能够改善，生命能被挽救，伤病能被医治。但在这些街上，我看不到一丝希望。很多孩子已经走得太远，毒品腐蚀了他们的大脑，十几年积累的陋习

埋葬了他们的本性，他们被锁进一个痛苦和毒瘾的怪圈。可能出现奇迹，但是那本身就需要奇迹。

不过玛诺·阿米加儿童之家的情况大不相同。有天上课前，卡洛琳对我说："上课时，我们教他们艺术，唱歌、画画、雕塑和跳舞。"艾迪跑了过来，手里拿着纸板，上面用胶水粘着彩纸做成的胳膊、腿和头，他在做一只猴子。

我喜爱艺术，也喜欢看孩子们创造艺术品。但我在想，对这些孩子来说，把精力集中在基本的读、写或是算数上，会不会更好一点呢？我问卡洛琳："你们为什么教这么多艺术课呢？"

"这能让他们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也能创造美好的东西。"

阿多普霍和艾迪这样的孩子非常聪明。有些孩子在街上混了很多年，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经常能看到一种成熟，这种成熟是同龄的美国孩子远不能比拟的。但从来没有人相信他们，爱护他们，告诉他们自身的价值，告诉他们可以创造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在儿童之家，他们必须要养成最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玩一种游戏，志愿者们管它叫"闻手手找臭臭"。在孩子们进入食堂之前，他们得排成一队，把手伸出来，手心向上。志愿者们会挨个检查他们的手，看是不是洗过了。

一个叫卡洛斯的10岁大的大眼睛男孩把手伸向我，我仔细地闻了闻，然后苦着脸皱着眉，做出一种好像闻到腐烂臭味的表情，卡洛斯和他周围的孩子们都咯咯地笑起来。

"很好，你过关了！"我突然放松表情对他说。卡洛斯蹦蹦跳跳地跑进食堂。

我又开始闻帕波罗的手，我装出一副沉思的表情，帕波罗也开始咯咯地笑。我摸着自己的下巴，开始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审问"他。

"告诉我，你用香皂洗手了吗？"

"洗了，泡泡糖，我洗过了！"

"那你洗了多久呢？"

"20秒，你告诉我们的。"

"你确定不是19秒吗？因为，如果你只洗了19秒，你就得回去重新洗

哦！”

“是的，是20秒，泡泡糖！”

“你数得多快？”

“很慢的，就——像——这——么——慢！”他说道，小心地拉长了声音。

“很好！”

帕波罗朝其他孩子做了个鬼脸，然后跑进了食堂。

“阿多普霍！”我朝他笑了笑。

阿多普霍排在两个孩子之后，当他发现自己被抓到后，指着我大笑了起来。他故意把两只手涂满泥巴藏在身后，想等我检查他时，突然把那双脏手伸到我眼前。

跟孩子们交流也能提高我的西班牙语。孩子们总是格外努力地想让我听明白他们说什么。一个孩子对我说了个词，当他发现我满脸迷茫地看着他时，他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头后面，然后绕着场地开始蹦蹦跳跳。“兔子”，我明白了。

当我逐渐能够很好地和孩子们交流时，我开始领会到儿童之家这些规定在孩子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过着一种有宗教约束的生活。在每顿饭前，他们一起用西班牙语默念祷告词。

仁慈的主啊
您在天国
我们是您的子民
……

我拍过一些照片，上面是一位穿白袍的牧师和几个孩子，孩子们也穿着白衣服站在圣坛上，他们正在准备一场弥撒。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之前的生活一次次地被虚假承诺和错误导向所冲击，而教堂和儿童之家里的仪式则为他们的生活奠定了稳定的、真正的信仰基础。

我妈妈信犹太教，我爸爸信天主教，我们这些孩子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过光明节、圣诞节、复活节、逾越节。我们之所以会去上主日学

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想让我们长大后成为有信仰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但是，我们的父母并不执着于宗教理论，他们常说，如果你们全身心地爱上帝，上帝就会帮你指明出路。

尽管我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宗教教育，但我知道宗教对这些孩子们很重要。他们需要某种坚定的信仰支撑，因为街上的生活一直在诱惑他们。

有一天，杰森建议我带些孩子去圣克鲁兹体育场看足球比赛。这应该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尖叫、绕着房间蹦跳起来。

“太棒了，泡泡糖，太棒了！”

“泡泡糖，是最好的，是最好的！”

球赛那天晚上我们离开玛诺·阿米加时，孩子们欢呼雀跃。帕波罗像一个女孩子吹口哨，罗德里戈向后仰着身子，扯开喉咙为他支持的球队加油。

“罗德里戈，安静一点。”

“好的，泡泡糖，好的，给我钱去买小公共汽车的车票吧，我去买。”他夸张地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我把钱给他，他迅速把钱装进红夹克的兜里，喊道：“谢谢，泡泡糖！”他紧跑了两步，假装要拿着钱逃走。

我们离开儿童之家走到大街上，孩子们觉得该轮到他们教我了。我现在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们给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一定要把钱包放在身前的口袋里，不然会被偷走的。”

“上车的时候你要小心。”

“是的，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你就能直接跳上车，然后抢个好位子。这样车会撞到你的。往后站，看我的，泡泡糖。”小公共汽车来了，这是一种方方正正的小型客车，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后面拖着一道烟尘。一个小伙子把半个身子探在车门外，高喊道：“去市中心。”有人在这里下车，有抱着小孩的，有背着装满杂货的大塑料袋的。我跟在孩子们身后上了车，和他们一起挤在座位上。“我们出发了，泡泡糖。”我看到司机的后视镜上挂着一串玫瑰色的珠链和一个小十字架，在他的仪表盘上贴着一张明信片，上面是慈祥的圣母玛利亚，圣母像右边是一个穿皮衣、跨坐在摩托车上的金

发女郎照片。

我们的车高速穿过市中心，路过一所所漂亮的大房子，房子周围高耸着水泥围墙，墙头上嵌满了啤酒瓶碎片，这些可以防止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翻墙，比如说和我一起乘车的这些孩子们。我们驶过卖小玉米饼的小摊，驶过面包店，驶过美发店，驶过一座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桥下的水缓缓地流着，带走了城市里的污水和垃圾，而一家人就在那污浊的河水中，挑拣着垃圾里有用的东西。

“泡泡糖，你看，”一个孩子会指着一条小巷说，“那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工人们走在街道上，妈妈们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孩子们则像一群小鸭子一样跟在妈妈后面。

孩子们早就憋足了精神，迷你小巴一停，他们就蜂拥冲向体育场。

“嗨！”我在他们后面大喊着。

他们转过身来。

“你们……”我想用西班牙语说“别着急”，但我想不出用哪个词，我只能说“别闹腾”。

“嘿，泡泡糖，快给我们买个座，快给我们买个座。”

我们已经有了门票，但是孩子们想让我给他们买个垫子，一种用购物塑料袋装满废报纸的东西。

“为什么？”

“快点，泡泡糖，我们需要那个，我们得有个东西坐。”

“我们已经有票了呀。”

“但是，那对你的屁股有好处。”他们说“屁股”的时候用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词，然后爆发出一阵哄笑。

“快点，我们进去吧。”

孩子们一路连推带搡地挤进体育场。这是个巨大的椭圆形场馆，水泥台阶被切割成一个个座位。我明白了那个卖“垫子”的家伙为什么那么有市场。我没给他们买垫子，孩子们觉得我很抠门。

“多好的座位啊，是吧，泡泡糖，现在我的屁股开始疼了。”帕波罗说。但我们根本就没坐多长时间。

比赛一开始，整个体育场就沸腾了。孩子们在狂呼乱叫，周围的男人们在跺脚、敲鼓、唱歌、高喊。即便按玻利维亚的消费水平，我们买的票也算便宜的那一档。我们身边都是满身尘土的光膀子的男人，显然之前刚刚结束了一天的体力劳动。每一次精彩的过人，每一次凶狠的铲断都让他们欢呼不止。太阳落山了，一天的辛劳已经被他们抛在了脑后。

看台上不知是谁点了一堆火，男人们撕开垫子，把报纸都填到火上，报纸越填越多，火也越烧越旺，周围的人群也慢慢向后退。球员还在踢球，裁判还在执法，球迷还在呐喊。这简直太疯狂了，但也真是太美妙了。我和孩子们一起跳着，呐喊着："快冲啊！"可我连加油助威的那支球队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们支持的球队落后了，而且看上去好像已经无力反攻了，人群骚动起来。看台上有人朝对方守门员扔了一个点燃的酒瓶，这土火箭就在球场的草地上炸了开来。我不记得是不是有啤酒卖，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偷偷带进了白酒，但当我们被裹进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向体育场外拥去的时候，我闻到了刺鼻的汗臭味和廉价的白酒味。天已经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能量，男人们开始寻衅滋事。

我们终于走出了体育场，我开始清点人数。1，2，3，4，5，6……1，2，3，4，5，6……我记得我带了7个孩子来这里，现在只剩6个了，把谁丢了？

罗德里戈。

"罗德里戈在哪儿？"我问孩子们。

"他刚刚还在这儿。"一个孩子回答我。

"好吧，我们在这里等他。"

球迷们拥出体育馆，我站在门口扫视着人群。他可能在拥挤中和我们走散了。人流渐渐稀疏了，最后一个步履蹒跚的醉汉从体育场走出来后，我意识到自己把罗德里戈弄丢了。

丢了一个孩子，我不能就这样回玛诺·阿米加，他到底怎么了？我记得罗德里戈曾告诉过我：他曾经在小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熟悉整座城市，认识很多司机。我明白了，他根本没走丢，而是溜走去做什么了，很可能在任何地方。杰森和卡洛琳告诉过我，街上的生活对孩子们有一种魔力，那些经历过充斥着性、毒品、暴力和流浪的自由生活带来的愉悦与痛苦的那

些孩子更是如此。

“罗德里戈在哪儿？”我又问了孩子们一遍。

“我们一直跟着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

他们掩饰不住脸上的笑意，我明知道他们在对我撒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他们完全明白我们的处境，我想去找罗德里戈，这就意味着要找遍每条街道。罗德里戈开了小差，这给其他孩子们制造了追求刺激和冒险的机会。

“好吧，跟着我。”我说。

我开始走，希望自己是在朝着小公共汽车的方向走，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走对了。

孩子们在我身后蹦蹦跳跳地跟着，我想，我需要报警吗？还是就在刚才那儿等？

1，2，3，4，5……5个人，我又丢了一个孩子。我扫视了一下街道，卡洛斯落在后面，正和一个女孩攀谈。

“卡洛斯，快跟上。”

“泡泡糖，我马上就来。”

“卡洛斯！”

“好吧，泡泡糖。”他慢慢悠悠地跑了过来。

当我们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寻找时，孩子们散得离我越来越远，有的在商店外徘徊，有的朝女孩们尖叫。就这样，我们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了几个小时。

“泡泡糖，我们每天晚上就这么来一次吧！”

少一个孩子，我不能回家，但我也不能让他们在外面过夜。我转过一个又一个街角，希望能看到罗德里戈。

突然，我想到了从一开始就该做的事。我把孩子们聚拢在我身边，对他们说：

“好吧，如果我们在30分钟内找到罗德里戈，明晚我带你们所有人出来吃冰淇淋。”

“这边走，泡泡糖，这边走。”孩子们跑了起来，我在后面紧追着。我们跑过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广场，路过三个警察。这三个警察看到一个白人

在街上追一群孩子，也跟着追了上来，直到我跟他们说“没事，没事，没问题”，他们才停下来。

“他在那儿。”一个孩子叫了起来，我们都停了下来。

我看见了罗德里戈的红夹克，还有他的后脑勺，他站在一个小公共汽车车站旁。

“好的，你们都给我安静。”

我悄悄地从罗德里戈身后靠近他，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转了过来。

“你去哪里了？你去干啥了？”他开始飞快地说话，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是一个撒谎的14岁玻利维亚男孩和一个撒谎的14岁美国男孩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十分清楚他在说谎。我紧紧抓着他的衣服往前走，孩子们在我们身旁围成一圈，在罗德里戈身边嘻嘻哈哈地嘲笑他，却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们搭上小公共汽车返回了玛诺·阿米加。

“谢谢，泡泡糖！”孩子们朝我喊了一声，跑进了儿童之家。

我不禁问自己，他们中到底有多少人最终还是会抵挡不住街头生活的诱惑呢？

我们旁边还有一座名为东·波斯科的儿童之家。一天，那里一个名叫朱安·卡洛斯的孩子被送进了医院。他的伤不重，只是锁骨骨折，本应该很快康复，但医疗措施不力引起并发症，并导致了感染。后来，这孩子感染了伤寒，最终不治身亡。他的棺材被送到儿童之家附近的一个小教堂里。

我和艾迪、阿多普霍一起走进教堂去看朱安·卡洛斯，棺材停放在一个三四英尺高的台子上，棺盖敞开着。我托着阿多普霍的胳膊把他举起来，让他能够看到朱安·卡洛斯。朱安·卡洛斯平静地躺在那里，深色的头发，紧闭的双眼。他穿着一件新的白衬衫和一条干净的蓝裤子，胸前挂着一个很多孩子都有的塑料十字架，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孩子们低声祷告，然后跑出教堂。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进来。

14岁的帕波罗和10岁的卡洛斯一起进来，他们肩并肩站着，看着朱安·卡洛斯，帕波罗把自己的胳膊搭在卡洛斯肩膀上，就像杰森在安抚孩子们时一样。

午饭的时候，艾迪走过来跳到我的腿上，我把他拉了起来。

“你好吗？艾迪？”

“还好。”

他有些不同寻常的顺从，他躺在我怀里，我像抱着婴儿一样抱着他。他把头枕在我的臂弯里，闭着眼，手脚都老老实实。这样一个好动的孩子突然变得安安静静，不东戳西碰，不大喊大叫，也不做鬼脸，这有些奇怪。

他用西班牙语说：“我有些像朱安·卡洛斯。”他把双手在胸前合在一起，轻轻地祈祷着。

“你觉得朱安·卡洛斯是睡着了吗？”我小心翼翼地用西班牙语问他。

“不是，他死了。”

“你觉得他是上了天堂吗？”

“没有，他就在小教堂里。”

在给朱安·卡洛斯做弥撒的时候，我靠着墙站着，手里拿着照相机。我十分希望能够记录下这一切，我希望人们能知道这里都发生了什么。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一串统计数据，证明第三世界国家到底有多穷苦，医疗保健有多么糟糕，但人们根本无动于衷。而这个孩子的一张照片，一个因为骨折而最后死去的孩子的照片却或许能够让人们猛省过来。可这是一场弥撒，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拍照，所以我一直没有举起相机。

那天，朱安·卡洛斯的父亲也在小教堂里，据我所知，他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身材瘦小，红肿的双眼一直含着眼泪。他为儿子的葬礼穿上了一件棕色的上衣、一条棕色的裤子和一双匡威运动鞋。

朱安·卡洛斯有父亲，为什么他还会死在流浪儿童之家呢？他的父亲虐待他吗？他爱他的儿子吗？是他把孩子遗弃在大街上的吗？

一个牧师匆匆忙忙走进教堂，比预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他看了一眼聚集的人群，在被雨打湿的运动装外罩上了一件长袍。他介绍了自己主持儿童葬礼的丰富经验，表达了对帮助操办这起葬礼的人们的敬意。他前后只有两次提到了朱安·卡洛斯的名字。

人们希望能从牧师那里得到些许慰藉，可他却什么都没说。程式化的颂词让人们的悲伤难以排遣。有几个人在不停地抽泣，但大多数人只是在默默悲痛。

我听说朱安·卡洛斯是在东·波斯科的浴室里滑倒受的伤，也听说这个说法是编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医院能接收这个孩子，不过我看不出编造这样一个谎言有什么必要性。另一种说法是，朱安·卡洛斯曾在东·波斯科流浪儿童之家进进出出了很多次，这次被送进儿童之家，是因为被他父亲打断了骨头。

朱安·卡洛斯住院三天，他父亲只来看过他一次，并且只待了12分钟，这个说法也是真的吗？

我们从教堂去往墓地时，持续不停的雨水已经把路变得泥泞不堪。一辆小皮卡搭载着朱安·卡洛斯的棺材，因为后厢不够长，有一截棺材不得不从敞开的后门中伸出来。大一点的男孩们坐在后厢里，他们一只手抓着车侧面的挡板，另一只手扶着棺材。每当汽车颠簸时，孩子们都要紧紧地抓住这两样东西。雨水打在铁皮后厢上和木头棺材盖上的声音，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卷起的泥水泼溅声交织在一起。

在这场穷人的葬礼上，我和一个看似和这男孩有点血亲的女人低语了几句。她对我说："好的，您拍吧，我希望您能把这个给其他人看看。"我悄悄地走到人群后面，举起了我的相机。

那个在弥撒时迟到的牧师主持了仪式，最后他说："再见了，我的孩子。"孩子的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在最后一刻，他仰起头流下了泪水，好像他直道现在才意识到朱安·卡洛斯真的死了。他抚摸着棺材，手指在上面慢慢地滑动，当手指从棺材上滑落的那一瞬，他再次放声痛哭。

大孩子们弯下腰，把棺材扛到肩膀上，移进墓穴。一个身材矮小、毫不起眼的泥瓦匠走了过来，麻利地用砖头和泥灰封死了墓穴，干净利落地把朱安·卡洛斯和其他流浪儿童彻底隔开。

当大多数人离开以后，一个年轻女人用食指在仍然潮湿的泥灰上写下一段墓志铭：

朱安·卡洛斯
你是天国中的
一个
小天使

在返回儿童之家的车里，一个刚刚到这里当志愿者的女大学生坐在我身旁，紧紧抓着我的手，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这场葬礼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回到玛诺·阿米加之后，艾迪跑来找我玩游戏，他对我说："朱安·卡洛斯现在已经不在小教堂里了。"

我见过各种武装冲突造成的暴力、悲剧和伤痛，但我认为，在虐待和遗弃中长大的孩子比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或肢体的孩子活得更加艰难。在玻利维亚，大多数流浪儿童从未体验过家庭的温暖，更不可能去上大学。我猜其中也没有几个人曾享受过一天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如果我们要改变，就必须首先理解。如果我们要关爱，就必须首先接纳。杰森和卡洛琳的善行始于接纳和关爱，然后凭借他们的勇气、智慧和同情心，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改变那些孩子们的生活。他们的关爱以耐心为基础，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懂得：他们并未无所不能，但是他们必须尽力而为。

后来，我在军队中读过一些军官写的简报，出于善意，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方案"，准备在战后当地统治崩溃后"迅速重建公民社会"。我尊重他们的美好意愿。但如果说我在玻利维亚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公民社会、人的品质和孩子们对未来的信仰这样的东西决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造就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些东西可以靠战斗夺取，有些东西则必须接受，有些转变可以推动加速实现，有些转变则必须建立在长期内部改革的基础上。只有这样，人道主义者，战士，学者，外交官才能各尽所能。我才 22 岁，我仍然坚信能够通过努力改变世界，但在玻利维亚的经历也告诉我，耐心和接纳同样不可或缺。

随着训练班的规模越来越小，我们小艇组的人员构成也一直在变化。雷恩在适应性训练阶段曾是我的小艇组成员，就在地狱周开始前，他又加入了我的小组。雷恩是 BUD/S 训练的老人了。他曾经参加过 234 期训练班，因为受伤退训。在他恢复期间，235 期和 236 期都已结训，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参加了 237 期训练班。雷恩已经快 30 岁了，这对于 BUD/S 学员来

说太老了；而且他结婚了，这在 BUD/S 学员中是个异数；他还是个非洲裔美国人，这在学员中也是少数。雷恩大概有 5 英尺 10 英寸高。如果跟大多数人比，他无疑十分优秀，但按照 BUD/S 的标准就不怎么样了。无论是跑步、游泳、障碍还是做俯卧撑，他都比别人慢。

富兰克林、格利戈·霍尔和“老头”约翰逊（他大概 31 岁了）都在我们的小艇组，他们都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小艇组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利普斯基；一个叫马丁，是个运动员。我们这个小组有运动健将，这让我们冲劲十足；也有陆战队员，这让我们纪律严明；我们还有雷恩，这让我们狡计百出，因为他有无穷无尽的花招。

雷恩的妻子给他带了一大包核桃仁巧克力饼。我们坐在行军床上，一边吃雷恩的饼干，一边等着地狱周开始。这时雷恩讲了一个自己当佛罗里达公路巡警时的故事。

“我听到电台的呼叫，一头牛站在双车道公路的中央，把两个方向的交通都堵住了。我问调度员不是在开玩笑吧，她回答不是。我开车朝那个方向走，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塞车了，车辆简直是在蠕动。我只好走紧急停车带，一路超过那些佛罗里达州的公民们，就是他们叫我来处理掉那头蠢牛。要知道，这些人被堵在路上哪儿也去不了，气坏了，火冒三丈。等我赶到那头牛那儿，另一名巡警已经到了。

“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也是一名从城里赶来的黑人巡警，而且我肯定他一辈子都没跟牛打过交道。他就站在那儿，面前就是那头牛，站在路中间一动不动。汽车只能从牛身边慢慢地开过去，两个方向上的车辆都堵得水泄不通。

“所有的司机，不管以前摸没摸过牛，一下子都变成了驯牛的专家，朝那个倒霉的家伙大喊大叫，告诉他用警车把牛往前顶，用警棍赶它，拉着耳朵把它拽走……都是些疯狂的主意。

“我走到那个家伙旁边，看得出来，他已经气疯了。这家伙在毒日头下大汗淋漓，累得要死，周围车辆堵得水泄不通，而且所有的司机都在冲他摁喇叭、大喊大叫，所以这个王八蛋也疯了，正冲那头牛大喊呢。他告诉我去拿点东西，所以我回到车旁，打开后备箱，这时我一抬头，正看见那个疯子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对准那头牛开了枪，把它打死在路的中央。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位白人老太太下了车，开始打电话。我不知道她在打给谁，也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我知道这下有麻烦了，而且我绝对不想卷进去。所以我立刻上车开走了。”

帐篷里爆发出一阵哄笑，这是雷恩的典型风格：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他总是知道应该躲开哪些地方。

“第二天，我被叫到巡警队长办公室。在办公室外面，我跟那个打死牛的巡警坐在一起，活像两个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孩子。那家伙转过头对我说，‘你好，兄弟’，我想，‘我现在怎么成你兄弟了’。他接着说，‘你得拉我一把’。 我想，拉你一把？怎么拉？大白天的，你当着一堆证人的面在大路上把牛打死了。我说，‘你要我怎么做？’这个混蛋盯着我的眼睛回答说，‘告诉队长，’——雷恩这时停顿了一下——‘那头牛攻击了我。’”

我们哄堂大笑。有人冲雷恩喊道：“你怎么办的？”

雷恩回答说：“等他们把我叫进办公室，我都没等队长开口问我，我直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说‘那混蛋打死那头牛根本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然后转身就走。”

笑声差点把帐篷顶掀掉，我们彻底消除了紧张情绪。那天晚上帐篷里有很多人，虽然最终通过BUD/S训练的寥寥无几，但这种幽默感的确是促使我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之前的想象。

人们各自带着心事渐渐睡去。我在心里默默检查了一下计划。我是小艇组组长，要直接对另外六名组员负责。我告诉他们睡觉时要穿着全部装束，靴子也不能脱。因为我们醒来时将是一片大乱——教官端着自动武器四处扫射，火炮模拟器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尖利的警报声，加上扩音器传来的吼声。我们的计划很简单：趴在地上，从东边爬出帐篷，做好隐蔽，由我清点人数。我们准备让霍尔抓住我的衣服，后面的人抓住霍尔的衣服，连成一列爬出去。因为我们到时很可能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如果教官用烟雾弹的话，我们可能也看不见自己的组员。教官和其他人会在四周奔跑、推搡，我们要连成一列后再朝外爬。我心想：还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我还应该做什么？

我刚刚睡着，就被Mk-43班用自动武器的射击声惊醒了。Mk-43射速550发/分，是海豹巡逻小队的首选“重”武器。虽然空包弹声音没有实弹

大，但当这种武器在封闭的帐篷里，在离你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咆哮时，那声音真是震耳欲聋。我立刻滚到了地上，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已经快爬出帐篷了。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漫长的等待结束了，考验开始了。

跟帐篷里的其他人一样，我成长在现代美国，很少经历考验。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读过斯巴达战士、罗马战士和圆桌骑士的故事，研究过印第安土著和古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在以往的文化中，男孩子成长为男子汉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考验。而在现代美国，这种考验几乎不存在。厄尔在德汗姆拳击场考验参加训练的孩子们，如果这些孩子们不经历厄尔的考验，就会参加黑帮，自己在那里接受考验。我们参加 BUD/S 训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至少有一个原因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接受考验。我们想通过严酷的考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考验开始了。

我们的计划执行得十分完美，七个人躲过在出口和入口等着学员的教官们，从侧面爬出了帐篷。在黑沉沉的夜幕下和周围的混乱中，似乎没人发现我们。我们用了宝贵的几秒钟，确认所有人都出来了。我站起身，霍尔拽着我的衣服，我们开始狂奔。教官们大喊："趴下！趴下！趴下！"但我毫不理会。空袭警报、模拟器发出的炮弹爆炸声和一刻也不停歇的枪声响成一片，而我们正要利用夜色下的这种混乱。

我们在海滩上奔跑，另一个小艇组正在做俯卧撑，一群教官端着消防水龙对着他们猛浇。教官对我们喊道："趴下！趴下！"但我们毫不停留。我们知道教官早晚会逮住我们，但我们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学员们被赶到著名的"粉碎机"操场，一面进行极其艰苦的体能训练，一面被消防水龙浇，时不时还会被来回巡视的教官打上几下。教官就是要在一片混乱中开始地狱周的训练。把各个小艇组打散，让学员晕头转向。我们七个人先向粉碎机操场跑去，接着向左转，躲在一个垃圾箱后面。

教官们在高声喊叫，枪炮声在轰鸣，其他的小艇组乱作一团。

"长官，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卷入到周围的疯狂之中，这种平静让有些人感到不安。

"放心。我们在这儿呆一会儿。"我回答道。

疯狂的人流从我们身旁涌过，汇入粉碎机操场。光听声音就知道其他学员已经被浇得浑身湿透，教官正在狂吼，命令他们作俯卧撑、浅打水、深

蹲、仰卧起坐。

雷恩说道："兄弟啊，这真是太妙了。"我们仍在静静等待。

"注意隐蔽。"我从垃圾箱的侧面瞄了一眼：没有情况。我们起身跑回海滩。

我们七个人一起站在海滩上，屏住呼吸观察了一下周围，没有教官。我们大笑起来，感到既高兴又紧张。这一切是真的吗？

雷恩从其他人的地狱周经历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随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每一个行动步骤。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许多人想充硬汉。他们十分兴奋，自己往虎口里送，被水浇，被教官揍，好让大家知道他们是好汉，结果地狱周才刚刚开始，自己就已经疲惫不堪。"

我们则研究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地狱周前，我对小组成员谈了自己的想法："绝大部分痛苦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坚强，微笑面对，乐观地挺过去，记住每过一刻，我们就离海豹队员近了一步。我们要团结一些，记住我们是一个集体。但我们也要开动脑筋，对于那些能躲过去的痛苦，我们要想办法躲过去。"

我们站在海滩上，听着尖利的警报声和哨声，看着烟幕弹散出的浓烟笼罩着地面。粉碎机操场周围早就挂起了高音喇叭，里面传出的空袭警报声震耳欲聋。为了让混乱场面更加逼真，除了火炮模拟器和闪光弹的爆炸声外，教官们还不时引爆装在50加仑空油桶里的炸药。

我们站在海滩上笑了整整10分钟，笑得肚子都疼了。几颗星星在云间闪烁，海浪拍打着沙滩。我们仍然保持着警惕，严密监视教官接近海滩要走的所有通路。但一个人也没有。我感觉好运气很快就要用光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清点人数。我可不希望让自己的小组在海滩上被抓住，然后被教官们单独操练。我对其他人说："先生们，我们也去参加聚会吧。抓紧你前面的人。我们就要有大乐子了。"

我们在一片混乱中跑进粉碎机操场，警报在凄厉地叫着，教官在狂吼，周围的学员在拼命地做俯卧撑和浅打水，他们浑身湿透，筋疲力尽。我们穿过这片混乱，一边跑一边拍旁边同学的头，这是我们在海滩上商定的一次佯攻。教官对我们喊道："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趴下！"我一边跑一边

喊道："呼吁，琼斯教官！"同时继续拍别人的脑袋。

"格雷滕斯，你们在干什么？"

"呼吁！"我边喊边跑。

"格雷滕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正在清点全班人数，琼斯教官。"

教官们在制造混乱，不知道我是否从其他教官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命令，只能推测我的确得到了命令，我当然愿意让他们这样推测。我们继续绕着粉碎机操场跑，拍其他人的脑袋。有几个家伙看穿了我们的把戏，也跳起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我们就有了一列长长的队伍，穿梭在水柱、烟雾与混乱之间，四处拍别人的脑袋。

这真是完美的开局。并不是说我们戏弄了教官，他们清楚所有的把戏，只是对我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因为善于利用混乱也是对海豹队员的一项要求。我们感觉自己赢了一局。99%的痛苦都无法避免，我们必须承受，但我们现在已经躲开了那么一丁点，信心满满地开始这一周的训练。

小型充气艇（IBS）是一种黑色的橡皮艇，长 13 英尺，重约 100 磅。每个小艇组都被分到一只艇，在地狱周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看着它，吃饭时也必须留下一个人看守。教官如果发现小艇无人看守，就会来把桨偷走，或者把小艇的气放掉。无人看守小艇会引来严厉的惩罚。小艇组是按照身高划分的，所以当我们一起把小艇顶在头上跑步时，每个人都能分担一部分重量。许多 BUD/S 学员因为颈椎受伤而退训。现在学员们离开粉碎机操场，搬起小艇，把它顶在头上，在柔软的沙地上向前跑去。

这时，我听到两边小艇组的成员们正在高声地彼此埋怨。"我叫你不要——""你听着！""他妈的闭嘴，往前跑。"这些家伙此前在粉碎机操场上饱受折磨，被淋得浑身湿透，扛着小艇现在感到艰难，而且已经开始相互埋怨。

"冷静，"我们一边向前跑，我一边说道，"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但这一周不会都像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事事得偿所愿。听说，别的小艇组现在已经开始闹矛盾了。我们要乐观，要团结，要苦中作乐。我们都能通过。"

在黑夜中，我们在柔软的沙地上奔跑，前面是世界上最严酷的军事训练中最痛苦的一周。霍尔说："不错，真的不错，长官，我们听你的。"已经有

几个人退训了。我们的小组则信心满满，而且每向前踏出一步，我们都变得更加坚定。

我来BUD/S报到的那一天，我走上粉碎机操场，数以千计的BUD/S学员在这里做了数以百万计的俯卧撑、仰卧起坐、开合跳、浅打水。水泥地面上画着脚蹼，表明各人进行体能训练的位置。操场上挎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只有昨天才是轻松的一天”。

我去见适应性训练阶段的主管军官格林准尉。他体格壮硕，留着浓密的八字胡，在海豹突击队中服役近20年。我们坐在他办公室外的一条长凳上，俯视着粉碎机操场。

“BUD/S训练难度很高，但对于军官学员，我们还要加大难度，你也不例外。你的BUD/S训练成绩必须名列前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你当小艇组组长，成绩差的人当不了组长。无论跑步还是游泳，你都得在前面。我们要你做好榜样，立好标准。”

BUD/S训练的一大亮点在于：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要一起训练，军官要与士兵承受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痛苦。BUD/S训练中，所有人都要戴头盔，而军官的头盔上由前至后漆着一条醒目的粗大白条，无论你去哪儿，在人群中都会被一眼发现。就像我小时候读的古罗马军团故事一样，军官顶着马鬃制成的红色盔冠，即便在混乱的战斗中，士兵也能一眼看到他们，追随他们。

在预备军官学校学习时，我的教官常常说：“要么在前面领导，要么就滚开。”这句话在这里同样适用。我后来意识到，军队之所以很多时候能够培养出最杰出的领袖，一个原因就在于军事训练特别强调一项最重要的领导素质：树立榜样。榜样可以是体能方面的，例如“跑步时你最好跑在前面”。但更重要的榜样往往是由能够体现价值观的一系列行动树立的。例如，海豹的军官要让下属先吃饭，自己最后才吃。我在海军特种作战中心受训时，当时的中心指挥官史密斯海军上校发给所有下级军官一份1950年版的《美国武装力量军官手册》，其中的第一段开篇明义地要求军官要用人格的力量领导下属，并将此作为军官职责的核心：“军官是美利坚合众国特地挑选出的精英，是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完整的核心力量，是国民优秀品质的光荣代表，必须终生以身作则。”

我们头顶着小艇在松软的海滩上向前奔跑。此时我发现格林准尉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军官学员的确特别引人注意，我们必须冲在前面，树立榜样，这一点他说的没错。但 BUD/S 训练对于军官学员来说更难，事实并非如此。

在你领导别人时，训练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更加容易。这一点格林准尉当时并没有告诉我，我是后来自己体会到的。因为只有当心里还有空间的时候，恐惧才有可能攫住你的心，而作为领导者，你会一心关注你的下属，心里剩不下任何空间。

现在我能够发现下属身体、言语、情绪甚至精神上的任何变化。谁快要发火了？谁在担心自己的孩子？谁走路一瘸一拐的？谁在自怜自艾？谁需要帮助？谁需要教训？

当我们在海滩上奔跑时，另一个家伙气喘吁吁地嘟囔了一句："刚才干得真漂亮，长官。"这是我得到的最高赞誉。

在加入海军前我就知道 BUD/S 将是一次严酷的考验，但那天夜里当我在海滩上奔跑时，我才明白了考验的真正意义所在。考验的关键并不在于我的个人表现。

考验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全新的人，让他领导世界上最优秀的精英为美国执行最艰巨的任务。那天夜里跟我一起扛着小艇奔跑的人里既有孩子的父亲，也有退役的警官和陆战队员，还有刚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他们有的来自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有的来自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的来自贫寒的单亲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决心报效国家，为了他人的幸福甘愿放弃个人的享乐和舒适生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接受过考验、承受过苦难、愿意为他人牺牲的人才配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我越了解他们，BUD/S 中的领导工作就变得越轻松，因为现在我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的痛苦和苦恼。考验的关键不在于我的个人表现，而在于他们的整体表现。在地狱周的开始，与我的弟兄扛着小艇在海滩上奔跑的那一夜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向南跑了几百码后，教官开始用"冲浪"折磨我们了。我们冲入大海，在齐胸深的水里手挽着手站成一排。冰冷的海浪拍打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开始发抖了。我不能确定当时的具体时间。虽然我能清晰地回忆起地狱

周的许多时刻，但其先后次序则是一团乱麻。我们在沙滩上挖坑生起篝火，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赶下海，但当时到底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的晚上？“山丘之王”的训练是在星期二还是星期四？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教官把我们赶下海，我们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而且整个星期都是如此。

当我们在冰冷的海水中发抖的时候，教官们开始拿着喇叭喊话了：“先生们，退出吧，这样能少遭点罪。这可是漫长的一周，你们才刚刚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冷，越来越难。”

“上岸！”我们趟过海水冲上海滩，这时哨声响了：匍匐训练。尖利的哨音一响，我们就要扑倒在沙地上。哨音两响，我们就要开始朝哨音的方向匍匐前进。我们拖着冻得发抖的身体在沙滩上匍匐前进，刚刚暖和一点，教官就又吼道：“下海！冲浪！”

粉碎机操场上的训练刚刚结束，就已经有人退训了。在海滩上扛着小艇奔跑的课目结束后也有人退训，等教官把我们赶下海之后，又有人退出了。我觉得，当时退训的人是被自己心中的恐惧压倒了。我们被机枪扫射的声音惊醒。我们浑身湿透。我们做了无数的俯卧撑和浅打水。教官对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在海滩上扛着小艇奔跑。但当时班上的每一个人此前都接受过至少是同样强度的训练，所以让他们退训的决不是身体上的痛苦。他们退训是因为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课目上，对地狱周这个怪物的恐惧压倒了他们，像巨浪一样将他们的梦想拍得粉碎。

在匍匐训练中，我跟雷恩一起爬。一个我最喜欢的教官，韦德教官开始大吼：“好啊，格雷滕斯先生，你不想自己一个人往前爬。你想在这儿等雷恩先生吗？那好，你们两个人，冲浪去！”我和雷恩起身冲到冰冷的水中，然后跑回来扑倒在沙地上。韦德教官是游泳高手。他教的是战斗侧泳课，当他穿上脚蹼在水下打水时，简直像是一头海狮在自由自在地游动。韦德曾在南美多次执行任务，他还教我们巡逻基础课。韦德聪明得近乎变态。等我和雷恩再次扑倒在沙地上时，他喊道：“我猜你们两个还没搞懂。地狱周是个人训练。你们两个却老想合作。”当然，韦德的意思是说地狱周是集体训练——只有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通过。与其说他是在对我和雷恩叫喊，倒不如说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们最好彼此合作。

我们浑身湿漉漉地在沙滩上匍匐，身上沾满了沙子，肘部和膝盖的皮

肤都磨破了。我们两个回到沙滩时，一个教官刚刚吹了一声哨子，马上要吹第二声，我们又要向30码外的地方爬去。教官大声说道："只要再熬五天！你们已经累了吗？你们还没开始呢！"

我们再一次冲进大海，返回沙滩后列队站好。教官问我："你们班上有多少人？"此前情况一片混乱，不断有人退训，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格雷滕斯，你连自己有多少人都不知道，还他妈的怎么带队伍？"他们又问其他的军官："费茨霍夫？弗里曼？"

"可怜虫！"

我们开始清点人数。清点人数后，我们发现已经少了六个人。地狱周才刚刚开始呢。

教官命令我们站在海边，海浪拍打着我们湿漉漉的军靴。教官让我们向后转，面对海滩，背对大海，双臂交叉后倒。涌起的海浪淹没了我们。"腿举过头！"教官吼道。腿举过头让我们呼吸不畅，每次海浪涌上来，我们就得屏住呼吸。

有人浑身颤抖地站起来，走到教官那里，他们的意志崩溃了。教官经常会问一句："你确定吗？"他们总会回答"是"。一旦他们考虑退出，热水澡、干衣服、回到女朋友或妻子身边、轻松的工作、回到学校学习这些诱惑就会让他们不愿继续承受未来的寒冷、潮湿和痛苦。我们听到钟声响起——叮、叮、叮。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我们向小艇跑去。为了在海上夜航，小艇发动机上安装了红色和绿色的荧光灯。我们的头盔上也装了荧光灯。如果我们在黑夜的海中失去知觉，荧光灯会标示出我们在海里的位置。我们站在小艇旁，教官吼道："举艇！"我们七个人抓起小艇，伸直双臂把它举过头顶。一般教官会让我们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双臂开始打颤。"放下！"我们一起侧跨一步，把小艇放在沙滩上。"举艇！""放下！""举艇！""放下！""举艇！""放下！"整个地狱周里，我们组一起把小艇举了成百上千次。

我们开始一系列操艇比赛：先划过浅水区，然后"弃艇"——将小艇翻个底朝天，把每个人都弄得浑身湿透，最后把小艇再翻过来，划过潮际线，返回海滩。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穿过波浪，划向大海，跃入水中，再返回海滩。教官

的奖惩举措让每个人都拼命地划。获得第一名的小艇组下一轮可以休息，最后一名的小艇组则要被反复折磨：将小艇顶在头上做集体仰卧起坐，或者是把脚搭在小艇发动机上做俯卧撑。

有时候我们会把小艇换成150磅重的原木，在海滩上进行“原木体能训练”。我们七个人要扛着原木在沙滩上奔跑，然后要端着原木翻越15英尺高的沙堤。我们还要反复托举原木：伸直手臂，将原木举过头顶，放回肩上，再放到地上，然后再次把原木举到肩上，再举过头顶。我们还得带着原木下海，好“给它洗洗澡”，然后再带着湿漉漉、滑溜溜的原木返回沙滩，继续奔跑。

“原木体能训练”给身体造成的痛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在健身房里，你可以在卧推器上做10次练习，然后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休息一下，放松肌肉，但原木训练完全不同。我从未体验过它造成的那种肌肉疼痛，肌肉不是酸痛，而是在灼烧。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体能训练”，而是在用肉体上的折磨考验意志。

“原木体能训练”后，我们又来到障碍场，筋疲力尽地扛着小艇翻越障碍。我们七个人同心协力，将橡皮艇拖上高高的木墙，顶着它跨过独木桥，越过各种障碍。

然后我们顶着小艇再次回到海里。我顶着船尾，其余六个人顶着两舷，每侧三个人。当我们跑入水中，海水没到前面的人腰部时，我就会喊，“第一组上艇”。这时最前面的两个人就会跳进小艇开始迎着海浪划桨。我接着喊“第二组上艇”，中间的两个人跳进小艇；再喊“第三组上艇”，最后两个人跳进小艇。最后我跳进小艇，抓起我的桨，在船尾掌握方向，指挥小组奋力将小艇划过潮际线。

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算好波浪拍击的时间，小艇很容易被掀翻，七个200磅重的大汉和他们的桨就会被卷到潮水中。我们都戴着头盔，但受伤是家常便饭——一般只是普通的擦伤、淤伤和青肿，但踝关节和膝关节严重扭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偶尔还会有人骨折。

我们向北划艇，准备完成地狱周最危险的训练科目——携艇攀岩。在科罗纳多的海滩上，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山，怒涛拍击着嶙峋的怪石，发出巨大的声响。这个科目要求我们像在作战中一样“潜入”敌区。我们必须

将小艇划到巨石间，然后扛着小艇攀上岩石登岸。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的指挥官认为美军可能发动大规模两栖作战行动。但美军并没有派出成千上万的大部队登陆，仅仅派出了一支海豹突击队。突击队进行的爆破活动诱使萨达姆调动了两个齐装满员的作战师，这分散了萨达姆军队的力量。就在他调动部队时，联军从沙特阿拉伯攻入科威特。这支海豹突击队只有六个人，但它成功地削弱了萨达姆在美军主攻方向上的防御。

我们在地狱周前也曾练习过携艇攀岩科目，这个科目的关键就在于抓住海浪拍击的间隙。当我们靠近岩石时，前桨手要跳下艇，拽着一根系在艇首的绳子攀上岩石，并在岩石间找好立脚点，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往前划。海浪拍击岩石的力量极大，如果此时恰好有人处于岩石和小艇之间的话，这个人就有麻烦了。我在BUD/S训练中遇到的第一个同学达斯汀·科诺斯就在携艇攀岩训练中摔断了腿。

在向北划艇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而此时连地狱周的第一夜都还没有过去。不过，在大海中划艇倒是可以离教官远一点，没有了他们的咆哮，夜晚突然变得安静祥和。在整整2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划艇，别的什么也不做。但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担忧，因为携艇攀岩有受重伤的可能。我们可以选择退出或者坚持下去，这属于可控因素，但突然掀起的巨浪、被掀翻的小艇，这些都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谁的肌肉也比不上岩石坚硬，谁的双手也不如巨浪有力。我们怕的不是受伤，每个人以前都骨折过，我们怕的是可能会因为受伤而被踢出这期BUD/S训练班。那样的话我们就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然后一切从头再来。

我们在起伏的波涛中将小艇划到距礁岩大约100米的碎浪区。当我们慢慢靠岸时，浪看起来并不大。但这可能是一种假象，靠近海滩的地方可能转成巨浪。我们看着领先的两艘小艇朝着岩石划去，艇员跳下水，抬起小艇爬上岩石，头盔上的荧光灯在黑暗中闪烁。

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划近岸边，波浪相互激荡，然后拍击在岩石上。潮水退了，如果我们把握好时机的话，我们就能让小艇冲上沙滩，然后把它抬上岩石，而不会直接撞到岩石上。我们抬起小艇朝着岩石飞奔，等我们翻过巨岩后，教官对我们一通吼叫，指出了我们十几处动作不规范，然后命令我们趴下做俯卧撑。但等我们再次抬起小艇朝海边跑去时，我说道："伙计

们，干得好。”利普斯基则嘟哝了一句：“感谢上帝。”我们顶着小艇继续往前跑，虽然经历了几个小时的煎熬，但我们感觉自己现在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教官们整夜都在“折磨”我们。下海，上岸，赤膊躺在华氏50几度的冷水中。BUD/S训练让我们知道了很多滑稽的事情：瘦子体温低，胖子体温高，所以在冷水里的时候最好呆在一个胖子身边。当然，这里的“胖”是相对而言，学员里面没有真正的胖子。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富兰克林对利普斯基说：“你这胖子赶快过去，给海水加加温。”

天色终于渐渐发白了。这是曙光吗？我们终于熬过了第一夜。我们顶着小艇，沿着塔瓦拉路朝基地另一侧的食堂跑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塔瓦拉战役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受命从2600名日本的精锐两栖部队手中夺取这个小岛。尽管有航空摄影、望远镜观察、潜艇侦察和询问商船水手等各种手段搜集的情报，美军仍然误判了形势。满载陆战队员的两栖登陆艇在小岛周围700码开外的珊瑚礁上抢滩。登陆艇打开舱门，士兵们背着背包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猛烈的机枪火力向海滩冲去，数以百计的陆战队员和海军士兵在弹雨中倒下，许多人还没有冲上海滩就被打倒在水中。在76小时的战斗中，为了夺取这个四英里长、四分之一英里宽的小岛，超过990名陆战队员和680名海军士兵阵亡。直到今天，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把这个岛称作“可怕的塔瓦拉”。塔瓦拉战役之后，美国海军下定决心，决不能再因为情报失误导致这样的屠杀。必须提前派人潜入战区，侦察地理水文情况。这些人要侦察登陆区，爆破障碍物。水下破坏小组就是在塔瓦拉被鲜血染红的海水中诞生的。

在食堂里，我们得到了几分钟相对平静的时间，尽可能地多吃东西。许多海豹队员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坚持撑到下一顿饭。”

食堂里划出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供参加地狱周训练的学员取餐。我们拼命地往餐盘上堆食物。煎蛋？要。香肠？要。法式土司？要。煮鸡蛋？要。水果？要。西红柿？要。豆子？要。我还取了两杯水和一壶热巧克力。每一卡路里都是支撑我们跑步、举重、游泳、抵御寒冷的能量。我跟小艇组的其他成员坐在一张餐桌旁，所有人的盘子里都有一大堆食物。我吃得很快。热巧克力和鸡蛋的碎屑落在我的膝盖上，我用袖子抹了一下，但没理会掉在地上的一点西红柿和香肠。

在 BUD/S 训练中，吃饱了还能跑能游非常重要。因为军官要最后才吃饭，我很少有时间完整地吃完一餐，经常是嘴里塞满松饼、手里还抓着一个苹果就站起身来向外跑。

一般说来，我们吃饭时教官不会来打扰。他们坚持要学员大量喝水。有几个人筋疲力尽，吃饭都很困难，这时教官会催他们快吃。到了地狱周的后半程，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会睡着，教官有时会在打瞌睡的学员盘子里放上辣酱，然后把他叫醒，要他快吃。因为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他会不假思索地把一大勺食物送进嘴里，然后被辣得一下睁大眼睛清醒过来。

吃完饭后，我们又顶着小艇，前往 BUD/S 医疗所接受第一次体检。医生检查我们的伤口，看有没有感染，给我们量体温，检查是否有低温症的迹象。

体检让我们进退两难：体检时，教官是不理会我们的，而且医疗所里很暖和，因此我们都想尽可能地在里面多呆一会儿；但是，我们都尽量地向医生隐瞒自己的伤情，膝盖肿胀、感染、肺炎，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生让你中止训练，而一旦中止训练，你就必须在伤愈后从头开始。我们检查时只穿着黑色尼龙短裤（为了防止磨破大腿），因此很难隐瞒伤情，但我们还是尽量隐瞒。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他们会把听诊器贴在我们背上。

“呼吸有困难吗？”

“没有。”

“受伤了吗？”

“没有。”

体检后，我们来到“足疗站”。“褐衫停训者”——已经通过地狱周，但在后来的训练中因伤停训，等待编入下一期训练班的 BUD/S 学员——给我们的脚喷上抗菌药，给伤口抹上凡士林，贴上胶布，缠上绷带。

这本来是一段安静祥和的时光，但教官们在足疗站里摆了一个大音箱，一个尖厉的声音在里面疯狂地高声嚎叫：

今天星期几？

请你告诉我好吗?

今天星期几?

我糊涂了。

是星期天吗?

[暂停]

不是。

[暂停]

是星期一吗?

[暂停]

不是。

是星期二吗?

唱布鲁斯的日子吗?

穿鞋的日子吗?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是星期三吗?

不是。

是星期四吗?

闭嘴!

是星期五吗?

星期六?

戴帽子的日子?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不是。

可能是昨天,

但我忘记了。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不是。

可能是昨天,

但我忘记了。

嗨,今天星期几?

你能告诉我吗？

星期几？星期几？

我糊涂了。

喔！

我们离开足疗站，远离那里的心理折磨，穿着短裤向一排塑料筐跑去。每个人都有一个塑料筐，上面贴着胶带，胶带上写着名字。筐里放着一摞干衣服，我们有30秒的时间穿上干爽的袜子、裤子和T恤。不过等我们跑出门时，一位教官正拿着水龙等着我们呢。

在地狱周的后期，一次体检之后，一名教官喊着让我趴下。我趴到水泥地上做俯卧撑，教官用消防水龙喷我的脸。曲臂的时候，我感觉上衣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做下一个俯卧撑的时候，我伏到地上，触感告诉我那是一块巧克力糖。肯定是一个“褐衫停训者”塞到我口袋里的。我在水龙喷射的水柱中笑了，心中默念着“自由者永远无法征服”、“抵抗万岁”之类鼓舞人心的话，给自己打气，这也说明我当时已经筋疲力尽了。

第二天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模糊的片断。我们穿着靴子在沙地上来了一趟四英里计时跑。接着只记得我们好像是要进行远程海训。我们浑身湿漉漉地站在沙滩上检查刀具（我们游泳时要携带匕首，下水前必须检查刀具和救生装备），感觉自己开始暖和起来了。

总而言之，在地狱周开始的18个小时里，我们一刻不停地接受折磨，中间没有任何休息：计时长跑、马拉松式的游泳、无数的俯卧撑……

我和我的游泳同伴都知道，我们整整一周都会被冻得浑身发抖，所以我们商量着不要慢慢地走进水里，而纵身一跃跳进去。教官能折磨我们，但我们可以让教官看看，我们很享受地狱周。你们想冻僵我们吗？哼。我们自己来。我们跑到海边，跳进水里，感觉自己好像赢了什么东西一样。

以往我们都害怕两英里游泳这个科目。要游完全程得拼命折腾上至少70分钟。但在地狱周里，跟其他科目比起来，在海中游上两英里简直是一种享受。我们的身体因为运动而渐渐暖和起来，而且尽管教官会划着小艇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拿着喇叭对我们大喊大叫，但在我们游泳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没法再折磨我们了。

随着这一天渐渐过去，又有人退出了。游泳科目结束后有两人退出。当教官宣布下面我们要背上40磅重的背包长途行军的时候，又有两个人退出了。但我们接下来没有进行长途行军科目，而是顶着小艇向食堂跑去。

第一夜过后，我们开始一天四餐：早餐、午餐、晚餐和夜餐。“坚持撑到下一顿饭”这句话真是真理：在星期一午餐的时候，感觉星期五离我们还有足足五年，不过晚餐感觉没有那么遥远。

跑进食堂的时候，我们已经出现力不从心的迹象：手脚都肿了，膝盖、跟腱、脚踝都有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进食堂之前，我们又被水龙从头到脚冲了一遍，但头发里、耳朵里、衣服的领子里仍然有很多沙子。

大多数跑进食堂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普通人往往不理解这种梦想。林肯在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梦想。无论这是真是假，但我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赢得同胞们真正的尊敬，而且让自己配得上他们的尊敬。”BUD/S的学员们也有同样的梦想，他们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希望能青史留名。

在温泉关隘口，300名斯巴达战士用生命拖住了波斯的数万大军，在他们阵亡的地方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路人啊，请转告斯巴达人，
我们遵守命令，战死于此。

大多数学员参加BUD/S训练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希望梦想成真，成为一名现代战士，一名海豹队员。但现在，许多人开始动摇了。午饭时，我们已经有气无力了。两名学员把盘子和水杯砸到了地上。“看看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当人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争吵打架。这时需要幽默感。

我们在餐桌旁高谈阔论：“你看到琼斯教官拿着喇叭的那副模样了吗；就像要把它吞下去似的。”

“不对，他是他妈的在跟那个东西亲嘴。”

“他爱死那东西了。”

“他单身吗？”

“嗯。”

“不是，他跟那个喇叭结婚了。”

“我敢打赌，他晚上要把那东西带回家。”

“他大概给它起了好多爱称。噢，小喇喇，噢，小喇喇，噢，小喇喇。”

“我敢打赌，他绝不让其他教官碰那东西。”

“我赌他们也不想碰。”

琼斯教官走过我们的餐桌旁，有人开始五音不全地哼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另一个家伙轻声地唱着：“新娘来了，她穿着……”

我们笑了一会儿，埋头吃饭。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滑稽可笑，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合理，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当时这些话的确让我们捧腹，而自己居然还能笑出来，这让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星期一下午，我们咬牙坚持。其间进行了大量训练，经受了无数折磨。通常来说，在地狱周中，过去的时刻都是美好时光。但在星期一下午后，还有星期一的夜晚在等着我们。

“好了，先生们，再有几个钟头太阳就要落山了。”喇叭里传来一阵笑声。星期一的夜晚臭名昭著，是最艰难的一夜。其间要进行“钢铁平台”科目。我们听说这个科目会把你冻僵，感觉就像是一个浑身赤裸、全身湿透的人被扔在北极等死一样。星期一的夜晚是杀手之夜，它将是你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

太阳渐渐落下去了。教官让我们上岸，站成一排，看着太阳落山。他们则拿着喇叭对我们喊道：

“跟太阳说晚安，先生们，跟太阳说晚安。”

“今夜将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夜。”

教官提醒我们，今夜我们将要第一次在地狱周中进行通宵训练。

“而且以后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夜晚。”

我们看着太阳渐渐西沉，已经碰到了海面。

当教官真的打算折磨我们时，他们会说：“不管是谁，只要现在退出，就能喝到热咖啡，吃到面包圈。来吧，谁要面包圈？谁要点咖啡？”

我们看着太阳沉入大海，此时班里有什么东西崩溃了。我右眼眼角的余光看到，有人正跑向那口钟。一开始有两个人，接着又有两个，然后又是

一个。教官已经把钟带到了沙滩上，只要敲它三下就可以退训。我听到钟声在响：

叮，叮，叮。

叮，叮，叮。

叮，叮，叮。

这次是一群人一起退出。几周前我们开始适应性阶段训练的时候还有220多人，而在237期的这些人中，最后只有21人毕业。这一次退训的人数是最多的，比BUD/S训练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多。

谁能想得到呢：这些人完成了50米潜泳，忍受了防溺水训练和“冲浪”的折磨，通过了障碍跑和沙地上的四英里跑，在海中游过两英里，经历了原木体能训练，做了无数的仰卧起坐、浅打水和俯卧撑，在冰冷的海水和沙地上摸爬滚打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BUD/S训练中最艰难的部分竟然是站在沙滩上看着太阳落下？

每个退出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要笼统地解释他们为什么退出可能是愚蠢的。但是这些人在参加海军前就已经主动进行了几个月的训练，志愿参加海军后又在新兵营训练了几个月，参加BUD/S训练前还接受过特别训练。他们愿意接受BUD/S的考验，忍受痛苦和寒冷，而且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所以我们应该问一句：他们为什么现在选择退出？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选择退出是因为让恐惧压倒了自己。当太阳落下，对于未来的恐惧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可能会承受怎样的痛苦，训练可能是多么艰苦。他们站在海滩上，没有进行任何训练，四周暖洋洋的，但他们却想着自己会非常寒冷，非常痛苦，自己可能熬不过去。他们的恐惧在内心不断积聚，为了释放这种恐惧，他们敲响了那口钟。

有些人用幽默来释放这种恐惧。

“你觉得我脸上的沙子去死皮的效果怎么样？”

“嗯，你看起来真挺光滑的。”

“他们把这个叫做地狱周护肤品。不过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称呼我身上的味道。”

“你知道吗，为了让别人用泥巴和沙子在身上搓一通，我女朋友还花钱去做美容呢。”

“没错，这跟美容差不多，不过我们做这个还挣钱呢。简直不敢相信，真他妈的太合算了。”

“我打算在美容院找份工作算了。”

还有些人根本不让恐惧在心中停留。他们已经学会辨别各种情绪，会在心中默念，欢迎回来，恐惧，但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帮助队友上。

“你的脚怎么样？”

“没事。”

“好的。自己相信。今晚上可是难熬的一夜。应该很快就吃晚饭了。”

另外一些人则把注意力就放在当前。多么美丽的日落啊。这是地狱周，可我现在只要站在沙滩上就行了，这真不错。

我最喜欢的一个组员就是富兰克林，他以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最烦别人说废话，而且幽默感特强。富兰克林总是拿退训开玩笑：“我今天肯定要退，跑完步就走。然后我要去太平洋海滩上冲浪，闲逛，吃墨西哥玉米卷。”跑完步后他会说：“嘿，有谁打算早饭后跟我一起退训吗？我打算去吃早饭，但我还是要走。”等吃完早饭，他会说：“体能训练，我喜欢体能训练，等体能训练完了就走。”体能训练结束后，他会说：“我吃了午饭就走。他们今天准备了汉堡，我喜欢海军食堂的汉堡。”他一直这样说要退训，有时让那些真打算要走的人很烦。其实，他的幽默中蕴含着智慧：如果必要的话，我以后会走的，但现在，不管现在我要做什么——把原木举过头顶，坐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还是顶着小艇在海滩上奔跑——我都能至少再坚持10秒钟，我现在只要再坚持10秒钟。

最后，钟声不再响起，太阳也没入海中，夜色降临了。我们重新划分小艇组，又开始跑步。钢铁平台位于海军基地圣地亚哥湾一侧。海水平静、冰冷、漆黑，我们穿着靴子和迷彩训练服跳入水中，散开后开始踩水。

当寒意浸入我们的骨髓之后，教官们喊道：“脱掉你们的上衣。”我们一面踩着水一面脱掉T恤和迷彩上衣，把它们扔到钢铁平台上。“脱掉靴子！”我们在冰水中挣扎，一面踩水一面解鞋带，牙齿不停地打架，两手也在发抖。我们把靴子扔到平台上后，教官命令我们“上来”。我们爬上平台，站在上面的水泥地上，两脚已经被冻得麻木。教官们一反常态地保持

沉默，我们都能听到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接着喇叭里传来一个声音："某些人来这儿大概是觉得当个海豹队员很酷，很光荣，自己也能帅上一把。都是好莱坞闹的。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当海豹队员就是这样，受不完的罪。你们可以离开这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可以报效国家。不是每个人都要当海豹队员。"

"下水。"随着一声命令，我们又一次跳入漆黑的冰冷海水中，牙齿打架、手脚麻木地踩着水。

自从 1962 年 1 月 8 日肯尼迪签署总统令批准组建海豹突击队以来，地狱周训练就一直在进行。肯尼迪大力推动特种作战。他反对美国仅依靠核武器来应对苏联的挑战，并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如果苏联在非洲资助某个共产党政权，在南美支持叛乱，或者向南亚派遣军事顾问，美国并不能发动核打击予以回应。肯尼迪总统相信，美国必须灵活地做出反应，这意味着要具备各种国家力量工具，包括能够执行多种秘密任务的特种作战部队。美国海军海、空、陆突击队，或称海豹突击队就是其中的一支精锐之师。海豹队员接受地狱周训练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现在轮到我经受这一考验了。

人们对海豹突击队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它是美国攻击力最强的突击队。海豹突击队的确能够造成巨大破坏，但这不是海豹突击队的特别之处。任何体能出众的 16 名运动员（海豹突击队一个排的规模）经过两周训练，拿起步枪也能够进行破坏。海豹突击队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有思想，有纪律，能够适当地运用暴力。几年后在伊拉克服役时，我曾亲眼目睹一组游骑兵判定屋内藏匿有"基地"组织的一名恐怖分子后，踢开房门闯入屋内，用枪对准这名恐怖分子，发现他没有带武器，就将他打翻在地后上了背铐。与此同时，在同一房间内的其他游骑兵用身体护住一个正在熟睡的伊拉克小女孩。他们随后温柔地把她抱起来，交给另一个房间里的一位伊拉克妇女。厄尔经常说："随便哪个傻瓜都能打。"战士之所以成为战士，不是因为他们有力量，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用力量来达到美好的目的。

夜还在继续。我们进行了一个名为"里昂之跃"的科目，在刺骨的寒冷中来回奔跑、游泳。之后我们向战斗训练池跑去。教官提醒我们，前几期训练班曾有个学员死在了训练池，现在有人想退出吗？

在训练池里，教官让我们在一米高的跳台上跳水。入水姿势优美的家伙可以在温暖的更衣室休息几分钟，表现差劲的人则要接受“清洗”，站在几支高压水龙下被冷水冲。

我们分成几组，在池子里进行毛毛虫赛。之后教官派一个小组取来几条小艇，我们把小艇抛进池子，然后爬上小艇。这时，一名教官拿出一袋麦当劳汉堡，对我们说：“现在开始玩山丘之王。如果你落水，就游到训练池对面，你出局了。艇上的最后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小艇组赢得一袋汉堡。预备，开始。”

我们剩下的几十个人开始在艇上扭打起来。一开始我们都很有分寸。我们是一期的同学，是一个团队，尽管我们为了汉堡扭打在一起，但不会真下重手拼命。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学员落入水中，搏斗也变得激烈起来。小艇只能勉强承载上面所有扭打在一起的学员的体重，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过了10秒钟，我又听到：“富兰克林，救救我！”

我朝右边扫了一眼，看见霍尔的脸被浸在小艇底部的积水里，眼睛睁得大大的。霍尔曾是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也是这期训练班中最强壮的学员。在混战中，因为他一个人对付四个人，结果被压到了艇底，现在有五六个人踩在他身上打斗，但在一片混乱中没人注意到他的窘境。小艇已经进水了，而霍尔被死死地压在下面。其他人打斗时，小艇不停地摇晃，这让霍尔能时不时地喘口气，喊一声，接着又被压到艇底。富兰克林就在他身边，但在混乱中没有听到霍尔的呼救声。

我抓住霍尔的脖领子想把他拽起来，但他的两只胳膊都被死死地压住了，两个人踩在他的胸上，还有两个人踩在他的腿上，我拽不动他。我火了。“滚开！滚开！”我抓住一个人，一下子把他扔进了水里。另一个人背对着我，我一拳打在他的肋部，接着一脚把他踢进了水里。

可以说人人都知道我一贯非常冷静。雷恩常常说：“格雷滕斯简直比电风扇还让人凉快儿。”所以见到我这个样子，许多人都往后退，或者干脆跳到水里——不是说他们怕我，而是他们知道显然是出了大事。

我把霍尔拽起来，他直从肺里向外咳水。我们现在是艇上的最后两个人。

“格雷滕斯，他妈的过来。马上过来！”

我跳下小艇，朝站在训练池另一边的教官游去。我刚刚上岸，教官就一把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推到墙上。“你他妈的有什么毛病？你在干什么？”我刚要张口回答，教官又把我拽过去，然后再狠狠地搡到墙上。

从训练池边看去，好像是我想汉堡想疯了，开始真的打自己的队友。我解释说霍尔被压在艇底了。教官把霍尔叫过来，他证实了我的话。“好吧，你们两个，每人吃一个该死的汉堡。只能吃一个。不能给你们一袋。”

那天夜里随后发生了什么在我的记忆中一片模糊。我们顶着小艇绕着基地跑圈。冲浪，玩沙。做俯卧练习，听着哨声一次又一次地起身、卧倒、俯卧。当我们再次接受体检时，我看到雷恩被推到了一边，坐在一张检查台上。我们距离太远，没法交谈，所以我举起双手招呼他，朝他比着口型：“怎么了？”雷恩抬起了左腿，两手摆出拿照相机的姿势，然后摁了一下食指，做出照相的样子。他要去照X光。我注意到雷恩走路一瘸一拐，但我以为他能挺过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雷恩。

星期一晚上退训的人最多。随着星期二的太阳升起，我们继续有人因伤退训，另外仍然有人主动退出。地狱周之后，我认识了许多没能通过BUD/S训练的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分为两类。一类人接受事实。他会谈论自己BUD/S受训经历，也许还会嘲笑这种训练，最后他们会说：“可这不适合我。我尊敬那些家伙，我也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但我不适合。”另一类人感到无尽的痛苦。他们讲话吞吞吐吐，哪怕事隔多年仍然希望假装自己通过了训练：“我通过了，但是教官不喜欢我，逼我退训了。”“我本来可以通过的，但当时我的女朋友进了大学，要搬家，我必须跟着她走。”当我跟这些人交谈时，我能感觉到他们胸口像有一个脆弱的气球在不断膨胀，他们在谈话中左右支绌，免得这个气球爆裂。讲出真相的人能够继续前行。欺骗自己的人则在自己的余生中都要背着BUD/S训练经历这个沉重的包袱。

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也是一片模糊。更加寒冷。不停的奔跑。无休止的冲浪折磨。一天晚上，我们在沙地上用桨挖了个坑，教官允许我们在坑底休息15分钟，然后让我们生了一堆火，绕着火堆不停地跑圈，等我们暖和过来又把我们赶下海，再让我们跑回沙坑。这就好像在雪堆旁有一盆热水，扎进雪堆里一次可能挺有趣，但教官不停地让我们在两者之间折返，把我们折磨得疲惫不堪。

等我们的意识渐渐模糊之后，教官们在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狂笑的声音，赶着我们把小艇一会儿划向北，一会儿划向南。我们跑到食堂吃饭，接受体检，然后又下海。

在训练中原本最容易的部分，我迎来了自己最难熬的时刻。教官把我们赶到双杠旁（我们练肱三头肌的地方），让每个小艇组出一个人比赛，优胜者所在的小艇组可以到海滩上的多功能帐篷里休息一下。那是星期三。我们已经连续三夜没有合眼，疲惫到站着都能睡着。

我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入睡。我跟其他人一起跑进帐篷。周围的人都已经睡着了。我躺了下来，以为立刻就能睡着，但自己却毫无睡意。我闭上眼睛，用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这样我应该能睡着了。

事与愿违。我的左脚在上一次体检时被包扎了起来，每一次心跳我都能感到左脚的血管跳动，就好像被止血带扎住了一样。其他人都睡着了，我坐起来脱下靴子，解开绷带把它扔在地上，然后穿上靴子，系好鞋带。（我们知道，如果脱下靴子睡觉，脚就会肿得再也穿不上靴子。）

我仰卧在行军床上。帐篷的顶上有一个开口，阳光穿过这个开口，正好照在我的上身。我们经历了一个星期的酷寒之苦，但现在这个挤满了人的帐篷里酷热难当。我又坐了起来。我想挪动一下行军床，但我的床夹在两张床之间，上面的两个家伙睡得死死的。我根本动不了。

我烦躁不安。这不公平。“褐衫停训者”把我的脚包扎得太糟糕了。我还分到一个最差的床位。要是我睡不着怎么办？我还能通过吗？恐惧涌进我的心里。我起身走出帐篷。两个“褐衫停训者”看见了我。

“你没事吧，长官？”

“没事，我很好。”

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一周十分痛苦，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可我现在需要睡一觉，而我睡不着。他们能让我以后再睡吗？不会。多么愚蠢的问题。我该怎么办？要求打个盹？我怎么才能睡着？去别的地方吗？不行。我必须在帐篷里睡。如果我睡不着怎么办？

我走到一堵矮墙旁，墙上有一个水龙头。我以为自己最不情愿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再弄得浑身湿透，但我还是用沾满沙砾的肿胀的手拧开了龙头，将头伸到水流中。我冷静下来，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果我能

克服其他的困难，就也能克服这个困难。我一定能行。我拖着肿胀的双腿走回帐篷，心中突然间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曾无数次地想过怎样应付地狱周的考验，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已经有这么多人退出、受伤了），而且此时我得到了一个几乎是前无古人的机会，能够在训练的中途独自站在海滩上静一会儿，享受自己的一切。“上帝，谢谢您！”我低语了一句，走进帐篷，进入了梦乡。我们在一片混乱中惊醒。教官们可能又在帐篷里打了空包弹，也可能是拿着喇叭大喊把我们叫醒的。无论怎样，我们突然从梦中惊醒，跌跌撞撞地跑出帐篷，然后又被教官赶下了海。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清醒，痛苦不堪地跑向海中。我们站在齐肩深的水中，按照教官的命令向南跑去。我们在海水中摇摇晃晃地向前迈步，但每一步都跑不出多远。我们又开始感到寒冷刺骨。我回头望去，看到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痛苦的表情。我不记得当时自己到底干了什么，是开始唱歌，朝战友喊加油还是对教官们表示蔑视，只记得自己狂吼了一通，然后所有的学员都跟我一起大吼。整个班的情绪变得完全不同，我们好像已经下定决心，就算被打倒也要立刻爬起来。很快，我们就是在兴奋地吼叫了。这是我在地狱周中最大的个人胜利。我还有整整两天，仍然面临着受伤的危险，但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回想起来，我最困难的时刻其实就是我在整个地狱周中唯一一次独自一人的时刻，结果我一心想着自己的痛苦，觉得不公平，开始自怨自艾。

地狱周仍在继续。我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顶着小艇跑步，在训练池里进行各种比赛，在食堂与训练场之间往返。训练强度始终不减。“预备。举艇。”我们伸直胳膊举着小艇，直到双臂都开始颤抖。“出发！”教官吼道。我们在沙滩顶着小艇不停地走，每走一步，小艇都会在头上弹一下。我们走了几英里，直到感觉一步也走不动了才停下来。我们在沙滩上奔跑，最后连那些最能跑的家伙也跑不动了，只能在地上爬。

这是我们从地狱周中获得的最大收获：我们将近80个小时不眠不休，其间几乎一刻不停地经历痛苦与寒冷的双重折磨，感到自己站都站不稳，连弯腰系鞋带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实际上我们还能扛起40磅重的背包在黑夜中奔跑。

连续几天不睡觉后，我们的精神开始恍惚，教官们开始戏耍我们。体

检过后，我们跑到海滩上，开始玩“西蒙说”游戏[1]。

“西蒙说抬起你的右腿。西蒙说抬起你的左腿。西蒙说抬起你的右腿。现在抬起你的左腿。”教官失望地摇着头。“这非常简单，先生们。我发指令，你们听，决定是否执行。小孩子都能玩。我刚才说‘西蒙说’了吗？没有，我没说，所以那些抬左腿的傻蛋们，冲浪去。”

我们现在都双脚站在地上，每个人都在琢磨，教官刚才又没有看见我抬左腿。“好啊，你们想耍花样？你们不想好好玩‘西蒙说’游戏是吗？好，我明白了。所有人都去冲浪，玩沙。”

我们跑到海边，跳进海里，上岸，在沙砾中翻滚，然后排好队，继续玩“西蒙说”游戏。

我们还玩“哈奇伯奇”游戏[2]。地狱周的第四天，我们一瘸一拐地跑到海滩上，我们的教官喊道：“伸左腿，收左腿。伸左腿，摇一摇。”

有几个家伙对此毫无兴趣，随后我听到教官作了一次最为荒唐滑稽的威胁：“你们最好他妈的打起精神来，好好地玩‘哈奇伯奇’。”

我轻轻地笑了一声。接下去在恍恍惚惚中，我无法控制自己，开始大笑起来。我用左手捂住脸来掩住笑声。

“你觉得这很滑稽是吗，格雷滕斯？”

我竭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希望能回答一句“呼吖”或者“没有”。但我把手放下后，却莫名其妙地答了一句“是挺滑稽的，教官”。

我以为他会把我赶下海，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体罚所有学员，但他没有，而是说：“好吧，既然你觉得这挺滑稽，干吗不过来到这儿来？！”我跑上前去，站在全班面前。

“格雷滕斯，你上的是牛津大学，还得过罗德奖学金？”

“呼吖。”

“那么说你该很他妈的聪明了，是吗？”

我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呼吖？”

“好，那我想看看玩得最出色的哈奇伯奇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

[1] 儿童游戏，规则是只有当发指令者说了“西蒙说”，其他人才执行该指令，如果不说“西蒙说”则不执行。

[2] 儿童游戏。哈奇伯奇其中指伸展双臂，摇晃身体的动作。

了吗？”

“呼吁！”

“好，伙计们，伸左肘，收左肘，伸左肘，摇一摇。哈奇伯奇，转个身，”我感到一种荒谬的喜剧感，大声喊道，“就这样！”

我领着全班伸右肘，收右肘，伸左脚，收左脚，每次转身后，我们就会一起大喊：“就这样！”

结束之后，教官转身对我说：“格雷滕斯，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地狱周哈奇伯奇，你们都可以休息五分钟。”

我们在小艇旁坐下，累得连开玩笑、甚至是大口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这一组里面的其他人靠着艇舷，立刻就睡着了，只剩下我自己坐在沙滩上。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无论跑步、游泳、越障碍，我都不是最快的，但至少刚才我是最出色的哈奇伯奇战士。

地狱周让我们知道：即使在幻觉中，处在昏迷的边缘，我们也仍然能够继续训练，而且还可以玩智力游戏。

游戏仍然继续。这次是在星期四下午吗？我跑到沙滩上，我的一名小艇组成员哈里森对我说：“格雷滕斯，过来。”我跑过去，他揽着我的肩膀，把嘴凑到我的耳边，好像要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似的，说：“富兰克林拿着锁呢。”他接着转身指着海滩另一边。

“什么？”

“富兰克林拿着锁。”

哈里森在我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因为一连五天没有睡觉，他的神智现在不太清楚。我问：“哈里森，我们怎么办？”

“富兰克林拿着锁，他在那边。”

哈里森的脑子已经是一团糨糊了。教官给了富兰克林一把锁上的密码锁，把开锁密码也告诉了他，然后让他跑到海滩另一头几百码的地方，我们其他人则在海滩上散开，间距 15~20 码。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富兰克林要爬到下一个人的身边，把锁交给他，同时告诉他密码，这个人要记住密码，在沙滩上爬 15 码，将锁和密码传下去，一直传给最后一个人，由他爬到终点，并在那儿打开锁，这样才算赢。等锁传到我手里时，哈里森一边把锁塞给我一边说：“快，格雷滕斯，快！”

“密码是多少？”

他瞪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赢不可，格雷滕斯！快！”

“要赢就需要密码。”

“哦。好吧，随便编一个吧。”

我转身朝下一个人爬去。哈里森是个运动健将，无论跑步还是游泳都棒极了。在玩密码锁游戏的时候，他大概还能扛着霍尔在沙滩跑上两百码，但他脑子已经是一团糨糊。有些人现在瘸得非常厉害，哪怕就是拼了命也只能跑出10分钟一英里的速度，但他们里面有几个头脑仍然非常清楚。

执行侦察任务时，海豹队员经常要在一个位置呆上几天，瞭望，观察，报告。在BUD/S训练中，我们也要接受这方面的测试。教官从每个小艇组挑出一名代表，让他们围在一块蒙着布的木板周围。教官把布掀开后，我们看见木板上放着七样东西：牙刷、CO_2管、硬币、安全别针、口香糖、手表和绳索。教官给我们30秒的时间观察，然后把木板盖上，让我们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东西。连续五天不眠不休严重损害了许多学员的记忆力：“硬币、口香糖、还有，还有，也许还有块手表？”而其他人则记得清清楚楚：“硬币、安全别针、手表、CO_2管、牙刷，我刚才说手表了吗？对了，还有口香糖……”尽管五天没有睡觉，但他们的思维依然十分敏锐。

星期四夜里，我们登上小艇，划过碎浪区，开始“划艇周游世界”。科罗纳多是一个半岛，在这个科目中，我们要划艇绕科罗纳多一周。因为这是地狱周的最后一夜，一开始我们都精神抖擞。

绕着科罗纳多半岛设有许多检查点，我们必须划到检查点，向那里的教官报到。虽然我们拼命地划，但我们的小艇漏气了，增加了阻力，降低了我们的速度。在每一个检查点我们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报到。每次我们划到教官身边，他们都会说：“好吧，伙计们，你们肯定不想睡着，所以到冷水里浸一下清醒清醒吧。”这时我们就得从小艇上跳入冰冷的海湾。

马丁划艇的时候睡着了，差点从艇上掉到冰冷的海里。我和另外一个同伴抓住他的救生衣，把他拖回艇里。因为我是艇长，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用自己的桨当舵来掌握方向。突然之间，同伴们回头喊道：“格雷滕斯！”

我这才发现自己刚才睡着了，小艇偏离了航向。

我竭力保持清醒，但眼中圣地亚哥的灯火却在不停地旋转。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拼命向前划，但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的对话已经变成了荒谬的胡言乱语。

“格雷滕斯，是你，你看见了吗？你刚才喊那些家伙了吗？”

“什么？”

“那些绿色和红色骑兵发出的光，快看，他们打成一团了。”

“什么？”

“噢，我的上帝，简直就像一只松鼠，它还喝了一肚子水！”

“马丁，醒醒！”

马丁还没清醒，继续胡言乱语：“该死，结束了，那些罐头和糖果，我说的是图奇罗尔[1]卷糖，我这儿有一块儿，你要一块儿吗？我有一块儿，还能再要一块儿，没关系，真的，非常好，格雷滕斯，你让我们一直往前走就行了，我得去解个手，天挺暖和的，骑兵们现在就在这儿。”富兰克林听得傻笑起来。

我们那天夜里终于把小艇划到了终点。记得星期五早晨走出食堂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念道：我们成功了，最后一天了。

但教官们继续戏弄我们：“预备。举艇。好了，走吧，先生们。明天就是你们地狱周的最后一天了，只剩最后一晚上了。”

同伴们一面顶着小艇向前跑，一面问我：“格雷滕斯，今天是星期五，对吗？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对吗？”

“是的，是的，今天是星期五，我肯定。”我朝另一名军官学员、我的朋友迈克喊道：“迈克，今天是星期五，对吗？”

“是，我觉得是。”

我们扛着小艇跑到海边，然后向南边的“示范坑”划去。我们已经从老学员那里知道了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科目。所谓的示范坑，实际上是一片区域，周围是围栏，中间是一个大坑。在地狱周期间，坑里会灌上海水，变成一个巨大的泥潭。

---

[1] 美国著名的糖果品牌。

我们上岸跑到示范坑旁边，这时响起一声尖利的哨音，我们卧倒在地，烟幕弹随之爆炸开来，火炮模拟器也开始轰鸣。两声哨音响起，我们开始匍匐前进。离地面一英尺高的地方拉着铁丝网，我们必须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周围弥漫着紫色、橙色、红色和绿色的刺鼻烟雾，我们只能勉强看到前面人的靴子。坑的周围挖了沟，我们沿着沟爬进坑里，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满是掺杂着汗液的泥泞海水，还不时泛起橙色的水泡。

硫磺的味道异常强烈。我擤了下鼻子，用袖子擦掉擤出的紫色鼻涕。现在我们全都爬进了坑里，泥浆一直淹到我们的腋窝。坑的上方拉了两条绳索，一条距泥浆表面一英尺高，另一条有六英尺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攀上绳索，脚踩着下面的绳子，手抓着上面的绳子，溜到坑的对面去。与此同时，“褐衫停训者”会剧烈地摇晃绳子，没有一个人能走完半程，全都重重地摔到了坑底。

我们从老学员那里知道，示范坑是地狱周的最后一个训练科目。阳光温暖地照耀着大地，我们坐在泥水里看着其他学员在绳索上攀爬，心里非常非常高兴。地狱周就要结束了。

一声哨音响起。接着是两声哨音。我们开始爬出示范坑。“回到艇上去。回到艇上去。划回营地。”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不是通过了吗？在极度的疲劳下，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这些教官搞砸了！我们在那儿就该结束训练，他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那儿结束！

我们跑回艇边，向北划回营地。周围的学员个个恼火万分，“他妈的怎么回事！真他妈的！”

我们把满腔怒火发泄到教官身上，“你看到那个嚼烟草的死胖子了吗？他往坑里吐痰。死胖子！”

等我们划回营地，教官们又开始折磨我们，“冲浪。玩沙。”我们得互相搀扶着才能站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往前跑。我们再也没有力气跳进海里，只能直挺挺地倒在水里，然后浑身湿透地爬上岸，挣扎着站起来，再跑回海滩。

教官命令我们趴下做俯卧撑。到了这个时候，要做所谓的“俯卧撑”，我们只能把身体伏低一英寸，低下头，然后再撑起身体，抬起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趴下！面朝大海！”我们又做了一组俯卧撑，接着教官喊道，“起立。”我们站起身，向后转，发现全体教官和海军特种作战中心的所有人员都排成一排，站在前面的沙堤上。

司令官对我们宣布：“BUD/S 第 237 期学员，你们已通过地狱周！”

我们站在那儿。真的吗？我们低下头望着自己的靴子，然后又抬头看着教官。这是个花招吗？接着富兰克林仰天狂吼起来，我们也都跟着大喊大叫，转过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成功了。

我们同每一位教官握手，然后穿过沙堤，前往卫生所。最后一次体检之后，我们来到操场，那儿已经为我们每个人预备好了两大块比萨饼和一大瓶运动饮料。

我跟其他学员一起坐在水泥地上。我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更没有力气嘶喊。那是我一生中尝过的最美味的比萨饼和运动饮料。

总会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才能通过地狱周？”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能通过。有十几种人通过不了。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以为二头肌的块头是自己力量的表现，他们一般过不了。那些年轻人浑身刺着文身，想用这个说明自己多么坚强，他们一般过不了。那些注重仪表、不能忍受肮脏的人一般过不了。那些自信满满的前运动员一直饱受赞誉，以为能够像通过高中橄榄球选拔赛一样轻松通过 BUD/S 训练，他们一般过不了。那些牛皮大王吹嘘自己即将取得的成绩，但实际作为却屈指可数，他们一般过不了。那些找理由的人一般过不了。那些自怨自艾的人总是哀叹“这不公平”，他们一般过不了。那些空谈的人看上去光鲜，说话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却名不副实，他们一般也过不了。简而言之，那些一心只想表现的人都过不了。BUD/S 的魅力也正在于此：没有借口，没有解释，只有通过和不通过。

不过，很难判断谁能通过。我以为霍尔能通过，他通过了。我以为富兰克林能通过，他通过了。我以为迈克能通过，他通过了。我还以为卢卡斯能通过，但他没有（在防溺水训练时被淘汰）。与此同时，有些人在 BUD/S 训练开始时体质非常差，跑步会呕吐，甚至做引体向上都困难，但他们最终通过了。有些人身材矮小，瘦得皮包骨头，看到大海会紧张得牙

齿打架，但他们通过了。还有些人恐惧之情溢于言表，有时甚至怕得浑身发抖，但他们也通过了。

正如哈曼教官所说的那样，BUD/S 训练打碎了学员的外壳，暴露出他们的内核。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人们曾给我讲过他们邻居的故事，有的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生命，有些人尽管与之相识一生，但在生死考验来临之时却只知明哲保身。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

BUD/S 训练也是一样：在接受考验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究竟如何。

不过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过分夸大地狱周的重要意义。从许多方面来说，地狱周只是 BUD/S 训练的开始。通过这次考验只是让海豹突击队这个团队承认："你值得培养。"

地狱周让人手脚肿大，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但它并不能让人脱胎换骨。尽管地狱周强调团队合作，关心队友，但这不能保证通过地狱周的都是好人。有些海豹队员是我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但也有一些混蛋，他们虐待自己的女友或妻子，不会关心别人，不能领导团队，品行有亏，但他们也通过了地狱周。地狱周考验灵魂，但不能净化灵魂。

但通过地狱周的人至少得到了这样的收获：在此后的人生中，地狱周成为一个参照点。既然我已经通过了地狱周，那么我就一定能够勇敢面对现在的这次考验。

体检之后，我们走回（也可能是乘车）200 码外的宿舍。我打开房门，走到床边，坐在床边，把吃剩下的半块比萨饼放下。等早上吃的时候一定很美味，等我起床吧——谁知道我会睡到什么时候？我把一个枕头放在床脚，垫在脚底下，这样可以缓解脚部的肿胀，然后枕着另一个枕头躺下了。

我微笑了。地狱周结束了。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我绝不希望再一次体验这种美好。

第六章

高级作战训练

海豹突击队可以从海上、空中和陆上发动攻击。我们是美国的精锐突击队，而此时此刻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刻苦训练，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战士。我们在海滩上集结训练，挑灯夜战研究阿富汗地图，把子弹一颗颗压入弹夹，分解擦拭武器，一遍又一遍地校准步枪，离开营地接受高级山地作战训练，修改军服，更新遗嘱，给自己的挚爱写下遗书。

我睡了一大觉。睡了 12 个小时？ 18 个小时？我感觉身体沉重而麻木，不过地狱周造成的双手浮肿已经开始消退。我们起床走出兵营，像一队活死人一般走向卫生所，再次接受体检，检查是否有蜂窝组织炎、肺炎、骨折。体检过后，我们乘车前往当地一家餐馆，坐下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薄饼、香肠、肉丁、煎蛋、水果，还有肉汁饼干。

吃完早饭，我开车回家。我的头、手还有脚仍然肿大。我把车慢慢地停在家门口的路边，下了车。邻居家打开了洒水装置给草坪浇水，虽然只有几滴水落在人行道上，但我还是远远地绕开。现在我只想过一天干爽的日子。

星期一，我们又开始训练了。训练科目是水文侦察，学习如何在入侵行动前细致调查碎浪带的情况。我们还学习作战巡逻的基本技能，并进行恢复性体能训练：在粉碎机操场上训练体能，在海滩上跑步，并且继续每周进行一次两英里游泳。

星期二上午，我和自己的游泳训练同伴游完两英里后上岸，在海滩上跑步，这时一个人迎面跑了过来，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冲我们嚷了一句。

“他说什么？”我问道。

“我不知道。好像是纽约有架飞机坠毁了。”

其他学员游完泳，脱掉紧身橡胶保暖衣和迷彩服，摘下脚蹼之后，这个消息已经在全班传播开来：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塔。不，是两架飞机。一幢大厦坍塌了。两座大厦都塌了。数以千计的人遇难。

“成四列！”我们站成四列纵队，跑步前往食堂。大家边跑边交流各种

小道消息。食堂里的电视开着，无论是穿着军装和体能训练服的水兵还是戴着塑料手套、拿着勺子的厨师和服务人员，都站在一起看着电视。“打饭！”我们匆匆打完饭，坐在餐厅角落靠近电视的桌子旁边。我们吃饭时经常说些笑话，但那一天我们都沉默不语，埋头吃饭，偶尔才骂一句脏话，或者祈祷一句。

饭前，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和平时期军队的一员。饭后，我们清楚自己很快就要走向战争。

海军特种作战中心的全体人员都迸发出巨大的干劲。我们都认识那些现役海豹队员。他们在海滩上集结训练，挑灯夜战研究阿富汗地图，把子弹一颗颗压入弹夹，分解擦拭武器，一遍又一遍地校准步枪，离开营地接受高级山地作战训练，修改军服，更新遗嘱，给自己的挚爱写下遗书。

我们这期训练班的学员还没有成为海豹突击队的正式队员，但我们在整个海豹训练阶段都知道自己马上要上战场了，这在此前是没有过的。在我们跑步前往食堂的路上，同伴会问我：“格雷滕斯，你觉得他们会加快训练进度，把我们派到阿富汗吗？”这些话让我知道，我身边的队友与普通人相比是多么不同。

我们对“9 · 11”的记忆各不相同，但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中有一种复杂的感觉，有对恐怖暴力的震惊，对遇难者的同情，涌动的爱国热情，还有对复仇的渴望。我们悲伤，更崇敬为救助他人而献身的英雄主义行为。

上述这些感觉我的同学们也有，但全体学员还有另外一个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每一个人都说：“真希望我当时就在其中一架该死的飞机上。”这不是逞能，更不是吹牛。此前他们誓言为祖国而战，现在战斗已经打响。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超人，即便当时在场也可能仍然阻止不了这一切，但他们真真切切地希望在国家的危难时刻能够身在最前线。

海豹可以从海上、空中和陆上发动攻击。我们是美国的精锐突击队，而此时此刻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刻苦训练，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战士。

在潜水训练中，我们学会了在水中战斗。在此之前，我从未在水下呼吸过。在这个训练科目中，我学会了使用水下呼吸器，并且接受了海豹突

击队的独家训练。在佩戴水下呼吸器潜泳时，教官会不停地攻击我们，从我们嘴里扯掉呼吸器的咬嘴，扯下潜水面罩，拽掉脚蹼，关掉氧气开关，把氧气管打结，然后再迅速游开。我们必须一边忍受缺氧的痛苦，一边将氧气瓶和氧气管拽到身前，拧开开关，解开氧气管上的结，好重新呼吸到延续生命的氧气。而只要我们摆弄好了氧气瓶，重新吸到一口氧气，教官就会立即开始再次攻击我们。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们要跟自己的游泳训练同伴共用一套水下呼吸器，一起潜到战斗训练池底，而且所有人的潜水面具都用黑胶带贴得结结实实，在水下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要把整套潜水装备递过去，接回来，轮流用它呼吸氧气。再到后来，我们要背着60磅重的装备，举高双手，踩水五分钟。只要手碰到水面就算失败。不断有人在各种各样的测试中被淘汰，但训练继续进行。

我们要在海中逆着海流向北游五英里半，每天还要潜水两次。水压经常把空气压进我们的内耳，到了夜晚，被压缩的气体开始膨胀，导致暂时性的听力下降。睡上几个小时之后，闹钟会把我们叫醒，我们擤擤鼻子，揉揉耳朵，开始又一天的潜水训练。

我们潜泳游进海湾。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在15英尺深的漆黑水下一边看指南针掌握方向，一边数自己打水的次数，这样就能够精确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游出了100米的距离。九周的潜水训练之后，我和游泳训练同伴在深夜佩戴无气泡的德雷格战斗潜水呼吸器，在水下潜泳了七个小时。出发前，我们仔细研究了海图、潮汐和海流，制定了详尽的潜水计划。我们在水下通过一系列的手势沟通，根据计划几次调整路线，最终到达目标，放置模拟水雷后撤回。

其后我们进行陆战和武器训练。在彭勒顿兵营，我们用步枪和赛格-索尔9毫米手枪打了几千发子弹，开始是对目标打单发，几周后就开始组成16人的小队进行突击行动演练，奔跑着，嘶喊着，一起向目标倾泻弹雨。

我们必须学会步枪和手枪的分解组合，还要学习使用冲锋枪、霰弹枪、AK-47突击步枪、轻型反装甲火箭筒、反坦克武器和克里莫定向雷。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套基本装备，学习如何佩戴子弹带和水壶才能在巡逻时不发出任何声响，如何将每一块金属、每一件装备涂黑，让它们不反射任何光

亮。我们还学习了爆破基础课程，学会了使用 C4 和 TNT 炸药以及如何在水下安放炸药。我们练习投掷手榴弹，教官们还用催泪弹攻击我们，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如果必要的话，自己在痛苦和视线不清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战斗。我们在黑夜前往靶场，练习用夜视仪和激光瞄准器进行夜间射击。我们学习处理武器的卡壳故障，练习索降、分队作战、山地按图行进、电台通信等科目。我们还在森林中训练了数周时间，掌握了基本的侦察技能。

不断有人被淘汰——一名学员按图行进不合格，另一名学员没能通过爆破科目。教官们继续组织四英里计时跑、两英里计时游泳和计时障碍跑。随着限定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些人无法通过，结果被淘汰。在 BUD/S 训练的最后阶段，我们前往圣克莱蒙特岛进行夜间海上游泳训练。用教官的话说，之所以去那儿，是因为“没有人能听到你们的尖叫”。教官特别喜欢对我们讲，圣克莱蒙特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白鲨繁衍地，在他们带着霰弹枪登上救生艇的时候还不忘提醒我们这一点，说这是为了“打退鲨鱼的进攻”，然后命令我们下水开始游。我们每个人都游得飞快。

体能测试无休无止。在岛上要吃到饭，我们必须背负全套装备全力冲上山头。超过限定时间的人只能得到被海水浸透而且沾满沙子的食品。

在圣克莱蒙特岛上，我们要综合运用学到的各种技能。我们的小分队必须研究教官提供的假定目标信息，拟定作战计划并向教官汇报。然后我们被空投到海中，对滩头进行侦察，上岸后进行山地巡逻，安放爆炸装置并设伏，用空包弹袭击假想敌，将他们拖下车辆，进行讯问并获取情报，随即撤入丛林。按照计划，我们要运动到岛的另一侧撤离，在撤离点附近我们遭到伏击，爆炸声四起，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而在六个月前，我们还是一群新手，刚刚把头剃掉，在清晨等待着开始第一次四英里计时跑。

通过 BUD/S 训练后，我们转入高级训练阶段，首先前往奔宁堡的伞兵学校接受跳伞训练。我开始觉得跳伞很简单——等舱门打开，绿灯亮起，跳出机舱就行了。但真正掌握这项技能却需要三个星期的时间，因为跳伞颇具欺骗性，我们不是轻轻地落下，而是像根木棍一样重重地砸在地上。我们学会了“跳伞落地动作”来保证平稳落地，先用脚跟着地，就势翻滚，让小腿着地，然后再让大腿和臀部着地，最后让背部着地。做得好的话，这个

翻滚动作可以减缓触地带来的冲击。第一次跳伞后，我晕头转向地爬起来，收拾散落在地上的降落伞。一个家伙对我喊道："格雷滕斯，跳得太棒了。你刚才是脚、屁股和头着地的！"

我们随后又来到生存、躲避、抗拒与脱逃学校，在那里挨了五天的饿，学习如何搭建隐蔽所取暖，如何在敌后躲避追捕。最后我们都被抓住了，一连几天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一个个小笼子里，只有被拷打和讯问时才会被放出来。

其后我们返回科罗纳多接受海豹突击队资格训练，进一步磨炼射击技能，最后在夜间用曳光弹朝距队友仅有几英尺的地方射击；强化爆破技能，学习布设诡雷，布置埋伏；在山区的密林中巡逻，进行更长距离的按图行进训练，其间还在开阔地上露宿。我们在夜间一次又一次地佩戴着无气泡水下呼吸器跳入海湾，进行难度更高的战斗潜水训练。我们背着背囊在海滩和山地长跑，学习伪装自己，搭建隐蔽处。我们前往沙漠，学习沙漠作战。我们背着40磅重的背囊和步枪进行13英里的远程奔袭训练，一路上设有多个考核点，我们要在考核点进行步枪和手枪射击，投掷手榴弹，发射火箭筒。在贴身格斗课程中，我们学习如何制服并控制俘虏。在战斗救护课程中，我们要将自己的同伴扛在肩上，跑步把他们送到几百码外的皮卡车上。我们随后也要上车，当车辆在坑坑洼洼的沙漠道路上颠簸疾驶时，还要在他们满是汗水和灰尘的手臂上找血管，练习静脉注射。

在海上作战训练中，我们每五人编成一组，驾驶小艇在引擎的轰鸣声中穿越波涛。一个晚上，我们发现海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于是将发动机挂上空挡，慢慢地靠近，结果发现了一大片瘪掉的气球。这些气球数以百计，五颜六色，看来是某次聚会或者婚礼上的人放的，结果飘到了海上。我们静坐了一会儿，对海上行了个礼，然后慢慢地驶离，好似我们刚刚将一个人海葬一般。

不能达到训练标准的人继续被淘汰，就在毕业前的三天，一名已经训练了一年半的学员被淘汰了，原因是他的步枪射击技能不熟练。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我开始训练的时间相对较晚，当时我已经26岁了。现在我28岁。其他人大多是19岁开始训练的，现在他们21岁，可以说是在海豹突击队训练中成长起来的。

毕业仪式非常简单。我们在一座没有明显特征的水泥码头(我们把它叫做小艇谷仓)上列队,这里除了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装饰。没有乐队,也没有彩带。我们穿的也不是礼服,而是作训服。随后我们依次走上前,让教官把金色的三叉戟徽章别在我们胸前。与此同时,领导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自1970年以来,三叉戟一直是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徽章。这也是美军中唯一一枚官兵同时佩戴的作战技能徽章,说明我们是一起训练、一起战斗的战友。三叉戟徽章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对我们来说都有重要含义。

"海锚代表着我们所属的军种——海军,它是在地球表面投射力量的主力,也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这是个古老的海锚,提醒我们海豹突击队源自海军战斗破坏小组和水下破坏小组的光荣传统。

"三叉戟是海王波塞冬的节杖,代表着海豹突击队与大海的密切联系。海洋是最严酷的作战环境,但我们必须成为海洋的主宰。

"手枪象征海豹突击队的地面作战能力——无论是直接攻击还是特种侦察。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手枪的击铁已经扳起,随时可以击发,这提醒你们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雄鹰是我们国家自由的象征,这里它代表着海豹突击队从空中迅速进入战场的能力,也提醒我们要以超越任何其他部队的更高标准展翅飞翔。在军用徽章上,鹰的头一般是高高昂起的,但在我们的徽章上,鹰的头是低下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牢记:谦虚才是衡量战士力量的真正标准。"

当所有人都佩戴上三叉戟标志后,我们集体转向大海,跑上突堤,跃入海湾。我们作为学员曾经上千次地跳入海中,但这次是我们成为海豹队员后的第一跳。

我们游过海湾,然后绕着科罗纳多岛跑了六英里,终点是一片沙滩,我们在那儿烧烤、聊天、互相祝福。就像所有的美好经历一样,在庆祝胜利的欢乐中也带着感伤,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患难与共的弟兄,而分离就在眼前。即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每个人的脸上都涂着伪装油彩,我也能凭借各人的持枪姿势分辨出每一个人。执行巡逻任务时,我只要看他们转头的动作就知道他们是否听到了什么动静。我认识他们的家人,凭借他们坐在地上压子弹的动作就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家庭问题而分了心。我们

彼此熟悉每一个人的眉毛、眼睛和笑容，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愤怒，什么时候担忧，什么时候充满胜利的喜悦。我们曾一起驾艇穿过怒涛，一起在群山中攀援，一起从空中跃下，一起欢笑。我们知道，沙滩上的这次聚会是我们全班最后一次相聚，其后我们都将奔赴天涯海角，有些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尽管我们通过了无比严酷的训练，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经历战火的考验。

第七章

前往阿富汗：这一次，不是演习

在飞往阿富汗的飞机上，我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的一端挂在飞机舱壁上，另一端挂在一个装满武器的货箱上。飞机里挤满了人和装着武器装备的箱子，有的人躺在吊床上看书，有的人躺在防震垫上睡觉，有的人坐在飞机座椅里，翘着脚，带着头盔通话器。飞机正飞入战区，而我正重读一本关于塔利班的书。

在飞往阿富汗的飞机上，我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的一端挂在飞机舱壁上，另一端挂在一个装满武器的货箱上。飞机里挤满了人和装着武器装备的箱子，有的人躺在吊床上看书，有的人躺在防震垫上睡觉，有的人坐在飞机座椅里，跷着脚，戴着头盔通话器。飞机正飞入战区，而我正重读一本关于塔利班的书。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基地组织”。在牛津大学研究生院时，我曾简要地读过阿富汗历史。我知道俄国人曾经侵略过这个国家，他们失败了。我知道阿富汗境内到处都是未引爆的炸弹和地雷，这些东西经常会爆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我知道阿富汗正处于邪恶的塔利班暴政统治下，而塔利班在西方以野蛮虐待妇女著称。在 2001 年时，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那时候有人再问下去，我想自己可能连有哪些国家和阿富汗接壤都说不清楚。

孩提时代，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让我心怀敬畏。他征服了一片从马其顿王国到埃及、并横跨现在印度整个北部地区的广袤土地。“9 · 11”事件之后，我开始自学关于阿富汗的知识，我了解到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历程中，最艰苦的几次战役都发生在兴都库什山区，也就是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损失了上千人马，他自己也两度负伤。在一次战斗中，一个阿富汗战士用箭射断了他的腓骨，另一次战斗中，一个阿富汗战士用石头把他砸成了脑震荡。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其他外国军队接踵而至。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在阿富汗的帕尔旺地区遭遇了他们在东亚以外地区唯一一次败绩。1839 年，英国人几乎兵不血刃地侵入阿富汗。但到了 1841 年，阿富汗人民

反抗英国占领军。大约1.65万名英军和他们的家人意图在那个死亡冬天撤往贾拉拉巴德，然而，在两周之内，90英里的路程成了英国人的不归路，除一人挣扎着逃进贾拉拉巴德之外，其他1万6千多名英国人全部死于寒冷和阿富汗部落战士的屠刀下。当年年底，英国从阿富汗撤走全部军队，直到30年后才敢卷土重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植了一个不受欢迎、摇摇欲坠的政府。苏联军队的出现不但没有击败那些反叛部落，反而促使阿富汗各派军事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了一项新的运动——圣战者运动。圣战者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袭击和伏击等手段，将苏联军队赶出阿富汗。

苏联军队凭借绝对优势兵力把圣战者赶进了山区。为了根除阿富汗抵抗力量，苏联军队开始了野蛮的空中打击，将阿富汗村庄变为无人区。苏联军队对山区实施地毯式轰炸，并动用了米-24直升飞机，这种可怕的直升飞机能够携带导弹，并装备有射速3900发/分的转管机枪。他们用燃烧弹把绿色的山谷烧成一片焦土，往阿富汗的农田里撒布了上百万颗地雷。为了吸引孩子，他们还空投了做成玩具样子的诡雷。

圣战者们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旧装备，在苏联军队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下感到绝望和无助。就在那时，美国开始向圣战者们提供“毒刺”式热寻的防空导弹，那些可怕的直升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开始一架架被击落。战争的天平就此倾斜。到1989年苏联撤军时，苏联军队损失了将近1万4千人和数以百计的坦克和飞机。

苏联撤军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1992年，一个部落联盟从苟延残喘的政府手中夺下了首都喀布尔。整个阿富汗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彼此争夺地盘，老百姓本已少得可怜的财产被抢夺，男孩和女孩们被绑架。毒品贸易被用来筹集军费，在部落、毒枭和地方军阀之间为争夺钱财、土地和毒品交易控制权的战争中，阿富汗人民饱受摧残。

塔利班在战乱中崛起。塔利班最初能够夺取权力，是因为他们声称是一支正义之师。塔利班意为“学生”，塔利班则指研究古兰经的宗教学生，他们誓言要根除腐败，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保护人民，使他们免受部落混战中的暴力、强奸和掠夺之苦。他们在整个阿富汗迅速发展壮大，数以千计的理想主义青年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塔利班的壮大带来

了稳定和秩序，到2001年年初，塔利班几乎清除了所有毒品生产。

但塔利班也带来了野蛮压迫。在塔利班统治下，一个孩子偷了面包就会被剁手，妇女的遭遇则最为悲惨。如果一个女人被指控通奸，那么她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裹上白布埋在地下，只露出头，然后活活被石头砸死。经常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涌进足球场，去观看因违反了伊斯兰教义的妇女在球门横梁上被吊死。塔利班禁止看电视、听音乐、拍照和放风筝。如果一个女人胆敢露出一寸皮肤，就会遭到无情的痛打。塔利班还为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庇护。

到2001年春，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90%的国土，其他所有反对它的部落结成了"北方联盟"，领导人是众望所归的、英明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马苏德被称为"潘杰希尔雄狮"，他把"北方联盟"各派牢牢团结在一起。2001年9月9日，马苏德遇刺身亡。袭击者是基地组织成员，他们伪装成阿尔及利亚新闻记者对马苏德进行采访，走近马苏德时引爆了藏在摄像机里的炸药。两天以后，飞机撞向了美国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

2001年9月14日，美国国会授权乔治·布什总统找到并处死任何参与"9·11"袭击事件的人："总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力量，打击策划、指使、实施'9·11'恐怖袭击或对其提供帮助的国家、组织和人员以及这些组织和人员的庇护者。"布什总统要求塔利班交出奥萨马·本·拉登，但遭到了塔利班的拒绝。

中情局的特工渗透进入阿富汗，他们手里拿着大把美元去贿赂"北方联盟"的部落首领，并承诺美国会对"北方联盟"的行动给予强有力的空中支援。美国特种部队于10月下旬抵达战区，与阿富汗友军协同作战。美军士兵可以从马背上直接召唤空中支援，"北方联盟"的部落战士们也开始迅速追歼零散的塔利班部队。在大量的美军特种部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帮助下，"北方联盟"击败了超过5万人的塔利班部队，并把塔利班赶下台，赶进山区。这是美国发动的最有效的战争之一，到我们拿下坎大哈，我们只牺牲了12个人，整个作战行动耗资7000万美元。尽管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高层人物仍然逍遥法外，但如果我们在2002年年初就停战的话，可以说我们以极高的效率取得了战争胜利。

我飞往阿富汗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的夏天，我开始对美国的这次军

事行动感到担心。阿富汗向来是一个容易入侵但不可能征服的国家，我们已经把塔利班赶下了台，已经使基地组织丧失了在阿富汗境内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还需要去追杀某些人，但那需要的是合理配置的资源、巴基斯坦盟友的合作和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不是占领阿富汗。

我们到了一个巨大的基地，那里已经驻扎了数万人的美军部队。就算是在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阿富汗也从没实现过中央集权统治。如果我们打算征服这个国家，并按照美国的标准建立民主的话，恐怕这一任务得持续几十年，并且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宣布获胜。

我这一队海豹突击队员的任务十分明确：搜寻并猎杀基地组织的高层目标。这需要当地人的合作、情报和盟友有效的工作网。这不需要我们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离开美国之前，我接到了一份介绍交战规则的简报，也就是我们在阿富汗使用武力的原则。其中规定在几乎所有行动中，只有当敌方采取敌对行为或表现出敌对意图之后，我们才可以使用致命性打击手段。不过阿富汗也有几个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敌对存在”。我在海豹训练中曾学习过确定敌对存在的意义：

确定一方为敌对存在：一旦美国相应部门确定某方为敌对存在，作战单位无需观察其是否采取敌对行为或表现出敌对意图即可对其进行攻击。[1]

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高层人士都被确定为敌对存在。解释交战规则有时很复杂，但对他们则很简单：如果你见到本·拉登或其同僚，杀了他！

我们准备检验一种假设：在一个混乱无度的国家里，投入训练有素的部队作战和做善事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到达巴格拉姆[2]后，我走进了一间简易情况介绍室，坐在箱子上听海豹突击队的一名二级军士长作简报。“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杀死本·拉登和他的帮凶们，如果本·拉登在这儿……”他指着简报板高处的一个位置说道，“那我们就在这儿。”他又指着下面一

[1]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命令，“美军军事行动标准原则”，2000年1月15日。

[2] 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帕尔旺省。

个位置，说道："我们能抓到他的一些副手，从而接近本·拉登。"他指着简报板中间的位置，说道："然后我们就能成功。"

我周围的人都在点头，这些人都是海豹突击队里的精英。他们穿的军服与普通军服大不一样，上面没有任何识别标志。大多数人留着大胡子，在海豹突击队中已经服役了10多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队员。相比之下，我只是个刚刚通过海豹突击队资格考核的菜鸟，就像是一个刚刚进入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人坐在了超级碗比赛[1]的更衣室里。当我还在进行野战训练，攻击那些假扮阿富汗人的美国人守卫的模拟建筑时，他们已经在真刀实枪地浴血疆场了。在这里，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德弗诺克斯上尉邀请我来阿富汗，他也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我是通过我的朋友阿伦·劳尔斯医生结识的德弗诺克斯上尉。劳尔斯和德弗诺克斯上尉告诉我，他们希望我到海外战区工作一段时间，用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我们在阿富汗的工作，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改善我们和潜在盟友之间的交流合作关系。海豹突击队用上万小时训练队员去杀死敌人，但要想赢得战争，我们也需要赢得朋友。在阿富汗，盟友是击败塔利班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盟友帮助我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搜捕个人。

击败基地组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力情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情报系统，但是与我们作战的敌人经常使用信使骑马翻山越岭传递情报，因此在与阿富汗人的接触中获得的情报是无法替代的。

我们怎样调整行动部署才能赢得朋友呢？一队全副武装的海豹突击队员第一眼看上去怎么都不会觉得友好。

在离开基地前，我们挤上了几辆丰田海拉克斯越野卡车，在模拟训练场里进行乘车训练。一个模拟来袭火力的爆炸装置炸响，我们跳下车，找掩护，朝着假想敌方向还击，山腰上瞬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榴弹爆炸声。

我回到营房，看到了告示板上钉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我们这支海豹分队的通讯兵，他已经战死在阿富汗。刚刚和我一同乘车训练的人都是美国近两年军事行动中的尖刀人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他们的经历也使之变得更加锋锐。

---

[1] 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冠军赛。

后来有一次，我们驾车行驶在岩石遍布的路面上，一辆车的车胎爆了。我跳下车，拿着扳手，蹲在地上开始换轮胎。我很高兴自己终于能有点用了。16岁的时候，爸爸教我给家里的福特车换轮胎。在我经历过这么多年牛津大学的学习和海豹突击队的训练后，居然是我爸爸教的东西让我在海外服役的过程中做了第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随同部队一起去了喀布尔，在那里工作了几天后，我出发前往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这个前进基地四周是高耸的泥墙，中间是一片土场，大概有一块棒球内场那么大，上面停着十几辆悍马车和海拉克斯越野卡车。在基地的指挥部里，破旧的桌子上摆满了电脑，显示器的光照亮了一群人的脸颊，他们时不时地会站起来，走到军用地图前移动一些大头针的位置，标明美军作战分队所在的战场位置。在营区最高的墙上高耸着卫星天线，旁边是一面迎风招展的芝加哥熊橄榄球队的大旗，表明这里的军队来自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

我们每天都会穿着防弹衣，开着军车，携带着武器，离开基地去试着和当地人交朋友，会见本地商人、村子里的长者、药剂师和线人。这是一支混编的队伍，其中有海豹突击队队员、联邦调查局人质解救小组成员、海军拆弹专家、空军航空控制员、空军伞降救援队员、陆军民事军官，还有其他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在这支队伍里发挥着自己的特长。联邦调查局特工受过讯问目击者或嫌疑人的专门训练，很擅长谈话和搜集证据。空军伞降救援队员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地医护兵。海豹突击队是最可怕的攻击力量，如果有可靠情报，海豹突击队可以独立筹划、指挥、完成复杂的战术行动，实施抓捕或消灭目标，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都无法望其项背。

我们努力表现得友好，但同时也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准备战斗。我第一次随队外出巡逻时，我们的车刚驶入车流，我朝左侧看去："男人，手持AK-47，副驾驶位置，白色丰田。"那个男人黑头发，留着乱蓬蓬的大胡子，用棕色的眼睛看着我，张着嘴，露出一口黄牙。我把枪管倚在敞开的车窗上，只要他举起手中的武器，我就可以开枪射击。我们转向右，他的车转向左走了。

我们开上了一条宽度不够两辆车会车的窄路，每次遇到对面有车辆驶来，我们就会把车开上路肩。除了偶尔向指挥部报告我们的位置外，我们

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我坐在越野卡车的后座上，屁股底下是一条厚厚的绿色防爆毯，这种毯子能在爆炸中给我们提供一点保护。

在我们前方，棕色的大山像哨兵一样耸立在远方，这风景有一种荒凉的美：太阳、岩石、洁净的空气、连绵的群山。我们遇到一队骆驼，驼峰上压着鼓鼓囊囊的袋子、水囊和毯子。一个人骑着驴走在驼队最前面。我们经过他时，他转过头斜视着太阳，我看到那砖红色的穆斯林头巾下是一张沟壑纵横、写满沧桑的脸。我们驶过一辆烧焦的大众汽车，转上一条土路，拐进一个村子。

村子里一座座泥砖房子紧紧挤靠在一起，周围是一片片田地，干涸的褐色土地上秧苗刚刚返青。在这里，我们像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生一样工作，我们的医务兵拉开装备药品袋，听翻译介绍村民们的病情："这个孩子的手划破了"或者"这个人的胳膊肘流血了"。医务兵给他们清理伤口，用崭新的绷带帮他们把伤口裹好。医务兵会帮他们处理这些小伤，而当翻译指着一个老人说"他说他的胸口疼，他的心脏不行了"时，医务兵就无能为力了，只能给他一瓶阿司匹林。

我和一个陆军民事军官在村长的陪同下绕着村子走了一圈。我猜这个村长大概有40多岁，很瘦，戴着黑色穆斯林头巾，走起路来精力充沛。他做着夸张的手势，飞快地说着话，我们的翻译都跟不上他的速度，他对我们说他需要一口井。民事军官问了他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村民们现在怎么才能弄到水？他们怎么灌溉庄稼？饮用水是不是干净？对这个村长来讲，我们就是金钱和服务的潜在来源。

村长也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有孩子吗？我们成为自由战士多久了？我告诉他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照顾孩子和普通民众，现在成了一名战士。他想通过翻译告诉我什么，可是翻译和另外两个阿富汗人听到他的话后都笑了起来。翻译告诉我："他说你和他一样，但是反了过来。以前，他是一个指挥官，指挥部队与塔利班作战。现在是个村长。他说，与塔利班作战要简单得多，用不着听那么多叫嚷和抱怨。"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村子，我和队里其他几个人一起站在一个医疗站外负责警戒。医疗站里正进行一次会面，我们要保证会面安全进行。孩子们笑嘻嘻地慢慢朝我们靠了过来。

"美国,好!"

"阿富汗,好!"我朝他们喊道,越来越多的孩子围了过来。我突然想起当我在克罗地亚走进难民营时,也是这样被孩子们簇拥着;在柬埔寨时,我走进一个村子,孩子们也是这样围拢过来。而现在我的感觉很不一样。我身穿防弹衣,手上戴着手套,端着步枪,子弹上膛。人群中也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我扫视着人群,寻找威胁,寻找武器,留意着其他海豹队员的位置。如果有人从北面那栋房子里朝我们射击该怎么办?如果有人从南面开来的卡车里朝我们开火该怎么办?如果……?仅仅在几年前,我会拿着照相机组织孩子们做游戏。而现在,我端着步枪,计划着万一遭袭时的应急行动方案。

在一片尘土飞扬中,我们驾车离开了这个村庄。我坐在卡车后座上,旁边放着我的"逃生包"。"逃生包"是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基本的必需品,有求生电台,还有额外的医疗用品和弹药,万一我们不得已要逃生的话,这些东西都很有用。我们驱车前往另一个村庄,去与一个小店主碰面。他以前是被我们搜捕的恐怖分子联络人,几个月前,他的小店被炸毁了。他英语说得还不错,告诉我们他的东西都被毁了。他很友好,但是对我们没什么帮助,说话的时候眼睛左顾右盼,我敢肯定他不大情愿和我们谈话,因为他很害怕和我们合作的后果。我们走出他的商店回到车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间都被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占用,他们需要和某个潜在的情报来源碰面或者要追踪某些线索。这些人想自由地、安全地在阿富汗行动,但他们缺少车辆、武器和安保。不过他们往往比我们更懂当地语言,更了解我们所处环境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比军队更多的财政资源。

军队如果想花钱,哪怕只是一点钱,都要写一大堆报告。相比之下,一些政府部门在花钱上更自由,他们可以花钱买情报、雇当地的承包商在村子里打井,可以干很多事来打开关系。

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买不到和平,但是有时候可以为和平创造条件。我吃惊地发现,与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提供住宿、食物、武器、水、交通工具和其他供给相比,花钱与潜在的阿富汗盟友拉关系要便宜得多。并不是所有投资都能得到回报,但如果我们给某人几百或几千美元,让他告诉我

们关于恐怖分子高层人士的可靠情报，我们就能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抓捕或清除该目标。这样干投资小，见效快。我们却经常投入数百万美元搭建一个复杂的信号情报搜集平台，然后再花上数十万美元维持其运转，结果却很少能得到有价值的行动性情报。如果我们每月给当地领导人几千美元，就能为部队买到安全通道、村民们的亲切感和基地组织的情报，这种方法简单而有效。而我们却从密苏里州派来一群小伙子组成巡逻队，每天两次穿梭于各村庄之间，以体现我们的“存在”，希望阿富汗人民能对我们这群美国大兵着迷。

我爱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我爱美国人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良好愿望和精神。但很多时候许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位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人——从没和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过，他们会被自己那闪闪发光的美好愿望蒙住双眼。如果你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城镇里巡逻，让一个当地人选择，是愿意听你大谈一通自由还是愿意收下 50 美元，大多数人都会收下现金，然后对你说声非常感谢。

我在克罗地亚、卢旺达、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和加沙的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最简单的一条教训就是，当地人都很聪明，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如果我们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有能力直接帮助他们。

在烈日下，我坐在村子里，和一群憔悴、浑身伤疤、满脸胡须的人聊天，他们看上去都有 50 多岁。他们经常微笑着告诉我们，他们才刚 30 岁出头。在阿富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43 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 257‰，相比之下，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只有 6‰。在读研究生时，我非常关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它按照人类发展的三项基本指标（健康长寿、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对国家进行排名。尽管在阿富汗，因为大量难民跨越边境逃亡，战争持续不断，很难获得全部统计数据，但总体而言，阿富汗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所有 178 个国家中排名第 174，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蛮荒、最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之一。

天很长，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我们的巡逻经常无功而返，只是不停地驾车从一个村庄开向另一个村庄，在闷热的车里吃着自热野战食品。然而，就算要到这漫长的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每一次无线电通讯仍然干脆利落，每一个潜在威胁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天傍晚，太阳渐渐落

下，我突然听到电台里传来了呼叫："拦住他，白色丰田，副驾驶位置的乘客，我们要抓的人！"

"看到他了！"

我跳下车，走进街道，用枪口指着朝我驶过来的那辆车的司机的胸口。那辆白色的小型汽车朝我冲过来，里面有两个阿富汗人。我向后退了两步，如果那辆车继续朝我加速冲来，我可以退到我们的车后向他开火。但司机踩下了刹车，车慢慢停了下来，车内乘客举起了双手，司机也高高举起双手。我用枪指着他们，另一个队友打开车门，把他们从车里拖了出来。我们搜查了他们的车，发现了一个蓝皮笔记本。这有情报价值吗？当我们盘问司机时，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阿富汗人都想走近看看出了什么事。他们站在那里，双臂抱在胸前，眯着眼睛看着我们。也有人会一边指着我们，一边大声叫其他人过来。

"两辆车停在路上，100 米，南面，有人。"

"我看到屋顶上有 3 个人，200 米，东面，一个手里拿着棍子，也可能是 AK 步枪。"

越来越多的人停车下来观看，小孩子和年轻的男人们一步步朝我们靠近。

"西边有一辆卡车，停在路边，50 米距离，车上有 5 个人，都是年轻人，都有大胡子，都有黑头巾。"

我们放了司机，把那个乘客押上我们的车。我们所有人都跳上车，几秒钟之后，我们的车已经加速离开。

我坐在审讯室里，看克里斯向我们押回来的人问话。克里斯是一个专业审讯员，和我们这个组一起工作。"和平与你同在！"克里斯把手放到心口说道，又伸出手和我们的犯人握了握手。他剥开一块巧克力给那人，并问他还要不要，他说不要了，谢谢。

"那么，跟我说说你自己吧，"克里斯说，"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说他是个农民。

"你的农场在哪儿？"

那人回答了。

"你都种什么庄稼？"

那人也回答了。

“当我的朋友拦住你时，你正准备去哪儿？”

那个人解释说，他正准备回家，他一个亲戚的朋友开的车。他去卖了点东西，那时候正准备回家。

克里斯舒舒服服地坐着，时不时地问那人要不要喝点什么，是不是真的不饿。他们谈话时，克里斯常常会重复一些问题，偶尔也会问些新问题：“你经常走这条路吗？去年你种的什么庄稼？”

克里斯和那人谈了几个小时，最后谈话结束时，克里斯认为我们抓错了人。我们抓回来的犯人应该真是一个农民。他在做自己的事，却在那漫长的一天快结束时，被我们当成恐怖分子塞进车里带了回来。克里斯向那个人解释说，我们非常遗憾给他带来了不便，他看上去和一个著名的恐怖分子很像，那个恐怖分子在当地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我们在尽全力保护当地人民。克里斯说，美国人民非常尊敬阿富汗人民，我们非常希望和他们合作。我们第二天早上会给他些钱，让他回家，也是为我们给他带来的麻烦做些补偿。

我后来也看过一些年轻的陆军审讯员，他们试图用恐吓的办法逼迫被拘押人开口，但是我从没见过这些审讯员得到一条有用的信息。克里斯非常专业，他知道哪种方法会起作用。世界上最好的审讯员不靠威胁和恫吓，而是靠和他们的犯人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假以时间，他们就会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在生存、躲避、抗拒与脱逃学校中学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最有效的审讯员，就是那些用自己的智慧与被审问人建立友善关系以获取情报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张非常有名的照片，照片是海军陆战队传奇审讯员谢伍德·莫兰少校审问日本战俘时的场景。与那张用几头猛犬恐吓犯人的照片[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兰坐在一张帆布折叠椅上，对面坐着一个日本战俘。他很专心地倾听，身体微微向前倾，眼睛专注地看着对方。这种高效的、有礼貌的、聪明的、非强迫性的审讯方法，现在也已经行之有效地运用于对基地分子的审讯中。

---

[1]　指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中曝光的照片。

杰克·克鲁南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1996—2002年在奥萨马·本·拉登特别工作组工作，他曾讲过让一名恐怖分子开口的审讯过程。

我们抓到一个名叫阿里·阿卜杜拉·赛义德·穆罕默德的人，他是基地组织成员，是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幕后策划人。阿里·穆罕默德坚信，我们一旦抓到他就会对他严刑拷打。然而我们向他保证，我们不但不会伤害他，还会给他的家人提供保护。没用几周时间，我们就像是找到了金矿，获得了大量关于基地组织行动的信息。

阿里·穆罕默德并不是特例。我们向每一个被羁押的人都保证不会伤害他或他的家人。这使他们无不目瞪口呆，从而也使他们感觉到有义务和我们合作。而且，情报会带来更多的情报，被羁押的那些人都很惊讶地发现我们原来已经对他们的组织、家庭和个人了解了那么多情况。有些人在讲出秘密时明显感到轻松。当他们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后，转变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身体会开始放松，很多人会哭，更多的人会开始祈祷。这些人经历着巨大的情感和精神波动，从坚信要和我们这些人作战并杀死我们，到决定应该和我们这些敌人合作。

和我一起工作的专家们都明白，我们带回来讯问的人回到家后会向全村的人讲述他和美国人在一起时的经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他村子里第一个和美国人有过接触的人，而他居住的村子很可能看不到报纸和杂志，看不到电视新闻报道，他的故事就会成为美国人在阿富汗的故事。你怎么样了？美国人怎么对待你的？他们和俄国人一样吗？英国人呢？

我们的判断是：这人是个农民，办完自己的事后搭朋友的车回家，这时我走上大街，用枪指着他，我的队友把他从车里拽了出来。如果我们真想要抓住基地组织的目标，我们就需要情报，需要从他、他的朋友和他的亲戚这样的人身上才可以获得的情报。在每一次和当地人的接触中，我们既可以树立敌人，也可以结交朋友。

善待阿富汗人不仅对我们赢得这场情报战至关重要，对我们本身也是

至关重要的。塔利班通常都受过良好的训练，甚至比在阿富汗作战的一些美军部队都更加训练有素。那么，我们与塔利班的区别何在？战士与暴徒的区别何在？区别不在于我们手中的武器更精良，也不在于我们受训的时间更长。我们之所以卓尔不群，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虐待一个犯人很容易，但是任何不道德的野蛮行径不但无益于打败塔利班，也会使一个战士堕落成暴徒。一个殴打犯人的人，一个射杀无辜民众的人，他或许能逃脱审判，但他永远逃不脱自责。当我和这些专业人士一起在阿富汗工作时，我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在战场上光荣地战斗。

我们每天都会去与盟友会面，去搜寻敌人。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充满紧张气氛。这里会不会有人朝我们开枪？这家伙说的是实话吗？我们是不是开进了埋伏圈？

有一天，我们登车前往一小时车程外的一片住宅区，这里是一个当地领导人的家，他曾经给我们提供过基地组织的情报。当我们走进他家院子时，一群戴着无檐帽的孩子迅速跑开，我们的联络人大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和我们队里来自另一个政府部门的队员说了几句，然后带我们走出院子。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沿着绿树成荫的土路走了50码远，我们一个队友指了一下山坡上的鸦片种植地，我们迅速分散警戒，我单腿跪在距离一辆停在树下的小型车20码的地方。我们的联络人和我们一个队友走向那辆车，我看到我那队友弯下腰，拉下太阳眼镜，透过满是尘土的车窗朝车里看了一眼，接着，他一边带着我们那个阿富汗联络人迅速走开，一边呼唤拆弹专家。当拆弹专家走近那辆汽车时，我撤了下来。汽车里装满了爆炸物，未引爆的旧炮弹码放在座椅上。我们不知道这辆车停在院子外面是有人想把它当炸弹用，还是它坏在这里开不走了。村里曾有些人想把它推走。

“好，告诉所有人，谁也不要再碰它！”

这个人希望我们能帮他们把这些炸弹安全引爆。我们这个小队可以拆除少量的爆炸物，但我们只有一个拆弹专家。他判断这些爆炸物都很不稳定，炸弹的位置也太接近村庄，无法在现场实施安全引爆。我们呼叫指挥部派拆弹队过来拆除这些炸弹。我们跳上车离开时，联络人已经告诉我们，附近有一伙年轻的塔利班士兵，周围可能有一个他们的据点。

当我们驱车前往那个可疑的塔利班据点时，我们呼叫指挥部，请求派

无人机过来看一下那个营地是不是有人的活动迹象。当我们沿着小路快速前进时，我们的队长在一台加固笔记本上测算出我们与目标地域的位置关系。那个地方看起来空无一人，但这是在白天。我们要不要准备实施一次夜间侦察或伏击呢？

无人机到位后，我们驱车去见另一个可能的盟友。警察局坐落的院子相对不错，有几栋漆成白色的建筑。警察局局长一边抽烟一边和我们说话。上次我们谈过话后他又知道了些什么？他有我们追踪的目标的信息吗？他听说过他的辖区里有这么一个可疑的塔利班营地吗？局长穿着皱巴巴的警服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对我们大谈他要训练、喂饱和装备他的人是多么困难，政府里有人承诺说给他更多的钱，但是钱还没到位。他问我们是不是能帮帮他。

这个警察局长想要钱，而且他很可能有我们想要的情报。乍看上去，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要不要给他钱？

和阿富汗人的每一次接触，乍看上去总是很简单，实际上却复杂得多。而我们的成功就取决于成千上万次现在这样的接触。

这个警察局长也好，我们接触过的其他阿富汗人也罢，他们都有不同的效忠对象——政府、塔利班、民族、部落、自己的经济收入、家族荣誉、职业生涯。他们有自己的忠诚，也有不同的癖好。为了能在这里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得有朋友和盟友，但要想建立朋友和盟友关系，我们就必须克服语言、地理、文化和习俗上的重重障碍。

我认识的大多数专家都在努力加深自己对阿富汗历史的了解，我自己也是如此。但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塔利班的历史时，我们发现还得要注意阿富汗各民族间的差异，比如说塔吉克族和普什图族人的差异。当我们以为自己开始了解这些民族差异后，我们发现还需要了解部落的问题。

当然，一旦我们开始了解部落，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还要努力去了解我们所接触的社区和个人面临的具体问题。我们的分队中有各种各样的难以置信的人才，但无论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普什图语或达里语，还是基地组织战士惯用的阿拉伯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 20 个单词来。

每一次接触都意义重大，我们学习得很快。然而美军部队通常都只驻扎 3 到 7 个月，最多 12 个月。部队的频繁轮换丢掉了大量宝贵的知识和

经验。

阿富汗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大小，人口大约有3000万，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农村。阿富汗25个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仅占总人口的20%。与之相反，美国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

此外，阿富汗的人口广泛分布在世界上最险峻、最偏远的乡村里。我们需要盟友，但很难找到他们，也很难为他们提供给养。就算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村庄，我们也会发现有70%的人是文盲，经济状况比索马里还糟糕，而索马里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更困难的是，这场战斗也使巴基斯坦卷了进来。基地组织的大量武装就在阿富汗边境的另一侧等待、训练、组织、装备和重新武装。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阿富汗的任务复杂而艰巨。但这场战斗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不清楚自己的长期任务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打败基地组织？是要打败塔利班？还是要在阿富汗建立机能完善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经济社会？

我觉得，早在200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忘记2001年的阿富汗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打败了塔利班，把基地组织赶进了巴基斯坦。没错，美国的经济实力、空中力量和美国大兵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战斗中的地面部队是阿富汗人。我们的盟友——“北方联盟”是在地面上击败塔利班的主要力量。使我担忧的是，在一年半以后，美国仍没有制定一个足够清晰的计划来拉拢和支持我们的盟友。我们也似乎混淆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区别。

基地组织是一股外部势力，由来自阿拉伯的本·拉登和来自埃及的艾曼·扎瓦赫里这样的人组成。在参与“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塔利班是阿富汗国内的一股势力。我认为需要区别对待这两股势力。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他们是一种威胁，必须予以铲除。塔利班中也有一部分人需要被铲除，但是塔利班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组织，有各种不同的利益和长期内斗的历史。在我看来，在派出数万部队进入这个多山的国家发动战争前，我们最好能确定究竟需要以武力对待哪些人。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是有联系的，但并不一样。为了使我们能更有效地

作战，我们必须要只杀该杀的人，只抓该抓的人，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人。

有些人主张，为了打败基地组织，保卫美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击败塔利班，为了击败塔利班，我们要在阿富汗建立民主。我觉得这就像是在说，为了除掉你房子里的老鼠，就得把家里的墙都换掉，然后你还得在后院建一个奥运会游泳馆那么大的游泳池。把阿富汗变成一个高度民主、繁荣昌盛的国家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而打败基地组织是一项更紧迫、更实际的任务，这也是一项我们能完成的明确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要求我们集中在阿富汗的所有力量。

如果我们打败基地组织的战略需要我们建立民主社会和繁荣的经济，那么我们就不仅仅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样做，还要在索马里、也门等十多个其他区域和国家这样做。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驻地，无人机仍然在那个可疑的塔利班营地上空巡视。电话铃响起，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我们在喀布尔的指挥官。他说："我和布鲁斯谈过了。海豹突击队第 1 大队和特别舟艇部队 12 分队想让你回来，在下一次野战训练演习前指挥 Mk-5 特遣队。"换句话说，他们要把我送回国了。

我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是，长官！我马上就走。"

我在阿富汗只呆了几星期，刚刚开始觉得防弹衣穿在身上很舒服。来阿富汗之前，我指挥过 Mk-5 特遣队，这支特遣队准备部署在东南亚。部署计划本该在几个月后实施，我以为在这段时间里能一直呆在阿富汗。运气不好啊！

我从巴格拉姆基地登机离开阿富汗，那里到处飘扬着盟军的旗帜，法国、荷兰、波兰、德国……我走过那座每天要为上万人准备伙食的巨大餐厅，走过巨大的掩体，走过超大型的运输车，耐着性子听完关于扫毒计划、立法方案和民事规划的简报。我想起了那个村长说的话："与塔利班作战容易得多。"

回到圣地亚哥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噩耗。在我离开后，曾经和我编在同一支巡逻队的一名海豹队员牺牲了。

这一次，不是演习！

第八章

秘密突击

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假装这不是你们的错，假装你们是受害者，假装你们被误解了，假装你们没有做那个你们做了的决定。如果这样，这种想法会一直纠缠、困扰着你们。第二个，也是更好的选择是，你们要勇于诚实地面对所发生的事，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你们能诚实面对一切，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变得成熟。也是你们获得力量的源泉。

当我们准备离开新加坡北端的森巴望码头时，我看了一眼雷达显示屏，绿色的小点指示出航道上有三艘大油轮，除此以外，整个夜晚一片寂静。

“把灯关了吧。”我说。

艇长通过无线电下达指令：“熄灯！”我们这两艘艇黑了下来，航行灯全部关闭，只剩下昏暗的舱内灯。我们就像两团漆黑的暗影，在漆黑的夜里游弋，漆黑的水面上只有白色的航迹显示了我们的踪迹。

到达第二个检查点时，领航员对我说：“长官，这是B检查点。”

“收到。”

通讯兵开始呼叫指挥部：“东大门，东大门，这是克里斯托，我正经过B点。收到吗？完毕。”

“克里斯托，这是东大门，B点，确认，完毕。”

我们的检查点通常分类命名，并按字母顺序排序。比如说，我们使用城市名称：奥尔巴尼（ALBANY）代表A，布法罗（BUFFALO）代表B，科罗拉多（COLORADO）代表C，丹佛（DENVER）代表D……或用汽车品牌：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代表A，黄蜂（BEEMER）代表B，凯迪拉克（CADILLAC）代表C，道奇（DODGE）代表D……但是，最常用的还是姑娘的名字：亚利克西斯（ALEXIS）代表A，贝蒂（BETTY）代表B，卡桑德拉（CASSANDRA）代表C，丹妮尔（DANIELLE）代表D，在行动中，有人经常顺口把自己女朋友或妻子的名字叫出来。

驶过B检查点，宽阔的海面对我们充满了诱惑。

艇长问：“加速吗？”

“加速。”

艇长一推操纵杆，发动机咆哮起来，我们瞬间以50节的速度飞驰在海面上。月亮躲在云层后面，时不时洒下的月光照亮了海面。我转头向左，看到了我们另一艘艇那黑色的轮廓，它和我们保持着30米的距离，在浪尖上飞驰。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防水卡片，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呼号、无线电频率和所有检查点的位置。我打开手电筒，查看了一下我们距下一个检查点的距离后，又把卡片收了起来。艇内一片漆黑，但是我的部下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我在咧着嘴大笑。

“长官，你觉得很有意思吗？”

“装填弹药。”

我是Mk-5特遣队的指挥官，下辖两艘艇、21个人，负责指挥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离开新加坡，准备前往菲律宾的三宝颜市，这段航程超过了1400海里。如果我们能顺利抵达，将是海军特种作战史上最长的一次航行。

Mk-5是特种作战艇，1995年问世，专为海军海豹突击队执行秘密渗入和撤出行动量身定做。艇长82英尺，宽17.5英尺，足够容下全体艇员和16名海豹队员。尽管艇很大，但它异常灵活，能够高速完成急转弯。艇上装有减震座椅，我们在以50节航速在海面上飞驰时，这种座椅可以大幅减轻我们所受到的震荡。

每艘艇有4个机枪架，我们通常在每个枪架上配备双联12.7mm口径机枪，在这两艘艇上，总共有16挺12.7mm口径机枪，火力惊人。此外，我们还经常混装12.7mm口径机枪和MK-19自动榴弹发射器。这种榴弹发射器可以发射40mm榴弹，有效射程2400码，一个熟练的射手每分钟能精确发射40—50枚榴弹。除了这些武器之外，我们还携带了国内最先进的电子情报侦察设备。

Mk-5采用喷水推进系统，它的棱角外形使它很难被雷达侦测到。艇身后部朝外倾斜，后甲板上带有一艘15.5英尺长的“佐迪亚克”战斗攻击艇，在海军特种作战中，特战队员们可以坐在这艘小艇内，悄无声息地滑入水中。

在广阔的海面上，我们像两条并驾齐驱的小鱼，不过我们被打造得更快、更聪明，必要时还会露出锋利的牙齿。

这种作战艇是无可比拟的，但只有在正确的人手中，它们才能焕发生命活力，而这些人就是我指挥的这群特种作战舟艇大队队员。海豹突击队和特种作战舟艇大队是海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辖的两支部队，特种作战舟艇大队不像海豹突击队那样声名远扬，通常扮演无名英雄的角色，但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美国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种作战力量。

特种作战舟艇大队在科罗纳多进行训练，与海豹突击队进行水下基础爆破训练使用同一个基地。尽管科目有所不同，特种作战舟艇大队的训练也很紧张，并且和海豹突击队一样，淘汰率非常高。在艇员资格训练阶段，受训人要参加一系列严酷的体能强化训练，学习无线电通讯、操艇、航海、机械工程和维修。他们还要学习手枪、步枪射击，学会使用特别作战舟艇上的重武器。在高级训练阶段，他们有的要学习如何在蜿蜒曲折的内陆河浅水中航行，有的要学习如何从飞机上与10吨重的硬壳充气艇一起伞降到远海海面上，还要学习如何在高速航行、剧烈颠簸的船上用12.7mm口径机枪进行精确射击。

我是这支特遣队的指挥官，负责此项任务，特种作战舟艇大队队员负责操控两艘作战艇。每艘艇有一个艇长，负责管理他的艇员。领航员、轮机长、通讯兵和后甲板军士长是全体艇员的核心，当然我们的队伍里还有情报专家和医务兵。

进入远海航行后，等待我们的将是漫长的一夜。轮机长疯子老T对我说："嘿，上尉，我准备给你弄块鱼肉饼干尝尝。"疯子老T名叫道格·特拉弗，以前是一名警官，非常幽默，参加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是为了再一次挑战自己。

"全是你的，老T。"

特拉弗指的是老水手们此前为庆祝我们跨越赤道而准备的"美食"。美国海军最悠久的一项传统就是"越线"典礼，那是专门为第一次跨越赤道的水兵准备的，庆祝他们从"菜鸟"变成受人尊敬的"老水手"。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型海军舰艇会做横跨半个地球的航行，但是当我们来到新加坡时，我们已经位于赤道以北82海里的地方。在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历史上还没有小型海军特种作战艇独立跨越赤道的先例。作为一

支特种作战分队，我们决定创造历史。我还是一个菜鸟。因此我们的军士长史蒂夫·麦肯泰尔和队里的其他老水手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具有作战风格的典礼。出发前我们还在新加坡的岸上时，典礼的前奏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这些菜鸟被分成几对儿，我和疯子老T一组。我们站在营房附近的绿草地上，那里铺了一条闪亮的黄色滑道。在老水手们的鼓动下，我们奋力攀上滑道，俯冲下滑。当我们头朝下滑到地上时才发现，塑料滑道上洒的不是水，而是鱼油。

我们爬上、滑下了很多次，衬衫和短裤上沾满了臭烘烘的鱼油，连头发也没能幸免。老水手们随后往我们油乎乎的手里塞了两个鸡蛋。

“好，菜鸟们，你们今天全天都得保护好这两个鸡蛋。我们在基地周围设了几个关卡，你们得从一个关卡跑到下一个关卡，在每一个关卡上，你们都得完成一个任务。完成任务时间越短，你们得分就越高。如果鸡蛋碎了，分数就没了，你们还会被最强壮的老水手惩罚。不过，赢的人有奖。”

疯子老T和我一起绕着基地飞跑，浑身散发着鱼油的恶臭。我们用滑腻腻的手指发报，分解组合武器，在沙滩上作俯卧撑和蛙跳，在烂泥里走螃蟹步。

我们气喘吁吁地冲进最后一个关卡，满身是鱼油、沙子、烂泥和汗水，我们手里的鸡蛋都完好如初，但是当我们把鸡蛋递给老水手时，他们对我们说：“放下，放下，我们可不想碰你们。”

很快，臭烘烘的菜鸟们在营房外面集合了，麦肯泰尔军士长说道：“好了，菜鸟们，现在你们有机会来品尝来自七海的美味，吃得越多，就能挣回越多你们在障碍场上损失的时间。”

老水手们端出了一个大盘子，上面堆满了裹着酸奶酪、鱼肉、乌贼肉和蛋黄酱混合物的小饼干。我用沾满鱼油和沙子的手指，掐起一块饼干凑到鼻子底下，我只闻了一下就打消了想挣回些时间的一切念头。

疯子老T却动力十足，每一块小饼干都能抵几分钟，老T算了一下，如果他能吃下6块饼干，我们就能赢了。

“老T……”

“没问题，上尉，我能吃。”

老T捏着鼻子，很快吞下了一块饼干，接着第二块，然后又狼吞虎咽地

吃下第三块，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吞下第四块。按照规则，必须要把饼干咽下去，不能吐出来。就在老T吃第四块饼干的时候，他的胃开始一阵痉挛。

所有人都在朝他叫着："撑住，老T，别吐出来！"

老T努力闭着嘴，但他还是吐了。他弯下腰，撑开双腿。特遣队的所有20个人，不管是菜鸟还是老水手，都朝他叫着："别吐，别吐，你能行，老T。"

老T把双手捧在面前，把吃进去的东西全吐到了手里。"你没事吧，老T？"全队人都等着看他下一个举动。老T不顾嘴边还挂着呕吐物，对大家说："伙计们，我还能把它们咽进去，我能把它们再咽进去。"

全队人都疯了，高喊到："咽吧，老T，咽吧！"

老T站在那里看着手里那堆东西，我走过去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行了，老T，你够厉害了。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老T扬手把呕吐物扔了出去。

第二天，我们驾船朝赤道方向行驶了大概80海里，我们的姐妹船迎风升起了一面绘有白色骷髅和交叉腿骨的黑色海盗大旗。我们向南疾驶，接近赤道时，老水手们在Mk-5战斗艇上架起了扬声器，用巨大的音量放着重金属摇滚、乡村民谣、说唱等代表我们全队人不同品位的各种音乐。

按惯例，水兵们都是乘船跨越赤道，但是老水手们认为这次要有特种部队的风格——我们得游过去。在距赤道大概半海里的地方，我们这群菜鸟跳下一望无垠的大海。四周除了我们的船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开始游泳，但大家很快发现，洋流是朝北涌动的。半小时过去了，我们离赤道反而更远了。但老水手们根本没打算让我们上船，他们扔下来一条粗绳子，对我们说："抓紧，我们把你们拖过去。"

发动机开始加速运转，我们紧紧地抓着绳子。作战艇的速度越来越快，大海用力撕扯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从绳子上拽下去。我们全都咬牙坚持着，直到被拖过赤道。

一过赤道，我们就向作战艇游去。我们被水淋淋地从大海里拖出来，拽上船，成为新的老水手，并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把海盗旗换成美国国旗，接着在后甲板上举行了颁奖典礼。此前，我推荐了几个表现突出的队员获得嘉奖。现在，就在开阔的大海上，一枚枚奖章别在了他们的制服上，

一份份嘉奖命令被高声宣读。我们请那天和我们同行的牧师说几句话。

在浩瀚无垠的蓝色海面上，我们低头倾听牧师的讲话："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用最好的方式践行了美国海军的光荣传统。以这种方式跨越赤道，说明有些时候要做到一件事，必须首先充满信心。"

我以前从没想过赤道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海上并没有那么一条神奇的线，放眼望去，只能看到一片广阔的大海。

当我们重新开始漫长的航行时，疯子老T对我说："你知道吗，上尉，那些饼干其实还不错。"

我们当天晚上连续航行了许多个小时，但婆罗洲太遥远了，我们必须在海上加油，根据安排，我们要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一艘民用油轮汇合。这一部分行动不但不要求保密，还要进行大力宣传，因为我们想表明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深化。史蒂夫·麦肯泰尔军士长与那艘民用油轮的船长见面时发现，那艘船上的船员因为要与一支美军特种部队一起工作而兴奋异常。因为船长和他的船员们都相信，自己已经应征参加了反恐作战。

史蒂夫故意不作澄清，他告诉那些船员晚上接头时要用暗语联络。当我们两船相距6海里时，史蒂夫会在预先设定的频段说："有牛奶吗？"油轮的船长要回答："不，只有饼干。"之后，我们就会把船开过去。

到了史蒂夫进行联络的时间了，他对着无线电送话器说："有牛奶吗？"简短的停顿后，我们听到了船长的声音，他用带有南亚口音的英语说道："噢，不，没有牛奶，没有，没有，只有饼干，这里没有牛奶，没有牛奶，只有饼干，只有饼干。"船长激动得有些慌乱。史蒂夫接着问："是什么饼干？"这不是史蒂夫给他的预定的台词，那个船长说："噢，老天，我忘了，我们有饼干，有饼干。"

史蒂夫说："你有奥利奥[1]吗？"

"哦，有的，有的，我们有奥利奥，都给你们。"

"噢，很好，"史蒂夫说，"我喜欢奥利奥。"

"我也喜欢。"船长说。

---

[1] 一种奶油夹心饼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很畅销。

接着，秘密加油行动开始了。

加完油后，我们向婆罗洲前进。我们在黑夜里穿行，人们在工作，海浪在脚下翻滚，我突然深深体会到一种幸福感。

我有21个出色的部下，驾驶着两艘特种作战艇，在夜间横跨大海，朝着以前从没有特种作战船只去过的港口前进。我们在进行创造历史的航行，这是前人从没尝试过的。我最近的上级也在3000海里以外。

我和领航员检查我们的实际位置，并和计划航线作了对比，航向精确，时间精确。但当我们在海面上飞驰时，我不仅仅考虑我们的速度、位置、通讯和计划，更在考虑我的队员，尤其是这帮家伙的精神状态。

我们面前是一次伟大的航程，不过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最艰难的考验，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当时我们正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与泰国同行一起参加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泰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白色的沙滩和绿树叠翠的群山。在泰国，我去过很多供奉着佛祖的粗陋的石头寺庙，也拜访过很多泰国皇家修建的气势恢宏的寺庙，那里面供奉着巨大黄金塑像。在曼谷一个搏击场里，我观看了泰拳比赛。在休息日，我鼓励我的人尽可能多地去领略这个国家。

一个星期六，凯伊·拉尔森和我准备去骑大象游览泰国的热带雨林。凯伊和我一起通过了基础水下爆破训练、跳伞学校训练、生存、躲避、抗拒与脱逃学校训练和海豹突击队资格训练。我是上尉，他是中尉，也是海豹队员，担任硬壳充气艇特遣队指挥官，手下有8个人和两艘11米长的充气艇，主要负责执行各种接舷登船任务。凯伊和我一同游泳、跳伞、潜水，执行夜间行动，三年多流血流汗的共同经历使我们成为至交好友。我们登上了一辆旅游车，车开了几英里后，凯伊转过头来对我说："兄弟，我有点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凯伊告诉我，他的两个部下早上把他叫醒，要跟他谈谈。他说："他们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们去了城里，在那里看到了凯文。"

"凯文，那个海豹上尉？"

"对，斯图亚特·凯文。他的眼睛鼓得很厉害，所以他们问他：'哥们儿，你的眼睛怎么这么胀？'凯文发疯似的对他们嚷道：'你们以为自己是

谁啊？宪兵吗？’让他们滚蛋。后来，他们在厕所又见到了他，凯文和他排里的两个人一起进来的，凯文拿着个小袋子，和他的人一起走进了一个隔间，凯文命令他排里的一个新人给他在门外把风。”

“袋子里是什么？”

“他们不确定，但认为可能是迷幻剂，或某种毒品，或者是叫K粉的东西。”

“你怎么跟你的人说的？”

“我告诉他们我会和你谈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

凯伊的人了解我，也信任我。在旅游车上，我用手机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一清二楚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和凯伊告诉我的完全一样。

凯伊问我：“你怎么想？”

我说：“我们要给每个人做尿检，给全中队做尿检。所有的海豹排，所有的舟艇特遣队都得做，谁的毒品检测反应呈阳性，我们就把谁开除。这几个人在俱乐部里看到的事会变成一大堆指控。”

凯伊给他的人打电话说：“伙计们，我们准备给全中队的人做尿检，我和格雷滕斯马上回来，我们还要再仔细谈谈，这件事你们做得对。”

我和凯伊正在商量的时候，他的电话又响了起来。他听电话的时候，我能看得出他脸上露出了担忧的表情。他挂上电话对我说：“我不想告诉你，兄弟，但是我的兄弟说，‘我们只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在全中队范围做尿检的话，Mk-5特遣队里的人可能有麻烦’。”

这不光是在海军特种作战部队里出了毒品问题，而且是在我指挥的特遣队里出了问题。我告诉凯伊：“跟他们说，我会做一个全中队范围的尿检，还要告诉他们，我准备在我的特遣队里进行一次深入调查。”

几分钟后，凯伊的人再次打来电话，他们告诉凯伊，他的一个部下“觉得有些人可能偷偷在他饮料里放了什么东西”。

“好的，”凯伊说，“等我回去后再说。”

事情越来越丑陋了。现在，凯伊知道他的特遣队里也出现了毒品问题。

凯伊和我问旅游车司机能不能把我们送回酒店，但是司机说他还要去其他地方。我们想让我们的人开车出来把我们接回去，可我们马上想到那就得向全体人员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放弃出游计划，我们得预先制定一

个比较完善的计划。我们还是爬上了大象背。

大象在丛林里穿行，我们在大象背上不停地躲闪着横伸出来的树枝，同时，我和凯伊都在打电话，给曼谷，给葩提亚，给圣地亚哥。大象会时不时地把鼻子卷上来，我们会喂给它一个香蕉，但我们的电话一直没停。

我一直觉得象背上的这场危机是我从军经历中最超现实主义的一幕。我不禁想起了迦太基名将汉尼拔[1]，他就是坐在一头战象的背上跨越阿尔卑斯山，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2]。那时候汉尼拔是怎么想的呢？

这天是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回到驻地时，大部分人都还外出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命令全体队员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我、凯伊、科蒂斯军士长、另外两个军士长还有我的军需官一起在酒店的公共休息室里摆了一排椅子，准备好了纸笔准备记录。

我对科蒂斯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真讨厌做这种见鬼的事，但我们还是开始吧。"

我们把部下一个一个地叫进来。

我特遣队里的一个年轻人带着灿烂的笑容走了进来，以为我们肯定是要向他布置什么新的任务了。当他看见坐在他面前的这群表情严厉的军士长和军官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我们开始向他发问时，他的脸色开始发白，手也抖得厉害，不得不把笔放下，把手按在自己大腿上。我们把部下一个个叫进来，虽然我们喜欢这些家伙，但还是要讯问他们。

回到圣地亚哥之后，人们问我，做这件事是不是很难？调查自己人是不是很难？对自己海豹突击队战友的行为进行评估是不是很难？我那时回答他们说，难不难没关系，我们必须要那么做。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不管我们会惹多少人烦，不管我们可能会失去多少朋友，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的人，那些行为端正的人。我们不能让嗑药的人进行实弹射击，不能让嗑药的人执行复杂的任务，不能让嗑药的人代表美国。我们更不能允许军官向年轻的新人兜售毒品。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道理都显而

[1] 247—183(或182)B.C.,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2] 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为布匿战争。

易见。但当我把人叫到我面前时，的确有些难。他们有的和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有的经常和我开玩笑，有的人的家人都和我很熟悉，有的人请我帮他们进行职业和教育规划，讯问他们让我很难过。我和其他人都感到一种痛彻心扉的失望。我们在广阔的海面上，在骄阳似火的 Mk-5 后甲板上一起汗流浃背地进行海上救生训练，并肩进行实弹射击，在夜间行动中一起分享食物。他们和我们一起通过了重重考验，却没能通过这次考验。

到调查结束时，我的特遣队里有三个人，凯伊手下有一个人，另外还有几个海豹突击队队员被开除出海军。这场丑闻的中心人物——那个海豹突击队军官凯文因吸食致幻剂、可卡因，并向新人兜售毒品而锒铛入狱。

凯伊和我还得应付一些蠢蛋。在菲律宾有一个海豹突击队上尉，他告诉我和凯伊应该惩罚那几个“告密”的人，这个家伙还告诉我们应该向上级撒谎，隐瞒整件事。他后来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警告处分。但总的说来，我们的行动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

每一种文化都会遇到自己的问题。那天结束时，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价值观最后胜出。海豹突击队规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崇尚荣誉，诚实做人”。我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支持。

海豹突击队规章里还有一句话：“要对自己和队友负责。”从我的特遣队中开除的三个人中，有两个年轻人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我不相信他们来泰国是为了寻找毒品。他们是在努力寻找方向，想成为勇士，成为男子汉，但当他们看到凯文这个他们崇拜的海豹突击队上尉在泰国吸毒、贩毒时，他们决定效仿凯文。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在这两个人离开泰国之前，我坐下来和他们谈话：“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们要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是坏消息，可能在你们的余生中一直影响你们。好消息是，你们能够决定这件事如何影响你们的生活。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假装这不是你们的错，假装你们是受害者，假装你们被误解了，假装你们没有做那个你们做了的决定。如果这样，这种想法会一直纠缠、困扰着你们。第二个，也是更好的选择，你们要勇于诚实地面对所发生的事，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你们能诚实面对一切，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你们会从这个错误中变得成熟。尽管现在可能难以接受，但这将是你们获得力量的源泉。”

这时，他们对我说："谢谢您，我们非常抱歉，让所有人失望了。"

我和他们握了握手。我的队伍已经减员了，当我往回走时不禁在想：是不是当初我就应该做些什么事，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呢？

直到现在，我还和那两个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给我寄来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照片，我们谈到了他们的工作和家庭。这几年他们成熟了很多。我很高兴地给他们推荐了学校和工作。他们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把那次错误的决定抛在了身后，他们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都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勇士，道德品质与血气之勇同样重要。我们所有人也时刻提醒自己牢记这一点。

我的特遣队和海军特种作战部队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我在圣地亚哥的上级从加利福尼亚给我派来了人手，使特遣队恢复到满员状态。为了增强全队人的凝聚力，我加强了体能训练的力度。我采用了牛津拳击教练亨利·迪安的做法，每天早上日出之前带领队员起床跑向附近的一座山，然后像狼群一样冲上山顶，跑下山后再冲上山，这样一遍遍地训练体能。之后我们跑回基地的游泳池，分成两组开始一项被称为"雄性海豹"的比赛，这是一种非常粗野的水球运动，整个游泳池会被我们搅得天翻地覆。

在动身前往婆罗洲时，我感觉所有人已经把泰国的事抛在了脑后，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新任务上——进行侦察，并扮演美国亲善大使的角色。

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我们受命要停靠在婆罗洲的几个港口，很多港口以前从来没有招待过美国军舰。在悠久的美国传统中，海军被派遣前往某地时，它既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也是外交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在一次对国务院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一支好的海军不是战争的导火索，而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同控制着婆罗洲，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潜在的重要战略伙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总共拥有2亿6300万人口。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在2001年，每天有1170万桶原油和世界贸易总量的40%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这片海域的海盗活动十分

[1] 指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即老罗斯福。

猖獗。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关系。美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战略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把这种复杂的局势想象成一场3个小时的晦涩难懂的电影,那么我和我的人在其中只是仅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这个角色演好。

我们停靠在港口期间会去参观鳄鱼养殖场和猩猩乐园。停靠在文莱王国港口期间,在与美国大使会面后,我们坐在一艘宽大的画舫里,沿着文莱河顺流而下,看到了文莱苏丹的家——努洛伊曼皇宫。我们还在小饭馆里吃了辣茄子和炒面,与当地人聊天。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海军招兵广告一直承诺"要带着他的水兵周游世界"。当我们行走在异乡的城市,品尝着当地的特色小吃,我们觉得海军信守了承诺。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决不是一个旅游景点。

我们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是菲律宾的三宝颜。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相比,这只是全球反恐战争中一个不知名的前哨阵地。美军在一个菲律宾基地里拥有一片小小的营区,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周围是用绿色沙袋堆起的高墙,由海军陆战队队员负责警戒。在高墙内,海豹突击队、特种作战舟艇大队、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绿色贝雷帽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每天四餐,早餐、午餐、晚餐和夜餐,晚上就睡在一张张紧挨在一起的双层床上。营区的中央是一个水泥平台,上面装了座椅和围栏,充作体育馆。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在闹钟声中醒来,吃顿丰盛的早餐,有薄饼、香肠、土司、谷物、水果;锻炼一小时;上艇准备行动。吃顿丰盛的午餐,有汤、肉、水果和沙拉;接着再出去工作;筹划行动,接着再吃顿丰盛的晚餐。

太阳落山后,我们要么上艇执行夜间行动,要么再去锻炼一小时。营区外有很多菲律宾家庭。他们处理垃圾的方法通常是焚烧,所以空气中时常浓烟密布,一些塑料垃圾经常飘到我们营区上空。这里的空气不适合跑步,但是因为每天规律的锻炼、丰盛的伙食和良好的睡眠,每个人的衬衫里都鼓鼓的隆起了所谓的"三宝颜监狱肌肉"。

托德·雷克莱尔是一名陆军特种部队少校,也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负责管理整个美军营区。雷克莱尔毕业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陆军会把他最厉害的男人和女人们送到那里,把他们变成战争专家。雷克莱尔负责美军在三宝颜的所有任务,亦即与菲律宾军方合作,打击和瓦解菲律宾南部

的所有恐怖分子组织，特别是那些与阿布·萨耶夫恐怖组织关系密切的团伙。

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圣战运动从全世界范围招募伊斯兰信徒，加入他们反抗苏联的战斗。应征者中有个名叫阿布拉贾·阿布巴卡尔·简加拉尼的年轻人，他出生于菲律宾大陆以南10海里的巴西兰岛上的一个神学家家庭，受过大学教育。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简加拉尼回到菲律宾继续他的战争。他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极端主义者，开始建立阿布·萨耶夫恐怖组织。

阿布·萨耶夫组织用炸弹袭击修女、牧师和无辜的平民，其中也有美国的牧师。恐怖分子还炸毁基督教的传教船只和教堂。1991—1995年四年间，阿布·萨耶夫组织打死136人，打伤数百人。1998年，简加拉尼在一次与警察交火中被打死，这个组织从此把精力转移到暗杀、绑架和吸引媒体关注上。在2000年一次被广泛关注的绑架事件中，他们绑架国外游客，并从利比亚政府手中敲诈了2000万美元的赎金。为了扩大影响，阿布·萨耶夫组织还热衷于斩首，并把斩首过程拍摄下来拿到菲律宾电视台播放。

2001年5月27日，阿布·萨耶夫组织的一伙人袭击了菲律宾著名的岛思棕榈度假胜地，并绑架了三名美国人，其中有从堪萨斯州玫瑰山来的一对牧师夫妇格雷西亚·伯纳姆和马丁·伯纳姆。袭击者头目阿达姆·提劳，曾多次参与阿布·萨耶夫组织的刺杀和袭击行动。提劳是个爱炫耀的人，喜欢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头巾和太阳镜在晚间新闻里出镜，嘲弄、辱骂政府。提劳威胁说，如果他拿不到赎金，就会杀死所有人质。

5月28日，菲律宾总统向阿布·萨耶夫组织宣战，发誓要“终结其发动的一切”。两周后，6月11日，提劳兑现了他的威胁，将其中一名人质秘鲁裔美国游客吉勒莫·索伯洛斩首。尽管总统强烈谴责这一暴行，但是菲律宾政府和军方却无能为力。联邦调查局试着为剩下的那对夫妇支付30万美元的赎金，可是这笔钱在到达阿布·萨耶夫组织手中之前就不翼而飞。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很难在巴西兰岛茂密的丛林里找到提劳。而且巴西兰岛的居民对阿布·萨耶夫组织印象颇佳，经常为其行动提供支持，因此也很难从当地居民那里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2001年9月11日以后，由于阿布·萨耶夫组织早先与奥萨马·本·

拉登和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美国政府将它列入自己的恐怖组织名单。此后，摧毁阿布·萨耶夫组织并营救伯纳姆夫妇成为美国海军和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优先任务。借助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追踪仪器，菲律宾陆军确定了提劳和人质的位置后展开营救行动。格雷西亚·伯纳姆获救，马丁·伯纳姆在交火中被打死，提劳则逃入了丛林。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知道，提劳会很快逃回他家所在的岛上。在驻扎在三宝颜的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帮助下，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在接应提劳的船上安装了可被飞机追踪的红外感应装置，一场攻击蓄势待发。就在前一天晚上，四艘船离开了三宝颜基地，第一艘船是“诱饵”船，负责接上提劳，并把他送到开阔海域，第二艘船上是菲律宾海军陆战队队员，后两艘船上是海豹突击队队员和特种作战舟艇大队队员。

提劳的船离岸越来越远，上面的人已经无法游回到岸上，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船只加大油门冲了上去。提劳在其后的战斗中被击毙，这对阿布·萨耶夫组织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但正像所有恐怖组织一样，阿布·萨耶夫组织受挫后重新招兵买马，继续行动。

阿布·萨耶夫组织仍然是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敌人。美军在三宝颜有大批出色的军事顾问。但阿布·萨耶夫组织盘踞的苏禄群岛散布在长约215海里的狭长海域，如果没有能在岛屿间快速、敏捷穿行的船只，美军就无法发挥其力量，而航程超过550海里的Mk-5战斗艇能让我们向阿布·萨耶夫组织的整个活动区域投送部队并展开行动。

然而，为了能够成功击败阿布·萨耶夫组织，我们不仅需要快速战斗艇，更需要提高菲律宾部队的能力，使他们未来能够独立作战。菲律宾的特种作战人员接受过海豹突击队训练。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是在一片沙滩上，当他们的人走过来迎接我们时，我很吃惊地发现这些菲律宾人走路时的架势和我们完全一样。他们的肤色和我们不一样，迷彩服和我们不一样，个子比我们小，武器、水壶、指北针和背包比我们的旧，磨损得也更厉害，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友好但透着杀气，泰然自若但随时能投入战斗。就算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坐在饭馆里，看上去也跟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马尼拉郊外的贫民窟长大，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美国南部的小农场里长大，但我们都在世界上最艰苦的学校中百炼成钢，共同的经历让

我们彼此有一种认同感。

开始巡逻时，我们带上了菲律宾特战队员，让他们帮我们尽快熟悉周围的岛屿。Mk-5 战斗艇的发动机低声闷吼着，载着我们悄悄滑过一排排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茅屋竹棚。渔人们白天撒了一天网后，晚上就在这里休息，成群结队的狗在码头的竹板路上跑来跑去，时不时停下来，让当地的孩子逗弄一下。在菲律宾，43%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 美元。南部群岛的贫穷人口更多。我们对感兴趣的地方拍了些照片，譬如一间安装了许多天线的破旧茅屋，新建清真寺附近一处新建的码头。我们调试好装备准备收集电子通信情报，并请菲律宾同行向我们介绍这些村子里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Mk-5 战斗艇的吃水深度只有 5 英尺，但是它的喷水推进系统要从更深的地方吸水，所以当我们悄悄驶过村子的时候，要在水面已经开始呈现浅蓝色的较深的地方航行，我也会特别小心地保持我们的航行深度。眼前的情景让我想起了柬埔寨的海边。那里的孩子们也在浅海里撒网，海边的人家聚成渔村，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尚未痊愈。

几次巡逻之后，我们发现尽管 Mk-5 战斗艇武装精良，速度快，航程远，但即便在夜间，它也不太适合完成近距离的情报收集工作。

菲律宾同行的船也有问题，他们的船是从走私犯手中缴获的，15 英尺长，平底，装有两台巨大的摩托发动机，船头和船舷上画着一张血盆大口和锋利的白牙，菲律宾人管它叫“鲨鱼”，但除了这名字之外，这艘船一点都不凶恶。它的航程很短，在风浪中又很难控制。

如果想进行有效的近距离侦察，我们还得找其他的平台。就算是我们 Mk-5 战斗艇后甲板上的“佐迪亚克”橡皮艇也不行，它在水中也太显眼。我们需要悄悄混进去。

我想起了在柬埔寨时见过的小渔船，当地的渔民经常用它在夜里去浅海捕鱼。我问菲律宾人这里怎么打鱼，他们很肯定地告诉我，这里的渔民也用那种船。我们买了一些当地被称为“邦加”的小渔船。它是很简单的木船，有点像带有外舷支架的窄独木舟，发动机很小，通常被菲律宾渔民用来在家附近捕鱼。这种船经常被漆成可笑的黄色、绿色、紫色等，到了晚上，会有几十只这样的船在海边游荡，人们一般都在船上捕鱼，不过我们有

时也会用夜视镜看到他们在上面打盹。

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勇士们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富创造性。我们不但学习战术，还学习如何调整战术、抓住机会完成任务。教官对我们喊“卧倒”时我们必须卧倒，但如果他们手拿消防水管、基地里浓烟滚滚、夜晚漆黑一片的时候，他们再喊“卧倒”我们就会照跑不误。

我们开始工作，在这些邦加船上加装 GPS 系统、无线电设备、武器和闪光灯。特种作战舟艇大队的操艇手跳进船内，启动发动机，学习在岸边的浅水中控制这种船。我们则驾驶 Mk-5 战斗艇出海，练习在 Mk-5 战斗艇的后甲板上放出和收回邦加渔船。

我走上后甲板，对凯伊说：“准备完毕，兄弟，让你的人出动吧。”

凯伊的人跳进邦加渔船，最后一次检查无线电设备。

“克里斯托，这里是海豚，检查无线电，完毕。”

“海豚，克里斯托，听到你了，很清楚，我怎么样？完毕。”

“克里斯托，你也听得很清楚。海豚结束通话。”

我们一群人弯下腰，抓住了邦加渔船的木头船舷。

“准备，1、2、3。”在数到三的时候，我们一起用力，把邦加渔船从后甲板上推进海里，他们随后打开了红外脉冲灯。这时我们在夜视仪里看到两个菲律宾渔民正走向海岸。在 Mk-5 战斗艇的甲板上，所有机枪都已子弹上膛，所有人都严阵以待，一旦我们的人遇到麻烦，我们会立刻加速冲过去。

在第一次行动的那天晚上，我们的 Mk-5 战斗艇从码头出发，邦加渔船从海滩出发，在海上的指定地点会合后，我们再把邦加渔船拖上 Mk-5 战斗艇的后甲板。我们的船就像一团黑色的暗影，在漆黑的夜里安静地滑过漆黑的海面。后甲板军士长用夜视仪监视着波浪翻滚的海面，领航员监视着雷达屏幕，行动队员则用摄像机抵近拍摄几个可疑的目标区域。

就像是玩拼图游戏一样，我们的行动区域的情况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与菲律宾同行分享了所获得的情报。在耐心等待了几个星期之后，菲律宾军方决定对和乐岛发动攻势，希望能全歼阿布·萨耶夫恐怖组织的残余势力。

展开行动的那天清晨，太阳还没升起，我们就已经从码头出发，向南开去。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准备进攻岛上一处可疑的恐怖分子营地，里面有很

多茅屋和营房。阿布·萨耶夫组织的武装分子曾无数次乘坐摩托艇逃离困境，我们这次则要在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势的时候，切断阿布·萨耶夫集团任何可能的退路。我们在海岸边停下，通过电台收听菲律宾军方行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不得不进入军事行动中最难受的一种状态：临战准备。

太阳升起来了，海面上波光粼粼，到处一片安宁。我们坐在船上，电台里传来嘶嘶啦啦的杂音。天慢慢地热了起来，我们的汗水浸透了褐色的T恤衫。我们喝着水壶里的水，吃着野战食品，一艘战斗艇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但除了时刻保持警惕外，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又把武器和电台检查了一遍，确认了另一艘战斗艇的位置，这时电台里的呼叫声频繁起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跑了。”

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们走了整整一天才穿越了岛上的丛林。等他们到达营地时，里面空无一物。

我们把船头转向北，开动马达，驶回了三宝颜基地。

那天晚上，我的特遣队队员给艇加满了燃料，擦拭了武器，准备好海图，检查了手电筒中的电池，然后我们去睡觉了，准备第二天早上再次出动；如果接到命令的话，我们在当天夜里也能够随时紧急出动。

阿布·萨耶夫组织四处躲藏，在两年的时间里，它没有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威胁。但我们要让这种威胁永远消失。特遣队里的家伙们更希望能跟他们光明正大地打一仗。但如果阿布·萨耶夫组织一直藏着不露头，那我们就得把它找出来，就得运用各种方法日复一日地进行追捕。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老到，提高警惕，严密防护，凭借坚实的力量与崇高的荣誉感恪尽职守。当我们轮换回国时，另一批美国海豹特种兵和菲律宾盟友会来接替我们的岗位。当使命召唤的时候，我们将勇敢、坚定地奔赴前线，固守我们的阵地。我们必将取得胜利。

第九章

出击

《孙子兵法》中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时候，充分的战争准备能让我们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我们需要时刻准备好与敌人交火，但我们不希望与恐怖分子有太多的直接战斗。我们的目标是巩固自身的战略地位并积累优势，从而在恐怖分子出现时打垮他们，在恐怖分子躲藏时搜捕他们，尽可能地阻止其发展壮大。

一个看似明显却经常被忘却的事实是，当我们投入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训练去赢得战争时，往往可以不战而胜。《孙子兵法》中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时候，充分的战争准备能让我们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我在肯尼亚执行任务期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到达肯尼亚后，我们驾驶越野车从肯尼亚海滨城市蒙巴萨沿B8号公路向北前往遥远的曼达湾。曼达湾地处肯尼亚北部的战略要冲，紧邻索马里的南部边境，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小基地。我们的司机都是关岛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人，这些人在基地专职负责安保工作，他们戴着太阳镜，身边放着步枪，驾驶车辆在土路上疾驶，前后两车间距离很大，以免后车被前车扬起的尘土挡住视线。曼达湾是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当我们在内罗毕或蒙巴萨告诉肯尼亚人我们要去那里的时候，他们都会吃惊地瞪大眼睛，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当我们接近一个村子时，坐在副驾座位上的人转过头来对我说："嗨，上尉，村子里的人都恨我们，你留神他们看我们的样子。"孩子们穿着破烂的衬衫和短裤，手里拿着棍子，停下来站在那里，盯着我们的车队。羊群咩咩叫着逃开，村子里的成年人也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恶狠狠地看着我们。

"上尉，还记得那些家伙炸我们大使馆的时候吗？"他指着窗外对我说，"情报部门说，他们去的时候就在那个村子停留过。肯尼亚人大多信基督教，但海滨地区都是穆斯林，这些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美国人。"

10年前，我在前往卢旺达的途中曾到过肯尼亚，不过那时我还没参军。现在，我看着那些盯着我们的村民，分辨不出谁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只看

到了愤怒的父母们。我们把窗户摇起来，戴上太阳镜，手里抓着步枪，以危险的高速穿过了满是羊群和孩子的村子。我初来乍到，而这些人已经在这儿呆了几个月了，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我到达了曼达湾，担任这里海军特种作战行动组的新任指挥官。前任指挥官把跟当地领导人、肯尼亚海军甚至自己人的关系都搞砸了。我的任务是担任作战行动组指挥官兼基地指挥官，负责协调基地里美-肯双方的关系。但如何成为肯尼亚人的同盟者和朋友，我一时还没有头绪。

1998年，两个人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向了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地下车库大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跳下车，朝卫兵扔了一颗手榴弹后逃跑，卫兵幸免遇难，车库大门也没被炸开，那个恐怖分子司机看到卫兵在通过无线电呼叫支援，知道自己无法开进车库，于是他把车尽量靠近大使馆的建筑，引爆了整车炸药。

两吨炸药把紧挨大使馆的一栋7层建筑炸得支离破碎，只留下一堆砖石瓦砾和一片滚滚浓烟。离大使馆一个街区远的22层高的合作银行大楼的玻璃全部被震碎，甚至10个街区外的建筑物玻璃也被震碎，碎玻璃洒满了街道。所幸这座大使馆是惯于应对炸弹袭击的以色列人建筑的，它经住了爆炸的冲击，楼内无一人死亡。但是，仍有224人死于爆炸，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大约5000人受伤。

直到2005年，我们一直收到有关肯尼亚的恐怖活动报告，很多起事件都与其北方邻国——索马里有关。自从1991年索马里独裁政权倒台后，索马里就处于一种被政治学者称为在当今单一民族国家中“最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局面。军阀间为了争夺地盘爆发了激烈的混战，冲突导致约35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当国际社会用船只向索马里人民运送食品援助时，军阀们攫取了80%的援助物资，用来换取武器。美国政府提供了军事和技术援助，大大缓解了饥荒，但在当地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杀害了24名巴基斯坦维和官兵后，美军的作用从维和转变成搜捕艾迪德，这也直接导致了1993年的“黑鹰坠落”事件。在那起事件中，当地民兵击落了美军一架直升机，进而引发了一场17小时的激战，18名美军士兵在战斗中阵亡，数百名索马里人被杀。

索马里人民依然灾难深重。整个国家被地方军阀控制，他们为争夺本

以稀少的资源而相互厮杀，并对民众实施恐怖统治。超过40万索马里人至今依然流离失所，居住在拥挤、肮脏的难民营中。一些外国的救援人员被杀，更多的救援人员被驱逐。与此同时，十年一遇的大旱几乎使庄稼颗粒无收。据可靠数据，索马里大概有43%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此时的索马里比以往更需要粮食援助，但由于海盗持续不断地袭扰运粮船只，粮食援助降到了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到2005年，日益严峻的海盗问题迫使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放弃海路运输，改走陆路，而陆运成本要比海运成本高出25%～30%。

由于肯尼亚历史悠久的恐怖活动，北方近邻索马里的极度不稳定，以及猖獗的海盗，曼达湾成了在日趋广泛的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我们的美军营地坐落在肯尼亚海军基地内的一片空地上，占地不超过两个足球场大小。我们后来借用迪斯尼动画片《狮子王》里那只英勇的小狮子的名字，把基地命名为“辛巴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虽然个头小，但志向大。但整个指挥链条上的人都告诉我们“辛巴营”这个名字不够强悍，于是我们把名字改成了“狮子营”。

当我走进基地时，十几只狒狒窜进了树丛。我们营区中间是一栋小房子。这座小房子以前破破烂烂的，屋顶漏了，墙壁倒了，地板上还长出了树。但现在经过几拨特战队员的修葺，这小房子有了崭新的红顶白墙，坚固结实。房子里有一间装满野战食品的储藏室，一间救治伤员的医疗室，还有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摆着桌子、电脑和无线电设备。

房子周围是五顶卡其色的10人帐篷，帐篷上装了小空调，可以让里面的人晚上觉得凉爽些。我们的护营狗叫巴萨，就是我们获得补给的那座港口城市——蒙巴萨的简称。巴萨曾是一只伤病缠身的流浪狗，营地里的家伙们把它治好，让它恢复了健康，现在它是一条30磅重的精力充沛的大狗。它给自己指派的任务是阻止狒狒偷我们的野战食品。狒狒们靠近营地的时候，巴萨会大叫着冲向它们，但狒狒们根本不害怕巴萨。我有一次甚至看到一只雄性狒狒抓起巴萨使劲摇晃他。在公路下面的排水口里，还有河马在那里乘凉。

我们是一个联合特战行动组。所谓“联合”，是因为我们的人员分别来自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谓“特战行动”，是因为行动组中的战斗成员

主要是海军特种作战舟艇大队队员，他们使用硬壳充气艇、喷水推进摩托艇和当地的船只展开行动。我们还为肯尼亚特种部队人员开设了训练学校。在肯尼亚的任务与在菲律宾的任务非常相似，我们需要与肯尼亚军方合作，主要依靠他们进行反恐行动。

无论在肯尼亚的拉姆群岛还是在菲律宾，我们都努力与当地人建立一种友好互利的关系。我们需要时刻准备好与敌人交火，但我们不希望与恐怖分子有太多的直接战斗。我们的目标是巩固自身的战略地位并积累优势，从而在恐怖分子出现时打垮他们，在恐怖分子躲藏时搜捕他们，尽可能地阻止其发展壮大。

美国宣称我们在和恐怖主义进行一场“战争”。美国人考虑战争时总想着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像在下国际象棋时要将对手将死一样。但用这种方式考量冲突可能造成误导。正像基辛格博士等人指出的那样：“国际象棋的目标在于谋求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它的结果要么是全面胜利，要么是彻底失败。对弈双方是在棋盘中心针锋相对地搏杀。”但与恐怖分子的斗争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用一种棋类游戏做类比的话，最好是用亚洲的围棋：“围棋旨在谋求相对优势，双方在整个棋盘上进行博弈，目标是在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缩小对手的势力范围，其目的与其说是要获得胜利，不如说是要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我们在肯尼亚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我们的人和肯尼亚同行一起把船艇放入曼达湾，教肯尼亚人如何追踪可疑船只，如何控制犯人，如何进行团队战斗。我们的人和肯尼亚人轮流扛着对方沿着柏油马路疾跑，由此增进感情，建立友谊。如果我们训练的肯尼亚人能阻止基地组织通过索马里偷运爆炸物和武器，我们就在战略层次上取得了进展。

我们派人带着照相机和无线电设备乘当地船只进入那些我们以前从未涉足的区域，进行特种侦察行动。如果我们能看到更多，了解更多，消息更加灵通，那么我们就能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我们和附近城镇来的镇长一起聊天，我们的民事军官和他们坐在一起喝茶，讨论打井、建学校和当地孩子的健康等问题。我们结识的盟友越多，基地组织的朋友就越少，我们也就能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我们也试着在喷水推进摩托艇上加装机枪和GPS设备。我很怀疑把喷水推进摩托艇当成作战艇用到底有多大实际意义，它的航迹十分明显，马达轰鸣声太大，航程有限，不能搭载其他人员，没有空间加装传感器……但我们都赞成用喷水推进摩托艇追捕恐怖分子和海盗，如果我们能发明有效的新战术来阻止恐怖分子，我们就能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我们每天的行动很简单。我们的行动组要在肯尼亚沿海城镇中熟悉作战行动环境，为高级指挥官提供肯尼亚各港口后勤基础设施的精确情报，这样，我们就能在从坦桑尼亚至索马里的整条肯尼亚海岸线上规划未来的行动。如果我们要在肯尼亚沿海城镇以外的地方展开行动，我们必须知道哪里能安全停靠船只，哪里能买到油料，哪里能设置哨卡，哪里能为特战组提供食宿。考虑战略问题很有意思，但后勤问题才是行动成功的关键。行动组的这些评估工作使得在整个肯尼亚沿岸海域展开行动成为可能。这就是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我们更加紧密地与肯尼亚海军当局合作，使我们获准使用他们沿海的雷达站配合海上拦截行动。肯尼亚有大型雷达站，能够监视近海所有船只的航行情况，但是他们从没有把雷达站与特种作战船只结合使用。我们开创性地与雷达站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系，并拟定了相应的标准作业程序，使他们的雷达站可以协助拦截可疑船只。这种新做法极大提高了肯尼亚海军控制本国海岸线的能力。这也是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我们协助肯尼亚海军制定了更积极的海上拦截行动计划，将其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加倍，拦截更多可疑船只。这意味着肯尼亚海军要延长执勤时间。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无人管控的海域现在有了肯尼亚特战小组巡逻。这同样也是不断在战略层次上取得进展。

对我们来说，积极向前迈出每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建立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作为基地指挥官，我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确保美国在当地与肯尼亚的关系良好发展。而我在肯尼亚执行任务期间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一次不经意的疏忽足以毁掉几个月耐心工作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而我这次的麻烦竟然是一台陷在水中的铲车。

我到任几个月前的一天，我们的喷水推进摩托艇在海湾中完成试航后返回港口。一名驾驶员下了艇走进浅水中，朝着在岸上操作铲车的一个美

国承包商挥手。铲车上的人以为摩托艇驾驶员在向他求助，就把铲车开下岸想把摩托艇拖出水。开喷水推进摩托艇的人发现不对劲，挥舞着双手想告诉那铲车司机停下来。铲车司机把这手势解读为“紧急情况”，于是猛踩油门。地面很软，铲车牢牢地陷进了低潮时的沙地里。涨潮后，海水淹没了铲车，只剩下驾驶室还露在水面上。

不幸的是，铲车沉陷的那个地方是美国和肯尼亚船只进出的必经之路，陷住的铲车严重影响航行，肯尼亚人想把它弄走。

这本应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雇用当地人用一辆拖车在落潮时把铲车拖出来就行了。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变得非常复杂。在我的办公室里，前任指挥官留下了一摞厚厚的备忘录，里面都是处理“这辆铲车”的建议。这些材料让我知道，除非官方证明这台铲车已经报废，否则将这台铲车赠与肯尼亚人就是违法的（肯尼亚人建议，如果把铲车当废铁送给他们，他们就免费把它拖出来）。尽管这台铲车已经在盐水里泡了几个月，远在千里之外的吉布提的某些官员却还要讨论这台铲车能不能用。此外，如果要赠送这台铲车，美国政府还得查明谁才是这台铲车真正的主人。这铲车到底是谁的呢？美国政府中好像没人知道。几个月来，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竟然无法挪动一台铲车，而且还不能让肯尼亚人弄走它。多么荒谬的局面！对我来说这是个标志，时刻提醒我实际上存在两支美军。一支是作战部队，领导得力，勇猛善战。另一支则是国防部，虽然国防部中有很多优秀的人和优秀的战士，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穿着迷彩服的男男女女只是跟文职雇员们一起坐在电脑前，在世界上最大的、有时候也是最不愿承担风险、最没创造力、最低效的官僚机构中，兜着圈子来回地发送电子邮件、报告和简报。

有人告诉我肯尼亚基地的指挥官对美国的表现很不满意，原因很多，铲车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带着我的高级顾问一起去拜访了基地指挥官。

指挥官的办公室很简单，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本挂历和一面黑、绿、红三色的肯尼亚国旗，办公桌上有薄薄的一沓文件。指挥官很瘦，大概有5英尺8英寸高。他把窗户开了一条缝，让风能吹进来，嘴里嚼着一大把卡塔叶——在肯尼亚很流行的一种温和的兴奋剂。我们握了手，他

的秘书端来了茶，我们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

“先生，谢谢你抽时间接见我们，很高兴能见到你。和你的人在一起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知道海上行动进展很顺利。”

指挥官笑了笑，说：“是的，我们为这次行动感到骄傲。”

喝了一杯茶后，我们开始讨论铲车的事。他对我说：“这件事很麻烦，也很让人困惑。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挪走它，我们为什么不能动它，我们可以帮你们挪走它。”

“我同意，”我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

“是的，但是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它还在港口那里堵着呢。那个地方很不方便，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移动它，这件事很好笑，不是吗？”

我们很愉快地聊了半个小时，聊了很多我们有共识的东西——海上行动进程，岗哨处需要有一条艇用坡道，还有基地里狒狒的数量。谈话结束时，我邀请他一起吃晚餐。我说：“在基地里，你对我们十分照顾。我们很希望能邀请你来我们的营区，让我们招待你和你的同事一起吃晚餐吧。如果你能来，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

他说：“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件事很好笑，几个月前我去过你们的营区，他们要搜查我的车辆。我很吃惊，这是我的基地。那真是件很好笑的事！”

“非常抱歉，”我说，“我们的士兵受命要检查所有进入营区的车辆。他们没认出你来，这件事让我们很尴尬，这是你的基地，先生，你是这里的长官。”

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但他的耐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想，如果一支到访美国的肯尼亚部队把一台铲车陷在我们的港口里，如果他们在美国领土上搜查美军高级军官的车辆，美军基地的指挥官将作何反应？

我回到营房，浏览了一遍关于铲车的所有电子邮件，事情弄清楚了：没人明确命令我们把铲车留在港口。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开始要求获准移动铲车时，一封封电子邮件开始发送，从曼达湾到内罗毕，再到巴林，再到华盛顿，再到圣地亚哥，再到吉布提，再回到曼达湾，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批准。我开车回去见指挥官。

“先生，这个铲车的问题对你来说拖得太久了，所以，让我们把它从你

的港口弄走吧。”

“那么，我们可以移动它了？”

“是的，先生。你们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弄吧。当然，如果你愿意我们帮忙的话，我和我的人会帮你移开它。先生，这是给你的。”

我递给他一个VIP通行牌，他可以把它放在车里，这样，他来我们营区的时候，我们的执勤人员就能够识别出他的车辆，并会向他表示相应的尊敬。

我还去拜会了离我们最近的拉姆镇的镇长。拉姆是肯尼亚一个古老的城镇，也是东部非洲最早有人居住的城镇之一。2世纪时，托勒密[1]就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拉姆。当时的拉姆是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吸引着来自波斯、印度、葡萄牙和世界上其他贸易集散地的诸多商贾。我们坐着肯尼亚的水上出租车慢慢靠近拉姆，白色的碉堡式房屋渐渐映入眼帘，有些房子是尖顶的，上面盖着干棕榈叶；有些房子是平顶的，上面铺着一层红色的赤陶土。房子之间的空地上高高耸立着绿色的棕榈树。防波堤旁停靠着一排排木船，里面堆着装满食物的筐子和装满建筑材料的箱子。很多船装载的货物太重了，船舷离水面只有几英寸。在这里，沉船和溺水都是常事。

我下了船，踏着湿乎乎的水泥台阶走上防波堤旁一条宽敞的土路。我看到瘦骨嶙峋的男孩们用木棍赶着驴，驴背上驮着水泥、木材和谷物等货物。这里到处是驴，有的驴在褪色了的黄绿色电话亭里嗅来嗅去，有的驴睡在清真寺外，有的驴驮着装在编织袋里的珊瑚石，有的驴拖着刚从红树林里砍下的木头，还有些驴被男孩们骑着，沿着岛上拥挤的土路赛跑。有人告诉我岛上总共有2000多头驴。

我和镇长坐在一起喝茶聊天。镇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人，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一件领尖钉有扣子的衬衣，听说他的一项特权就是能使用拉姆除救护车之外唯一的一辆机动车。我们谈话时，镇长指着窗外告诉我，美军的民事军官曾承诺要帮忙建一所学校，但却半途而废。我离开时不禁无奈地摇头。

美国人总喜欢建点什么来表达善意。但直接对人投资的效果要好得

[1] 90—168，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光学家。

多。由于腐败和地方政治的掣肘，在肯尼亚建学校十分困难。建筑是资本密集型项目，因此必然会让当地官员为争夺个人利益而争论不休，而美国人通常又不会深入参与实际建筑过程，所以就算学校建成，美国也得不到什么赞誉。但如果学校的屋顶塌了，桌子坏了，水槽裂了，美国就会受到谴责。更重要的是，建筑物不会说话，不能扮演亲善大使的角色。美国人最多出席一下落成典礼，然后就走了。如果我们把钱用来培训教师，支付一些教师的工资，效果会好得多。在肯尼亚，一个新老师的年薪才1560美元。这样我们就能培养出一批对美国友好的老师，让他们教育下一代小学生，这些教师也会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与美国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想通过投资交朋友，那为什么我们不对人投资呢？通过建筑物来交朋友是很难的。

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沿着从我们基地伸出的那条笔直的土路跑步。路有一辆半汽车那么宽，两旁栽满了小树，为狒狒们提供了绝佳的聚居地。我以前在动物园见过狒狒，几年前取道肯尼亚前往卢旺达时，我在公园里也看到过一群狒狒，但我从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它们。狒狒们的攻击性很强。站在路边的雄性狒狒大概有70—80磅重，仰着头打呵欠时嘴里露出的黄色利齿足有两英寸长。它们在路上闲逛着，像一群流氓。有人告诉我看到它们时拍手很管用，于是我举起双手拍了几下，狒狒们转过身看了看我，然后跑掉了。

我继续向前跑。那时我正在练习马拉松，希望某种肯尼亚马拉松奇迹也能出现在我的双腿上。我跑进离基地一英里的一个村子，路上都是去上学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校服：雪白的衬衣和蓝色的短裤。

“你好！”我说。

“你好！”孩子们回应我。

“你们好吗？”我冲他们微笑着。

“很好，你好吗？”一个男孩对我说，然后开始和我一起跑。孩子们都习惯了在早上见到我跑步。他们会一家一家地招呼：“那个白人来了，那个白人来了。”接着孩子们会尖叫着从屋子里冲出来跟我一起跑。有三四个孩子经常和我一起跑上几百码，他们笑嘻嘻地在我身边跑着，背后的书包一颠一颠的。

有一天，我跑完步返回基地，一个肯尼亚哨兵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敬礼，然后他问我："长官，你是个运动员吗？你跑了多远？"

"今天大概有 11 英里。"我说。

"你应该和我一起跑，"他说，"我们看谁跑得快。"他嘴角露出了微笑。

第二天早上，我和那个哨兵在哨位会合。他叫丹尼尔，大概有 6 英尺 2 英寸高。他跑步的时候双腿就像是从地上飞了起来，那是我见过的最流畅、最有力的步伐。我在他旁边一边大口喘气一边问他："你经常跑吗？"

"不，最近不常跑了。我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比赛是在南非，几年前了。"

我说："噢，那很好。我可从没参加过国际比赛。"我们边跑边聊。丹尼尔告诉我他每天都在那哨位站岗，8 小时或 12 小时轮一次，他和其他十几个哨兵一起住在一间屋子里，已经有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他问我："你在这儿和那些特种部队的人一起工作吗？"

"是的，我们一起工作。"我说。

"那些人，"他说，"非常骄傲。我希望有一天能加入他们的行列。"

当我们与肯尼亚人面对面接触时，他们都会对我们报以友好的微笑，表现得好客而热情。只有当我们在一片尘土飞扬中驶过城镇，或是堵住他们的港口时，他们才会怨恨我们。

在我看来，我们和当地人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美国在非洲之角的情报工作不力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看到的很多情报材料充其量只是改头换面的新闻标题。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只能从活生生的人那里获得，但我们以前跟肯尼亚人民接触、合作得太少了。我对我的高级顾问说，我准备带着我的人去我们来曼达湾时经过的那个"坏"村子。下车去和村民们见见面，买些他们的水果。

"你确定你要那么做吗？万一有个闪失，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确定，"我说，"要在这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而且我的人也会很高兴能有水果吃。"

我们在曼达湾没有新鲜水果和蔬菜吃。我们在吉布提的给养官曾努力想给我们弄些新鲜水果，但要把一个橘子从欧洲运到吉布提，再从吉布提运到蒙巴萨，再从蒙巴萨运到拉姆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只能吃装在野战食品袋里的果汁黄桃。当地的市场上有成堆成堆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但

国防部不会给我们经费让我们从“未经批准的供货商”那里购买食品。我手下这帮家伙吃野战食品也能活得不错，但我认为从当地市场购物是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绝佳途径。

我带上自己的钱包，把手枪装进皮枪套里，带着队员开着几辆车前往那个村子。我们走下车，每个人都按照我的要求把太阳镜推到头顶上，好让村民们能看到我们的眼睛。我们和村民们握手，开始在水果摊上挑水果。很多村民以前只见过我们戴着太阳镜、紧闭着车窗、手里拿着步枪、开着车从村子里呼啸而过，这一次，他们走过来问我们问题。

“你们从哪里来？”

“你们喜欢肯尼亚吗？”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有些指挥官经常打着“保护部队”的旗号，要士兵摇上车窗、筑起高墙、把枪口指向外面。但“保护部队”的最好方法是将部队置于朋友和盟友之中。如果我们获准从当地购买食物，我们只需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经费就能让我们自己吃得很好。我们不但可以得到更好的食物，或许还可以结下珍贵的友谊。

有些报告指出，当初用炸弹袭击美国大使馆的恐怖分子来到肯尼亚时，他们曾在我们买水果的那个村子里停留过。如果我们当时在那里有几个愿意向我们提供情报的朋友，就有可能阻止这起攻击事件。我知道买几袋水果改变不了世界，但整个军方官僚机构害怕承担风险的思想倾向会妨碍指挥官迈出哪怕是显而易见的一小步。如果一个指挥官以“保护部队”的名义用围墙把自己人和当地人隔绝开，他决不会受到质疑。但如果一个指挥官冒险去和当地人建立联系，万一出现闪失，他很可能会受到惩罚。在驾车返回基地的路上，我的人聊着天，我以前从没听他们说过这些。

“是的，我开始和那哥们聊钓鱼了……”

“我买了十个芒果，哥们儿，这芒果真好……”

“那位女士喜欢你，她一直在冲你笑……”

“你看到那孩子穿的衣服没有？都是窟窿，得给他带件我们的衣服去。”

不久之后，肯尼亚基地指挥官邀请我们去参加晚宴，庆祝又一次肯-美联合行动圆满成功。

我后来去了伊拉克。在那里我发现一条规律：我们在哪里有了朋友，有了盟友，我们就能在哪里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军司令官、后来的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马歇尔计划的缔造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乔治·C.马歇尔提出了三条简单的参战规则："除非必不得已，否则永远不要开战；永远不要单独战斗；永远不要战斗太久。"这三条规则至今依然适用：我们单独战斗得越久，战斗就会拖得越久。

丹尼尔和我继续一起晨跑，在我即将离任的前一天晚上，丹尼尔骑车来到了我们的营区。我们的哨兵从大门口用无线电向我请示，我告诉他们让丹尼尔进来。我走出房门欢迎他，他蹬着车过来，在我面前停下，两条腿跨着车站在地上。我们握了握手。

"你好吗，丹尼尔？"

"很好，长官，很好。"丹尼尔的声音中有种奇怪的拘谨，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在我们营区里的原因。

丹尼尔低头看着地，对我说道："长官，我想，您能不能在离开前给我一些野战食品？"

"当然可以，丹尼尔。"我说。

和外军一起工作的时候，美国人经常需要处理"给他们多少东西"这样的问题。在菲律宾、肯尼亚和阿富汗这些地方，美军和外军之间资源上的差距实在太大，经常陷入两难境地。我们不能要啥给啥，被当成提款机。但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给，那样不光会丢面子，还会失掉朋友。

我们不能让基地里的每一个肯尼亚人都骑车进来要几箱野战食品，但丹尼尔已经是我的朋友了。"丹尼尔，你知道，如果我回来，我会跑得更快的。"

"嗯，也许吧，"他说，"但那时我可能也跑得更快了。"

我帮丹尼尔把那箱野战食品绑在自行车上，和他再一次握了握手，目送着他蹬车离开。

第十章

“猎杀小组”在行动

作为海豹突击队员和“猎杀小组”指挥官，我的任务跟以前一样——击毙或捕获基地组织高层人物。但目标太多了，单独依靠特种作战部队无法完成打击任务。我的上司要求我们找到抓捕基地组织成员的新办法，并与常规部队和伊拉克陆军密切合作。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共享情报，同时评估海军陆战队军事训练组及其伊拉克同行的战斗力，看他们能否胜任此类任务。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行动，我们就能极大提高对基地组织网络的打击力度。

巡逻队向南走去，尘土覆盖的街道上留下了每个人的脚印。我们分成两个巡逻组，每组负责一条穿过费卢杰工业区的街道。这里是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的高发区，而我们要阻止袭击。那是2007年3月，不仅费卢杰，整个伊拉克都接连不断地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恐怖分子把自己化为火球，将集市上的摊主、店主、刚离开清真寺的朝拜者和站在阳光下的孩子们都撕得粉碎。先是冲击波，像一道幻影般在空气中飞速闪过；接着是弹片，穿透人们的胳膊、腿、肺和脸；有时候，最后还有炸弹中氯化物放出的毒气。

我到伊拉克时，美军已经在那里打了三年半的仗，正在开始实施“增兵战略”。美军部队每一天都在走钢丝，既要打击基地组织，又要对伊拉克人民友好。但很不幸，这里的坏人穿的不是红T恤衫，好人穿的也不是蓝T恤衫[1]，我们的战士必须在混乱不堪的街道上扮演外交官的角色。

那天早上，我和6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15名伊拉克军人一起巡逻。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军事训练组（MiTT）成员，他们负责训练伊拉克部队，并跟他们一起行动。这批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来了几个月了，他们的防弹衣穿得很利索，手势信号也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对费卢杰的街道了如指掌，甚至比自己的家乡还要熟悉。当太阳高高升起时，建筑物的影子变短，气温迅速窜升，我的军装外面罩着50磅重的防弹衣，热得我大汗淋漓。

街上空无一人，这种空旷就像老西部片当中的情景：当警长走进镇里，偷牛贼、杀人犯、强盗都躲了起来。镇上的人都躲了起来，家家关门闭户，买卖歇业。但我们能感觉到一双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们。

---

[1] 美军的训练演习中敌方为红方，己方为蓝方。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一个车库门旁跪下，拽了拽门上的锁，拉得门咣啷作响。他端稳霰弹枪，压低枪口，一枪把锁轰开。他随后抬起枪口，把那把破锁剩下的零碎扔到满是尘土的大街上，猛地把门拉开。房间里装满了重型机械和工业零件，一件件锈迹斑斑，满是油泥。地板也油乎乎的。我们走进车库，用枪口指着黑暗的角落。

“安全。”

“安全。”

“安全。”

我仔细搜查着这间车库，寻找武器、炸药或其他不良企图的证据。但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一堆垃圾。

我们又走上街道巡逻。那天早上，我和特哈维斯·曼宁走在一起。平常我们一说到他的家庭，他就会神采飞扬，咧着嘴笑。但今天他戴着头盔，脸绷得紧紧的。

作为海豹突击队员和“猎杀小组”指挥官，我的任务跟以前一样——击毙或捕获基地组织高层人物。但目标太多了，单独依靠特种作战部队无法完成打击任务。我的上司要求我们找到抓捕基地组织成员的新办法，并与常规部队和伊拉克陆军密切合作。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共享情报，同时评估海军陆战队军事训练组及其伊拉克同行的战斗力，看他们能否胜任此类任务。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行动，我们就能极大提高对基地组织网络的打击力度。

在伊拉克的头几个月，我一直在拜莱德空军基地的联合作战中心担任作战军官助理，没有真正到战场上厮杀。不过我在联合作战中心能够看到来自伊拉克各地的报告。2006 年 10 月，我军阵亡 106 人。11 月，我军阵亡 70 人。整个伊拉克没有几个地方处于我们控制之下，战争进展情况不妙。有很长一段时间，陆军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都说需要更好地了解伊拉克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协助我们。

当我第一次乘坐悍马车穿过费卢杰街道时，我看到成群结队的伊拉克年轻人在抽烟，在商店外闲逛。美军部队 7 个月轮换一次，每天最多也就能在街上巡逻几次。而这些伊拉克人和他们的家庭每天都生活在这些街道上。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独力控制伊拉克，我们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

他们的文化。如果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让伊拉克人加入进来,捕杀基地组织成员,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园。美国人不可能保卫所有的家庭,但在街角抽烟的这些伊拉克人可以背着步枪在街角站一晚上,保卫自己的小区。

和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特战队员都参加过猎杀基地组织特殊人物的夜间行动。他们会与其他训练有素的人员一起,在夜间登上悍马汽车、直升机或斯特瑞克装甲车,只要有准确的情报和合适的装备,他们就能悄无声息地攻击目标。夜晚给了他们黑色的掩护,城市中发电机的轰鸣则掩盖了他们靠近目标的细微声响。

海军陆战队则有不同的任务。作为常规部队,它的任务是:无论白天黑夜,必须控制战场空间,控制邻近区域。特种部队队员就像是猎人,在危险的异国丛林里行动。常规部队就像是农民,要清理、平整土地,还要播种。常规部队必须创造和平,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结交盟友。

伊拉克有2800万人,国土面积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小。只要乘直升机在乡村上空飞一圈,或者开车沿着街道转一遭,哪怕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人也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美国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来彻底控制伊拉克。我们必须像在越战时期曾经提出的那样:赢得人心。

跟我一起巡逻的海军陆战队员训练伊拉克部队,会见教长,出资建造学校,结交盟友。在战场上,这项工作最不起眼,但完成起来非常困难,而且绝对是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有两个人倒下了。"

"路边炸弹。"

我们继续往南走,电台里不断传来更加详细的信息。另一个巡逻组的一辆悍马车在西边的一个街区遭遇路边炸弹袭击,两名伊拉克士兵身亡。我后来看到,座椅上和悍马车里到处都是黑色的血迹。

我听到一声爆炸声。"手榴弹!"电台中传来一声呼喊。一枚手榴弹扔向了另一个巡逻组,它滚到了大街上,人们及时躲开,无人伤亡。

北边响起了AK-47步枪的射击声。我转过身,有人在朝我们开枪吗?一个伊拉克士兵开始朝枪响的方向跑过去,我等他跑到身边时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他想战斗,我欣赏他的这种本能,但我们现在无法进行有效还

击，因为我们没看到目标。如果他从掩蔽处跑进开阔的十字路口，他就成了活靶子。很可能是一个孩子在朝天开枪，想把我们诱进开阔地去，而且一个狙击手很可能已经把瞄准镜锁定在那个开阔的十字路口了。

“我们停下。”我对那个士兵说。接着，我又对特哈维斯说：“特哈维斯，派一辆悍马车去我们北边，掩护我们的背后。”

特哈维斯对着无线电送话器说了几句，20 秒后，一辆载有 12.7mm 口径机枪的悍马车转过了街角，向北面 AK-47 枪响的方向开去。

伊拉克人训练得还不够。在巡逻中，我们必须一只眼盯着街道，一只眼看着他们。他们在观察射界吗？他们是不是挨得太近了？搜捕武装分子已经很劳神了，同时还要担心我们的伊拉克盟友，简直让人身心俱疲。我们希望也需要他们成功，如果伊拉克人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准备好，意味着我们没把他们训练好，意味着我们还要在伊拉克呆更长的时间。

在这样的巡逻中，经常由常规部队搜捕那些基地组织的小喽罗，其中一些家伙在路边埋炸弹不过是因为有人给了他 30 美元。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吃惊地发现我们有很多目标人物的照片，上面的伊拉克人穿着橘红色的上衣，直勾勾地看着照相机。我们有他们的照片是因为我们以前抓到过他们，不过我们又把他们放了。

今天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值得吗？

这群海军陆战队员里有很多人已经在费卢杰巡逻了几百次，每次离开基地他们都会遭到枪击。有一次巡逻时，我们的右侧突然火光一闪，一枚火箭弹朝我们前面的悍马车飞来，火箭弹在悍马车前一英尺处落地弹开，击中街道另一侧的一栋建筑物后爆炸。在另一次巡逻时，海军陆战队队员刚转过一个街角，就听到 AK-47 独特的枪声在夜空中响起，海军陆战队员们迅速蹲下寻找掩护。今天，一枚路边炸弹在他们身边炸响。每一天，每一次巡逻，他们（还有我们）都可能遭到攻击。

在基地里，如果电话和电子邮件被切断了，你就知道战场上又出事了。有人阵亡了，而指挥部不想让这种消息跟流言一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传到阵亡者毫无准备的父母妻儿耳中。当电话又可以接通时，你就知道肯定是有牧师和军官已经去拜访了阵亡者的亲属。

费卢杰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狗屎，塑料袋在风中四处飞舞。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拉科塔部落[1]的战争英雄疯马，他在骑马冲上战场时总会喊："Hoka hey！"意思是今天是战死的好日子。我们搜查过的商店里堆满了锈迹斑斑的发动机和窗框。所有东西看上去都不可能再有一点用处，哪怕是当汽车炸弹都不行。我在满是狗屎和垃圾的街道上巡逻，心想今天可绝不是战死的好日子。

两个伊拉克士兵开始在我身后抽烟、聊天，我朝他们挥挥手，示意他们回到巡逻队列中去。这些伊拉克士兵是盘大杂烩，许多人纪律涣散、胆小、体能有限，喜欢在巡逻的时候扎堆聊天，有些人打闹时还会用枪口指着自己的朋友。也有一些人想学着当个好兵，他们在巡逻时非常专注，并且很守纪律。尽管他们的战术素养还有很多问题，但伊拉克士兵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曾在拉马迪跟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一起在夜间执行过任务。他们的战术素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一走出斯特瑞克装甲车，游骑兵们就迅速展开了完美的战斗队形。我通过夜视望远镜可以看到，周围每一扇敞开的窗户，每一扇敞开的门，都被激光瞄准具的红点锁定。游骑兵们进入一条巷子时，他们会丝毫不差地相互掩护着交替前进。他们会悄无声息地靠近房屋，迅速轰开大门，在几秒钟之内完成搜索工作。

但进了房子以后，他们就遇到麻烦了，因为他们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游骑兵通常都带着翻译，但翻译一般都惊慌失措，有的翻译甚至也不是伊拉克人。游骑兵会干脆利落地搜索房屋，寻找情报。他们会把文件、电脑统统带走，有时候还会带回几个俘虏，但由于他们无法和当地人交谈，他们在离开房子时往往还像之前一样一无所知。而且这种破门而入的方式让他们几乎不可能交到朋友，反而会树立不少新的敌人。

伊拉克士兵正相反。他们在巡逻时互相打闹，在小巷里挤在一起，不认真观察就一气冲过三条街道。我曾经见过一个伊拉克士兵，他跑到一栋要搜查的房子墙外，把武器扔下，爬上墙跳进院子里，然后大声叫喊，让他的朋友把枪给他扔进去。伊拉克人的战术素养很差，但一进到房子里，他们巨大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伊拉克士兵可以搜查房子的住户，看他们是

[1] 美国西部一个美洲土著民族，属于印地安人中的苏族。

不是藏有武器，然后他们会跟屋里的男人一起抽烟聊天，等离开的时候总能获得点什么消息。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也会为我们的侵入向屋主表示歉意，并经常有希望获得谅解。很多人同样不喜欢伊拉克士兵，有时候甚至仇恨他们，但他们至少有沟通的能力。

在伊拉克的文化情报面前，美国人简直是睁眼瞎。大多数美国人进入一个美国人的房子，不用问也能分辨出哪个房间是小女孩的，哪个房间是十几岁的小男孩的。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住，只要进去转一圈我们就能很肯定地知道答案。同样的，伊拉克人看看地板上的垫子和毯子就知道有没有人住，看看屋里的茶具、衣服和装饰就能很准确地猜出这家人从哪里来。简而言之，他们在文化上很敏锐，能够跟伊拉克人交谈，从中获取一些必需的情报，然后依靠这些情报打败武装分子，控制战场，建立和平。在这方面，美国人永远望尘莫及。

我们走向一扇浅蓝色大门，大门朝着垃圾遍布的街道，紧锁着。一个伊拉克士兵拨开门闩，然后推开了门。伊拉克士兵走了进去，当我走进大门时，看到北面有一栋很大的灰砖砌成的仓库样建筑，西面有一间白色的小屋，小屋旁边有一辆破汽车，而在水泥地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金属狗笼子样的东西，上面有一条金属线一直通进小屋里。

“科夫，站住。”我对前面那个伊拉克士兵说。他转过身，我指着笼子。那条金属线让我很不安。我想，那是简易爆炸装置吗？

那条金属线看上去缠在笼子下面的一块砖上。它穿过宽敞的院子，一直通到那间小屋里。在院子远端的那间小屋看起来像守夜人的小屋。那辆车没有轮子，车身架在几块水泥砖上，离正房只有几码远。是汽车炸弹吗？

他们为什么把简易爆炸装置绑在他们自己院子中间？那块砖是假的吗？一个伊拉克士兵喊了起来，一个穿着蓝色长衫的虚弱老人从小屋里犹犹豫豫地走了出来。两个裹着黑纱的体格魁梧的女人从门洞里探出头来，看着我们。

那个伊拉克士兵又喊了一声，老人拖着破烂的棕色便鞋朝那个狗笼子走去。我一下明白了，那不是简易爆炸装置。

我走过去，看见笼子里有鸟在筋疲力尽地扑腾着。笼子的一边就搭在

那块缠着金属线的砖上。

伊拉克士兵开始询问老人，我听不懂他的回答，但是我注意到他说话含混不清，瞳孔有些扩大，汗水沿着脖子淌了下来。

我问翻译：“他们用笼子干什么？”

“抓鸟。”一个伊拉克人说。

另一个人做了一个手势，告诉我他们吃抓到的鸟。我想，什么鸟？是鸽子吗？我知道，费卢杰的工业区几乎全关门了，失业率暴增。难道人们就靠吃鸽子活着吗？

老人晃晃悠悠地走到小屋外的一个箱子上坐下，他发出了一声呻吟，右手伸向地面，左手抓住胸口。他倒下了，蜷缩着躺在地上。

那两个女人开始尖叫。一个伊拉克人告诉我，她们在喊：“他需要他的药，他的心脏病很厉害。”

我们的医生跪下一条腿，检查他的脉搏，女人们还在尖叫。

一个伊拉克士兵和那两个女人走进那间小屋，他们争着拿老人的药。另外两名伊拉克士兵也要朝那小屋走去，我说：“医生拿到药了，散开，别站在那里不动。”我们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街道那边有两栋二层小楼可以俯瞰我们，如果那两栋楼里有狙击手的话，想打我们可太容易了。我从躺在地上的老人身边走开，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我希望这老东西可别死了，真他妈头疼！”

这处住宅没有问题，我们搜查完出来时，老人已经重新坐到箱子上，正喝着水。

“他看上去很好。”医生说。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朝边上扫视了一眼，吐了口口水说：“简直再好不过了，好得可以在他的狗洞里继续吃鸽子。真他妈的！”

特哈维斯转过头来问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有一会儿了，”我说，“我们得考虑那边可能已经有狙击手把枪架好了，正等我们出门呢。那扇门是唯一的出口，我们得把门完全打开，这样就不用挤那个小门洞了，我们快跑出去的话，他们也很难打中我们。我们直接冲到街上去。他们肯定注意到我们是在一家店挨着一家店地搜查，所以我们要跳过下一家店，以防他们在那儿埋伏着等我们。”

狙击手已经成为费卢杰最主要的威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在街上，就会不停地移动。在街上和伊拉克人交谈时，我们也会前后左右变换位置。你得假定时刻有人正用瞄准镜的十字交叉线对着你的头，一停下来可能马上就会被狙击手击中。如果我们下了悍马车，上车之前司机会往前开几英尺，以防有狙击手一直瞄着车门位置等我们上车。

我们听到西面的一个街区传来 AK-47 步枪的枪声，电台里也传来了有轻武器射击的报告。就在一个街区以外，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人们竭力想杀死对方。但我们这条街目前还很安静。

我们又搜查了另外两家店铺，搜查任务就此结束。巡逻队摆出了防御阵型。我单腿跪在一个水泥路障后。这样，在等悍马车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就既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又能看清整条街的动静。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出现在我们头顶上空，螺旋桨下的金属机身向前倾斜着，好似一只随时准备发起攻击的猛禽。

悍马车队把我们带回城市中心的海军陆战队基地。我走进去准备脱掉防弹衣，这时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一阵呼喊声。我跑进大厅，只见一片混乱，就像在学校里打架的样子。伊拉克士兵围成一圈，正在踢打一个倒在地上的人，那个人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呻吟着、哭喊着。那个家伙头上套着头罩，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海军陆战队员们把愤怒的伊拉克士兵和那个带着头罩的俘虏隔开后，我走到一个伊拉克士兵面前，他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大腿，狂怒充血的眼睛红红的，张着嘴，露出满口的牙，仰头发出一阵哀号声。另一个人泪流满面，不停地想去踢那个俘虏。喊叫声越来越大，伊拉克士兵们用阿拉伯语朝海军陆战队员们大声叫喊着。人们开始用手指着对方，进而推搡了起来，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都汗流浃背、饥饿、筋疲力尽，而且都全副武装。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把俘虏从地上拉起来，一个狂怒的伊拉克士兵抡圆了拳头把他打倒在地。我听到隔壁房间里也传来了叫喊声，我意识到那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约尔·庞德瑞尔跑进房间，然后他又回到我身旁，我们一起对伊拉克士兵喊："冷静，冷静。"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冲进了走廊，手里端着步枪。我观察着整个房间的动静——伊拉克士兵们，他们狂躁的眼睛，他们的武器。哪怕只有一个人做出一点愚蠢的举动，这件事就

会马上变得糟糕透顶。我的手枪就在腿上的枪套里。

阿里上校走了进来，他身高有6英尺2英寸，这让他在伊拉克士兵中间显得鹤立鸡群。他留着寸头，黑色的八字胡，据说曾是萨达姆·侯赛因时期的伊拉克特种部队成员，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入侵过科威特。我们希望这个曾经的敌人现在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他左手拿着一支AK-47冲锋枪，用阿拉伯语大声喊着，接着他又喊了一遍，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只剩那个满脸是泪的伊拉克士兵还在殴打那个俘虏。我们这时才弄清楚情况。那个痛哭的士兵的朋友在那天早上的炸弹袭击中被炸身亡，而引爆炸弹的正是那两个俘虏。痛哭的士兵又一次朝俘虏大喊了起来。阿里上校朝那个士兵走了过去，他倒退了几步，退到墙边。阿里上校对他大声喊叫着，那个士兵也朝阿里大喊。阿里一晃肩膀，把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管狠狠地顶在那个士兵的胸口。整个房间终于安静了下来。

我们的两个医务兵让俘虏坐下，检查他们的伤势。在此期间，我了解了此前的情况。原来，另一支巡逻队沿着路边炸弹的起爆线追踪到了路边的一间小屋。见有士兵靠近，两个人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伊拉克士兵追上去抓住了他们。虽然那两个人辩称他们什么都没做，但伊拉克士兵们觉得不对，就算他们没有引爆那枚路边炸弹，当他们看着伊拉克巡逻队向炸弹走近时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海军陆战队队员的纪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冷静，愿意用自己的身体隔开愤怒的伊拉克士兵和被抓到的叛乱分子。但在伊拉克，对俘虏的处理工作简直是一团乱麻，不但美国人不满，伊拉克人也不满。美国在伊拉克最受诟病的活动就是对俘虏的处置。

任何一个美国政府部门都无权在伊拉克建立一套有效的司法体系。美军负责抓人，美国司法部负责建议，美国国务院进行联络，伊拉克人则不知道该干什么，情况一片混乱，结果对伊拉克武装分子抓了放，放了又抓。这种滑稽的循环体制简直就像是专门设计用来让伊拉克武装分子在监狱中变得更加激进的，对于打击武装叛乱活动毫无助益。

不管我们的怀疑多么有道理，我们也只能把俘虏扣押几个星期。最死硬的基地组织老手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一般都可以顶住我们高级审问员的

所有手段。如果基地组织俘虏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沉默，他们就很快会被释放。结果那些没什么情报价值的人（比如说为了几块钱去路边埋炸弹的人）会招供，而基地组织的高层人物却什么都不会说，然后就会被释放。有很多时候，尽管我们强烈怀疑某人就是基地组织分子，但我们还是被迫要释放他，结果没过几个月，就会有人递给我们一张照片，上面就是这个人，穿着我们上次抓到他时给他穿的橘红色囚服，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得抓住这个家伙！"

除此之外，还存在监狱空间不足和审讯员短缺的问题。如果海军陆战队某天抓到了7名可疑的武装分子，我们可能只能审问关押5个人。如果我们抓到了30个，我们可能还是只能关5个人。

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中表现出的荣誉感沦丧和纪律涣散现象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军方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收回了现场指挥官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权。比如说，某一俘虏的正常拘留期已满，指挥官认为最好能再多扣押他一星期，此时指挥官就需要获得华盛顿的批准，并且获得这种批准非常困难。虽然我不是专家，但在我看来，申请延长拘留期的程序变得如此困难，致使很多指挥官几乎不再提出此类申请。

我在伊拉克遇到的所有人里面，最了解伊拉克俘虏问题的是海军陆战队一个在费卢杰与伊拉克警察一起工作的一等兵。我们谈了半天时间，他向我介绍了费卢杰警官们的个性、他们的行动方法、他们的缺点、失误和糗事儿。他告诉我，伊拉克警察有他们自己的监狱系统，与美军军方的监狱系统是分开的。当我问他费卢杰警察把犯人关在哪里时，他说："你想去看看吗？"

"当然了。"

我们穿过营地，陪伴我们的是一个惴惴不安的胖翻译，他不停地嘟囔着："我们应该跑，或许迫击炮要打过来了……"我们穿过一扇门，走下几级台阶。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气味，有人体的气味、汗味、尿味，还有恐惧的味道。这里就是羁押所。

在一段狭窄的水泥台阶尽头，一个伊拉克警卫斜靠在椅子上，脑门上粘着几绺油腻腻的头发，警察帽子扣在后脑勺上，腿上放着一支AK-47步枪。我们转向右，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又看到两个伊拉克警察坐在那里

值守。

一等兵通过翻译问我们能不能看看拘留室，一个伊拉克警察站起来走向铁门。铁门上在我眼睛那么高的地方有一道狭窄的槽口，那个警察伸手拉开了槽口的遮板。

我向前走了一步，感觉到一股闷热、沉重的空气从槽口冒了出来，被拘押人身上的恶臭直冲我的鼻孔。我透过小口往里看去，看到几十双或游离或呆滞的眼睛也在盯着我看。

好像所有人都在里面站着。难道是太挤了坐不下？他们捕捉到了我的眼光。他们是俘虏，我是自由的。他们可能整夜站在那里，然后是整天，然后再是整夜……

警卫把槽口关上，我转过身。

那几十个人像动物一样被塞在一间小囚室里，他们在哪里小便？能给他们多少水喝？伊拉克警察完全是在美国权限和影响之外行动。犯人们会被拷打吗？难道任凭他们在里面自生自灭吗？

我们的整个指挥体系都知道这座监狱，但伊拉克警察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我知道我们在巡逻中会抓到多少无辜的人，我想伊拉克巡逻队也同样会抓来无辜的人。

当无辜的人在战争中死伤时，我们会想到战时的“附带损伤”。囚室里有些人是恐怖分子，但我知道，至少有一些看着我的眼光属于那些无辜的人。

美国人可以辩解说我们与伊拉克警察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我们在和他们并肩作战，我们在那里，我在那里。那些面对这种苦难只会耸耸肩然后转过身去的人给出的反应都一样——“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我之所以参军，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无辜的人，觉得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战斗。但有一点是无可回避的：无论战士的纪律多么严明，当我们拿起剑时，必定有无辜的人遭受苦难。

痛苦是希腊文学和哲学的一大主题，在西方世界第一个战争故事《伊利亚特》中，荷马刻画了战争给无辜的人造成的伤害。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马克，在失去她所有的家人后，请求丈夫退出战斗，她说：

“你，赫克托尔，你现在是我的父亲，我高贵的母亲，也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丈夫，年轻、热情、强壮！”然而，赫克托尔还是返回了战场。他战死了，特洛伊城破之时，安德洛马克沦为奴隶，她刚出世的婴儿被从城墙上抛下。在我的一生中，我不断地读希腊文学，因为希腊人的思想都是根植于现实的，哪怕是以戏剧或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也一样。

希腊人经常讨论“实践智慧”。这个概念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我们有时会说“知识”或“常识”，但“实践智慧”的含义更加丰富。它是一种能力，可以让人知道“要做什么”，同时也知道“什么值得去做”。

“实践智慧”能让士兵勇敢作战，也能让领导人英明领导，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只能从经历中获取。我自己在卢旺达、伊拉克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历并没有把我造就成军国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要继续做出艰难的决定，决定什么时候拔剑。我也认识到使用武力既是必须的，也是有缺陷的。无论什么学术流派也改变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艰难的决定最好由优秀的人来做，而最优秀的人只能在艰难的经历中造就。

巡逻后，人们洗干净脸，擦干净步枪，把速冻比萨饼盒子扔进微波炉里。我们总结完情况，然后和伊拉克同行一起坐在长桌旁，开始吃这顿延误了的午饭，有黄瓜、西红柿、盐巴、豆子和羔羊肉汤。

由于语言障碍和疲惫，我们很少谈话。但大家一起吃饭是件很有人情味儿的事情。等我们吃完午饭起身时，刚才那场争执中造成的裂痕看上去已经平复了。

夜幕降临，我们围在一个小电视前，看最新的007电影。筋疲力尽的我们开始说些傻话，拿所有那些高级“特工”玩意儿开玩笑，说我们需要那些东西才能在费卢杰赢得战争。“嗨，约尔，我觉得你得把那些设备装到你的悍马车上。”这种玩笑并不好笑，但我们还是大笑起来。

电影结束后，我们带着观影后的恍惚走回自己的铺位。按照计划，这是我在费卢杰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觉得还算舒服。我绝没想到一个伊拉克人当时正在计划一场自杀式袭击，而且在我们醒来之前，他就会来找我们。

第十一章

没有结局

支努干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传来，黑色的天空里慢慢出现了它灰色的剪影。我站在跑道外 30 码的地方，脚边放着我的背囊。直升机降落下来，激荡起一片尘土，尽管我带着耳塞，但双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依然让我觉得震耳欲聋。我和战友们握了握手，拿起两个装得满满的帆布背囊，慢慢跑向直升机。对我来说，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和飞扬的尘土通常预示着即将发生什么。走上坡道进入机舱时，我有一种熟悉的兴奋感觉。

支努干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传来，黑色的天空里慢慢出现了它灰色的剪影。我站在跑道外30码的地方，脚边放着我的背囊。直升机降落下来，激荡起一片尘土，尽管我带着耳塞，但双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依然让我觉得震耳欲聋。我和战友们握了握手，拿起两个装得满满的帆布背囊，慢慢跑向直升机。

对我来说，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和飞扬的尘土通常预示着即将发生什么。走上坡道进入机舱时，我有一种熟悉的兴奋感觉。我把背囊放到舱内的地板上，迈过蒙着眼、反剪着双手坐在地上的伊拉克犯人。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被从家里拽了出来，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直升机上，周围是陌生的气味和声音，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哪里。

这架直升机专门配属给我们这支特遣部队使用，机舱里坐着一队留着大胡子、穿着特制军服的特战队员，手中轻巧地握着步枪。他们身旁坐着些地方承包商，其中一个承包商穿着崭新的防弹衣，但防弹衣一点也不合体，高高地悬在他的大肚子上。

在漆黑的夜幕中，直升机停了许多站。机长在每一站都会举起一个标牌，上面写着拉马迪、巴格达或其他一些基地的名称，告诉我们降落在哪里。一些特战队员下去，又有一些上来，直升机的螺旋桨一直在旋转。当我们离开巴格达飞往拜莱德时，我想，这是我在伊拉克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航程的最后一站。按照计划，我将在拜莱德空军基地登机回家。我靠直升机的右舷坐着，隔着机枪手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任由思绪飘荡。我要去弗吉尼亚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绝顶聪明、热情奔放、顾盼生情的眼眸

能一直照亮我的世界。我沉浸在和她一起在沙滩上漫步的美好幻想中。

明亮的红色曳光弹从我们旁边掠过，划破夜空。我希望我们的机组做出反应，紧急倾斜转弯，舱门机枪手还击，但我们还是一直往前飞，曳光弹仍然在夜空中飞舞。我们为什么不做规避动作？过去的几个月中，在伊拉克上空有6架直升机被击落。我想给自己一些解释。或许那些是我们自己的曳光弹。但它们打得太近了。曳光弹依然在我们身旁呼啸而过，而我们的驾驶员依然保持着同样的航线。

我想，不要是现在啊，这可是我此次任务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飞行的最后一站啊！这时直升飞机向右急转，几枚曳光弹擦着机身飞过，机枪手也终于扣动了扳机，子弹朝地面倾泻而去。

当我们在拜莱德空军基地安全着陆时，我知道，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被一枚乱打的迫击炮弹击中，在食堂里差点被一条火鸡腿噎死等等——我马上就要安全回家了。我疲惫地走向基地里属于我的那张床，扔下背囊，脱掉防弹衣。我解开沙漠迷彩上衣左胸口袋的扣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天主教朋友送我的圣·克里斯托弗的纪念章、一个佛教朋友送我的小经轴、一个新教朋友送我的天使硬币、一个犹太朋友送我的哈姆萨[1]，一个印度教朋友送我的刻有印度神明的硬币。在执行此次任务前，我觉得拒绝哪个祈祷和保佑都不好，就都带在了身上。我不敢肯定是哪个起了作用，所以当我脱下军装时，我笼统地说了句："感谢神明。"

回到家后，我给约尔·庞德瑞尔打了电话，他在费卢杰头部负伤，然后被直接送回弗吉尼亚。那天早上卡车炸弹袭击发生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约尔在电话里对我说："他们在我脑袋里安了一大堆钉子，海军陆战队要把我送去心理医生那里，看我是不是疯了。可问题是，爆炸之前我就已经是个疯子了，他们不可能分辨出我有没有变化。"约尔告诉我，他很快就能打高尔夫球了，他的家人也很高兴能够一家团聚。我们决定见个面。

三个星期之后，我仍然在熟悉回家后的作息规律。我下车的时候，手机响了。

"嘿，埃里克，我是约尔。"

---

[1] 犹太教护身符。

“嘿，老兄，怎么样了？”

“我听到了个坏消息。”

“啊？什么？”

“昨天，特哈维斯·曼宁在费卢杰阵亡了。”

我站在路上。一辆红白相间的出租车在停车标志前减速，然后又加速离开了。

约尔说：“我是今天早上听说的……”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见到特哈维斯时的情景。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那天，特哈维斯径直跑过营地，手里端着步枪，身后跟着海军陆战队员，他带队来援助我们，第一个跟我在屋顶上会合。

当凯斯维柯救护车队来把伤者送往费卢杰医院时，我问特哈维斯：“行吗？”

“行。别担心，我在你背后呢。”

“照顾好你的人”是军队指挥官的一项必备素养。我的人不光是海豹突击队队员，或者特种作战舟艇大队队员，或者我的猎杀小组成员。当我们在海外服役时，所有军人都是一家人。每个人都远离亲人，出生入死，每个人都在忍受漫长、炎热的日子，听着同样的烂笑话，看着同样的旧杂志。每个人都失去了朋友。如果我们能在执行任务时照顾自己人，难道我们回家后就能撒手不管？

我和约尔与曼宁的家人见面后，我决定去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探望伤者。当我走进医院的时候，我想，我自己没躺在这儿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运气。如果一枚火箭弹瞄得再准一点，如果自杀式卡车炸弹再近两英尺引爆，如果打向直升机的炮弹击中了目标，我可能已经躺在这里的一张床上了。

我推开一间病房沉重的棕色房门，一名躺在床上的年轻士兵转过头，看着我走进病房。他的脖子上缠着纱布，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喉咙。

“你怎么样？”我问他。

他在一个黄色的标准手写板上写道：“很好，在这之前，我在那边一直觉得很有意思。”

年轻的妻子红着眼圈坐在他身旁，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大多数陆军伤

员都在华特里德陆军医院，而这个士兵由于治疗上的某些原因，被送来了这里——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我和他开玩笑说，海军医院可是敌人的领土。他写道："海军实际上还不错，某些人。"他笑了。我们又聊了几句，当我走出他的房间时，我在想，这小伙子出院后会做什么呢？

我走进另一间病房，里面有个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右肺被切掉了一块，右手也残疾了。他用左手抓住了我的手，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母亲驼着背坐在他旁边。我感觉她好像已经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担心、烦乱和心痛。我猜这个海军陆战队员大概有19岁到20岁的样子，他让我想起了很多和我一起战斗的人。我好像看到他在东南亚闷热的早晨擦拭着武器，看到他在肯尼亚执行任务前拨动旋钮检查电台频率，看到他在伊拉克一次夜间巡逻前穿上防弹衣。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问他在哪里服役，怎么受的伤，是哪里人。我问他："你伤好了之后想干什么？"

"我想回部队，长官。"

我点头说："我知道，你的弟兄们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在生存、躲避、抗拒与脱逃学校，我们学到了"斯托克代尔悖论"。这个悖论因詹姆斯·斯托克代尔海军上将而得名，他在越南当了七年半战俘，回国后因为在战俘营非凡的领导能力荣获国会荣誉勋章。斯托克代尔教导我们，作为领导者，你必须接受现实，正视所处的严酷处境，但与此同时，你必须保持希望。

残酷的现实是，这个海军陆战队员再不能随他的部队一起重返战场了，那么他怎样才能保持希望呢？在克罗地亚、卢旺达、玻利维亚、印度和其他很多地方，我看到了人们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重新生活。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能立刻重返部队，你想做些什么呢？"

他说："我也想过一点儿。我童年的成长经历很糟糕，海军陆战队是我呆过的最好的地方，他们把我的生活带入了正轨。我想也许我会回家吧，也许能当个教练。也许我能回家给孩子们当个教练或辅导员。"

在另一间病房里，我和一位失去了双腿的海军陆战队员聊了一会儿。他的头在部队里剃得干净利落，他的上身还是那么孔武有力。

我问他："你恢复健康后准备干什么呢？"

“回我的海军陆战队，长官。”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后，我问他：“如果你不能马上回去，你想做些什么呢？”

“我想，可能会希望留在贝塞斯达吧。我想帮其他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恢复健康，让他们知道还有希望。我刚刚知道自己失去了双腿时感觉非常失落。但我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帮助了我。所以我也想帮助其他人走出低谷。”

我后来又和一个被路边炸弹炸伤的海军陆战队员谈了一会儿。

“你的听力怎么样了？”我问他。

“一只耳朵还不好，另一只耳朵好多了。医生说他们认为我的听力会恢复的，我也希望两只耳朵都能很快恢复。”

他的父亲靠着墙站着。当我问他如果不能回到部队的话想做什么。他说自己可能想当一名老师。他的父亲说：“我们商量过了，他会回去上学，去获得教师资格。”

那天当我离开医院时，我知道有很多人曾来探望过这些军人，来对他们说“谢谢你”。这些探望者里有军人、政府官员、名人、朋友、男童子军、女童子军，他们都会对他们说：“感谢你的奉献，感谢你的牺牲。”我们军人无疑都会感激这些，因为“谢谢你”这句话对他们意义重大。

但我也发现这些军人们需要听到一些别的话。除了“谢谢你”，他们还希望听到“我们仍然需要你”。他们需要知道我们没把他们当成累赘，而是当成财富，我们没把他们当成弱者，而是强者。他们需要知道我们很高兴他们回国，我们在国内也需要他们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

在和波斯尼亚的难民和卢旺达的幸存者一起工作时，我发现如果人们能够帮助他人，那么不管他们失去了多少，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在难民营和流浪儿童救助站工作的那些日子让我知道，想帮助人们在巨大的挑战面前重建新的生活，关键不在于我们给他们些什么，而是他们自己做些什么。

我们的伤残退伍军人已经失去了很多，有的失去了视力，有的失去了听力，有的失去了肢体。所有伤病都能康复。但如果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那将是致命的打击。我也知道没人能给他们希望，他们必须通过行动

创造希望。

离开医院后，我做了些调查，发现有超过100个组织在为这些受伤的勇士服务，有的资助阵亡官兵的孩子接受教育，有的帮助受伤退伍军人建造合适的住宅，使他们能够克服伤残的影响独立生活，有的为退伍军人们提供律师服务。

我发现很多组织都愿意给予他们帮助，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请受伤的退伍军人们继续“服役”。

我希望在欢迎伤残退伍军人回家时，不仅要给他们慷慨的帮助，还要给他们挑战。

所以我捐出了自己的作战津贴，创办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退伍军人组织，我的两个朋友也为此拿出了自己的残疾抚恤金。我的组织名为“任务继续”，为非赢利性、慈善和公益组织中服务的伤残退伍军人提供奖金，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派顾问帮他们规划加入我们组织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给他们挑战和机遇，使他们能在自己的家乡再次为社会服务，并借此重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当我以志愿者“总裁”身份开始工作时，一个好朋友建议我重新考虑一下我的计划。“你准备怎么挣钱呢？你准备怎样养活自己呢？”

我想起了杰森和卡洛琳夫妇，他们把一切都投入到了为玻利维亚流浪儿童的工作中。我想起了在印度瓦蜡纳西为贫病濒死之人开办的庇护所里的修女们，想起了拥入卢旺达的救援人员们。我还想到了伊尔·布莱尔，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教年轻人打拳。我知道在他们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们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坚信只要自己做正确的事，所有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

如果想打造一种服务文化，我必须以身作则。我知道有些奖励基金专门用来扶持创新组织的领导人。如果我领导出色，我可能能为自己争取一份奖金，用于自己的生活。这将会是一大挑战，但如果我想让别人接受挑战，就必须先挑战我自己。

汤姆·曼宁和珍妮特·曼宁激励了我，他们建立了特哈维斯·曼宁基金会，其座右铭是：“不是我，会是谁……”我想到了我自己。我曾经置身世界上最恶劣的处境，从那些把痛苦转变成智慧、把苦难转变成力量的人们

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公共服务组织，而由于我的军旅经历，我更加理解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我们穿着同样的战靴，拿着同样的步枪。不是我，会是谁？

我也想到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里的那些小伙子，想到了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他们在海外服役，在那里负伤，我现在要让他们在家乡打造新的生活。如果我要求他们这么做，我就也得要求自己这么做。

在地狱周里，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那个帐篷里——当时我一心想着自己的痛苦和恐惧，因此变得软弱。这里的情形也一样，如果我问："我准备怎么养活我自己？失败了怎么办？遇到困难了怎么办？"然后，我也会变得软弱。但我想到了约尔，想到了特哈维斯，想到了所有那些为重建生活而战斗的伤残退伍军人们，我变得更加坚强。

我集中精力，一次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克里斯·马文正在从理疗中心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朋友肯·哈勃在收音机里讲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肯·哈勃正在讲小时候爷爷讲给他听的战争故事。克里斯把车开进自家车道之后，关闭了发动机，却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今天的子弹和过去的没什么两样，都那么杀气腾腾，我见过它们造成的伤害。但是现在，还有我爷爷从没见过的简易爆炸装置、自杀式汽车炸弹和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战争故事永远都不会再像我小时候听到的那样了，我已经看过了所有故事的高潮。是的，我还在和一个被截肢的人一起大笑，他开玩笑说自己弄没了价值300美元的文身。但我知道他那时的痛苦是多么真实。他告诉我他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住更多弹片，保护住他们班里的战友。"

泪水从克里斯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三年前，克里斯乘坐的黑鹰直升机在阿富汗上空的行动中坠毁。他摔断了双腿和一条右臂，右半边脸粉碎性骨折，双膝、髋骨、两肩严重受伤。当有人跑向飞机残骸时，他还有一点意识。

"飞机着火了吗？"克里斯气喘吁吁地问。

"没有。"那个人说。

"我是最糟的一个吗？"克里斯问道。他想，如果我伤得最重，那其他人就应该没事了。

肯·哈勃所描述的——一个人因为没能挽救战友的生命而感觉失

败——正是克里斯在飞机坠毁后的感觉。在听到那段讲述之前，没有人把在服役中造就的牺牲精神和战友情谊用语言这样清楚地表达出来。

收音机里的这段讲述结束后，主持人介绍说："讲述人肯·哈勃是退役海军飞行员，他正在一个非赢利性组织里工作，旨在帮助伤残退伍军人志愿为社区服务。"

克里斯想，我也是个受伤的老兵，我要联系这个人。克里斯·马文成了我们第一个奖金获得者。

作为奖金获得者，克里斯和其他受伤的战士一起服务。他牵头服务项目，向其受伤的朋友提供建议，和我们一起建立工作模式，帮助伤残退伍军人重新服务家乡。克里斯帮助数十个伤残军人迈开了新生活的第一步。现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依然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积极分子。

尽管向克里斯提供奖金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工作依然举步维艰。我住在一间空荡荡的公寓房里，睡在充气垫子上。在我们承诺给付第二笔奖金后，我准备动用自己的信用卡来支付这笔钱。

2008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数十人前来参加我们的开放日活动，这其中就有我们第二个奖金获得者，马修·特罗特。

马修是一位有 11 年军龄的海军老兵。在 2004 年下半年的一次船上事故中，他两脚跟腱撕裂，还有一些碎裂的小骨头碴儿扎进了脚底的肌肉里。他每次一走路，碎骨就会刺进他的跟腱。他接受了修复手术，但在康复过程中，由于打着石膏的双腿无法伸直，疤痕组织进一步损伤了他的腿部神经。

当医生打开石膏后，马修试着走路，可是"每一步感觉都像是走在钉子上"。极度折磨人的痛苦从脚跟向上蔓延到他的双腿，直到腰背部。因为无法再进行体能锻炼，他一下长了 150 磅。他努力想回到船上，回到战友们中间。但在他的第四次手术后，海军给了他一份调离文件。第一页底端"退伍原因"一栏里，写着"服役人员不能胜任船上职责，因此不能继续在海军服役"。马修在海军航空兵服役了 10 年，有时也会填写一些表格，申明某种武器"不堪使用"，现在，他感觉自己也被盖上了"不堪使用"的印章。

回到家乡德克萨斯后，他搬进了一辆活动房车，靠残废救济金生活。

没有人肯雇用他。“那是我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刻，我以前管着160人。而那时的我就像跌到了谷底。后来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我进一步沉入深渊。”2007年下半年，马修听说了“任务继续”组织。当我们和马修交谈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问过每一个伤残退伍军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你，你打算怎样继续服役？

马修告诉我们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一直喜欢和马在一起，跟孩子们在一起。于是我们联系了德克萨斯一个名叫“马帮助残疾人”的非赢利组织，这个组织擅长将骑马作为治疗手段，帮助身体或精神不健全的孩子。

在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支付给马修薪金，让他当那些残疾儿童的辅导员和行为榜样。马修和孩子们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出色，简直难以置信，他后来主动探访了位于圣安东尼奥的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的烧伤病房。站在物理治疗室中，对一些几乎是全国伤得最重的退伍军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马疗法是一种物理疗法，只不过是这种疗法要跟马呆在一起。任何在地上能做的物理疗法，在马背上也能做。当我开始接受物理治疗时，我仅能走100码。接受了马疗法之后，我可以骑着马跑上6英里。你既能锻炼你的上半身，也能锻炼下半身，还会使心脏、胳膊和腿变得更有力量。在治疗前，我得拄着拐棍走路。治疗后，我已经有几个月没碰那东西了。”

在他现身说法之后，马修问大家：“现在，有多少人想去马疗中心，和马一起做些治疗呢？”

理疗室里的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但是，”马修说，“我不打算带你们任何人去。”

退伍军人们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我不打算带你们任何人去，”他暂停了一下，说，“除非你们在完成治疗之后能回到‘马疗’农场来做志愿者，给来农场进行治疗的孩子们当辅导员。”马修解释说，当他向自己发起挑战，准备重新开始服役时，他的生活就已经改变了。现在，他准备向这些伤员发起挑战，让他们开始重新服役。

当马修从我们这里拿完6个月的奖金后，他被马疗法中心聘为全职雇员，继续给残疾儿童当行为榜样和辅导员。他还会坚持指导一群退伍军人作理疗，然后他们也会回来给孩子们做辅导员。现在，马修用业余时间去

学校学习，想成为注册理疗师，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在“马帮助残疾人”中心工作。

马修成为会员之后，我用特哈维斯·曼宁的名字命名发给他的奖金，以示对曼宁的尊敬。我还邀请了珍妮特·曼宁来圣路易斯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她在那儿见到了马修。马修告诉她：“这份奖金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每天都在努力生活，实现曼宁的价值，延续他所代表的精神。”

他接着说：“我衡量自己目标的尺度是‘这个小伙子能走了’或者‘这小伙子的手能动了’。这件工作的回报太丰厚了，它让我能够帮助其他人，他们可能和我有着相同的处境，也可能比我还糟。我把退伍军人们带了进来，他们一旦完成治疗，就能去帮助治疗项目中的孩子们，以此回报社会。我们用军人作孩子们的行为榜样，激励孩子们努力康复。”

我后来讲话时，我看到妈妈和珍妮特·曼宁坐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哭泣。我很清楚，坐在那儿说话的本来很可能是特哈维斯，那样的话播放牺牲者生前影像的就不是珍妮特·曼宁，而是我的母亲了。那天以后，我做了几百次讲演，讲述我们的工作。那是我最艰难的讲演，但当我看到妈妈和珍妮特肩并肩坐在一起时，我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从最开始时的举步维艰直到现在，“任务继续”组织已经向100多名克里斯和马修这样的伤残退伍军人颁发了奖金。2008年10月，美国总统来到圣路易斯，高度赞扬了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致敬服役计划”中，男女军人们聚在一起，在那些已故军人的家乡的社区进行服务，为他们“继续完成任务”。我们相信，向这些逝去的人表示敬意的最好方法就是践行其价值观。以伤残退伍军人作为勇气榜样，我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超过1.2万名志愿者，在遍及全国各地的社区里进行了超过7.5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寻找生命意义》一书的作者。他曾这样写道，人们通过三种方式创造活着的意义：工作，人际交往，以及在面对无法避免的苦难时做出的选择。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苦难和考验，也有使工作和爱充满意义的无限可能。

我逐渐认识到，勇气和同情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每个战士、每个人道

主义者、每个普通人都同时具备这两种品质。事实上，为了赢得战争，为了创造和平，为了挽救生命，哪怕只是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既善良又强大。

最近，我在弗罗里达州坦帕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服预备役。我和一个海豹队员一起长跑，快跑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尊战士雕像，他独自一人，全副武装，双眼望向前方。他是在小憩吗？是在行军吗？是在站岗吗？在他身后的墙上，刻着逝去的战士的名字。我们走向那面墙，寻找着朋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地看着，但是……

“噢，他们在这儿呢！”

我走过去，我们两人用手抚摸着那些名字，我们的同学，我们逝去的朋友。我们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我们走。”

我们默默地跑着。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能够认识那些可敬的人，与他们建立友谊。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活着，而这是种难以置信的恩赐。

我静静地坐在在密苏里州中部一座小木屋里，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小屋的墙上挂着一段名言：“我只能在这世界上走一遭。所以，如果我能做任何善事，如果我能向任何人表示善意，让我现在就做吧。我不要迟疑，不要漠视，因为我不能再活一次。”

生命是短暂的，生命也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今天，我们拥有彼此。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前线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任务继续……

后记和致谢

本书讲述的是我在海外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完成军事训练、参加反恐战争以及在美国领导公共组织的主要经历，并没有详尽地记叙我的全部经历，更没有完全涵盖与我并肩战斗的那些人们的突出贡献。我在这里只记录了一些关键事件的几个重要时刻，至于我在阿尔巴尼亚、墨西哥和白宫的经历，则被完全略过。

在与朋友们分享书稿的时候，我听到的最多的意见是：

你怎么没写我们在……的那段经历啊？

怎么没写差点遭到河马攻击？

没写我们掉了 20 磅，看上去像个游魂？

没写我们侦察任务险些失败？

没写我们给那个饥饿小女孩东西吃？

对那些没有在书里提到的人们，我只能说声抱歉。他们也许没出现在书中，但我永远把他们记在心里。

这本书描述的不是我的生活的全部。否则我会在书中更多地描写我的家人以及其他与我关系密切的人。我和很多优秀的人共事过，有特雷莎修女院的修女们，她们从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在最穷的穷人中间工作；有美军最出色的突击队员们，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朋友和我们的祖国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希望自己的记述能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们伟大的人生。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那些正在寻找自己在前线位置的人，帮助那些自己亲友正在前线服务或正在考虑去前线服务的人。人们经常问我："我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该怎么做？""哪些人能通过海豹训练？""我女

儿想去海外的一家孤儿院服务，我能让她去吗？”“我能为家乡服务吗？”或者“我能做点什么来帮助退伍军人吗？”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

这本书记述了我的经历，记录了我人生的低谷和高峰，也记录了我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它能对那些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人有所帮助。

记忆过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我很幸运，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在这一路上一直陪伴着我，帮我回忆往事，对我的记录作必要的更正。我的另一件幸事在于，我在旅程中拍摄了上万张照片，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除来往信件之外，我还查阅了电子邮件、备忘录、文件和报告等，我的同事蒂姆·李更是帮我对重点事件进行了采访和调查，但错误还是在所难免。比如说我在玻利维亚流浪儿童之家工作时，有个男孩去世了。这本书里讲了他的故事。但在我前一本书《力量与同情》中，我写他是因为断了一条腿才被医院接收的。我后来在地下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我在玻利维亚时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他最初的伤是锁骨骨折。这或许只是个细节问题，但细节决定成败，我尽量做到让所有细节正确无误，并对任何还存在的事实上的谬误承担所有责任。

书中提到的所有仍然健在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和特种作战人员，除了那些公众人物之外，我都使用了假名，而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我用的都是真名。还有两个人的名字是我起的，在卢旺达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叫“凯伦”的女人，还有我在难民营认识的那个叫“丹尼斯”的男孩。尽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真的不敢确定了。如果一直用“那个从德克萨斯来的金发女人”或“那个忧心忡忡的波斯尼亚男孩”指代他们，那就太拗口了。

在这本书里没有复合人物[1]，也没有复合场景。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很多人对我提供了帮助，我欠了他们一大笔人情债。我的文字顾问 E.J.麦卡锡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一直给我鼓励、建议和真挚的友谊。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集团的发行人布鲁斯·尼古拉斯从一开始就对本书充满信心，他极富洞察力的编辑能力为本书增色不少。

[1] 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技法，将几个原型人物在作品中融合为一个人物。

蒂姆·李做了极其出色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完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采访工作。他是个聪明而努力的朋友，他的幽默感更让他成为本书的一大助力。

我的亲朋好友是我最好的编辑，在此我要感谢：奥德丽. L. 雅各布斯，罗伯·格雷滕斯，马尔科·克雷腾斯，巴勃·奥斯伯格，谢娜·切斯特努特，西尔维特·布拉德和吉米·索妮，梅丽萨·道伯森做了出色的排版编辑工作，贾奎斯·恰佐德绘制了精美的图片，还有理查德·肖恩伯格，他毫不吝惜地允许我使用其拍摄的海豹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的那些精彩照片。我还要感谢鲍勃·霍尔登，他把房子借给了我几天，让我能够专心写作。

我曾和成百上千优秀的人一起工作过，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不敢一一点名，唯恐有所遗漏。谢谢你们。最后我还要感谢孩子们，感谢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感谢那些愿意让我融入他们生活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们，感谢那些愿意把故事讲给我听的人们。虽然本书远远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但我希望至少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他们的伟大。

[读秀信息]
作　者=（美）格雷滕斯著
形态项=２６ｃｍ
出版项=武汉市：长江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１１．１１
ＩＳＢＮ号=９７８－７－５３５４－５４３４－８
中图法分类号=Ｉ７１２．５５
原书定价=２９．８０
参考文献格式=（美）格雷滕斯著．
雄心铁拳　　海豹六队高级指挥官摄人心魄的回忆录．
武汉市：长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

内容提要=本书是一部海豹六队高级指挥官摄人心魄的回忆录，格雷滕斯这本感人肺腑的著作中包含着一个悖论：有时候只有你强大了才能行善，但另一方面，只有行善才能让你真正强大。铁拳与仁心必须合一，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Ｄｕｘｉ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４３９５＆ｄ=ＣＡ８７０Ａ９３Ｂ５０２０７８Ｄ５０９ＤＤ０３ＤＡＡ３Ａ７６６Ｆ